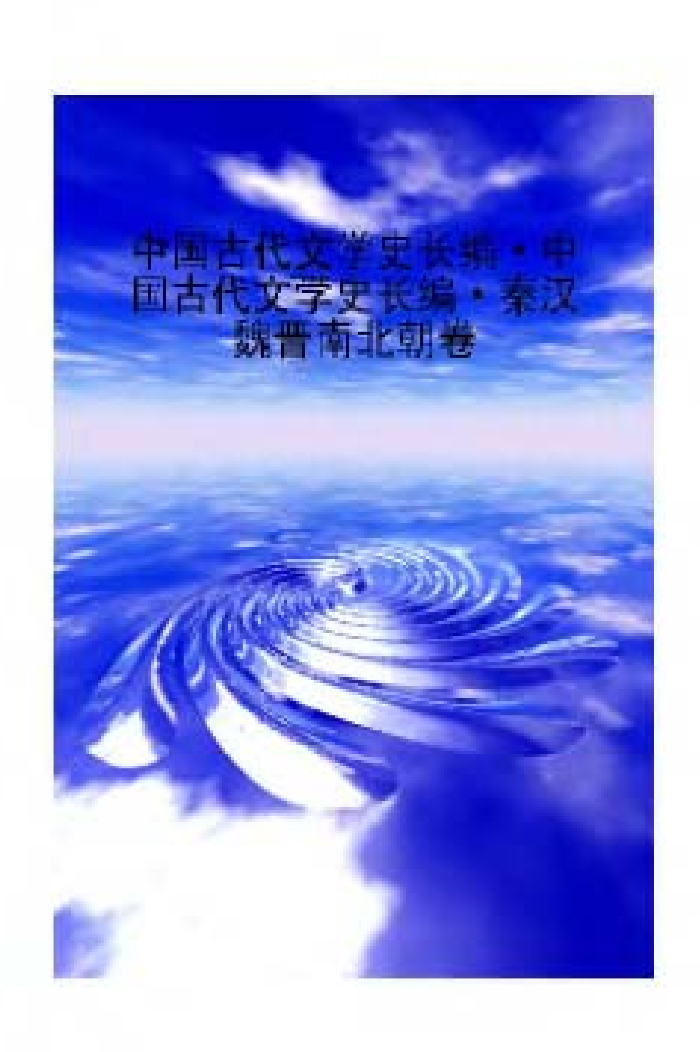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
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秦汉
魏晋南北朝卷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郭预衡 主编

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nup@mail.cnu.edu.cn www.cnup.cnu.edu.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郭预衡主编；万光治等编写．—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5（2000 重印）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ISBN 7-81039-405-3/G·348

Ⅰ．中…　Ⅱ．①郭…②万…　Ⅲ．①文学史-中国-古代-高等学校-教材②文学史-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高等学校-教材　Ⅳ．12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4332 号

ZHONGGUO GUDAI WENXUESHI CHANGBIAN
(QINHAN WEIJIN NANBEICHAOJUAN)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主编　郭预衡　本卷主编　万光治

书名题签　启　功　装帧设计　西　风
责任编辑　王超英　执行编辑　亻　聿
责任印制　晓　旭　责任校对　京　丽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E-mail　cnup@mail.cnu.edu.cn
网址　www.cnup.cnu.edu.cn
电传　68418523（总编室）　68472512（发行部）
北京首师大印刷厂印制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7-81039-405-3/G·348
版次 2000 年 8 月第 2 版
印次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7
字数 533 千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29.00 元

主编　郭预衡

编写（按姓氏笔画）

万光治

林邦钧

赵仁珪

段启明

熊宪光

编写说明

1. 本书配合《中国古代文学史》，按照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五个历史阶段，分编五卷。

2. 本书的内容包含两个部分：

(1) 文学史的纲要。

(2) 纲要引据的材料（包括史实、作品和评述材料）。

3. 纲要力求简明，眉目清楚。

4. 引据材料，力求精确，注明出处。一般注明著者、书名、篇名、卷次。但屡见或习见之书，一般只出书名，不出著者。如系转引之书，则加说明。一般不注版本。

5. 所引材料，尽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一般不录当代著作。有必要时，酌加补充说明，附以编者按语。

6. 全书五卷，体例力求统一。但因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编写方式也不尽一律。

7. 本书五卷册，皆为集体编写。每卷的执笔人是：

先秦卷	熊宪光
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万光治
隋唐五代卷	林邦钧
宋辽金卷	赵仁珪
元明清卷	段启明

序言

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是为了适应三种需要而编写的。

其一，给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某些教师提供一点讲授的方便。

其二，给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学生提供学习的方便。

其三，给自学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提供自学的参考。

编者从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感到讲授中国文学史，在基本教材之外，需要一部论述简要而资料丰富的辅助教材。尤其是在中小城市或边远地区图书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有了这样一部教材，就可以不必翻检群书而看到一些原始资料，用于教学，比较方便。

对于大专院校的学生来说，在不能人人自备参考书的条件下，有了这部辅助教材，也就可以补充所学的知识，且有助于自己钻研。

对于自学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有了这样一部教材，就可以得到文学史最简明的内容提要和较丰富的参考资料。

这部《长编》是配合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而编的辅助教材，已列入国家教委组织制定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本书的体例特点是：既不同于一般文学史，也不是资料汇编，而是介乎两者之间。既有文学史的基本论述，又附以相关的资料。论述部分，力求简要，引而不发，以供教者发挥，供学者思考。资料部分，摘引原文，力求精当。遇有歧义，则兼收数说，以供选择。

这部《长编》，和当今某些文学史著作的形式虽有一些不同，但从历史上看，却也并不新奇。名为“长编”，即取《续资治通鉴

长编》等书的名称，其体例也和《三朝北盟会编》等书有些相似。近人著作体例之相近者，则有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当然，作为文学史的“长编”，又和一般历史著作有所不同。

编者用心如此，希望于读者有益；但因水平所限，缺点实多，切望同行和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学术著作出书甚难的岁月里，风雨同舟，不胜感激。

编　者

目录

第一编 秦汉文学

第二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一编　秦汉文学



第一章

秦汉文学总论

第一节　秦统一后的文学

一　秦统一后的中央集权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之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又筑长城、修驰道、颁令车同轨、书同文、划一度量衡，以维护国家统一，加强君主集权。



（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绾等言："……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廷尉议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不师古。……太尉主兵权，丞相总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通典》卷一九《职官》一）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

（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邹枚路传》）

（始皇）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后诸侯力政……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许慎《说文解字序》）

二　秦统一后的文化专制

秦因戒惧于五百余年列国纷争的历史，对先秦学术的百家争鸣局面和士阶层的文化创造精神大为敏感和忌刻，从而导致焚灭诗书、坑杀儒生的悲剧发生。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齐人淳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列传》）



魏人陈余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吾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侯生、卢生相与讥议始皇，因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资治通鉴》卷七）

秦焚诗书，独存博士官。所职者则犹令其司经籍。然既曰通古今，则上必有所师承，下必有所传授，故其徒实繁。秦虽存其官，而甚恶其徒，常设法诛灭之。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传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数十人。然则秦之于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盖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一)

三 刻石之文与诏令奏议

因为实行"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的文化专制政策，秦的学术与文学，几乎一片荒芜。秦留给后世的，仅有为数不多的刻石之文和诏令奏议一类的应用文字。

秦始皇帝……又渐并兼列国，虽亦召文学，置博士，而终则焚烧《诗》《书》，杀诸生甚众，重任丞相李斯，以法术为治。……斯虽出荀卿之门，而不师儒者之道，治尚严急……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二十八年，始皇始东巡郡县，群臣乃相与诵其功德，刻于金石，以垂后世。其辞亦李斯所为，今尚有流传，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三十六年，东郡民刻陨石以诅始皇，案问不服，尽诛石旁居人。始皇终不乐，乃使博士作《仙真人诗》；乃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其诗盖后世游仙诗之祖，然不传。《汉书》《艺文志》著秦时杂赋九篇；《礼乐志》云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今亦俱失。故由现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五篇《李斯》)



第二节 汉初文学

一 汉初无为之治

公元前209年，陈涉起义，秦因暴政，亡于二世。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胜自立为楚王，居陈，遣诸将徇地。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三年，章邯等将其卒围钜鹿，楚上将军项羽将楚卒往救钜鹿。……二世自杀。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沛公遂入咸阳，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居月余，诸侯兵至，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秦竟灭矣。后五年，天下定于汉。(《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初承战乱之敝，百业待兴。统治者乃约法省禁，行无为之治，以期安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经济。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书·食货志》)



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汉书·刑法志》)

因社会经济亟待恢复，统治者无暇建立文化专制政策，黄老之学乃占主导地位，学术思想亦有相对自由。

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列传》)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

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史记·曹相国世家》）

二 汉初分封之制

汉初，刘邦分封功臣为异姓王，分封同姓子弟为同姓王。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汉书·诸侯王表序》）

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八载而天下乃平，始论功而定封。讫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汉兴设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为王者，其实古诸侯也，故谓之"诸侯王"。王子封为侯者，谓之"诸侯"。群臣异姓以功封者，谓之"彻侯"。大者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以为差降。（《通典》卷三一《职官》一三）

汉兴以来，封国与皇权的矛盾渐趋尖锐，以至酿成吴楚七国之乱。

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乱，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然诸侯原本已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汉书·诸侯王表序》）

（景帝前）三年，正月……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亚夫、大将军窦婴将兵击之，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二月……诸将破七国，斩首十余万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胶西王卬、楚王戊……皆自杀。（《汉书·景帝纪》）

汉初封君，大抵喜艺文，好养士。兼之去战国未远，纵横之学犹存，故这时的文人，皆不同程度地具有纵横之风。

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王中，则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文术者。楚、吴、梁、淮南、河间五王，其尤著者也。



……惟吴梁淮南三国之客，较富文词，梁客之上者，多来自吴，甚有纵横家余韵；聚淮南者，则大抵浮辩方术之士也。(《汉文学史纲要》第八篇《藩国之文术》)

三 汉初崇尚楚文化

先秦时期，因北方人士对南方楚文化的偏见与歧视，激发了楚民族对自己乡土文化的热爱。秦灭六国之后，这样的情感并未因之消减。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史记·项羽本纪》)

刘邦及其功臣皆起于楚地。建国之后，其于楚歌、楚舞、楚服、楚声的偏爱，有极深刻的政治、文化、地域心理等方面的原因。



汉兴，乐家有制氏……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汉书·礼乐志》)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秦既焚烧《诗》《书》，坑诸生于咸阳……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汉文学史纲要》第六篇《汉宫之楚声》)

四 汉初文学概貌

汉初文人鉴于春秋以来的战乱割据和秦以暴政亡国的教训，对

国家的统一，倍加珍惜。故汉初的文章，大都反思历史，指切时弊。贾山、贾谊、晁错等人政论而兼史论的文章，是这一时期散文的代表。

自三代讫于五季，为天下君而得罪于民，为万世所麾斥者，莫若秦与隋，岂二氏之恶浮于桀、纣哉？盖秦之后即为汉，隋之后即为唐，皆享国久长。一时议论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征，是以其事暴白于方来，弥远弥彰而不可盖也。尝试衰举之。

张耳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入关，为天下除残去贼。"陆贾曰："秦任刑不变，卒灭赢氏。"王卫尉曰："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张释之曰："秦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贾山借秦为喻曰："为宫室之丽，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託处……"贾谊曰："商君遗礼谊，弃仁恩，并心于进取……"又曰："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下憎恶之如仇雠。"晁错曰："秦发卒戍边，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又曰："任不肖而信谗贼，民力罢尽……外内咸怨，绝祀亡世。"（《容斋续笔》卷五）

这时的文章，既受战国纵横遗风的影响，又有较为自由的思想环境，其议论时事，不独能保持战国畅所欲言的作风，也具有雄辩的逻辑力量和充沛的情感力量。

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观晁氏之对，证验古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也。（《文心雕龙·议对》）

由汉至魏，文章变迁，计有四端……若贾生作论，（《过秦论》之类是。——作者原注，下同）史迁报书……虽记事记言，昭书简册，不欲操觚率尔，或加润饰之功，然大抵皆单行之语，不杂骈骊之词；或出语雄奇，（如史迁、贾生之文是，出于《韩非子》者也。）或行文平实，（如晁错、刘向之文是，出于《吕氏春秋》者也。）咸能抑扬顿挫，以期语意之简明。（刘师培《论文杂记》第九）



因楚文化的影响，汉初上层人士抒写情志，大抵以楚歌诗为主，且影响及于后世。

汉祖《大风歌》汪洋自恣，不必三百篇遗音，实开汉一代气象，实为汉后诗开创。若武帝《瓠子》、《秋风》、《柏梁》诸作，从湘累脱化，有词人本色也。(任昉《文章缘起》)

昭帝《黄鹄》、《淋池》二歌，皆乐府楚声也(《诗源辩体》)

高祖既定天下，因征黥布过沛，置酒沛宫，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自击筑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亦楚声也。……其后欲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因而废太子，不果，戚夫人泣涕，亦令作楚舞，而自为楚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

《房中乐》始于周，以乐祖先。汉初，高帝姬唐山夫人作乐祠，以从帝所好，亦楚声。至孝惠二年（前一九三）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又以沛宫为原庙，令歌儿吹习高帝《大风》之歌，遂用百二十人为常员。文景相嗣，礼官肆之。楚声之在汉宫，其见重如此，故后来帝王仓卒言志，概用其声……(《汉文学史纲要》第六篇《汉宫之楚声》)

汉宫既尚楚声，影响所及，文人乃以屈原《楚辞》为范本，衍为汉初骚体赋。

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文心雕龙·诠赋》)

爰自汉室，迄于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文心雕龙·时序》)



春秋之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即前所列楚辞是也。……两汉而下，作者继起，独贾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骚律，非一时诸人所及。(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第三节　武帝时代的文学

一　武帝时代的空前统一与强盛

从汉初到景帝数十年的经营，为武帝时代的经济繁荣奠定了

基础。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汉书·食货志》）

在此基础之上，汉武帝抑豪强、削封国，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统一。

（元朔二年）三月……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书·武帝纪》）

太始元年春正月……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同上）

武帝施主父（偃）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景（帝）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序》）

汉武帝更以武力消弭边患、开疆拓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武帝即位……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兵。单于不至，以故无所得。……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是岁元朔二年也。……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咸约绝幕击匈奴……票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使杨信使于匈奴。是时汉东拔涉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

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汉书·匈奴传上》）

汉诛西南夷，独滇复宠。及东粤灭国迁众，繇王居股等犹为万户侯。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粤起严助、朱买臣，朝鲜由涉何。遭世富盛，动能成功，然已勤矣。（《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书·西域传》）

随着汉帝国之兴盛，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弊病逐渐暴露并开始恶性膨胀，武帝的多欲政治与酷吏政治随之而起。

禹又言："……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汉书·贡禹传》）

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寝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死者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汉书·刑法志》）



二　文化繁荣与思想一统

由于武帝时代的空前统一、强盛，统治者开始在文化与人才使用方面实行兼容并包的政策。

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隋书·

经籍志一》)

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晁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汉书·司马迁传》)

上（武帝）方欲用文武之术，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响，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也。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但随着汉帝国的臻于鼎盛和社会危机的逐渐暴露，在制度上和理论上强化君主集权制度的历史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思想的大一统，乃成为武帝时期文化政策的一大特色。

建元元年冬十月……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三　武帝时代文人与文学的基本特征

由于武帝时期的空前强盛与政治、文化的大一统，汉初以来地域文化的影响退居其次，从而形成八方荟萃、气度恢宏的文化主流。如汉之乐府：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寓；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铿鎗闛鞈，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司马相如《上林赋》)

这时的作家，眼光与胸襟更为开阔。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司马相如《答盛览作赋书》)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

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兼综南北、融汇古今的以描绘帝国声威为主的散体赋。

古者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章学诚《校雠通义》)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肖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两都赋序》)

在史学的领域，更出现了在时空两个方面都极富于会通精神的《史记》。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迁之年代，后左丘约四百年。此四百年之中国

社会，譬之于水，其犹经百川竞流波澜壮阔以后，乃汇为湖泊，恬波不扬。民族则由分展而趋统一；政治则由革阀族而归独裁，学术则倦贡新而思竺旧。而迁之《史记》，则作于其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十七页）

但在另一方面，面对完善的中央集权政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和以“经明行修”为标准的选士制度，汉代知识分子从先秦继承而来的干预意识被具体化为从政意识，其思想行为的规范大大加强，个人意识则相对淡化。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

因为经学的兴盛，生动活泼的“诗三百”蜕变为“诗经学”。“诗经学”旨在以伦理化、政治化的“诗三百”陶铸文人心性，规范文人创作，文学的意义则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

《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



这时的文人，热衷于诠《诗》解《诗》，或模仿《诗经》中的庙堂诗歌，四言诗式因此长期未能突破。

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文心雕龙·明诗》）

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钟嵘《诗品·序》）

汉京自杂歌乐章外，五言概不多见，是殆历武、宣之世，崇尚经术，不暇以为。（乔亿《剑谿说诗》卷上）

不独汉文人诗如此，文章亦多经学气味。

吾尝论两汉之文，皆有六经气味，浸溢乎其中。唐、宋诸名家，不过引经文为证据耳，其实气味远甚。（费锡璜《汉诗总说》）

文学既沦为经学附庸，不独赋家被视为倡优，即著作之儒的地位，也远在经学之儒以下。

（枚）皋不通经术，谈笑类俳倡。……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汉书·贾邹枚路传》）

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为优。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答曰："不然！……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设其位。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彼虚说，此实篇，折累二者，孰者为贤？……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世传《诗》家鲁申公书，《书》家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王充《论衡·书解》）（按：由王充驳论可知，文儒不如世儒，乃汉世一普遍之观念。）



第四节　西汉后期文学

一　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

西汉之衰，始于元、成之世。其时，朝廷荒淫、外戚干政，土

地兼并严重。

(鲍宣) 上书谏曰："窃见孝成皇帝时，外戚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家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二　王莽托古改制与古文学派兴起

因为有社会的危机与外戚的干政，乃有王莽的托古改制。然而王莽的改制不但未能解决社会的矛盾，反倒加速了王朝的崩溃。

新室政治，可分数端：一曰均贫富，二曰兴教化，三曰改官制，四曰修庶政，五曰兴学术。凡莽之所怀抱者，多未能行，或行之而无其效，虽滋纷扰，究未足以召大乱，其召乱者，皆其均贫富之政，欲求利民，而转以害之之故也。……莽之病，在于偏重立法，而不计法所以行。虽亦欲行督责之术，而不知社会组织不变，党类利害相违，弊端终将百出无已，断非督责之术所能补救也。(吕思勉《秦汉史》第七章《新室始末》)



王莽托古改制，在学术思想上提倡古文经学，古文经学乃得立为官学。

西汉末年有两个大问题：一是土地集中，农民流亡，二是农民卖身为奴。……王莽为了夺取政权，用托古于《周礼》的办法，提出"王田"的主张，即根据《周礼》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把土地收归国有。王莽一举一动都学周公，以《周礼》作为政治改革的根据。《周礼》是古文经，因此便提高古文经的地位。刘歆是王莽的帮手，他写了一封《移让太常博士书》，大骂今文家的博士……平帝时，古文经由于有王莽的政治力量做后盾，立了五个古文博

士，以与今文博士对抗。（范文澜《经学讲演录》）

三　西汉后期的文学特征

自儒学在武帝时代定于一尊，西汉后期的文章，引据经典，阐释义理的风气愈益严重。

卿、渊已前，多俊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文心雕龙·才略》）

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四章《经学极盛时代》）

汉之文章，仲舒为义理之宗……议论主武帝以前，义理主武帝以后。（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文章源流》）

这一时期辞赋的内容与体制，亦走上规摹前人的道路。

（雄）以为……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汉书·扬雄传赞》）

扬雄作《反骚》、《广骚》，班彪作《悼骚》……汉魏以来，作者缤纷，无出屈宋之外。（谢榛《四溟诗话》卷一）



学术的复古，必然导致文章的复古。扬雄后期不傍经典，作《法言》、《太玄》，力求自成一家之言，便是一例。

（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汉书·扬雄传》）

在经学独盛的时代，扬雄所作，折衷儒道，对东汉异端思想的崛起，有导乎先路之功。

在汉代儒术神学化并庸俗化的时代，扬雄敢于怀疑"俗"的一方面，部分采取了老子的思想，自有其异端的倾向，又通过了老与《易》的模拟而表现出部分的唯物主义色彩。同时，他在玄学的研究上，一方面开魏晋玄学作风的先河，另一方面在西汉之际也有其独立的贡献。……总之，扬雄并非富于独创性的思想家……但是，扬雄处于阴阳家方士家思想弥漫朝野的两汉之际而竟能正视历史上的唯物论无神论的遗产，以对抗当时神学家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这实在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六章）

但扬雄的文章，因刻意求古而失于矫枉过正，不免流于艰深难读。复古文章的流弊，大抵如此。

陈后山曰："扬子云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辞艰。"（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文辨》）

扬子云之言，其病正坐近似圣人。（刘熙载《艺概·文概》）

第五节　东汉前期文学

一　东汉前期政治状况



王莽的新朝，在农民起义中结束。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乃下诏释放奴婢，行度田限田之制，又削夺丞相权力，政务悉归尚书，以缓和社会矛盾，加强皇帝集权。

（建武七年）五月……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卖者无还直。（《后汉书·光武帝纪》）

（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覈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建武十六年）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后汉书·光武帝纪》）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疆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政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二　东汉前期思想统治的强化

经历了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和两汉的易代悲剧，皇权与经学的神圣地位受到怀疑，刘秀乃大兴学校，严格经明行修的选举标准，借以控制士人的思想。

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后汉书·儒林传序》）



后汉取士，必经明行修；盖非专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前汉匡、张、孔、马皆以经师居相位，而无所匡救。光武有鉴于此，故举逸民，宾处士，褒崇节义，尊经必尊其能实行经义之人。（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四章《经学极盛时代》）

刘秀既以图谶之助得为天子，即位之后，更以图谶巩固既得的政权。东汉的经学，乃走上神学的道路。

皇考南顿君初为济阳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

见。初，道上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后汉书·光武帝纪》）

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成帝时，夏贺良以为汉有再受命之祥，而应在光武。王莽时谶云："刘秀当为天子"，尤为显证。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深信谶纬，五经之义，皆以谶决。贾逵以此兴《左氏》，曹褒以此定汉礼。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四章《经学极盛时代》）

三　东汉前期学术与文学的分化

因为政治与思想的桎梏加强，这时的文人，大抵皈依君权与神学，而少有怀疑的精神。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秦暴，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



（《白虎通义》）傅以谶记，援纬证经，自光武以赤伏符即位，其后灵台郊祀，皆以谶决之，风尚所趋然也。故是书论郊祀、社稷、灵台、明堂、封禅，悉檃括纬候，兼综图书，附世主之好，以绲道真，违失六艺之本。（庄述祖《珍艺宦文钞》卷五《白虎通义考序》）

这一时期文学、史学的评论与创作，亦颇受君权与神学的影响，表现出严重的内在矛盾，其中，尤以班固最为突出。如班固的论赋与作赋：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抑亦《雅》、《颂》之亚也。（《两都赋序》）

……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汉书·艺文志》）

（《两都赋》）前篇极其眩曜，主于讽刺，所谓抒下情而通讽谕也。后篇折以法度，主于揄扬，所谓宣上德而尽忠孝也。二赋犹《雅》之正变。（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五）

又如班固之评《史记》、著《汉书》：

（班）固讥迁是非谬于圣人。……《史记》八书，而固变为志。……且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其所传儒流，徒与阴阳农墨等分畤并驱。固既讥迁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利而羞贫贱，此亦何以异于马乎？且固之讥迁，未足以服迁心。（熊士鹏《鹄山小隐文集》卷二《班马异同论》）

然而经历了两汉易代之际的社会危机，文人对正宗思想不能不产生怀疑。从桓谭的《新论》到王充的《论衡》，正是显示了一条由“非圣无法”到“叛经离道”的思想发展轨迹。



王充（公元27—104四年）的反谶纬反宗教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是中世纪思想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异端”体系，是两汉以来反对“正宗”思想与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思想的伟大的代表。……在王莽与光武之际，尚有郑兴、尹敏与桓谭等“非毁俗儒”“尤好古学”的反谶纬思想，这对于王充尤有直接的影响与启示。……桓谭的政治思想……大体为儒家思想，而以抑商贾防兼并为其方略。……综计桓谭的批评，不能说有多大的新义，但其着眼所在，皆现实性的问题。其解决问题的方案，完全委诸人力；此在东汉谶纬迷信盛行的时代，颇有积极意义。……郑兴尹敏无著作，其影响于王充者不可考按。而桓谭《新论》……则《论衡》的《超奇》、《佚文》、《定贤》、《案书》、《对作》等篇，曾称述八次之多，全为褒词，甚至说“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世也”（《超奇篇》），足见王充受他的影响是深刻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八章）（按：文中着重号为原作者

所加。)

由于学术思想的变化，这时的文章不仅摆脱了经学的繁琐作风，也扬弃了扬雄的古奥，出现了由文转质的新趋势。

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论衡·超奇》)

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刘熙载《艺概·文概》)

第六节 东汉后期文学

一 东汉后期的社会危机

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

光武中兴，悉用奄人，不复参用士流。和帝践祚幼弱，窦宪兄弟专权……乃独与宦者郑众定谋收宪，宦官有权自此始。……和帝崩，邓后临朝，不得不用奄寺，其权渐重。邓后崩，安帝亲政，宦官李闰、江京……与帝乳母王圣、圣女伯荣、帝舅耿宝、后兄阎显等，比党乱政。此犹宦官与朝臣相倚为奸，未能蔑朝臣而独肆其恶也。及帝崩，阎显等专朝争权，乃与江京合谋，诛徙樊丰、王圣等，是显欲去宦官，己反藉宦官之力。……宦官孙程等不平，迎立顺帝，先杀江京……并诛阎显兄弟，阎后亦被迁于离宫。是大臣欲诛宦官，必藉宦官之力；宦官欲诛大臣，则不藉朝臣力矣。顺帝既立，以梁商女为皇后，商以大将军辅政……而宦官张逵……谮商与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废帝。帝不信，逵等即矫诏收缚腾、贲……顺帝闻之大怒，逵等遂伏诛。及帝崩，梁后与兄冀立冲帝……质帝。质帝为冀所弑，又援立桓帝，并以后妹为桓帝后……其权已震主矣。而帝默与宦官单超、左悺……定谋，遂诛冀。是宦官且诛当国之皇亲矣。……至灵帝崩，何后临朝，立子辩为帝。后兄何进以大将军辅政……是朝权兵权，俱在进手……乃又为宦官张让、段



珪等所杀。是时军士大变。袁绍……等因乘乱诛宦官二千余人。……于是宦官之局始结，而国亦随之亡矣。（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东汉宦官》）

东汉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不肖者辄纵恣不轨，其贤者亦为众忌所归。遂至覆辙相寻，国家俱敝。（同上，卷三，《西汉外戚之祸》）

豪族地主的兴起与土地的高度集中。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仲长统《昌言·理乱篇》）

时大将军梁冀专朝。……（刘）陶上议曰："……窃见比年以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飡，所患靡盬之事。……伏念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不可食。群小竞起，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乌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厌……"（《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

外戚、宦官、豪族霸占仕路，甚而公开卖官鬻爵，亵渎选举。



（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后汉书·梁统列传附梁冀传》）

时连有灾异，郎中梁人审忠以为朱瑀等罪恶所感，乃上书曰："……大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考其党与，志清朝政。华容侯朱瑀知事觉露，祸及其身……遂诛蕃、武及尹勋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后汉书·宦者列传·曹节传》）

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

东京杨氏、袁氏，累世宰相，为汉名族。（《后汉书·杨震列传》）

（延熹）元年，十二月，初开西园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灵帝纪》）

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同上，李贤注引《山阳公载记》）

（中平）四年，是岁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后汉书·灵帝纪》

士人与宦官的斗争，乃酿成酷烈的党锢之祸。

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明年……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建宁二年，十月，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皆为钩党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后汉书·灵帝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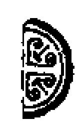
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捕前党。故司空虞放……等百余人皆死狱中。……自此诸为怨隙者……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后汉书·党锢传序》）

熹平元年，七月……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后汉书·灵帝纪》）

熹平五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后汉书·灵帝纪》）

二　文人的信仰危机与行为、心理的自我调整

政治的黑暗，仕路的阻塞，不仅威胁着士人、尤其是中下层士



人的政治命运，也冲击着已成为士人人格价值所在的“经明行修”的选士标准。

桓、灵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奸臣，网漏防溃，风颓教沮。抑清德而扬谄媚，退履道而进多财。力竞成俗，苟得无耻。……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甚也。于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有直者，无分而径进；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桑梓议主，中正吏部，并为魁侩，各责其沽。清贫之士，何理有望哉！（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

传统价值观念与现实社会状况的严重冲突，导致士人在思想行为方面固有的二重性有了新的内容，并走向各自的极端。一方面，他们以更加激烈的态度，维护和宣扬两汉以来的选士标准，并进一步把它确立为人格品评的标准，清议之风，由是形成。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另一方面，士人在鼓吹其道德信念的同时，内心又潜藏有对道德信念的深刻怀疑和极度失望，在汉代一直未占主流的老庄之学开始抬头。如朱穆《崇厚论》论道德与仁义礼法的关系，颇近老子。

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

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夫中世之所敦，已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于此乎！（《崇厚论》）

这样的思想，亦影响于士人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方式。

（范）冉好违时绝俗，为激诡之行。……桓帝时……议者欲以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于梁沛之间，徒行敝服，卖卜于市。……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后汉书·独行列传》）

向栩……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不好言语而喜长啸。宾客从就，辄伏而不视。……郡礼请辟，举孝廉、贤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同上）

台佟字孝威……隐于武安山。……刺史乃执贽见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终性命，存神养和。如明使君奉宣诏书，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隐逸，终不见。（《后汉书·逸民列传》）

矫慎……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后汉书·逸民列传》）

戴良……家富，好给施，尚侠气……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大豪戴子高。"良少诞节，母憙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良才既高达，而论议尚奇，多骇流俗。（同上）



士人思想行为的转变，使汉末"清议"在儒行、事功之外，又加入了更为内在的才情风致等人格内容。由于"清议"之风的推波助澜，汉末文人终于完成了兼综儒道的心理调整；而领导这一时尚的人物，首推当时文人推崇备至的郭泰。

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奥乎不可测已。……于时缨緌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州郡闻德，虚己

备礼，莫之能致。……将蹈鸿涯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蔡邕《郭泰碑》）

与政治上的党锢同时，思想上也有了“清议”的“禁锢”。禁锢了的清议，不得不开始转向，另求出路，其结果是清议转而为清谈。……从空洞无物的纲常名教，到纲常名教的否定而“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后汉书·仲长统传》），以至圣人（孔子）与老庄“将无同”，流为纯概念的游戏。其间转向的契机，实应从郭林宗讲起。郭虽善人伦，而不危言核论，实开清谈之风。……与郭林宗同时或略早的人，如徐穉、黄宪、荀淑、陈寔、周勰、戴良、向栩、袁闳之流，皆与郭一道同气……郭泰的学术思想，后世所知道的并不多。……魏晋清谈，儒道兼综，即阮瞻所谓圣人名教与老庄自然将无同，而郭泰也儒道兼综。魏晋之世，大大地弘扬了识鉴品题的学风，而郭泰在汉末即先已予以导扬。综合地看来，郭泰的学术思想的途辙，与魏晋清谈的关系甚为密切，这是可以断言的。……我们不难窥测《世说新语》的撰集者，以徐穉、郭泰等乃是清谈的揭幕人物，故撰集从他们开始。这即是说，《世说新语》的撰集者不仅目郭泰等为清议转向清谈的契机人物，且直认他们为清谈的始祖。（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十章）

三　汉末文学的转变



儒重群体规范，道重个人自由。汉末文人之调合儒道，必然使其思想行为偏离正统。反映在文学方面，也必然使作家在注重外在事功的同时，又热衷于体验和表现个人的现实生活与情感生活，抒情文学由此得到复苏。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标志了从文人的性情，到文人诗歌的体裁，都获得了一次大的解放。

……五言诗的草创时代，当在离公元前三十二年（成帝建始元年）不远的时候。在这个草创的时代，五言诗似尚在民间流传着……却未为文人所认识。班固的《咏史》却是最早的一位引进五言诗于文坛的作家。……张衡的《同声歌》……也与《咏史》一样，正足以见草创期的古拙僵直的气氛。直至东汉的季叶，蔡邕、秦嘉、孔融出来，五言诗方才开始了他的黄金时代。……抒情诗自当以《古诗十九首》为主。在这十九首之中……有的是游子思归之曲，有的是少年怀人之什，有的是厌世的旷达的歌声。……类多情意恳挚，措辞真率，不求乎工而自工，不求乎丽而自有其娇媚迷人之姿。（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八章）

《诗》、《骚》抒情精神的复苏，对赋家的创作心态、创作方法以及赋体结构的转变，起了决定的作用。汉末赋之走向抒情化和小品化的实质，乃是赋家诗人化与赋的诗艺化、诗境化。

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夺政权，国势日衰。……社会民生，日益穷困。……在这种政治社会情况之下，进步的文学家，不能无所感受。就是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赋，也渐渐地发生转变了。……《二京赋》以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张衡的《归田》、《思玄》一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形式比较短小，一扫那种铺采摛文虚夸堆砌的手法，运用清丽抒情的文句，描写自己的怀抱和感情，内容和形式都起了很大的变化……由长篇钜制的形式，变为短篇，由描写宫殿游猎而只以帝王贵族为赏玩的作品，变为表现个人的胸怀情趣的作品，这一转变是很重要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第五章）

这时的文章，因时势使然，文人无法再有效地干预现实，大都发愤而作，兼有“清议”的性质。

数子（按：指王充、王符、仲长统）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静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敝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敝矣。（《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论》）（按：范晔以三子之书为异端，难作常训，观点自然保守。但所云三子“好申一隅之说”，则已触及这类“清议”文章所具有的个性。）



东京之衰，刑赏无章也，而发愤者变之以法家。……上视扬雄诸家牵制儒术，奢阔无施，而三子（按：指王符、崔寔、仲长统）闳达矣。（章炳麟《訄书·学变》）

又因为两汉的辞赋，陶冶了文人的文学修饰能力；文人的心性，更脱卸了经学的束缚；兼之东汉的文章，句式渐尚俳偶，词藻渐趋华丽，汉末的文章，又大都富于文采。

西汉之时……若贾生作论，(《过秦论》之类是。) 史迁报书，刘向、匡衡之献疏，虽记事记言，昭书简册，不欲操觚率尔，或加润饰之功，然大抵皆单行之语，不杂骈俪之词；或出语雄奇，(如史迁、贾生之文是，出于《韩非子》者也。) 或行文平实，(如晁错、刘向之文是，出于《吕氏春秋》者也。) 咸能抑扬顿挫，以期语意之简明。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载于《后汉书》之文，莫不如是。即专家之文集，亦莫不然。) 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刘师培《论文杂记》第九)

马融、蔡邕之后，变骈文矣。(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文学》)



第二章

秦统一后的文学

第一节　秦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土壤

先秦时期，《诗经》、《楚辞》而外，更有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学术思想异常活跃，散文艺术成就辉煌。在此前提下，秦一统天下，又进而为巩固政权，在政治、经济方面，推行一系列积极措施；在文化方面，完成了车同轨、书同文、划一度量衡。凡此种种，均为秦继往开来，创造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的持续繁荣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由于秦享祚日短；由于秦继承了以刑名法术治国的传统；又由于秦戒惧于先秦的列国纷争而走向专制主义的极端；更由于秦的雄踞天下而滋生出尊己傲人的偏狭心理，秦的学术，一片荒芜；秦的文学，亦因其仅有的应用文字和颂扬文学而落入低谷。"秦世不文"虽不尽符合事实，但也大致概括了秦文学的特征。



一　狭隘的实用观念与秦文学

战国时代，秦用商鞅、韩非之术，改革政治，进取天下。法家尚刑名，崇霸力，重实用，绌文采，于儒墨诸家，大抵持排斥态度，从而形成以名法治国的政治传统。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商鞅《商君书·靳令篇》）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此其何故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韩非子·五蠹》）

秦并天下之时，百家传人犹在，诸子影响犹存。秦初尚设置博士，不废儒学。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之守节，礼仪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郑樵《通志》卷七一《校雠略》第一）（按：《汉书·艺文志》有羊子，秦博士，儒家；黄公，秦博士，名家，是知秦亦不废百家之学。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上邹峄山，“与鲁诸儒生议”；同年渡湘，问博士“湘君何神”？是知秦设博士，当在是年。）



然而秦在构建中央集权体制的过程中，因囿于狭隘的历史经验，又兼受其政治传统的影响，不免因循旧法而陷入极端的实用主义。其时，秦在文化方面，仅注重维护政治统一的制度改革，而忽略其思想理论的建设，秦之博士、儒生，乃形同虚设，而失去了文化思想创造的权利；秦之文学，亦因之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环境，仅留下一些或表现最高统治者的利益与意志，或以实践刑名法

术思想为旨归的应用文字。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史记·秦始皇本纪》）

东周以降，社会之等级渐平，人民之好学者日众，士大夫所专之学，渐次被及于氓庶，此乃自然之势，无可遏抑。秦始皇帝及李斯，顾力反之，而欲复诸政教合一之旧，于道可谓大悖。（吕思勉《秦汉史》第十九章《秦汉学术》）

二　严酷的文化专制与秦文学

秦上承数百年的战乱割据，又面对六国贵族势力死灰复燃的潜在威胁，始终困扰于分裂的噩梦，因而对儒生的分封之说，尤为敏感。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廷尉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为巩固政治一统，废分封、行郡县、改官制、集兵权，更实行徙豪强、销兵镝、严刑罚，集权意识，空前高涨。集权意识走向极端的结果，则是以焚书灭绝百家之说，以坑儒扼杀自由思想。

……丞相李斯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

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括于上郡。(《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焚书坑儒，孟子之党徒绝矣。(赵岐《孟子题辞》)

关于秦始皇焚书的历史，后人辩论不绝，有的认为焚书仅及《诗》、《书》古文，有的认为焚书遍及百家今文，这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我们以为，焚诗书是始皇绝古的历史手笔，然而“绝古”的手笔如此其残暴，百家思想也就在“一尊”道理之下，连类而被禁了。因此，秦代的焚《诗》、《书》，废古语，和汉代的注《诗》、《书》，尊经师，其形式虽相反，而其实质则相一致，都是把活的自由思想斩绝。

法家的历史命运之所以有悲剧的结果，是因为……他们的“术”的机会主义的性质，不但减低了理论的价值，而且限制了国民阶级的人格发展。……(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十六章第四节《韩非子的人性论和社会论》)



严酷的文化专制，不仅破坏了先秦文学的优秀传统，而且打击了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士阶层，秦之文学，由此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

诸子纷争之时，同派的每欲压倒异派的学者，如孟子之攻杨、墨，荀子之非十二子。不过他们都是没有权力，只不过嘴里嚷嚷打倒而已。到了秦始皇，他却真的以政治的力量来统一或泯灭一切“异端”的思想了。……他们……以如此的严刑峻法，对待学者，于是古代学术的精华，一扫而空。……

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对于古典文学的毁害，还没有秦始皇在短促的时间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毁坏那末重大。这实在是中国学术的一个绝大的厄运。秦始皇在政治上虽给中国民族以很大的供献，在文化上，他却是一个古今无比的罪人。

在那末深诛痛恶异派思想与“处士横议”的一个时代，在挟书有禁，藏书有罪，偶语诗书弃市的一个时代，文学的不能发达，自无待说。不仅列国的诸王臣民不能有什么痛伤亡国的作品出现，即秦地的文人，歌颂大一统的光荣的作品也绝无仅有。……没有一个时代遗留的作品像秦代那末少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六章《秦与汉初文学》）

三　畸形的自大心理与秦文学

秦始皇以武功进取天下，结束数百年之分裂局面，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帝国，其自大心理，不免畸形发展。其时，秦不独兼六国车服，仿建六国宫室于咸阳，而且大行封禅、巡狩之事。秦之文学，因此留下称颂功德的刻石之文。

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古者诸侯二车九乘。秦灭六国，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也；法驾半之。（蔡邕《独断》）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丞相王绾、卿李斯……从，与议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二节 刻石之文

一 刻石文的产生

秦始皇在位之时，数度巡狩、封禅，留下八篇刻石文以称颂功德。其文今存六篇半，刻石则仅存半枚。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刻所立石……于是乃并勃海以东……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刻石。……其东观曰……（按：即《东观刻石文》）。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按：《邹峄山刻石文》载《古文苑》卷一，二十八年《之罘刻石文》已佚，其余皆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楚辞》认为《碣石刻石文》"其体裁与他篇异，必有脱误无疑。"）



刻石之文，均为李斯所作。

其碑（按：指《会稽刻石文》见在会稽山上。其文及书皆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指，圆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字。（《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文心雕龙·封禅》）

秦汉以来，始谓刻石曰碑，其盖始于李斯峄山之刻耳。（吴讷《文章辨体序说》）

凡秦世的大制作，始皇游历天下，在秦山各处所立的碑碣，其文皆为（李）斯所作。（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六章《秦与汉初文学》）

二 刻石文的征实与虚美

李斯相秦三十余年，亲历割据战乱与秦的统一过程，故刻石之文对统一事业的颂赞言出由衷，绝无矫情。如《邹峄山刻石文》：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溥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又如《会稽刻石文》：

……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彊。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其于制度的颂美，亦往往于史有征，不为虚美。如《琅邪台刻石文》：



维廿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易经；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踰次行。……

但刻石之文，意在颂美，于秦的暴政，尤多粉饰之辞。如《琅邪刻石文》：

……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三　秦刻石的文体与风格

秦刻石的文体来源及创新。

先秦诗以颂德，铭以计功，其辞大抵皆四言韵语。秦刻石之文兼蓄两体，称颂功德，以志不朽。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文心雕龙·颂赞》)

……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详观众例，铭义见矣。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文心雕龙·铭箴》)



秦刻石以成功告祭天地，尚质而不重藻丽；其文出法家李斯之手，必多制度语、法令语，故浑朴古质、清峻峭悍。

秦皇岱铭，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疎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文心雕龙·封禅》)

秦朝廷铭颂可见者，峄山、琅玡、之罘、会稽数碑而已。其辞古质峭悍，当时政事习尚，直可想见，真秦文也。篆勒皆出斯手，铭亦必斯所作。(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

秦碑有韵之文，质而劲；汉乐府典而厚，如商、周二《颂》，气体攸别。(刘熙载《艺概·诗概》)

此在焚书坑儒大定法制之后，故有“考验事实”、“贵贱并通”云云；楚越俗薄，故于宣义廉清，尤详言之也。

秦相他文，无不诙丽；颂德立石，一变为朴浑，知体要也。其辞气便欲破除《诗》、《书》，自作古始，亦即焚书坑儒伎俩。（李兆洛《骈体文钞》卷一《李斯会稽刻石》评语）

秦君臣雄视天下；李斯又顺谀主意，受命作颂，刻石之文乃辞气宏放，颇多溢美，具有铺张壮大的风格特征。

至于始皇勒岱，政暴而文泽，亦有疎通之美焉。（《文心雕龙·铭箴》）

此在泰山立石之前，初夸大其并兼六国，故首述其在昔称王，继及上荐高号，继乃颂其一家天下，而不及其余。（《骈体文钞》卷一《李斯峄山刻石》谭献评语）

囊括并吞之气，震荡于文字间。

前半是颂秦德，后半是明得意。始皇登琅邪而大乐之，故其词特铺张尽致。（同上，《李斯琅邪台刻石》谭献评语）

刻石之文，为记诵久远，文短而用韵；又因受每行字数限制，大都三句一转韵，其语言节律，颇不同于此前的铭、颂。后世碑铭，亦有承其体制者。

其词每三句为韵，凡十二韵。下之《之罘》、《碣石》、《会稽》三铭皆然。（《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泰山刻石文》注）

秦刻石文多三句用韵。其后唐元结作《大唐中兴颂》每句用韵，而三句辄易，清音渊渊，如出金石。说者以为创体，而不知远效秦文也。（范文澜《文心雕龙·颂赞》注）（按：今存秦刻石之文，惟《琅邪台刻石》两句为韵）



第三节　诏令奏议之文

秦设博士，必有史官。近人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卷上《存旧》称，《史记·秦始皇本纪》数言“上宿雍”，“上病益重”等语，“必系秦史之旧”。是知司马迁所录秦君臣诏令奏议之文，载在秦

史，非寻常臆测之辞。此类文字，很能代表秦文风格，亦能见出战国文风向西汉文风的转变过程。

一 秦代君臣的诏令奏议之文

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其与丞相、御史议帝号一段文字，罗织六国罪名，出语专断，霸气十足；又称自己"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自信与狂傲，溢于言表。这样的文字，既有战国之文的逞雄作风，又有法家的峭刻峻直，更有开国帝王的不可一世，颇能代表秦统一之初的文章风格。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王绾、冯劫、李斯等人的应对之辞，俯视天地，独尊人皇，亦可见开国君臣的自大心态。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 李斯文风的转变

李斯在战国时代，有《上书韩王》、《议存韩》（两文均见《韩

非子·存韩》)、《上书谏逐客》。其时，天下尚未一统，纵横之风犹盛；又因所言之事，关乎个人进退，故文章长于辩难，辞气颇为恳切。秦统一之后，实行专制政治，李斯位为丞相，其于为文，无论奏议时事或上书明志，风格均为之一变。

李斯《议废封建》、《议烧诗书百家语》，其所论制，符合君主专制利益；《议刻金石》、《上书言治骊山陵》，所言事实，能满足帝王自大心理。故行文之时，语言简洁，不假雕饰，是典型的刑名法术语。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

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燋，叩之空空，如下天状。(严可均《全秦文》卷一；凌义渠《湘烟录》卷一引蔡质《汉仪》。疑有脱文)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迳；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文心雕龙·奏启》)

李斯《上书对秦二世》、《上书言赵高》作在君主昏愦、臣僚互相攻讦的时候，为文的心态，有了很大的变化。其揭露赵高之短，广引史鉴，犹逞辩辞。而上书对秦二世，则不能不顺其欲，献督责之术。全文虽以法、术、势为立论基础，又苦心孤诣，暗含规劝，但因首鼠两端，辞气终不免于尴尬。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可不察焉！……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

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史记·李斯列传》）

臣闻之，臣疑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昔者司马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有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弑简公于朝，遂有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同上）

李斯被诬谋反，下狱，作《狱中上书》。全文以反语自述功绩，既发泄怨愤，又无可奈何，遂开后世一类牢骚文体。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史记·李斯列传》）



胡亥即位后，有《责李斯文》，露骨表达其私天下、逞所欲的思想愿望，而毫不以仁义道德为掩饰。君主集权制度的本质，君主世袭制度的弊端，均在一段妙文之中。

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

胝，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以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奈何？（《史记·李斯列传》）

第四节　秦 之 佚 文

秦享祚仅十五年，刻石与诏令奏议而外，尚有诗赋、子书，今不传，或毁于项羽咸阳之火。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都……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

《黄公》四篇。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

…………



《秦零陵令信》一篇。难秦相李斯。

…………

秦时杂赋九篇。

…………

左冯翊秦歌诗三篇。

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汉书·艺文志》）

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

秦处楚、汉之间而无赋，余甚疑之。阅《汉志》有秦杂赋九篇，惜名氏皆不可得，坑烬之余故也。

秦子书，儒家有《羊子》四篇，名家有《黄公》四篇，注皆云：秦博士

也。黄公名疵，非四皓黄公。秦子书又有《零陵令信》一篇，注云：难李斯。斯当时孰敢难之？盖依托也。

《艺文志》又有《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皆无注。余始疑为汉时秦地之诗，及阅颜师古《黄公》下注云："为秦博士，能歌诗。"乃知嬴世不惟有赋，亦有诗也。（《诗薮》外编卷一）

李斯所称的《秦记》，以及博士官所职的诗书，已付于咸阳一火，绝不可得见。（《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六章《秦与汉初文学》）



第三章

汉代论说散文

第一节　汉初论说散文

汉代初年，学尚黄老，文化思想相对自由。兼之战国纵横余风犹存，作者为文，较能畅所欲言，文章具有铺陈壮大的风格。但这时的文章，也有不同于战国的特点。首先，文人从政机遇增加，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有条件对历史、现实、人事作直接的观察和思考。故这时的文章，大抵论证充分，逻辑严密，少有策士之辞的浮靡与诡辩，其结构和语言，也趋于详密严整。其次，汉初文人抚今追昔，对当时社会的统一与安定倍感珍惜。他们以强烈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总结前朝的兴亡教训，史论而兼政论，冷静客观而兼热情洋溢，是这一时期文章的又一特点。



一　贾　山

（一）生平

贾山（生卒年不详），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文帝时言治乱之道，名曰《至言》。文帝除铸钱令，山上书谏诤，以为不应变先帝之法；淮南王刘长谋反，又诵其无大罪。今存《至言》与《对诘谏除铸钱令》片断。（事见《汉书·贾邹枚路传》）

（二）作品

《贾山》八篇。（《汉书·艺文志·儒家类》）

文帝时则有颍川贾山，尝借秦为喻，言治乱之道，名曰《至言》。其后每上书，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不见用。所言今多亡失，惟《至言》见于《汉书》本传。（《汉文学史纲要》第七篇《贾谊与晁错》）

《至言》是汉初第一篇以秦亡为史鉴，阐述治乱之道的文字。贾山认为秦之灭亡，在于重聚敛，严刑罚，崇侈靡，不修礼义：

臣不敢以久远谕，愿借秦以为谕，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韦带之士，修身于内，成名于外，而使后世不绝息。至秦则不然。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倾耳而听。一夫大呼，天下响应者，陈胜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又为阿房之殿……为驰道于天下……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

为此，贾山告诫统治者要虚心以纳谏，爱敬以礼贤，更进一步批评了汉文帝的耽于游猎，提出了尊儒崇礼的建议。贾山所论，实已预示了汉代以儒术治国的历史趋势。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于事也，诸侯闻之，又必怠于政矣。……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射猎，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不胜大愿，愿少衰射猎，以夏岁二月，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然后唯陛下所幸耳。……

《至言》言辞峻切，气势磅礴，在汉初政论文中，亦为第一篇。

（《至言》）雄肆之气，喷薄横出，汉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后，盖希有矣，况东京而降乎！（姚鼐《古文辞类纂》）

（《至言》）大旨谓国家广益，在贤士纳忠。欲得忠益，则在平时尊礼以养士气。如秦以极盛而速灭者，不闻忠告也。所以然者，暴上故也。盖礼士为中主，为当日与方正之士驰猎而发也。若只作谏猎书看，失之千里。云合澜回，每于目眩然眼豁。（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三一）

古厚而发辉丽之色，矫健而涵博大之规。《吕览》、《韩非》之流，文章尚未与著书分途。（《骈体文钞》卷一一谭献评）

《贾子·先醒篇》："君好谄谀而恶至言。"至言与谄谀为对，是至言即直言之谓，至之为言极也。（高步瀛《两汉文举要》引王先谦语）

二 贾　谊

（一）生平

贾谊（前 201—前 168），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青年时代曾师事李斯门人吴公，颇通诗书百家之书，为汉文帝召为博士。一年中擢拔太中大夫，于国家礼仪、官制、律令等多有建议，终因年少气盛，敢于直言，为权贵所嫉，文帝三年，出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居长沙，心情抑郁，作《吊屈原文》与《鹏鸟赋》。文帝七年，奉召回京，拜梁怀王太傅。数年之中，多次上疏建言。如为削夺藩国势力，作《上疏请封建子弟》、《上疏谏王淮南诸子》；针对农村趋末背本的现实，上《论积贮疏》；文帝五年废盗铸钱令，上《谏铸钱书》（即《新书》中《铜布》、《铸钱》两文）。贾谊诸疏中，以《陈政事疏》最为著名。（按，《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今存《治安策》与《新书》中《数宁》、《藩伤》、《宗旨》等十余篇文字相似，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子部》第一以为乃班固熔裁《新书》而成。）然而贾谊在朝，为权贵排斥，所言多不用。梁怀王坠马死，郁郁自伤而卒，年三十三。事见《汉书》《贾谊传》、《郊祀志》、《儒林传》。



（二）贾谊的政治思想

汉初行无为之治，固然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却无法避免因权臣居功和诸侯自大对中央政权带来的危害；汉初立法清简，固然

有利于消除秦朝暴政的影响，却无法避免因各种矛盾的激化而导致吏治的渐趋深刻。针对上述两种情况，贾谊主张治国以礼乐为主，以法治为辅；以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究其思想大要，实以儒学为核心，兼采名法各家，既代表了汉初学术思想不拘一格的特征，也显示了由文帝而武帝以儒学为基础，构建封建社会思想体系的历史趋势。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帝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筦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不顾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今或言礼谊之不知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陈政事疏》）



但须注意的是，贾谊所说的"礼"，乃人伦秩序的现实规范，而非先验于社会历史的神圣法则，此与武帝时代经学家所讲的"礼"，是迥不相同的。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筦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陈政事疏》）

贾谊从历史，也从现实认识到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因而提出了民为君主国家的“本”、“命”、“功”、“力”等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以仁政治国的最高原则。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过秦论下》)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新书·大政》)

当然，贾谊的民本思想与仁政原则，并未脱出等级制度的范畴，其意仍在于维护和加强尊上而卑下的社会秩序。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陈政事疏》)

在经济方面，贾谊主张以农为本、增加积贮，抑制富商大贾，以发展经济，充实国力，消除巧滑与兼并。

今民买僮者，为之绣衣丝履遍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緁以遍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陈政事疏》）

筦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重，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蹷！……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畮，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论积贮疏》）

在国防方面，贾谊反对对匈奴实行和亲、纳币以图苟安的妥协政策，力主以进取的姿态，抵御外侮，消弭边患。



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又类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陈政事疏》）

贾谊言治乱之道，颇为后人推许。

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

过也。(《汉书·贾谊传》引刘向语)

……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盖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欧阳修《与黄校书论文章书》)

《治安策》本末宏阔，首尾该贯，议论虽未免纯驳之杂，然自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汉书评林》引楼昉语)

汉兴，贾谊博极群籍，抱王伯之略，为文帝陈治安。其言诸侯王势骄悍、易生变，后七国果反；匈奴患不可不备，单于果数侵，苦汉边吏；淮南王二子怨望，世以此称谊通达国体。(《汉书评林》引王宗沐语)

贾生陈政事，大抵以礼为根极。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在汉朝之儒，惟贾生而已。"一"儒"字下得极有分晓。何太史公但称其明申、商也？

贾生谋虑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经制之文，非经生所能道。汉臣后起者，得其一支一节，皆足以建议朝廷，擅名当世。然孰若其笼罩群有而精之哉！(《艺概·文概》)

(三) 作品

贾谊著述凡五十八篇，今存者除上述篇目，尚有《过秦论》，或作于迁长沙王太傅之前；《惜誓》、《旱颂》、《虡赋》(已残)，或谓贾谊所作。世传《新书》，乃后人割裂《汉书》所载贾谊文，又杂取他文以凑足五十八篇之数，故其书真伪参半，未可尽信。



贾谊，五十八篇。(《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贾谊赋，七篇。(《汉书·艺文志·诗赋略》)

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王逸《楚辞章句》)

《新书》十卷……其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瞀乱无条理。……疑谊《过秦论》、《治安策》等本皆为五十八篇之一，后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传所有诸篇，离析其文，各为标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数，故饾饤至此。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

贾谊的文章，谋篇严密，说理切至，发言警醒。

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

（按：指《论积粟疏》）……理既切至，辞亦通畅。（《文心雕龙·奏启》）

贾生俊发，文洁而体清。（《文心雕龙·体性》）

（《过秦论》）此篇言子婴不能救败，而深探其本，则由于秦俗忌讳。故三主失道，乱亡形见，而人莫敢言，已终不知。因重叹壅蔽之伤国，以总结三篇之意也。古文之法，一篇自为首尾。此论则联三篇而更相表里，脉络灌输。（《西汉文举要》引方苞语）

此三篇语言一贯，自为首尾。其大旨首篇责秦王，次篇责二世，末篇责子婴，界画井然，有条不紊。至其救败非也止，子婴论已完，秦王足已不问十句，总结三篇，章法完密。以下更别出一意作收，用至为深远。（同上，引吴育语）

此篇前半极力形容秦国累代之强，非诸国所能敌；及始皇益强，遂灭六国而统一天下。其势益雄，防卫益固，真可谓若万世不亡者。而陈涉以一无势力之人一出，而遂亡秦。此段更就前文所述，两两比较，几同卵石之异，而卵竟碎石，是真奇怪不可测度。其千回百折，止为激出末句。故正意一经揭出，格外警悚出奇，可谓极谋篇之能事矣。（高步瀛《文章源流》）

贾谊之文，情感充沛，又善铺陈排比，锻炼词藻，夸张渲染，颇得战国文章的气势。

（《过秦论》）中间险字奇句，亦尽杂见错出，乃却以粗肉矫健之气行之。读者但见其飞砂走石，横溢不可遏，然而精巧实理俱在内。（《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月峰语）



自首至尾，光焰动荡，如鲸鱼暴鳞于皎日之中，烛天耀海。（《义门读书记》卷四九）

玮丽之辞，瑰放之气，挥斥而出之，而沛然其有余。惟盛汉之文，乃有此耳。（《两汉文举要》引张廉卿语）

（《陈政事疏》）贾生文最善转笔换气，忽而驰骤，忽而旋转，极其恣肆跌宕。（同上，引方展卿语）

贾策断推西京第一。有家令之峻刻，而术非名法；有广川之醇茂，而气更英多。急势缓势相衔，夹喻夹正入化，辟尽眉山匠巧。（《古文眉诠》卷三二）

贾长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遗意。（《艺概·文概》）

三 晁 错

（一）生平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一带）人。少博学，颇通百家之书。其学大抵以申不害、商鞅刑名法术为主，而杂以儒术。文帝时，为太子舍人，迁博士、太中大夫。景帝时为左内史，迁御史大夫。错于汉家制度、政策，多有建议，尤主张削夺藩王，改革政治。其政论文章有《上书言皇太子宜知术数》、《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复募民徙塞上疏》、《贤良文学对策》、《论贵粟疏》、《论削藩疏》等。景帝三年，七国叛乱，错因内受权臣妒嫉，外受诸侯忌恨，蒙冤被诛。事见《汉书·爰盎晁错传》。

（景帝）三（年）：正月壬子，错有罪，要斩。（《汉书·百官公卿表》）
《晁错》三十一篇。（《汉书·艺文志》）

（二）晁错的政治思想

晁错针对汉代背本趋末、仓廪空虚、赋敛不时、兼并严重的现实，提出纳粟拜爵除罪的重农政策，以达劝农耕、实国力、备边用、轻赋敛、抑兼并的目的。汉代由文帝而至武帝的国力趋于极盛，晁错的贵粟思想实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肌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被水旱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

贵者矣。而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遨游，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用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足用，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论贵粟疏》）

晁错针对汉初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详细分析了敌我的短长利弊，不独提出择良将、练士卒、利甲兵、武装边民、扬长避短等战略战术思想，更建议在戍卒而外，募民入边，立城邑、劝农耕，令邑里相亲，父子相保，从根本上巩固国防，杜绝边患。



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无有胜意。……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相失，此不勒习之过也，百不当十。……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国之至要也。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异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

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言兵事疏》)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守边劝农疏》)

晁错针对汉初以来诸侯与中央矛盾日趋激化，内战危机迫在眉睫的现实，大胆提出削藩的建议，以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论削藩疏》)



晁错既讲严明刑法，也讲仁政爱民；既讲人君驭人之术，也讲人君的礼贤纳谏。其治国之道，大抵以儒为体，以法为用。此外，晁错虽然不讲修礼乐，崇儒术，却讲祥瑞符应之事，实已开汉人“天人感应”说的先声。

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此四者，臣窃为皇

太子急之。……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上书言皇太子宜知术数》)

臣窃闻古之贤主求贤以为辅翼……今陛下讲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托于不明，以求贤良，让之至也。臣窃观上世之传，若高皇帝之建功业，陛下之德厚而得贤佐，皆有司之所览……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臣闻五帝神圣……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熟，妖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臣闻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百姓和亲，国家安宁……臣闻五伯不及其臣，故属之以国，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其立法也，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也，以之兴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乱也。其行赏也，非虚取民财妄予以人也，以劝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赏厚，功少者赏薄。……故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立法若此，可谓平正之吏矣。……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恤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明诏军师，爱士大夫；求进方正，废退奸邪；除去阴刑，害民者诛；忧劳百姓，列侯就都；亲耕节用，视民不奢。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贤良文学对策》)



晁错享年较贾谊为长，涉世较贾谊为深，故其政论之文，亦较贾谊具体深刻而切于实用，文采则稍有不及。

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以夭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汉书·贾谊传赞》)

人皆以贾生通达国体，今观贾生之策，其迂远不通者，犹十而一二，岂如晁之凿凿可行哉？(李贽《藏书》)

（《论贵粟疏》）与贾疏同时上，意亦略同。而此更画出滋粟之方，在于自上贵之。上以权与粟，则粟贵；上以权与金钱，则粟轻。入粟一议，本计在于抑末，中间将珠玉对勘，正欲去其积重之势，以归权于粟也。后世边储事例，由此而兴。……字字透肌刻骨，而布局却字字摆开……

（《言兵事疏》）择将是篇主，合刃三要，是能事；中国五长，是胜形；险夷分用，是全策。文则辞锋锐，局阵宽；锐处易见，宽处难识。

（《守边劝农疏》）为当日践更戍边，进是策也。其胜算在"常居"二字。彼秦以威劫致乱，则迫遣不可也。然虏以亟肄疲我，则弛备又不可也。两而逼出城堑田室之法，正是"常居"胜算。文章经济，并臻绝顶。

（《复募民徙塞上疏》）本之人情，参之古法，气味在管商之间。此两篇合与赵营平《屯田便宜》互参。（《古文眉诠》卷二二）

晁家令与赵营平皆深于筹策之文。赵取成其事，不必奇也；晁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艺概·文概》）

晁贾性行，其初盖颇同。一从伏生传《尚书》，一从张苍受《左氏》。……为文皆疏直激切，尽可欲言……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略，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晁错则适遭景帝，稍能改革，于是大获宠幸，得行其言……使易地而处，所遇之主不同，则其晚节末路，盖未可知也。（《汉文学史纲要》第七篇《贾谊与晁错》）



四　藩国侍臣之文

汉初至文景之世，诸侯王如楚元王交、吴王濞、梁孝王武、淮南王安、河间献王德好养文学与儒学之士。文学之有名者如枚乘、严忌、邹阳、公孙诡、羊胜、司马相如等皆善作辞赋，惟枚乘、邹阳、司马相如有文章传世。司马相如后仕于武帝朝；淮南王安及门客所撰《淮南子》亦大抵成书于武帝时代，故本章另设专节介绍。

（一）枚乘

1. 生平

枚乘（？—前141），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为吴王濞郎中。吴王谋为逆，乘上《谏吴王书》，不纳。汉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于梁。梁孝王薨，乘归江阴。武帝以安车蒲轮征乘，卒于道。事见《汉书·贾邹枚路传》。

2. 作品

枚乘主要作品有《上书谏吴王》与《上书重谏吴王》。

枚乘为吴王门客，兼之吴王虽有谋反之心，尚无谋反之迹，故《上书谏吴王》以宛转的言辞，从王者治术、君臣父子之道谈起。

> 臣闻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土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则事无遗策，功流万世。臣愿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言。



其后，枚乘连譬博喻，辗转设辞，终止于谏吴王笃行德行仁义为久远之道：

> 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以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影而恶其迹者，却背而走，迹愈多，影愈疾，不知就阴而止，影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沧，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犹抱薪而救火也。……福生有

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泰山之霤穿石，单极之统断干。水非石之钻，索非木之锯，渐靡使之然也。……磨砻底厉，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愿大王孰计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书谏吴王》引譬生动而富于辞彩，说理透辟而富于哲理，奇偶相生、文多用韵而近乎辞赋，很能见出战国策士游说之辞的影响。但文章以忠于吴王、维护汉朝为旨归，语重心长，情辞俱胜，则又是战国的策士之文所不可比拟的。

此书是当吴王逆谋未露之先而谏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长喻远譬，曲尽利害，文字起伏变化，百态横生，真古之善言者。（《汉书评林》引林希元语）

将欲弭于未形，不得不用隐语。时邹阳亦为隐谏，然多道胡、越、齐、赵、淮南之难，犹属诡事俪辞，尚未若此之四虚无著，而骇心刺耳，愈出愈奇也。仔细寻之，仍复肌理细腻，得不诧为灵物。（《古文眉诠》卷二三）

欲言难言，愈离奇愈沉痛，《国策》之体，《离骚》之神，后来无继。（《骈体文钞》卷一一）

枚乘《上书重谏吴王》，后人疑为伪作。

枚乘《谏吴王书》……最是佳妙文字。班氏载之，亦是也。其《复说吴王书》（按即《上书重谏吴王》）可疑处甚多。盖此时乘已去吴适梁，无论不得复说，即以复说论，其中如齐王杀身及四国不得出兵，皆是后来事，乘安能预知之而预言之？昔人以为此书乃后人以吴事喻言，非乘所作，其说极为有见。班氏载之于此，亦似误也。（李景星《四史评议·汉书贾邹枚路传》）



乘之著作，尚有辞赋。所传古诗，乃后人伪托。

枚乘赋九篇。（《汉书·艺文志》）（按：枚乘赋今存二篇，《柳赋》见于《西京杂记》，《梁王菟园赋》见于《古文苑》，后人以为伪作。又有《临灞池远诀赋》，已佚，目见《文选》谢朓《休沐重还道中》注。《七发》见于《文

选》，可确认为枚乘所作。）

古诗佳丽，或称枚叔。（《文心雕龙·明诗》）（按：徐陵《玉台新咏》以《古诗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等八首与《兰若生秋夏》为枚乘作，后之学者，颇多异议。参看本编第六章第三节。）

汉弘农都尉枚乘集二卷，录各一卷，亡。（《隋书·经籍志四》）

（二）邹阳

邹阳（？—前129），齐（今山东东部）人。与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曾上书吴王，谏阻谋反，吴王不纳，去而之梁。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梁孝王与羊胜谋，求立为太子，阳以为不可，为羊胜所谗，下狱。阳上书自明，免，复为上客。吴王事泄，羊胜、公孙诡被杀，孝王恐诛，阳乃说景帝妻舅王长君，获免。事见《汉书·贾邹枚路传》。

邹阳有文八篇，所传辞赋，后人以为伪托。

《邹阳》八篇。（《汉书·艺文志》）（按：《汉志》列在纵横家。今仅存《上书吴王》、《狱中上书自明》、《说王长君》，载在《史》、《汉》本传，或在八篇之数。《西京杂记》所载《酒赋》、《几赋》，后人以为伪作。《汉志·诗赋略》未著录有赋。）



《上书吴王》以秦之"晚节末路"为殷鉴，以汉初诸侯灭国为教训，告戒吴王要熟察形势，勿心怀不轨。维护汉朝统一，反对分裂活动，乃是本文的主旨。

臣闻秦倚曲台之宫，悬衡天下，画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节末路，张耳、陈胜连从兵之据，以叩函谷，咸阳遂危。何则？列郡不相亲，万室不相救也。今胡塞北河之外……斗城不止，救兵不止，死者相随……何则？强赵责于河间，六齐望于惠后，城阳顾于卢博，三淮之心坟墓。大王不忧，臣恐救兵之不专，胡马遂进窥于邯郸，越水长沙，还舟青阳……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始孝文皇帝据关入立，寒心销志，不求明衣。自立天子之后，使东牟朱虚东褒义父之后，深割婴儿王之，坏子王梁、代，益以淮阳。卒仆

济北，囚弟于雍者，岂非像辛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据先帝之遗业，左规山东，右制关中，变权易势，大臣难知。大臣弗察，臣恐周鼎复起于汉，新垣过计于朝，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

邹阳在梁，作《狱中上书自明》，既谈历代君臣相知，乃国之大幸，也谈众口铄金、偏听生奸的道理，其意虽在辩明冤屈，但也表白了自己不求富贵利达、取容当世的节操。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于期非新於齐、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於志，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於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駃騠；白圭显於中山，人恶之於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於浮辞哉！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於世，义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缪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素宦於朝，借誉於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於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於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系於俗，牵於世，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雠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



鲁之听，则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为也。

…………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於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乎昭旷之道也。今人主沈谄谀之辞，牵帷墙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此鲍焦所以愤於世也。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底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翟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於威重之权，胁於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於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邹阳狱中上书自明》：己之节不可变，王之听不可偏。只二意反复言之。（《义门读书记》第四九卷）

邹阳的文章，广征博喻，说理透辟，文采与气势兼胜，颇得战国纵横遗风。

盖吴蓄深谋，偏好策士，故文辩之士，亦常有纵横家遗风，词令文章，并上辟阖，犹战国游士之口说也。《汉志》纵横家，有《邹阳》七篇，而不录其词赋，似阳之在汉，固以权略见称。（《汉文学史纲要》第八篇《藩国之文术》）



邹阳的文章，富于情感，尤其《狱中上书自明》一文，激昂感慨，反复申说，是汉初第一篇抒情性文字。

想如泉涌，若肆笔出之，而神彩飞动，词章炳蔚，悲叹愤激，语兼讽刺，使人读之，千遍不厌，卓为千古奇作。”（《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月峰语）

辞重语复，烦冤啮喈，几无辙迹，晚周先秦之文，绝似《离骚》。

迫切之情，出以微婉；呜咽之响，流为激亮，此言情之善者也。（《骈体文钞》卷一六）

《狱中上书自明》词多骈丽，似六朝文之滥觞。

赋者，古诗之流。此又词赋之流也。邹、枚以赋手为文章，似连而断，

似断而连，层见复出，色倘而缕微，其中自具清骨。若王褒、吾丘、终童辈，则卑卑矣。（《古文眉诠》卷三三）

邹阳，纵横家也。观其上书，行文似骈。而文气之盛，异于后之四六。是故谓骈体气弱，未为笃论。（《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文学略说》）

第二节　经学文风的兴起

武帝至元、成之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央集权加强，思想渐趋一统。其时，文人为文，大抵依经立义，杂揉“天人感应”，以论证君权神圣、制度合理。这类文章，以董仲舒、公孙弘、杜钦、王吉、匡衡、刘向、谷永等人为代表。但因为汉初文风的影响，也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这一阶段，仍不乏直陈时事，不傍经典的政论文章，如司马相如、徐乐、严安、终军、主父偃、路温舒、贡禹等人的论说之文。以上两类文章而外，又有司马迁、东方朔、杨恽、杨贵等人的文章，或抒发情志，或立言通脱，在西汉文章之中，别具一格。

一　经　学　文　风



自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确立，文人对王权的依附性加强，以“天人感应说”论证王权合理性成为学术思想界关注的核心问题。自此之后，作家以维护王权为中心目的，大都以先验的、唯心的认识体系去规范现实，论说文章染上浓厚的经学作风。这样的文章，思想僵化，文气迟缓、典重、繁琐，失去了汉初文章的蓬勃生气。

（一）董仲舒

1. 生平与著作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东）人。西汉

今文经学大师。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诵读，三年不窥园。武帝时举贤良，对策三篇，世称“天人三策”。自此，独尊儒术，乃成局面。对策毕，出任江都王相，盛推阴阳灾异。后以言灾异下狱，复出为胶西王相。晚年辞官，居家修学著书，于朝廷隆推儒术，多有建议。（事见《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公羊学派观点阐发《春秋》，往往兼及阴阳五行、天人性命，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之作。

《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作。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见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

董子《春秋繁露》，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经学历史》第三章《经学昌明时代》）（按：“三科九旨”之说，参看《经学历史》第二章注释八。）

董仲舒又有《士不遇赋》，载在《艺文类聚》卷三七、《古文苑》。《春秋繁露》中的《山川颂》，实为赋体之文。



2. 文章风格

董仲舒在淡化先秦儒家典籍文献价值并使其神圣化和绝对化的基础上，论证君权神授的合理与礼义教化的必要，其文自不免与经典若即若离。故行文之时，十分注重逻辑的演绎与论说的从容，文章因之具有典雅博奥、雍容徐缓的风格。如元光元年对策中对《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一叙述语的阐释：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於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於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对策一》)

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恩者，事理明也。(《文心雕龙·议对》)

董仲舒学本公羊，而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则其于礼也深矣。至观其论大道，深奥宏博，又知于诸经之义，无所不贯。(《艺概·文概》)



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同上)

(《贤良对策》一)董学原本《春秋》，约符命以经术，贯天人于治教，粹然一出于正。方之贾生，有经术事功之辨。(《古文眉诠》卷三三)

元光元年七月，京都雨雹。董仲舒答鲍敞问，作《雨雹对》(见《古文苑》)。文章虽不外以天人感应之说立论，但言及雨雹之形成、形态之变化，句型自由、散韵结合、描状生动，很能见出在辞赋发达的时代，即经学家之文，亦不能不受到影响。

仲舒曰：阴气胁阳气。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回，朝夕不息。……以此推移，无有差慝。运动抑扬，更相动荡，则薰蒿歊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气上薄为雨；下薄为雾；风其噫也；云其气也；雷其相击之声也；电其相击之光也。二气之初蒸也，若有若无，若实若虚，若方若圆，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其寒月则雨凝于上，体尚轻微，而因风相袭，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则上合为大雨，下凝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至也，阴气暴上，雨则凝结成雹焉。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润叶津茎而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条，凌殄毒害而已。云则五色而为庆，三色而成矞；露则结味而成甘，结润而成膏。此圣人之在上，则阴阳和、风雨时也；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而为祲沴之妖也。(《雨雹对》)

《山川颂》虽以颂名，实为赋体。全文以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立意，歌颂汉儒的理想人格，且多引《诗经》及孔子语，虽颇含哲理，终究只是赋化了的经文阐释。

荀、贾赋篇，此与鼎足。(《骈体文钞》卷二二谭献评)



(二) 谷永

谷永(? —前10)，本名并，字子云，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人。博通经典，尤精天官、《京氏易》。工于为文，善言灾异。尝依附大将军、外戚王凤，官至大司农。病卒。今存文二十余篇，多为奏议、对策，较著名者如《建始三年举方正对策》、《黑龙见东莱对》、《灾异对》、《上书讼陈汤》、《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以上见《汉书》本传与《陈汤传》、《郊祀志》等)。

(谷)永于经书，泛为疏达，与杜钦、杜邺略等，不能洽浃如刘向父子及扬雄也。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略相反复，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党于王氏，上亦知之，不甚亲信也。(《汉书·谷

永杜邺传》）

谷永的文章虽称引经典，讲说灾异，但能“专攻上身与后宫”，对汉廷的昏庸暴虐，敢作大胆直露的批评。

《易》曰：“在中馈，无攸遂”，言妇人不得与事也。《诗》曰：“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顷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女宠至极，不可上矣；今之后起，天所不飨，什倍于前。废先帝法度，听用其言，官秩不当，纵释王诛，骄其亲属，假之权威，从横乱政，刺举之吏，莫敢奉宪。又以掖庭狱大为乱阱，榜箠瘠于炮格，绝灭人命，主为赵、李报德复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系无辜，掠立迫恐，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轻无义小人以为私客，数离深宫之固，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随，乌集杂会，饮醉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无别，闵免遁乐，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王者以民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上亡。是以明王爱养基本，不敢穷极，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听邪臣之计，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绪，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为高，积土为山，发徒起邑，并治宫馆，大兴繇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谿，费疑骊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后反故。又广旴营表，发人冢墓，断截骸骨，暴扬尸柩。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馁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诗》云：“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愿陛下追观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镜考己行。有不合者，臣当伏妄言之诛！（《黑龙见东莱对》）

谷永《灾异对》杂引《诗》、《书》、《易》、《论语》，讲说灾异，批评政治，一如《黑龙见东莱对》。但文中提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这在汉代尊崇君权、政治一统的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

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



上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灾异对》)

成帝末年，滥祀鬼神，迷信方术，谷永曾上书予以批评（其文见《汉书·郊祀志下》)。足见谷永虽然讲灾异，讲“天人感应”，他所关注的，依然在现实人生。

臣闻明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祀，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登遐倒景，览观悬圃，浮游蓬莱，耕耘五德，朝种暮获，与山石无极，黄冶变化，坚冰淖溺，化色五仓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景，终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听，圣人绝而不语。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室衰微，诸侯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新垣平、齐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其后，平等皆以术穷诈等，诛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渊玉女、钜鹿神人、轑阳侯师张宗之奸，纷纷复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尝专意散财，厚爵禄，竦精神，举天下以求之矣。旷日经年，靡有毫氂之验，足以揆今。经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唯陛下距绝此类，毋令奸人有以窥朝者。(《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



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观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文心雕龙·奏启》)

（三）刘向

1. 生平

刘向（前77—前6），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时更为向。汉

朝宗室，宣帝时任辇郎。因言黄金可成，不验，下狱，免死，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时，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因弹劾宦官弘恭、石显，两次下狱，免官多年。其间，作《使外亲上变事》、《条灾异封事》等文。成帝时，官光禄大夫，因反对外戚王凤擅权，屡为王氏所抑。官至中垒校尉，年七十二而卒。在此期间，尝领校宫廷藏书，撰成《别录》。又撰有《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新序》、《说苑》、《极谏用外戚封事》、《谏营起昌陵疏》、《复上奏灾异》等。（事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序》）（按：刘向所撰即《别录》）

2. 著作

刘向《条灾异封事》以西周、春秋、战国与秦朝史事为借鉴，杂引《诗》十四条、《易》四条、《论语》一条及《春秋》所言灾异，结合当时自然之异象，反复论证，意在揭露时弊，发人警醒。这样的文章，内容失于繁琐，文气病于迟缓，但所言皆中肯綮，颇不同于一意周旋经典的腐儒。如：



……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愬，转相是非。传授增加，文书纷纠，前后错缪，毁誉浑乱。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权势藉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况甚于《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

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条灾异封事》)

元帝初立，忠直辅政，寺人潜愬，复困犴狱。至今读其封事，忠爱惻怛，义兼诗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刘子政集》)

章法之完密，提缀起伏之明画，往古未有，来者莫继。(《骈体文钞》卷一一)

当日恭显等假灾异以谮旧臣，更生发愤奏辩，谓灾异迭来，由谗邪并进；而信任诛斥，在主断不疑。援古形今，节节暗生，重重驳换，有反有正；有博征，有的证。本根湛深，气味醇茂，是为西汉后来之雄。(《古文眉诠》卷二六)

元帝时，石显与陈汤、甘延寿有隙。陈、甘击郅支有功，石显意欲加害，劾其"矫制兴师"。刘向上《理甘延寿、陈汤疏》(见《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引经典、史事，力言"论大功者不录小过"，陈、甘因此得以封侯。全文立论鲜明，说理严密，语言简直，与《条灾异封事》的风格，很不相同。

为文论事，当反复致志，救首救尾，则事词章著，览者可以立决。陈汤斩郅支而功未录，刘向上疏论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诛猃狁"，次言"齐桓公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李广利靡亿万之费，捐五万之师，廑获宛王之首，孝武不录其过，封为列侯"，末言"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后极言"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于是天子乃下诏议封。盖其一疏抑扬援证，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匡衡、中书石显出力沮害，竟不能夺。不然，衡、显之议，岂区区一故九卿所能亢哉？(《容斋随笔》卷一五)



朴至完密。精劲而宕逸。(《骈体文钞》卷一一)

刘向《谏营起昌陵疏》批评汉成帝靡费厚葬，剥夺民力。全文不傍经典，不言灾异，开篇以"三统"说为依据，直言天授王权，非独一姓；又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这样的立论，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栗，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此谓也。(《谏营起昌陵疏》)

之后，刘向以历史的正反教训，言葬制的厚薄利弊。其中，写孔子尚薄葬一段，似娓娓而谈；写始皇厚葬误国一段，尤其触目惊心：

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人，生薶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谏营起昌陵疏》)

刘向更言葬制的厚薄，体现了帝王是否具有德行智慧，因而直接关乎国家的兴亡。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汉成帝大起昌陵所作的批评，不独更为深刻，也更能发人警醒。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垅愈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惽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陛下慈仁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陇，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谏营起昌陵疏》)

谏厚葬首言国家无常之理，意易世之后，终不能保，以见其无益，此用意深远矣。中言古今圣帝明王贤臣智士薄葬之得以为劝。末言吴、秦昏主暴君厚葬之害以为戒。其言必旁喻远引，不为简捷直致，所以孚化人主，使浸注滋润入其言而不觉也。可谓善立言，善于告君矣。

一篇文字递递援引许多典故，末只以此数句收拾，结果意思殆尽，所谓片言有万钧之势，真文章宗匠手段。（《汉书评林》引林希元语）

刘向之文，虽杂引经典，但指切时事，发于至诚，多有可观之辞。

刘向文足继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谷梁》。仲舒对策，向上封事，引《春秋》并言“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亦可见所学之务乎其大，不似经生习气，譊譊置辩于细故之异同也。

刘向、匡衡文皆本经术。向倾吐肝胆，诚恳悱恻，说经却转有大意处；衡则说经较细，然觉志不逮矣。（《艺概·文概》）

《别录》中有《战国策叙录》，实为精采的史论文章。其文概述战国之世崇霸力、尚权谋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必然，不独文气纵横，颇有汉初文章的气势，亦独具史家的眼光：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战国策叙录》）

在武帝以来，罢黜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而独尊儒术的时代，刘向对战国策士的才干与作用予以历史的评价，亦可见其思想的并不“醇正”。

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

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政。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战国策叙录》)

刘中垒宏而肆，其根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新序》、《说苑》所辑，大抵为诸子、史书、策士之辞与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言事并重，或以记言为主，虽不乏封建道德说教与灾异迷信的内容，但语言大都精炼而生动，一些故事至今仍有认识与借鉴的价值。

《新序》十卷，汉刘向撰。……《隋书·经籍志》："《新序》三十卷，录一卷。"……曾巩《校书序》则云："今可见者十篇。"……巩所校录，则宋初残阙之本也。……此本《杂事》五卷(按：指江苏巡抚采进本)、《刺奢》一卷、《节士》二卷、《善谋》二卷，即曾巩校定之旧。《崇文总目》云："所载皆战国、秦汉间事。以今考之，春秋时事尤多，汉事不过数条。大抵采百家传记，以类相从，故颇与《春秋》内外传、《战国策》、《太史公书》互相出入"。高似孙《子略》谓："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纲纪、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固未免推崇已甚。要其推明古训，以衷之于道德仁义，在诸子中犹不失为儒者之言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一《子部·儒家类》)

《说苑》二十卷。汉刘向撰。《崇文总目》云："今存五篇，余皆亡。"曾巩《校书序》云："得十五篇于士大夫家，与旧为二十篇"。晁公武《读书志》云："刘向《说苑》以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法诫、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为目的。阳嘉四年上之，阙第二十卷。曾子固所得之二十篇，正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今本(按：指江苏巡抚采进本)第十《法诫》作《敬慎》，而《修文》篇后有《反质》篇。……其书皆录遗闻旧事，足为法戒之资者。其例略如《诗外传》。……二书(按：指《新序》、《说苑》)同出向手，而自相矛盾，殆捃拾众说，各据本文，偶尔失于参校也。然古籍散佚，多赖此以存。(同上)(按：严可均辑有《新序》、《说苑》佚文，见《全汉文》卷



二九）

也有的故事，语言隽永，意蕴深远，实开魏晋轶事小说的先声。如《楚人亡弓》：

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谓大弓也。（《说苑·至公》）

又如《齐景公游牛山》：

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使古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斯如之何？"乃泣沾襟。高子曰："然。赖君之赐，蔬食恶肉，可得而食也；驽马栈车，可得而乘也，且不欲死，而况吾君乎！"俯而垂泣。晏子拊手而笑曰："乐哉！今日婴之游也，见怯君一而谀臣二。使古之无死者，则太公、丁公至今犹存，吾君方为被蓑笠而立乎畎亩之中，唯事之恒，何暇念死乎？"景公惭焉。（《新序》，见《太平御览》卷四二八，又见《全汉文》卷三九）

二　《淮南子》与《盐铁论》



（一）刘安和《淮南子》

1. 生平

刘安（前179—前122），汉高帝孙，武帝叔父。始封阜陵侯，后袭父封为淮南王。谋反事泄，被杀。事见《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刘安好艺文，尝招致宾客作《内书》二十一篇，即今传《淮南子》。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

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中《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伎赋颂，昏莫然后罢。(《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汉书·淮南王传》称，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而《艺文志》"杂家"者流，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西京杂记》："安著《鸿烈》二十一篇。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鸿烈"之义，一见于本书《要略》，而高诱叙中，亦言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号曰《鸿烈》。是《内篇》一名《鸿烈》也。诱又曰，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艺文志》本向、歆所述，是《淮南内》、《淮南外》之称，为刘向之所定。然只题《淮南》，不必称"子"。《志》论次儒家至小说，名曰"诸子十家"，后遂缘之而加"子"字矣。(庄逵吉《淮南子序》)

2.《淮南子》的思想倾向

《淮南子》一书，兼综各家，内容驳杂，很能反映汉初以来文化方面兼容并蓄的时代特点。

《淮南鸿烈》者，淮南王刘安以文辩致天下方术之士，会粹诸子，旁搜异闻以成之。凡阴阳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蛮之远、昆虫草木之细，瑰奇诡异、足以骇人耳目者，无不森然罗列其间，盖天下类书之博者也。(黄震《黄氏日钞》卷五五)



言气多本之阴阳、神仙、医经之说，非儒、道、名、法所有。道家书可见者，今尚有《列子》，而《天瑞篇》有"大素"等名。又云《易》变为一，一变为七，七变为九，皆近《易纬》之说，晚周道家必不为此沾滞之论也。故疑《列子》本书已亡，今本乃汉末人伪作。又《淮南》亦依托道家，尤多言气，此所以异于晚周。(章炳麟《国故论衡·明见》)

《淮南子》虽属杂家，道家思想仍占有重要地位。

(《淮南子》)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

则橐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高诱《淮南子序》）

在武帝尊崇儒术、削夺诸侯、加强皇权的时代，《淮南子》以道家为主，兼采各家的思想倾向，实则是代表了地方诸侯利益的。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为天下强掩弱，众暴寡，诈欺愚，勇侵怯，怀知而不以相教，积财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为一人之聪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绝国殊俗，僻远幽闲之处，不能被德承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是以地无不任，时无不应，官无隐事，国无遗利，所以衣寒食饥，养老弱而息劳倦也。（《淮南子·修务训》）

夫圣人之治天下者，君臣父子以相生，桑麻谷粟以相养，其义在六经，其用在民生日用之常，如此而已耳。自周衰天下乱，诸子蜂起，各立异说而各以祸其人之国。汉兴，一切扫除，归之忠厚。诸子余党，终然无所售。诸侯王之好事而不知体要者，稍稍收之，亦无不以之自祸。安不幸贵盛而多材，慷慨而喜事，起而招集散亡，力为宗主。于是春秋战国以来纷纷诸子之遗毒余祸皆萃于安矣，安亦将如之何而不诛灭哉！（黄震《黄氏日钞》卷五五）

对于儒家的某些主张，《淮南子》也持肯定的态度。如论礼义廉耻之必要：



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泰族训》）

3.《淮南子》的文章风格

《淮南子》的文章，兼具秦汉诸子与屈赋的风格，词采赡丽，富于形象，一些文字更有辞赋的特点。

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汉之淮南聘天下辨通以著篇章。书成，皆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有变易者。乃其事约艳，体具而言微也。（桓谭《新论》）

《淮南》泛采而文丽。（《文心雕龙·诸子》）

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读其书二十篇，篇中文章，无所不有，如与《庄》、《列》、《吕氏春秋》、《韩非子》诸篇相经纬表里，何其意之杂出，文之沿复也。《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庄》、《列》；《淮南》之议论，错于不韦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书 是又非独出于淮南，所谓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诸人，各以才智辩谋，出奇驰隽，所以其书驳然不一。……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厌常玩俗者往往爱其书，况其推测物理、探索阴阳，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高似孙《子略》卷四）

《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艺概·文概》）

如《淮南子》文章之有类于《庄子》者：

凤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风雨不兴，川谷不澹，草木不摇，而燕雀佼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宙之间。还至其曾逝万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之疏圃，饮砥柱之湍濑。邅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际，经蹑都广，入日抑节，羽翼弱水，暮宿风穴。当此之时，鸿鹄鸧鹤，莫不惮惊伏窜，注喙江裔，又况直燕雀之类乎？此明于小动之迹，而不知大节之所由者也。（《览冥训》）



又如《淮南子》文章之有类于《离骚》者：

昔者冯夷太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游微雾，骛恍惚，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扶摇抮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钥天门。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锻，不能与之争先。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驰大区。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雿

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刘览偏照，复守以全，经营四隅，还反于枢。（《原道训》）

（二）桓宽和《盐铁论》

1．生平和著作

桓宽（生卒年不详），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治《公羊春秋》，博学好文，官至庐江太守丞。著有《盐铁论》六十篇。

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御史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当时诘难，颇有其议文。至宣帝时，汝南桓宽次公，治《公羊春秋》，举为郎，至庐江太守丞。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

宽集其所论，为书凡六十篇，篇各标目，实则反复问答，诸篇皆首尾相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一《子部·儒家类》）

2．桓宽的思想倾向和《盐铁论》的文章风格



从武帝至宣帝，虽尊崇儒术，但在政治实践中，却王霸杂用，并不偏执一隅。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辩论，已远远超出盐铁政策范围，涉及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问题，从而显示出儒法两家对于封建政治的互有利弊得失。桓宽于“盐铁之议”虽有剪裁、加工，但基本以客观、公允的态度，论列双方观点，《盐铁论》一书，因此具有史料的价值。如第一篇《本议》：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

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蓄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陈。修之于庙堂，而折冲旋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赡，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无被坚执锐者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扰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长久，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盐铁论·本议》）

桓宽尊儒，却并非纯儒。他赞同贤良文学的观点，为不废盐铁专营深表遗憾，但对桑弘羊也并不一概否定。桓宽最为反感的，乃是随声是非、明哲保身的圆滑官僚。《盐铁论》最后一篇《杂论》，即桓宽假借"客曰"，发表自己的意见：



客曰：余睹盐铁之义，观乎公卿、文学、贤良之论，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义，或务权利，异哉吾所闻。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长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为予言，当此之时，豪俊并进，四方辐凑，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之伦六十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訚訚焉，侃侃焉，虽未能详备，斯可略观矣。然蔽于云雾，终废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广可以附远；知权利可以广用，而不知稼穑可以富国也。近者亲附，远者悦德，则何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于斯路，而务蓄利长威，岂不谬哉！中山刘子雍言王道，矫当世，复诸正，务在乎反本，直而

不缴，切而不燎，斌斌然斯可谓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奋由路之意，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然巨儒宿学，恶然大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然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易》曰："焚如弃如。"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车丞相即周鲁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议以辅宰辅，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悦其上。斗筲之人，道谀之徒，何足算哉！（《盐铁论·杂论》）

……宽作是书，惟以盐铁为名，盖惜其议不尽行也。书末《杂论》一篇，述汝南朱子伯之言，记贤良茂陵唐生、文学万鲁生等六十余人，而最推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于桑弘羊、车千秋深著微词。盖其书之大旨，所论皆食货之事，而言皆述先生，称六经，故诸史皆列之儒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子部·儒家》）

《盐铁论》虽无汉初政论文章的气势，但其多引史鉴，以言时事，又不妄言灾异，不滥引经典，语言简明直率，却颇与后者相似。此外，一些段落，重形容，多排比铺陈，富于感情色彩，却又是汉初文章所没有的。如《备胡》等篇贤良言行役之人的痛苦：



今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绝殊辽远，身在胡越，心怀老母。老母垂泣，室妇悲恨，推其饥渴，念其寒苦。《诗》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我今来思（按：当作"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按：当作"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之我哀。"故圣人怜其如此，悯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劳赐举失职者，所以哀远民而慰抚老母也。（《盐铁论·备胡》）

贤良曰："……安者不能恤危，饱者不能食饥。故余粱肉者，难为言隐约；处佚乐者，难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广厦洞房者，不知专屋狭庐，上漏下湿者之瘖也；系马百驷，货财充内，储陈纳新者，不知有旦无暮，称贷者之急也；广第唐园，良田连比者，不知无运踵之业，窜头宅者之役也；原马被山，牛羊满谷者，不知无孤豚瘠犊者之窭也；高枕谈卧，无叫号者，不知忧私责，与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纨蹑韦，搏粱啮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糟之苦也；从容房闱之间，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坚驱良，列骑成行者，不知负担步行者之难也；同床旃席，侍御满侧者，不知负

辂輓舩，登高绝流者之难也；衣轻暖、被英裘、处温室、载安车者，不知乘边城、飘胡代、乡清风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孙保之，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妇之悲恨也；耳听五音，目视弄优者，不知蒙流矢、距敌方外之死者也；东响伏几，振笔如文调者，不知求索之急，箠楚之痛者也；坐旃尚之上，安图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难也，昔商鞅之任秦刑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师若弹丸。从军旅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独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义以度，所好恶与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若斯，则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讥？”公卿愀然，寂若无人，于是遂罢议止词。……（《盐铁论·盐铁取下》）

《盐铁论》作为对话体作品，既有作者的主观倾向，又能准确生动地写出人物的见解和论辩的作风。其文简洁畅达，浑厚朴实，在汉文之中，独具一格。

两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论相定，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之《新论》也。（《论衡·案书》）

（《盐铁议评》）为盐铁诸罔利之术者，桑大夫也。以斥桑为中纽，前题诸生，后撅朝议，颇仰扬抑，不激不阿。（《古文眉诠》卷三四）

三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生平，详见本编第五章第三节。

汉武帝通西南夷，司马相如是积极的支持者。故《喻巴蜀檄》对唐蒙的急于事功，只是轻轻带过，而于宣扬大汉的声威，声明通西南夷的意义，责备巴蜀父老“不急国家之难”，措辞却十分严正。

建元六年……（唐）蒙乃上书说上曰：“……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乃拜蒙以郎中将……发巴蜀卒治道……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细玩檄文，其中责百姓逃亡贼杀之罪居多，且以边郡之士闻警乐战为词，则非上意之说，不问而知。（《古文析义》卷三）

鉴于通西南夷不独为蜀父老，亦为朝廷大臣如公孙弘等所反对，司马相如设为问答之词，作《难蜀父老》，以委婉的语气，再三申说开辟西南通道的意义。可知自司马相如作《上林赋》，他对汉武帝稳定边地、巩固统一的政策始终持拥护的态度。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数岁，道不通……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报，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时方筑朔方，据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为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许之……（《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是文谓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则可。若谓以风天子，其事已成，不便中绝，且词中劝百讽一，又不如其已矣。总长卿以词赋得幸，多迎合上意。如上好游，则为《上林赋》；上好神仙，则为《大人赋》，至死犹言封禅，遗札以奏。则此篇未必非迎合。（《古文析义》卷二）

司马相如《谏猎疏》不言佚猎荒政害德，而言搏兽祸藏隐微，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是讽谏而兼奉迎的一段妙文。

此（按，指《谏猎疏》）全为陵阻险、射猛兽而发，说得悚然可畏，绝不提出纵兽荒禽，废事失德腐语。对英主言，自当如此。（《古文析义》卷三）



上述文章，或雄奇藻丽，或广用譬喻；或从容议论，或凌厉其词，既有汉初文章直指事情、不傍经义的气概，又显示出武帝时代词章渐趋华丽的趋势。

储同人曰：严厉而文。扬子云谓孔门用赋，则相如入室矣。即用文，何独不然？长卿所作（按：指《喻巴蜀檄》），文质彬彬，色声调法交至，扬（雄）、刘（向）、杜（挚）、谷（永）并揣摩其词令，仿佛其气度，而况后人乎？（《古文辞类要笺证》第六册引）

（《喻巴蜀檄》）意深重而语微婉，骨干大而肌理甚细。（《骈体文钞》卷一七）

（《喻巴蜀檄》）行文平叙处作倒入势，总上处作生下势，对处作递势，断处作续势。初阅之似平实无奇，再三读之，方见其转换卸接处笔力之高，人不能及。（《古文析义》卷三）

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文心雕龙·檄移》)

《难蜀父老》吴辟畺曰：西汉文章之盛，气体雄直，而奇文奥旨，足以运其气而举其词，故巍然浩然，如山海之富，而蛟龙万变，恍惚出没其中。盖扬、马于斯，尤为极轨，此文章之瑰玮大观也。学文者导源于此，而后上穷六经，下该百家，一以贯之矣。(《古文辞类要笺证》第十一册引)

意虽寓规，实则颂也。解此措语之法，乃能气壮情骇。《四子讲德论》仿之必俗，此文（按，指《难蜀父老》）仿之必骇也。然必解此，然后文有生气，藻丽绝特，尤撷香拾艳之渊薮也。(《骈体文钞》卷三)

(《谏猎疏》)朴而能华。发端雄奇，敷陈恳到，有屈刀为镜之妙。(同上，卷一一)

四　杨王孙与杨恽

(一) 杨王孙

在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杨王孙是第一个笃行黄老之术的人。

杨王孙者，孝武帝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汉书·杨胡朱梅云传》)



杨王孙尝作《报祁侯缯它书》，不独斥人间厚葬陋俗，更追求精神的返朴归真，是汉代散文中一篇发明玄思、行文通脱的文字。

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

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尧之葬也，窾木为椟，葛藟为缄，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殠。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于戏！吾不为也！（《报祁侯缯它书》，见《汉书·杨胡朱梅传》）

（二）杨恽

杨辉（？一前56），字子幼，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司马迁外孙。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因告发霍氏谋反，封平通侯，迁中郎将。居官清廉，位至光禄勋。性刻急，好发人阴私。因同僚间互相攻讦，被免为庶人。家居，大治产业，以财自娱。友人孙会宗作书谏戒之，恽作《报孙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以大逆无道罪腰斩。事见《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不知恽当时何怒至此？总是平时胸中拂郁，借此大泄耳。……且汉宣亦何从求而得之？吾意会宗得书之时，必有大不能忍者，或宣之于朝，或谤之于友，故使众得共闻。虽文致其罪，肇于会宗之谋与否，俱不可知，但出其书，以成其狱，实会宗为之矣。（《古文析义》卷四）

《报孙会宗书》是西汉文章中少见的怨愤、玩世之作。这样的文章，魏晋之际并不罕见，但在对文人思想行为规范甚严的汉代，杨恽竟因此罹祸。



兀敖恢奇，笔阵酷类其外祖，而旷荡之襟与偃蹇之态，不双管而并行，亦怪事也。（《古文眉诠》卷三一）

真西山曰：文气豪荡似史迁，然词涉怨望。吴辟疆曰：子幼学业渊源外祖，此文亦脱胎《报任安书》，而悍厉过之，乃其获罪之由。而文字之俊美，夐绝千古矣。（《古文辞类要笺证》第五册引）

第三节　复古文风

从成、哀之世到两汉易代之际，政治危机日深，古文学派崛

起。以古文反今文，不仅有恢复儒学典籍本来面目的意义，也包含有对“天人感应”思想体系的怀疑与否定。兼之王莽标榜“托古改制”，古文学派又受到官方的鼓励。学术的复古，必然导致文章的复古。不傍经典，畅所欲言、明白晓畅，少有文采，是这一时期论说文章的特点。

一 刘歆

（一）生平

刘歆（前53？—23），刘向子，字子骏。西汉古文经学家。成帝时，与刘向共同校领秘书，作《三统历》。向死，承父职为中垒校尉。哀帝即位，王莽举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承父业撰成《七略》，为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因提倡古文经学，受到五经博士的反对，作《移让太常博士书》。被逐，出任河内、五原等地太守。王莽摄政，刘歆为国师，封红休侯。因其子、女死于莽，参与劫持王莽，事泄自杀。（事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河平中，（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汉书·律历表》）

至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汉书·艺文志序》）

（二）作品

《移让太常博士书》批评今文学家“皓首穷经”、“抱残守缺”

的学风，“随声是非”、“党同门、妒道真”的态度，是汉代第一篇反今学，复古学的文章。其文措辞尖锐，无所依傍，峻洁有力，感情充沛，在经学极盛的时代，是不可多得的。

刘歆之移太常，辞刚而义辨，文移之首也。（《文心雕龙·檄移》）

此处真是千锤百炼，然却无一浮语，俱是本色，顾奇险亦未尝不具，愈玩愈妙。（《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月峰语）

子骏文气，峻厉过子厥考。（《古文辞类要笺证》第五册引吴先生语）

道源经委，正大详明。艰难郑重，字里有泪。（《古文眉诠》卷三六）

《移太常博士书》于研究经学发展历史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此（按：指《移太常博士书》）视《儒林传序》较简核，然事则详赡。

叙经术废兴明白有条理，可与《史》、《汉》、《儒林传序》参看。（《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月峰语）

叙经术废兴完阙之端，历历可见。文字典实峻洁，无一句浮词冗语。（同上，引林希元语）

二 扬 雄



（一）生平

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雄为人好学恬淡，口吃不能剧谈。作赋慕司马相如，年四十余始游于京师。为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吏，后待诏承明殿。数从成帝祭祀游猎，奏赋颂，任为郎，给事黄门。历成、哀、平三朝，不得升进。王莽篡位，以资深转为大夫，校书天禄阁。后因刘棻等进献“符命”，触怒王莽，株连扬雄，乃投阁自杀，几死。晚年自甘淡泊，埋头著述，不好辞赋，撰成《法言》、《太玄》。事见《汉书·扬雄传》

（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

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按：指《甘泉》、《河乐》、《羽猎》、《长杨》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忽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汉书·扬雄传赞》）

（二）作品

扬雄后期不好辞赋，更不屑作依经立义的文章，而要追踪"立德"兼"立言"的圣人。他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力求自成一家之言。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类推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而大潭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故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画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擢之以三策，关之以休咎，絣之以象类，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拟之以道德仁义礼知。无主无咎，要合五经，苟非其事，文不虚生。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十一篇，皆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自叙传》）

扬雄把《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推广为天、地、人"三玄"，在此基础上，调合道家的自然哲学与儒家的伦理哲学，构建起新的思想体系。

天以不见为玄，地以不形为玄，人以心腹为玄。（《太玄·告》）



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太玄·玄图》)

玄者，幽攡万类而不见其形者也。……知阴知阳，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惟玄乎？(《太玄·玄攡》)

扬雄的社会伦理观，本于儒家，但对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又有所扬弃。

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法言·寡见》)

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

扬雄既折衷儒道，对汉儒的谶纬迷信和老子的捶提仁义，皆有所批判。

或问："圣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则史也何异？"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法言·五百》)

或问："赵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法言·重黎》)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法言·问道》)

或曰："人有齐死生，同贫富，等贵贱，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惧乎？信死生齐，贫富同，贵贱等，则吾以圣人为嚣嚣。"(《法言·君子》)



扬雄折衷儒道的二元思想和二元人格，实标志着汉代正宗思想的危机和异端思想的萌发。对于两汉之际文人的思想作风和学术作风的转变，扬雄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溯自扬子云之后，汉代学士文人即间尝企慕玄远。凡抗志玄妙者，"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阔略杪小之礼，荡佚人间之事"(冯衍《显志赋》)。"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世之责，永保性命之期"(仲长统《昌言》)。则其所以寄迹宅心者，已与正始永嘉之人士无或异。……则贵玄言，宗老氏，魏晋之时虽称极盛，而于东汉亦已见其端矣。

然谈玄者，东汉之与魏晋，固有根本之不同。……汉代偏重天地运行之

物理（按扬雄、张衡之玄亦有不同，兹不详析——原注），魏晋贵谈有无之玄致。二者虽均尝托始于老子，然前者常不免依物象数理之消息盈虚，言天道，合人事；后者建言大道之玄远无朕，而不执著于实物，凡阴阳五行以及象数之谈，遂均废置不用。因乃进于纯玄学之讨论。汉代思想与魏晋清言之别，要在斯矣。（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魏晋玄学流别略论》）

对于汉儒紧守家法，耽于笺注的繁言碎语，扬雄持否定的态度。

或曰："浇浇者，天下皆说也，奚其存？"曰："曼是为也。天下之亡圣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识其亲；浇浇之学，各习其师。"（《法言·寡见》）

为此，扬雄既主张文质相符：

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法言·寡见》）

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人事也具，可损益欤？（《法言·玄莹》）

又主张文道皆应师法孔子的明白显达：

君子言也无择，听也无淫。择则乱，淫则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较且易也。（《法言·吾子》）



但扬雄更认为圣人之道，深不可测，辞必艰深，因而为文亦大都古奥难读。

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欤？"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地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廓，五经之为众说郛。"

客难扬子曰："凡著书者，为众人之所好也……今吾子乃抗辞幽说，闳意眇指，独驰骋于有亡之际……殆不可乎？"扬子曰："俞。若夫闳言崇议，幽微之途，盖难与览者同也。……彼岂好为艰难哉？势不得已也。……盖胥靡

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解难》）

扬雄对经学文风实行反拨，因矫枉过正，刻意求古，时为后人所批评。

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

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苏轼《答谢民师书》）

扬子云说道理，可谓能将许大见识寻求。然从来足于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气尽力竭耶？

扬子云之说，其病正坐近似圣人。（《艺概·文概》）

我曾经讲过几句做古文的秘诀，是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朦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鲁迅《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



第四节　复古文风的反拨

经历了两汉之际的社会危机，东汉王朝复归一统。刘秀利用图谶以巩固政权，汉代经学由此进入神学的阶段。但与此同时，也有文人学者对传统产生了怀疑，以桓谭、王充为代表的异端思想在这一时期最有时代特点。他们的文章，扬弃了扬雄的艰深古奥，行文力求达意，表现了由文转质的新趋势。

一　桓　谭

桓谭（前23？—56），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宿县一带）人。成帝时以父任为郎。王莽居摄时，"谭独自守，默然无言"；莽新之时，官为掌乐大夫；光武时为议郎给事中。因反对谶纬，几乎被杀，病死贬官途中。事见《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桓谭为学，"训诂大义，不为章句"。所著《新论》，仅存辑本。

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桓谭甚推许扬雄，王充尤盛赞《新论》，可见在扬雄与王充之间，桓谭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

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汉书·扬雄传赞》引桓谭语）

王公子问："扬子云何人邪？"答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国师子骏曰："何以言之？"答曰："才通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广大，其余皆藂残小论，不能比之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也。《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新论·闵友》）



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君山……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

观《新论》今存残篇，桓谭超群之识，乃在反对谶纬。其《后汉书》本传所载《抑谶重赏疏》，亦明确阐扬这一观点。

夫变异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

则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故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焉。(《新论·谴非》)

龙无尺水，无以升天；圣人无尺土，无以王天下。

谶出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托，称是孔丘，误之甚也。(《新论·启寤》)

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抑谶重赏疏》)

《新论》有《形神》篇，论形在则神在，形死则神灭，是对神学实行哲学的批判。全文不事雕琢，只求达意；笔调简洁，行文明快，实已扬弃扬雄的古奥，显示了汉代文风由文转质的新特点。

余尝过故陈令同郡杜房，见其读老子书，言老子用恬淡养性，致寿数百岁；今行其道，宁能延年却老乎？……余见其旁有麻烛，而灺垂一尺所，则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如善扶持，随火而侧之，可毋灭而竟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又不能后燃其灺。灺，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也。(《新论·形神》)

彼长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论衡·超奇》)



二　王充与《论衡》

(一) 王充的生平

王充(27—79?)，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出身庶族，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作过下层官吏，晚年家居著书。事见《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与《论衡·自纪篇》。

王充勤于著述，所作大抵皆正嫌疑，疾虚妄，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悯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夫贤圣殁而大义分，蹉跎殊趋，各自开门；通人观览，不能钉铨，遥闻传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没虚华之文，存敦庞之朴，拨流失之风，反宓戏之俗。(《论衡·自纪篇》)

（二）《论衡》

王充著作，唯《论衡》传世。其文以"疾虚妄"(《论衡·佚文篇》)为旨归，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先贤学说，更对汉代的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河洛伪书、谶纬迷信，乃至经学学风、俗儒人格实行学术的理性批判，其中自然也包含对现实的政治批判。

例如，《论衡》破除谶纬迷信，而不避当世显学：



> 或曰："凡动行之类，皆本有为。有欲故动，动则有为。今天动行与人相似，安得无为？"曰：天之动行也，施气也。体动，气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动气也，体动，气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气也，非欲以生子，气施而子自生矣。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恬淡、无欲、无为、无事者也。老聃得以寿矣，老聃禀之于天。使天无此气，老聃安所禀受此性？师无其说而弟子独言者，未之有也。或复于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为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难；已得仲父，何为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复与知。皇天以至优之德与王政，随而谴告之，则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过上帝也。

《论衡》疾虚妄而不避圣人：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最重也。问：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问孔篇》)

《论衡》疾虚妄而不避上圣：

或曰："桓公知管仲贤，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将谴告之矣。使天遭尧、舜，必无谴告之变。"曰："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择才若尧、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复与知。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自然篇》)

《论衡》刺讥俗儒败坏五经，亦不避当世显学。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正说篇》)



既批判天命论，又肯定命定论，是《论衡》内在的思想矛盾：

人之死生，在于命之夭寿，不在行之善恶；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于政之得失。(《异虚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物、厌胜感动使之然也。……命当贵，时适平；期当乱，禄遭衰。(《偶会篇》)

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骨相篇》)

因《论衡》的理性批判精神，历代学者，褒贬不一。褒之者如：

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后汉书》李贤注引谢夷吾语。)

抱朴子曰：余雅谓王仲任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抱朴子外篇·喻蔽》)

王氏……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订百氏之增虚，诘九流之拘诞。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析理折衷，此书为多。……有如日星之丽天，顺经躔而轨道；河海之纪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为"谈助"、"才进"而已哉！(杨文昌《〈论衡〉序》)

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玄深重其书，即韩退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艺概·文概》)

充此书虽近于冗漫，而人品则颇高。当其时谶纬方盛，异说日新，而充独能指驳偏谬，剖析源流，卓然不为浮论所惑，其识见有过人者。又阴、窦擅权之际，明、章莅政之初，不闻藉学问以求知，托权门以取进，其淡然荣利，不逐时流，范史特为取之，有以也。且其中议论甚详，颇资证据，其足考古事者。(谭宗浚《〈论衡〉跋》)

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章炳麟《检论·学变》)

贬之者如：



充自矜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审若斯谈，匹如中风病易之夫，澹谛不已，不待听其终而已莫不非而笑之者。不谓后世且有转相仿效之徒，流转觚翰，则其坏人心而害世道，莫此为甚也。且充不特敢于疵訾先人，而亦欲诬蔑前哲：颜、路讥其庸固，孔、墨谓其祖愚。始以解免其贱微，而既乃挤贤圣而扳之，此其弊庸，讵止诡于众而已哉！(杭世骏《道古堂文集》)

《论衡》……以予观之，殆所谓小人而无忌惮者乎？观其《问孔》之篇，掎摭至圣；《自纪》之作，訾毁先人，既已身蹈不韪。而《宣汉》、《恢国》诸作，谀而无实，亦为公正所嗤。其尤所纰缪者，谓国人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政之得失也。……呜呼，何其悖也！后世误国之臣，是今而非古，动谓

天变不足畏，《诗》、《书》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盖自充启小人哉！（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论衡〉》）

（三）王充的文学观及其实践

王充论文，重有补于世。

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篇》）

王充自己著书，亦皆有为而发：

《政务》（按：王充作，已佚）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也；《订死》、《订鬼》，所以使俗薄丧葬也。……斯盖《论衡》有益之验也。言苟有益，虽作何害？（《对作篇》）

王充论文，主张华质相符。

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杰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超奇篇》）



王充自己的文章，则因力戒浮华而不甚重文采。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对作篇》）

充书不能纯美。或曰："口无择言，笔无择文。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言瞭于耳，则事昧于心；文察于目，则篇留于手。故辩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今新书既在论譬，说俗为戾，又不美好，于观不快。……吕氏、淮南，悬于市门，观读之者，无訾一言。今无二书之美文，虽众盛犹多谴毁。"答曰：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辨论是非，言不得巧……（《自纪》）

王充为文，力主通俗易懂，与好为艰深之辞的扬雄，很不相同。

充书形露易观。或曰："口辨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沈。按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之读者，训古乃下。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答曰：……《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自纪》)

《论衡》行文，深入浅出，得心应手，是其所长。但因力求对问题作深入的论证、逻辑的辨析，不免信笔所之。反复申说，又有冗漫散杂的缺点。

充书文重。或曰："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今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则读者不能尽；篇非一，则传者不能领。……"答曰：有是言也。盖寡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寡者为下。……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少；户口众，簿籍不得少。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经？(《自纪》)

其文（按，指《论衡》）反复诘难，颇伤词费……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废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四》)

(《论衡》)善为锋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惟内心之不光颖，故言辨而无继。(章炳麟《检论·学变》)



王充既为文通俗，又不废辞赋，这又是他与扬雄不同的地方。

素车朴船，孰与加漆采画也？然则鸿笔之人，国之船车采画也。(《须颂篇》)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广陵陈子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像屈原、贾生，奏

像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案书篇》)

第五节 汉末清议文章

东汉后期，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党祸频仍，社会危机日益深重。这时的文人即使从政，已无力回天；社会理想与人格理想的崩溃，又使他们陷入极度的绝望与愤懑，于是出现了"清议"的文章。以文章清议时政，虽不能有效地改变现实，却可以减轻精神的重荷。兼之此时诗歌复苏，辞赋亦走向抒情化，文人大都具有诗人的气质，较能自由地表达情感，也开始较自觉地追求文采。故这类发愤而作、指切时弊的文章，不但富于激情，也很注重语言的表达。

一 王 符

王符，生卒年不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出身寒微，性格耿介，与张衡友善。因不得仕进，愤而隐居著书，作《潜夫论》。事见《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蓄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王氏精习经术，而达于当世之务。其言用人行政诸大端，皆按切时势，令今可行，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其学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未为醇儒。然符以边隅一缝掖，闵俗陵替，发愤增叹，未能涉大廷，与议论以感动人物。又不得典司治民，以效其能。独蓄大道，托之空言，斯贾生所为太息，次公以之略观者已。(汪继培《潜夫论序》)

与王充相比，王符的文章好引据经典，侃侃而谈，儒者气息较

浓，未若前者为文的自由随便。

范氏以符与王充、仲长统同传，韩愈因作《后汉三贤赞》。今以三家之书相较，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前史列之儒家，斯为不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

《潜夫论》皆贵德义、抑荣利之旨，虽论卜、论梦亦然。（《艺概·文概》）

针对汉末豪门士族的霸占仕路与“众小朋党而固位，谗妒群吠啮贤”（《贤难篇》）的现实，王符不独愤激，而且树起新的人物品评标准。汉末的清议，依德行而不以事功，与此是很有关系的。

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贪贱冻馁、困辱厄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以为小人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纣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恶来，天子之三公也，而犹不免于小人者，以其心行恶也。伯夷、叔齐，饿夫也；傅说、胥靡，而井伯虞虏也，然世犹以为君子者，以为志节美也。故论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不足以为轻；处隶圉，不足以为耻；抚四海，不足以为荣。况乎其未能相悬若此者哉？故曰：宠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贱不足以卑已。（《潜夫论·论荣篇》）



二　崔　寔

崔寔（？—170），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曾任辽东太守，官至尚书。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殓”。曾论当时事数十条，名曰《政论》。事见《后汉书·崔骃列传》）

《政论》今大都散佚。其文指切时弊，分析治乱之道，颇为时人所重。

（寔）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

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后汉书·崔骃列传》）

为救正末世积弊，崔寔《政论》，略近法家，文风亦较《潜夫论》为峻直。

《政论》所言，主权不主经，谓济时拯世，不必体尧蹈舜，此岂为治之常法哉？……

崔寔《政论》，参霸政之法术。……寔言孝宣优于孝文，意在矫衰汉之弊，故不觉言之过当耳。（《艺概·文概》）

三 仲长统

仲长统（180—220），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一带）人。博涉群书，赡于文辞，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时人谓之"狂生"。州郡召不就，献帝时参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事见《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昌言》全书已佚。《后汉书》本传载《理乱》、《损益》、《法诫》三篇。《群书治要》、《齐民要术》辑有部分文字。



《昌言》及发愤之作，故于现实、历史的批判，更为激切。如《理乱篇》对君权神授的批判：

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

不独君权来自以暴力荼毒天下，即所谓天道，也是一部君主存亡迭代的历史：

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

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

其下，作者更历数了无论盛世与乱世，君子所无法避免的悲哀：

大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跼高天，蹐厚地，犹恐有镇厌之祸也。逮及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老者耄矣，不能及宽饶之俗；少者方壮，将复困于衰乱之时。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辩色，耳能辩声，口能辩味，体能辩寒温者，将皆以修洁为讳恶，设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乐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

为此，仲长统乃为文述志，托靠老庄，皈依自然。这样的文章，实开启了魏晋通脱的风气。



（统）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仲长统的并非醇儒之言，在汉末文坛，荦然为一大家。

友人东海缪袭常称统才章足继西京董、贾、刘、扬。（《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东京之矫矫者。……《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

仲长统深取崔寔《政论》，谓“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而统服之若此，宜其所著之《昌言》，旨不皆粹也。(《艺概·文概》)

东京之衰，刑赏无章也，而发愤者变之以法家。……上视扬雄诸家牵制儒术，奢阔无施，而三子（按，指王符、崔寔、仲长统）闳达矣。（章炳麟《訄书·学变》）

汉末文风，渐尚俳丽。三子之中，《昌言》可为代表。

东汉文浸入排丽，是以难企西京。缪袭称仲长统才章足继董、贾、刘、扬。今以《昌言》与数子之书并读，气格果相伯仲耶？(《艺概·文概》)



第四章

汉代史传文学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

一　司马迁的生平

（一）司马迁的家世

司马氏世掌太史之职。从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到祖父司马喜，因世事变故而中断。迁父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年间乃重掌史职。



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裴骃《史记集解》：张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颓、叔带之难，故司马氏奔晋"）。……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按：《汉书·司马迁传》作"蕲"），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昌生无泽（按：《汉书·司马迁传》作"毋择"），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按：张守节《史记正义》：《括地志》云："高门原俗名马门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十八里。汉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二十二里，夏阳故城东南有司马迁冢，在高门原上也）。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

民。有子曰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史记集解》)

《汉旧仪》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史记索隐》)

司马谈生在汉代学术思想相对自由，儒学尚未独尊的时候，故其思想兼采各家，而又偏重于黄老。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按：颜师古《汉书·司马迁传》注："景帝时人也，《儒林传》谓之黄生，与辕固争论于上前，谓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按：《汉书·司马迁传》作"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按：《索隐》引如淳语云："'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去羡也。"），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二）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的生年，一说在景帝中五年（？—145），一说在武帝建元六年（？—135），今学术界大都依从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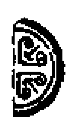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而

卒……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史记·太史公自序》)(按："天子始建汉家之封"，在武帝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裴骃《史记索隐》在"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后注云："《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以元封三年上溯二十八，是知裴骃以司马迁生年为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又"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后，张守节《史记正义》云："迁年四十二岁。"太初元年为公元前104年，上溯四十二年，是知张守节以司马迁生在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

案《自序》、《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此下夺迁字——原注)，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三年者，武帝之元封三年。苟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则当生于建元六年。然张守节《正义》于《自序》"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与《索隐》所引《博物志》差十岁。《正义》所云亦当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二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王国维《观林集林》卷一一《太史公行年考》)(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商务印书馆版《中国史学丛书》]均从此说，可参考。)

司马迁卒年已不可确考，其时大约在武帝末年(前87)左右。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汉书·司马迁传》)



太始四年，戊子，五十三岁。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者也。是报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或以任安下狱坐受卫太子节，当在征和二年，然是年无冬巡事。又行幸雍在次年正月，均与所报书不合。《田叔列传》后载褚先生所述武帝语曰："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是安于征和二年曾坐他事，公报任安书自在太始末审矣。(《太史公行年考》)

昭帝始元元年，乙未，六十岁。案史公卒年，绝不可考。惟《汉书·宣帝纪》载：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

丙吉拒闭使者不得入。……《汉书·百官公卿表》："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然中谒者本汉初旧名。……则武帝后元二年（按：即始元元年）郭穰已为中谒者令，时史公必已去官或前卒矣（按，《汉书·司马迁传》："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中书令即中书谒者令之略称。）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太史公行年考》）

司马迁幼承父训，诵读古文经传。二十岁南游江淮，北至齐鲁，复转而南游，于山川地理、文化风俗、历史故事、社会情况多有了解，为他日后著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迁生龙门（《史记正义》："《括地志》云：'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其山更黄河，夏禹所凿者也。龙门山在夏阳县，迁即汉夏阳县人也，至唐改曰韩城县。）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

考《自序》所记，亦不尽以游之先后为次。其次当先浮沅、湘，窥九疑；然后上会稽；自是北涉汶、泗，过楚及梁而归。否则既东复西，又折而之东北，殆无是理。……又案史公游踪，见于《史记》者……《河渠书》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齐太公世家》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玡，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魏世家》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孔子世家》曰："余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伯夷列传》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孟尝君列传》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信陵君列传》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春申君列传》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屈原贾生列传》曰："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淮阴侯列传》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樊郦滕灌列传》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肖、曹、樊哙、滕公之冢。"……此上所引，其有年可考者，仍各系之于其年下；余大抵是岁（按：即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出游时）事也，是岁所历各地，以先后次之如左：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屈原贾生列传》）。浮于沅、湘（《自序》）。窥九疑（同上）。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会稽大湟（《河渠书》）。上会稽、探

禹穴(《自序》)。上姑苏，望五湖(《河渠书》)。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春申君列传》)。据《绝越书》，则春申君故城宫室在吴)。适淮阴(《淮阴侯列传》)。行淮、泗、济，漯(《河渠书》)。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自序》)。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孔子世家》)。阨困鄱、薛、彭城(《自序》)。过薛(《孟尝君列传》)。适丰、沛(《樊郦滕灌列传》)。过梁、楚以归(《自序》)。适大梁之墟(《魏世家》)及《信陵君列传》)。(《太史公行年考》)。

司马迁约二十七岁仕为郎中，三十八岁承父职为太史令。因职务之便，尝参加国家盛典，数从武帝出游，又奉命出使西南夷，于山川地理、人文风俗、民族状况、社会政治，更加深了了解。

(元鼎)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汉书·武帝纪》)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

考《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文山郡。史公奉使西南，当在置郡之后。其明年(元封元年——原注)春正月，行幸缑氏，登崇高，遂东巡海上。夏四月，癸卯，还登封泰山；复东巡海上，自碣石至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盖史公自西南还报命，当在春间；时帝已东行，故自长安赴行在；其父谈当亦扈驾至缑氏、崇高间，或因病不得从，故留滞周南，适史公使反，遂遇父于河、洛之间也。(《太史公行年考》)

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史记·封禅书》)

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玡，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史记·齐太公世家》)

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泰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已轻百姓力矣。(《史记·蒙恬列传》)(按：以上三事，均在元封元年司马迁随武帝北巡与东祭泰山时。)

(元封二年)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于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汉书·武帝纪》)

(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服虔注，独鹿、鸣泽"皆在涿郡遒县北界也。")，自代而还。(《汉书·武帝纪》)



按《五帝本纪》"余北过涿鹿"……盖是年扈跸时所经。(《太史公行年考》)

司马迁作太史令后，继父志续撰《史记》。

(司马谈)发愤且卒……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索隐》："如淳云："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小颜云："紬谓缀集之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报任安书》，谓身遭腐刑，而隐忍苟活者，恐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论者遂谓迁遭李陵之祸，始发愤作《史记》，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谓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列代之史，父卒三年迁为太史令，即紬石室金匮之书，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会草创未就，而遭李陵之祸，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怨。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又《报任安书》内，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自天汉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阅八年。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其《自序》末谓自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乃指所述历代之事，止太初，非谓作史岁月至太初而讫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司马迁作史年岁》)



司马迁四十八岁遭李陵之祸，次年出狱任中书令。肉体与精神

的摧残，使他经历了一次人生的大转折，这对他认识封建集权政治和写作《史记》，有重大的影响。

七年(《史记集解》：徐广曰："天汉三年。"《史记正义》："案：从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史记·太史公自序》)

(李)广子三人，曰当户、椒、敢，为郎。……先广死。当户有遗腹子名陵。……李陵既壮，选为建章监，监诸骑。善射，爱士卒。天子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数岁，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史记·李将军列传》)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以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半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主上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治。家贫，货赂不足



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报任安书》）（按：《史记·匈奴列传》："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汉复使因杅将军敖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是知李陵奉命出军，意在分兵匈奴，解贰师之围，匈奴固不当以倾国之师，合击李陵。司马迁所云"仰亿万之师"，"一国共攻而围之"，乃用文学笔法，极言李陵以寡敌众之艰危与武帝待人之刻薄少恩，未可以实录视之。）

二　关于《史记》

（一）《史记》的名称

司马迁著史，自定名为《太史公书》，汉世习称之。又有称《太史公记》、《太史公百三十篇》者。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

子长述先人之业，作书继《春秋》之后，成一家言，故曰《太史公书》，以官名之者，承父志也。以虞卿、吕不韦著书之例言之，当云《太史公春秋》，不称《春秋》者，谦也。班史《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而班叔皮亦称为《太史公书》，盖子长未尝名其书曰《史记》也。（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五《史记》五《为太史公书》）



（扬）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父《太史公记》，颇为《春秋》。（《汉书·杨恽传》）

后年来朝，（东平思王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汉书·宣元六王传》）

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王充《论衡·对作》）（按《论衡》《超奇》、《案书》均言《太史公书》）。

《史记》之称，始见于东汉桓、灵之世，自此乃成为专称。

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东海庙碑》，见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〇二)。(按：此碑文刻在汉灵帝熹平元年 (172) 四月。)

君讳荣，字含和。治《鲁诗经》、韦君《章句》。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汉故执金吾丞武荣碑》，见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〇一。按：此碑刻于汉灵帝建宁 (168—171) 年间。

四代狱之别名，唐虞曰"士官"，《史记》曰"皋陶为理"。(蔡邕《独断》)

(《汉书》)《班彪传》又称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然出于载笔之词，与彪自称曰《太史公书》者异趣。钱大昕谓此为"范蔚宗所增益，非东观旧文"是也 (按：钱大昕语见《廿二史考异》五《史记》五《为太史公书》)。(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39～40页《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

(二)《史记》的体例

司马迁首创《史记》的纪传体例，以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体统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

(司马迁)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无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汉书·司马迁传》)



班彪谓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是盖以本纪、世家、列传为史迁创例。然《文心雕龙》云：迁取式《吕览》，著本纪以述皇王，则迁之作纪固有所本矣。今按《吕览》十二月纪，非专述帝王之事，而《史记·大宛传赞》则云："《禹本纪》言河出昆仑，高五百里。"又云："《禹本纪》及《山海经》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是迁之作纪，非本于《吕览》，而汉以前别有《禹本纪》一书，正迁所本耳。又《卫世家赞》

云："予读《世家》言"云云，则迁之作世家，亦有所本，非特创也 惟列传叙事，则古人所无。古人著书，凡发明义理，记载故事，皆谓之传。《孟子》曰："于传有之"，谓古书也。……汉武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是汉时所谓传，凡古书及说经皆名之，非专以叙一人之事也。其专以之叙事而人各一传，则自史迁始，而班史以后皆因之。（赵翼《陔余丛考》卷五《史记》）

古者史有二体，《尚书》纪言，不详年月；《春秋》纪事，特举大纲。至《左氏》始合而一之。事以年系，言以事见，凡一代之治乱，一人之贤否，与夫辞令掌故，先后源委，靡不条贯，诚史家之圭臬也。司马子长生秦火焚毁之后，网罗散失，通记八代，乃大变其体，创为纪传表志，盖有说焉。古事阙而近事繁，详略不伦，一也；自黄帝以迄共和，年月不备，难以编次，二也；传记杂出，传闻异辞，意在兼采，三也。故条贯之则例有所格，分著之说可并存，迁之变例，岂得已哉！（林春溥《开卷偶得》卷九）

迁书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本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号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之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班固述刘向、扬雄之言，谓"迁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郑樵谓"自《春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通志总序》——原注）谅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十七、二十八页）



司马迁继承先秦的史学传统，在注意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常于叙事之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锲入主观性论断，故《史记》的一些篇章，往往有史论的性质。

太史公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史记·太史公自序》）

予读太史公《自序》，以为孔子之后五百岁，不敢多让，至比其书于《春秋》，此其言诚夸，失实。然其卓识远见，微言晦志，不拘牵于世俗之论，而自抒发其意，亦有得《春秋》之一端者。……太史公之书，每不立正辞，往往见于抑扬之中，疑似之说，自非博学，不能深知其意……（陈子龙《史记

测议·序》)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客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见论断法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

《史记》又于每篇之末和书表之首，对历史和人物或作集中的分析，或抒发个人的感慨，开创了史书的论赞和序论的体例。

窃以为《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诰誓相参，风雅齐列矣！(《史通·序例》)

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文史通义·诗教下》)

若马班诸人论赞，虽为《春秋》之学，然本左氏假设君子推论之遗，其言似近实远，似正实反，情激而语转平，意严而说更缓，尺幅无多，而抑扬咏叹，往复流连，使人寻味行中，会心言外，温柔敦厚，《诗》教为深。(《文史通义》外篇三《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

《史记》因纪传体例所限，使用互见法以避免叙事记人的重复。



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文心雕龙·史传》)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史通·二体》)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

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所为体之失者也。（《史通·六家》）

吾言《史记》全部为一篇，考其系统，最为分明。各类各篇亦多絜冒串插之法。如《五帝本纪》黄帝，提絜全部者也。世家《吴太伯》、列传《伯夷》，则提絜本类者也。萧何、曹参世家，互为首尾。吕后、韩、彭纪传，互相激射。仲尼弟子殿春秋之末，刺客结战国之终。其它前后关联，彼此映带者，更不一而足。但能详细寻绎，皆可得其线索。且各类中，时代先后排列不紊。故《史记》为极有系统之书。（齐树楷《史记意·史记读法五》）

（三）《史记》的散失与补纂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后汉书·班彪传》）

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继其书。（李贤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可孙、史孝山之徒也。）（《后汉书·班彪传》）

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汉书》张晏注）

《汉书》曰："十篇有录无书。"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帝》……《将相表》、《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传、《傅靳》等列传也。"按：《景纪》取班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礼书》取荀卿《礼论》，《乐》取《礼·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遂分历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以缉以篇，何率略且重，非当也。《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异，而论司马季主。《龟策》直太卜所得占龟兆杂说，而无笔削之功，何芜鄙也！（《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



班固《前汉书·司马迁》云："十篇缺，有录无书。"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俱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无书也。今各随其篇辨之：

其一曰《景纪》，此其篇具在者也。《索隐》信张晏说，遂谓《景纪》后人取班书补之。学者取司马氏、班氏二纪观其去取详略之意，其才识之高不可默喻矣。此纪所载，间有班书所无者，不唯非生班孟坚之后所能补，亦非元成间褚先生所能知也，况用意高远，岂他人所能辨乎！

其二曰《武纪》，十篇惟此篇亡。卫宏《汉官仪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卫宏与班固同时，是时

两《纪》俱亡，今《景纪》所以复出者，武帝特能毁其副在京师者耳；藏之名山，固有他本也。《武纪》终不见者，岂非指切尤甚，虽民间亦畏祸而不藏乎？

其三曰《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其书具在，但前缺序，后自太始元年以下，则褚先生所续耳。

其四曰《礼书》，其叙具在，由“礼由人起”以下则草具而未成者也。

其五曰《乐书》，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以下则草具而未成者也。

其六曰《律书》，其叙具在，自“书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则草具而未成者也。

其七曰《三王世家》，其书虽亡，然《叙传》云：“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则其所载不过奏请及策书，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略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况是时，三王方就国，岂有事迹可记耶？“赞”乃真太史公语也。

其八曰《傅靳蒯成列传》，此其篇具在，而无刓缺者也。张晏乃谓褚先生所补，褚先生论著附见《史记》者甚多，试取一二条与此传并观之，对雅俗工拙自可了矣。

其九曰《日者列传》，自“余志而读之”以上，皆太史公本书。欧阳文忠公每有制作，必取此传读数过，然后下笔，其爱之如此！末有褚先生所论数百言，乃张晏所谓言辞鄙陋者也。晏并与其传疑之，此岂褚先生手笔乎？

其十曰《龟策列传》，其序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文］，正如《古文尚书》，西汉诸儒皆未尝见，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为伪也。作者关键，张晏虽不足以知之，如此传序存传亡，使晏稍详读之，不应悉以为非。亦由《史记》高古，习之者少，晏亦未尝究观尔。（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一十四《辨〈史记〉十篇有录无书》）



世言褚先生补《史记》，其实《史记》唯亡《武纪》一篇，余间有缺，无全亡者。而褚所补，亦唯《武纪》，其余特附益各篇中，如赘疣耳。（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褚先生补〈史记〉》）

《索隐》曰：“褚先生，元成间博士。”韦稜曰：“《褚颢家传》：宣帝时博士。”余谓韦说是也。《汉书·儒林传》：“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张生论石渠，至淮阳中尉。”论石渠在宣帝甘露时，其为郎必在前矣。而此篇云，臣为郎时，与方士考功，会旗下，为臣言。故余以为必作于孝昭之时也。（赵绍祖《读书偶记》卷四《褚先生》）

第二节　司马迁的史学精神

一　《史记》的会通精神

先秦史家和先秦诸子非天命而重人事，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强烈关注。但因学派不同，彼此角度不尽相同，终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局限。司马迁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方法，则有更加富于历史整体感和辨证精神的史学体系。

司马迁注意从研究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因果联系入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史记·太史公自序》）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列之，得以览焉。（《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讷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及至秦……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以奉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

历史之整个的观念。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尚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自班固以下，此意荒矣。……（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史记》言“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又曰“得势益彰”。其他言者甚多。

唯势之轻重，人往往误其轩轾之用……

势自有力存乎间。一时之趋势，非不奔腾澎湃，崩流倒峡。然渴可立待，则偶然之势，不可尝执者也。至于盈科后进，放乎四海，虽有大力，莫之能逆，乃必至之势，且盘固不可动摇者也。……《史记》一书，综若干年之事，而审察其始终中间递嬗转化之迹，令人详观，而有以处之至当。则亦经之用矣。（齐树楷《史记意·史记读法一》）

在历史科学方法上，司马迁的贡献尤其大，体裁的创制已由前人说过，我们不必多说。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司马迁的历史实在已由广度而更走入深度。正象德国史学家考尔夫（korff）那般人所谓，历史的意义，不在探求外延，而更在深求内包。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乃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这是第一点。其次是，历史本来是讲演化的，演化是纵的，是顺着一种线索的，这在司马迁固然已经很能把握了，但他却更进一步，在演进之中而加入一种体系的探求。例如他的《刺客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循吏列传》、《佞幸列传》、《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儒林列传》等，都是想用一种体系去整理的。这样的传记已经占列传的总数七分之一。八书更不用说。不但这样，就是他标出人名的列传，也多半以类相从，例如老庄申韩可以称为哲人列传，孙子、吴起可以称为兵家列传，屈贾可以称为诗人列传。再说就是列传与列传之间的排列也仍是有着连系的，例如《孙吴列传》之前便是《司马穰苴列传》，这同样是兵家；而《苏秦列传》之后便是《张仪列传》，这同样是纵横家；其他同样的例子不必尽举。这就可见司马迁乃是要在人类的生活经验之中而寻出若干范畴来了。因此，他的书乃是演化与体系二者并重的，倘无前者固不足为“史”，倘无后者便也不能驾驶史，超乎史。这是他在史学方法上可贵的第二点。（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虽为先秦史家和先秦诸子所重视，但因其政治主张和人生理想不同，各派的观点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司马迁在《史记》中却较为充分地显示甚至论证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它们对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和历史发展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就此而言，司马迁的经济史观不仅远远优于先秦史家和先秦诸子，也为后世某些史家所不及。

《史记》以其恢宏的笔触，描述了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论证

了劳动分工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初步窥探到了人类物质生产史上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诸如商品交换中的一般规律）。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史记·货殖列传》）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蓄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同上）



《史记》更深刻地指出求富根于人的性情。在正常的经济活动范围内，以不同的方式致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此不独进一步论证了商业、手工业等“末业”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对传统的道德观与价值观的虚伪性也作了无情的揭露。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

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按：《正义》："言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

…………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择观焉。（《史记·货殖列传》）（按：其下言蜀卓氏、山东迁虏程郑、宛孔氏、鲁曹邴氏、齐刀闲、周师史、宣曲任氏、边塞桥姚、关中富商大贾等以货殖致富，文繁不录。）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一书，于古今人物，记之详矣，几于无格不备矣。而于书之将终，乃传货殖，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贱，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入一篇之中，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伧父财奴，皆赖以立传，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或曰：崇势利也；或曰：有所感激也。纷纷议论，不一而足，是皆以私心窥太史公，究不得太史公之用心也。《诗》曰："哿矣富人，哀此茕独。"《书》曰："凡厥庶民，既富方谷。"《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至《大学》之为书，所言者皆修齐治平之道，而于终篇，言生财之道独详。史公此传，正本其意。盖财货者，天地之精华，生民之命脉，困迫豪杰，颠倒众生，胥是物也。惟圣贤及一二自修之士，能不受其束缚，其余几尽在范围之内，而可卑之毋高论哉？（李景星《史记评议》卷四《货殖列传》）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这真是拆穿后壁的说法了。（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史记》不仅触及了经济关系乃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基础，更指出人类的经济活动中，经济关系时刻都处于变动之中，从而否

定了富贵在于天命的神话。

乌支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富耶？（《史记·货殖列传》）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同上）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邪？（同上）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史记·平准书》）

司马迁更指出，经济的发达，乃是国家富强的根本。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巧，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史记·货殖列传》）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号称“五霸”。（同上）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史记·河渠书》）

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按：《史记·管晏列传》云：“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

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有国强者或并兼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史记·平准书》）

上古三代有商学焉，管子《轻重》、范子、《计然》是也。今《计然》不传久矣。然读《越绝书》"太阴三岁，处金则穰"数语，犹见研桑心计之工。至《管子·轻重》，于《海王》则言盐铁，于《地数》则言矿学，所谓天下才者，经世之具略见于此。故吾谓《史记》传货殖以存商学，苟无商学，则货殖虽不传可也。何也？子长之传货殖，首谓齐中衰，管子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乃用范子、计然，称号五霸。然则国家当危急存亡之秋，欲使寡者众，弱者强，贫者富，不得不理财而借助于商学。言商学则管子之治齐，范子之治越，皆明效大验之卓著者也，安得不为立传。（曹元忠《笺经室遗集》卷二《马班以后不传货殖论》）

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彼族之富强洵有由哉！……蒙昔读管子《轻重篇》、《史记·货殖传》，私谓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前哲精意千年湮没，致可悼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二十六册第三十一至三十四页《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先秦史家、先秦诸子重华夷之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历史巨变，汉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国力空前强盛，对各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更加速了各民族互相影响与溶合的进程。司马迁感受到这一历史需要和历史趋势，在《史记》中对华夏民族的形成历史、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史、以及它们与华夏民族的关系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间，司马迁虽然依据传说，以黄帝为各民族的共同祖先，不可据为信史，但因为各民族共同参与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创造，其说亦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此外，就顺乎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的需要而言，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匈奴列传》）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按：《索隐》："韦昭曰：'故郡名，后更为县，在

常山"”）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秦已破灭，佗……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史记·南越列传》）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史记·东越列传》）

带有神话性的（人物），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譬如黄帝很伟大，但不见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纪》，亦作得恍惚迷离。不过说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些话，很象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一点不踏实，其余的传说，资料尽管丰富，但绝对靠不住 纵然不抹杀，亦应怀疑。（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迁为《匈奴传》，不复详考，徒杂取经传所谓戎狄者论次之，而特以匈奴为宗；又谓其为夏之苗裔曰淳维，时大时小，别散去离，至冒顿而世传官号，始可得记，若一种姓者，疏略甚矣。（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二十《史记》）

《史记》发凡起例，固为后世所宗，然其主要特征，可约言者……第四，反春秋时代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狭小眼光，为匈奴等民族作列传。（徐浩《廿五史论纲》）



二 《史记》的实录精神

司马迁继承先秦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以史家的胆识，注重调查研究，注重材料的去伪存真，更不畏强权，尊重事实，力求史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故历代学者“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一）司马迁对史料的慎择态度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

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第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史记·五帝本纪》）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史记·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大宛列传》）

《五帝本纪·赞》不作一了语。其一段传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于运笔虚活承转处见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其引证原委又似历历有据，正其不敢自信处。盖多闻而能阙疑，多见而能阙殆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择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记》，要领尽此矣。（葛鼎、金燔《史记》卷一引钟惺语）



（二）史家的胆识与实录精神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断绝世，补敝兴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史记·太史公自序》）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曰："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刘知几）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时以为笃论。（《新唐书·刘知几传》）

司马迁作《史记》，大抵讥汉武帝所短为多，故其用意远，扬雄、班固之论不得其实。《秦始皇本纪》皆讥武帝也，可以推求凡《史记》用意深远，则其言愈缓；其事繁碎，则其言愈简，此是《春秋》之义也。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予按后汉王允曰："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班固所论，乃所谓谤也。此正是迁之微意。凡《史记》次序、说论，皆有所指，不徒为之。班固乃讥迁"是非颇谬于圣贤"，论甚不慊。（沈括《补笔谈》卷一）

伯夷古之贤人，则冠之于卷首；晏婴善与人交，则愿为之执鞭，其不虚美可知。陈平之谋略，而不讳其盗嫂受金之奸；张汤之荐贤，而不略其文深意忌之酷，其不隐恶可见。（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卷二《诸史》）

班氏以此（按：指班固讥司马迁之论）为真足以讥迁也，当也，不知适足以彰迁之不朽而已。使迁而不残陋，不疏略，不轻信，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则兹史固不待作也。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贵于言也？此迁之史所以为继麟经而作，后有作者，终不可追也已。……《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不为后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窥也欤。若责以明哲保身，则死于窦固之狱，又谁为之？其视犯颜敢诤者，又孰谓不明哲欤？（李贽《藏书》卷四十《司马迁传》）



三　《史记》的批判精神

《史记》的批判精神，不仅在于司马迁恪守史家的实录原则，更在于他对历史、对现实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尤为可贵的是，在《史记》的批判内容中，寄寓有司马迁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

《史记》通过对武帝时代酷吏政治的批判，不仅触及封建集权政治的某些本质特征，更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揭示了酷吏政治产生的历史原因。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

官空虚。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史记·酷吏列传》)

(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同上)

……(杜）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为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 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同上)

太史公于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亲，匈奴信汉，然后论两将军连年出塞，又必随之以匈奴入塞，杀略若干，于今《酷吏传》，先之以吏治烝烝，民朴畏罪，然后论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随之以民益犯法，盗贼滋起。然匈奴盗贼之变，此帝穷兵酷罚所致，威刑岂徒无益而已哉！至于祷祠百出，则各随之以若有符应之言；于求仙无方，则各随之以终不可得之言。迁之微文见意，往往如此，而武帝之无道昭昭矣！(黄震《黄氏日钞》卷四六《史记》)

《酷吏传》与《平准书》相表里。《平准书》每纪匈奴用兵之事，而见知之法，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直指之使张汤、减宣、杜周、义纵之用事本末，往往及之。《酷吏传》亦著兴兵伐匈奴之事，而造白金、出告缗令，以及征伐徒卒之役事载《平准书》者亦并记之，盖酷刑厚敛未有不相济者，而害国本、剥民命，其源俱由于此。此《酷吏传》所以与《平准书》并见，而《刑罚志》可以不作也。(牛运震《史记评注》卷十)



古无酷吏，汉初亦无酷吏，太史公特列以为传，此创格也。……然酷吏之所以为酷者，仍恃朝廷之法，使天子持其平，或知其酷吏而不任用，虽郅都百辈，又乌从逞其志而肆其毒哉！故行其酷者酷吏也，而成其酷者天子也。太史公深慨焉，故于诸人之传，一则曰"上以为能"，再则曰"上以为能"。上既能之，则深文曲法何所不至，虽明知张汤怀诈而欺，仍为案诛三长史以谢之，盖喜其酷而惜其死，总以为能之一念横于胸也。太史公大书特书，屡书不一，书其垂诫，岂在郅都诸臣哉！此作传之本意也。(张云璈《简松堂文集》卷八《读酷吏传》)

此传（按：指《平准书》）自"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以后，所言汉武之失者，一征伐，一巡游转运，一兴利，一鬻爵拜官而废选，一严刑酷诛，大端不过五者，然惟文字错综，故若不易辨耳。……就一事言者，盖汉武虚耗，

赶于征代四夷，辟地喜功，而游巡次之，宫室又次之。天下日复多事，则其势不得不虑。转输而多方以通漕，输复不断，则兴利不得不广欲，广利则不得不用任事之臣。上兴利而与下争，则民必多犯，而不得不严刑，以致人之死命，此皆相因而有者也。必参伍其文，而后义始显也。（凌濛初《史记评林》卷三十引董份语）

《史记》揭露和鞭挞了封建集权社会上层人物之间以利相合的人际关系和他们冷酷自私的品质特征。

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求汉王，反遇楚军。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置军中。（《史记·项羽本纪》）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祇益祸耳。"项王从之。（同上）



高祖为布衣时，（萧）何数以吏事护高祖，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毕已受封，及奏位次……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

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尉。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乃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史记·萧相国世家》）



……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蒯生曰："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黡、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欢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勾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史记·淮阴侯列传》）

汉高之狙诈猜忌，鲍生知之，召平知之，又一客知之，史公又从而反复著明之，而读者不察，犹谓其豁达大度，何哉？（唐顺之《精选批点史记》卷二）

篇中序酂侯相业止起数行，而叙高帝忌疑，曰大悦，曰乃大喜，曰大怒，曰不怿，凡五百余言。夫帝之疑忌，必畅写之《酂侯世家》者，见忠如酂侯，而帝疑忌如此，盖隐为淮阴侯等鸣冤矣，史真直笔哉！（徐与乔《经史辨体》史部《萧相国世家》）

陈豨以宾客盛，为周昌所疑。高祖使案其客，始反耳。未必素有逆谋。且豨以信幸为赵相国，将兵居边，非韩、彭之俦，有震主之威，据大国者也。何为先自疑而有反虑乎？韩信处嫌疑之地，轻与一陈豨出口言反，此亦非人情。信以淮阴侯家居，虽赦诸徒奴，合而使之，未易部勒也。上自出，关中虽虚，未能全无备，亦不可信也……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史记会注考证》卷九二转引冯班语）

《史记》对封建社会上层人物的奢侈、荒淫、迷信也有所揭露和批判。



封禅之文不经见，特昉于齐桓，再见于秦始，又再侈于汉武。齐公、秦皇特侈心生欲，因之以告神明，颂功德，本非以求神仙不死之术也。及秦始皇东游海上，接燕齐迂怪之士，然亦未尝设祠祀，秦虽遍祠名山川，亦非尽为封禅也。汉武初立，辄好祷祀，李少君辈倡之，而少翁、栾大、公孙卿、勇之属，互为其说，而汉武至死且不悟矣。（茅坤《史记钞》卷四）

太史公见汉武惑于方士而好神仙，敛集资财而作宫室列观，物力殚于上，民风靡于下，举世汹汹不可终日，因作《封禅书》以隐讽之。夫"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其见于传记者七十二王，独以是隐讽武帝者何哉？或谓史迁受腐刑之辱，忧愁幽怨而作是书，多言过其实以诬妄武帝未可知也。呜呼斯言，其如狱吏治狱锻炼周内人罪者乎！武帝之求仙候神，张皇鬼怪，身至海上，狂惑丧心，与始皇何异？其所以不即亡为暴秦之续者，始皇承商鞅峻法之后，积怨蓄祸，民气久已骚然，重以徐福赍童男女及针织工艺辈数千，

飘流海外，故闾阎仓皇思乱，益风驰电掣而不可收。武帝袭文景富庶之余，史称非有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故虽明堂、甘泉、太液、柏梁累有建筑，耗费不赀，而民心一时尚未瓦解也。史迁亦据实直书耳，曷尝有诬妄于其间乎？且前代封禅，亦仅郊天祭地巡狩柴望而已，登仙不死，皆当时方士谀词，于古无闻也。迁所述文成、五利、公孙卿辈所设施，著明深切，洵乎综道与法而兼有之，上以接《春秋》，下以警世主，其用心不深且远乎？此所以为千古良史也。子长以文豪一世，古今罕匹，为李陵事遽下蚕室，汉之刑法何其酷也。呜呼，雄才大略如武帝，益寿则专事禁方，用法则务为惨核，名虽尊贤良文学士，实殆崇尚黄老而深痛诋儒术者夫！（沈湛钧《知非斋古文录·书史记封禅书后》）

司马迁鄙薄封建官场中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利禄之徒，尤其鄙薄那些缘饰儒学以谋私利的“谀儒”。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迺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从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迺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迺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

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于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诸生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太史公曰：……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刘敬叔孙通列传》)

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

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弘为布被，食不重肉。……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内左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按：公孙弘所说之忠，忠一人也。)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

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佯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按：《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序》)

二世虽暴虐，（叔孙）通已臣事之矣。鼠窃之对，与指鹿何异？太史公首次此，而通之希世取容可概见矣。（凌稚隆《史记评林》卷九九）

叔孙生谀臣耳，史公论其希也度务，道固委蛇，又借鲁两生语形容之，讥刺深矣。班生赞叔孙通舍枪鼓而立一王之仪，而删史公语，失之。（丁晏《史记余论·刘敬叔孙通列传》）

通为高祖筹时变，开公孙弘阿世之端。史于通多微词，亦以其为谀儒也。（尚镕《史记辨证》卷八《刘敬叔孙通列传》）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太史公序传谓："大臣宗室以奢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布被脱粟。"无讥焉。范晔论之曰："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议，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可谓发史迁之未发。（柯维琪《史记考要》卷十）

《史记》揭示并肯定了封建社会史上官逼民反的现实。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史记·太史公自序》）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陈涉世家》）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持节，虎

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史记·酷吏列传》）

以陈涉与汤武、《春秋》并言，此理最精深，以其功同也。汤武有德，力能达于一时之天下，故功在一时。孔子有德，力不能达于一时之天下，而能传于万世之天下，故功在万世。陈涉无德，力亦不能为天下之功，而能为天下之有力者发端，故功即在发端也。世家者，见凡可以为治世安民所必需者，皆可以世其家。如泰伯之让，太公之谋，金縢之忠君，甘棠之治民皆是。故陈涉之发难，亦可为世家，见天子之位，世及不择贤，则陈涉之事，亦救民之一端，而戢暴君之焰，使之有所惕也。（刘光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

当嬴氏恣为肆虐，重役暴敛……海内愁怨，并思亡秦，较之偕亡祝丧，殆有甚焉。然而智者如徐福，渡海东逝；贤如耳、余，隐于监门；勇如梁籍，亡命会稽。举劫于威虐，相顾莫敢先发。涉以一耕佣，奋起陇上，豪杰云兴，秦遂夷灭。由是言之，荥阳戏亭之军，与鸣条牧野之师，功绩讵有异哉？张、陈谓涉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已明以汤武之诛残贼比之，而非始于太史公也。……功在后世，尊为世家，不亦宜乎！……而司马贞不悟，犹云宜降为列传，何其谬哉！（陈玉树《后乐堂文钞》卷一《史记陈涉世家书后》）

升项羽于本纪，列陈涉于世家，俱属太史公破格文字。……陈涉未成，能为汉驱除，是当时极关系事，列之世家，盖所以重之，而不与寻常等也。且涉虽一起即蹶，所遣之王侯将相，卒能亡秦，既不能一一皆为之传，又不能一概抹杀，摈而不录。……惟斟酌纪传之间，将涉列为世家，将其余与涉俱起不能遍为立传之人，皆纳入涉世家中，则一时之草泽英雄，皆有归宿矣。故通篇除吴广外，牵连而书者，至有二十余人之多……（李景星《史记评议》卷二《陈涉世家》）



第三节 《史记》的艺术价值

一 《史记》人物形象的创造

《史记》的纪传体，决定了它的记事以人物活动为中心。个别历史人物的经历、思想、品质、性格、情感乃至行为方式与其所生活的历史环境既有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他们一旦被载入史册，便同时具备了史学与文学的意义，成为既含有共性，又富于个性的"单个的"艺术形象，从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学典型的意义。

史公之书，自黄帝讫麟趾，备载历代，而卷帙不及《汉书》，似乎简矣。然简人所不能简，亦详人所不能详。事无论大小，但不铺叙则竟不铺叙，一铺叙则必使其音容笑貌，与夫性情心术，跃跃纸上。至其摹写精神，如东坡所言传神法，但观其意思所在，或在目、或在颧颊而已，若此则一二言不为少，千万言不为多也。且独观于意思所在，则其神定如射者目注正鹄，斯可从容命中矣。（陈元械《蛟川先生文存》卷一八《史记选序》）

司马迁作《史记》，变《春秋》编年之法，创为传纪，凡百三十篇。余每读其列传，观其传一人，写一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笑哭、爱恶之情，跃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读屈贾传，则见其哀郢怀沙过湘投书之状；读庄周、鲁仲连传，则见其洸洋俶傥之状；读韩信、李广传，则见其拔帜射雕之状；读游侠、刺客传，则见其喜剑好搏倚柱箕踞之状；读酷吏、滑稽传，则见其鹰击毛挚摇头大笑之态；读原、陵、春、孟四君传，则见其弹铗负犕执辔蹑珠之状，余不暇举。然若此者何哉？盖各因其人之行事而添颊上三毫也。故刘向、扬雄称为"实录"。（熊士鹏《鹄山小隐文集》卷二《释言》）



作正史上的列传，篇数越少越好，可以归纳起来的就归纳起来。……还有许多人，不可以不见，可是又没有独立作传的价值，就可以附录在有关系的大人物传中。因为他们本来是配角，但是很可以陪衬主角；没有配角形容不出主角，写配角正是写主角。这种技术，《史记》最是擅长。例如信陵君这

样一个人，胸襟很大，声名很远。从正面写，未尝不可以，总觉得费力而且不易出色。太史公就用旁敲侧击的方法，用力写侯生、写毛公、薛，都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着笔，本人反为很少，因为如此，信陵君的为人格外显得奇特。这种写法不录文章，不写功业，专从小处落墨，把大处烘托出来。除却太史公以外，别的人能够做到的很少。（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第八十一《人的专史》）

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如破秦军处，斩宋义处，谢鸿门处，分王诸侯处，会垓下处，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之，殷殷阗阗，如有百万之军，藏于隃麋汗青之中，令人神动。（吴见思《史记论文》第一册《项羽本纪》）

《高纪》字字是写帝王气，豁达大度，涵盖一切，前虚写，后实写。前如慢易诸吏，丰西纵徒，斩蛇，沛中多附；后如南宫置酒，未央上寿，沛中留饮，处处画出豁达大度。病甚却医，至死亦不失本色，语语入神。（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一《高祖本纪》）

郦生、陆贾是当代一流人物，即平原朱建亦不平常，故史公极力模写，凡情事、声色、衣冠、言动，俱从字句中现出。古人云，文如生龙活虎，捉搦不得，吾以为此文足以当之。写郦生处，处处写其狂态，另有一种超然迈远，高视一切之度。而陆生一传，则精详秀雅，又是一种丰裁。至与尉他对语一段，各用权术，互相驾驭，至今生气勃勃。（吴见思《史记论文》）

"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云云，"流涕"数语，粗粗卤卤，有布衣之忧，有骨肉之悲，不独似哙口语，而三反四正，复情词俱竭，只是子长笔力！至一"绝"字，惊痛声泪俱透，更千万语不能尽，更千万人不能道。（杨慎《史记题评》卷九五）

（《魏其武安侯列传》）其写醉语、怒语、对簿语、忙语、闲语，句句不同。至武帝亦不直武安，无奈太后何，亦欲廷臣公论，乃诸臣竟不做声，遂发作郑当时，是一肚皮不快活语，一一入妙。吾尤爱其淮南王事，忙时不及回笔，乃于篇末作波，魏其、武安对质语，后从韩安国口中说出，神化乃尔耶？写灌夫使酒，不一笔写，先写其醉搏窦甫，以为引起。至丞相戏许灌夫，起厲丞相，必以为使酒矣，乃偏放过顿住，插入请田一事，以为前后构衅，使酒之根，是如何神力！（吴见思《史记论文》第七册《魏其武安侯列传》）

……叙武安，始则服役魏其，继则比肩魏其，后则高驾魏其，地位随时变换，面孔声口，亦随时变换，一经太史之笔，便变幻异常，令人失笑。不独武安也，贤如灌夫，于入吴军，写其孝勇；颍水歌，写其豪横；结魏其，写其同病相怜之密；擾武安，写其降心俯就之卑，面孔心肠，亦若随时变换。

序其使酒骂座，又借夫口骂尽满朝趋炎附势之徒，面孔心肠，随时变换。叙两人，而有数十佰人，笑貌声音，哄聚笔端。非笔大如椽，何能刻画至此！（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三《魏其武安侯列传》）

《史记》于个别人物的纪传而外，又首创人物的合传与类传。这类纪传集中展现了某一阶级、某一阶层、某一行业，或思想、性格、命运相似的人物群像，表明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共性与个性，已有充分的重视。

酷吏十人，行多相类，而叙各不同，笔力极其变化，太史公语不多而意深厚。（唐顺之《唐荆川精选批点史记》卷五）

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主上，并无故人宾客出救，又贫不能赎，卒下蚕室，故于剧孟、鲁朱家之任侠，于猗顿、卓氏辈之货殖，俱极摹画。诸将中最怜者，李广之死，与卫、霍以内宠益封，故文多感欷。淮阴、黥布之特将，樊、灌以下之偏裨，详画以差。他如张耳、陈余，则感其两人以刎颈之交相贼杀。窦婴、田蚡、灌夫，则感其三人以宾客之结相倾危。郦食其、陆贾、朱建之客游，刘敬、叔孙通之献纳，季布、栾布之节侠，袁盎、晁错之刑名，张释之、冯唐、韩长孺之正议，石奋、卫绾、直不疑之谨厚，淮南、衡山之悖乱，汲黯、郑当时之伉声，此皆太史公所慨于心者。言人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写生者，春华秋卉，并中神理矣。（茅坤《史记钞·读史记法》）

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噁叱咤来薄人。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是子长叙事入神处。（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斋藤正谦《拙堂文话》）



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及其作事的步骤，皆与全部历史有关。太史公作《史记》，最着重这点，后来的正史，立传猥杂而繁多，几成为家谱墓志铭的丛编，所以受人诟病。其实《史记》并不如此，《史记》每一篇列传，必代表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孔子世家》、《荀孟列传》、《仲尼弟子列传》代表学术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苏秦》、《张仪》列传代表造成战国局面的游说之士，《田单》、《春申》列传代表那时新贵族的势力，《货殖列传》代表当时经济变化，《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代表当时社会上一种特殊风尚。每篇都有

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人作起居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二章)

《史记》以平行的人物各传记叙同一事件时，因易于交叉重复，司马迁不得不在叙及某人某事时，常以"事在某传"避免行文的累赘，此即后人称道的"互见法"。"互见法"的运用，有助于叙事情节的剪裁和人物形象的完整与统一。

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史公则以属辞比事而互见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游侠传》不详朱家之事，而述于《季布传》；《高祖纪》不言过鲁祀孔子，而著之《孔子世家》，此皆引物连类而举遗漏者也。《封禅书》盛推鬼神之异，而《大宛传》云"张骞通大夏，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又云"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高祖纪》谓高祖豁达大度，而《佞幸传》云"汉兴，高祖至暴抗也。"此皆恐犯忌讳，以杂见错出而见正论也。"(李笠《史记订补·叙例》)

分配之法，善可参稽，恶亦错见。如《张汤传》，已极写其乡上意所使矣，《汲黯传》又载其与李息言，"汤智足以距谏，诈足以饰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为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重。"伍被、严助、朱买臣传，又与汤传钩联。(柳诒征《国史要义》第八十页《史汉各传》)



《项羽本纪》：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案沛公一入秦宫即欲留居，今入彭城又复如此，亦无异乎淫昏之主，此范增所云贪财好美姬者也，宜其为项所破几灭亡哉！史公于此二事，不著之《高纪》，而见之《羽纪》及《留侯世家》，此为高讳而仍不没其实，旁见侧出，谓之良史，不亦宜乎！(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卷四)

绛侯诛吕安刘大功，具在吕后、孝文语中，此不复详，而独缕叙其功成自危，系狱惕息情事，感叹作波折，举重若轻，剪裁之妙也。条侯细柳军容，写得浩瀚沉雄，直有云垂海立意象。写吴楚功，亦坚致密栗。后写刚直不容，感慨跌宕，无限烟波。视叙绛事，为尤可悲涕矣！(汤谐《史记半解·绛侯周勃世家》)

迁史本纪、世家、年表、列传错综离合，复笔尤多。……而其错综之妙，有以见其中心思想者，尤莫如书孔子之事。孔子既有《世家》，生卒事迹又见年表、《鲁世家》，而周、秦《本纪》，各国《世家》又多载其行事及卒年。大

书特书不一书，尤可见其用意。……后史无有如孔子之足以表见中心思想者，故史公之法不传。然如陈寿之于《蜀志》，隐然有以见诸葛亮之为中心，故诸传载亮言行最多，而《出师表》既载本传，《董允》、《向宠》传中又节载之，不避复见。似亦史公遗意。（柳诒征《国史要义》）

二　《史记》的叙事特点

《史记》一篇有一篇的立意。在此基础上取舍材料，乃能作到中心突出，法度井然。

《史记》事自为书，人自为传，皆整齐综括之篇，法虽微而可按，故余论古文之法自《史记》始。

文章之有法度也，非自法始也，必先有其意而后以法运之。意者一篇之主宰而文之所由生。意不高，虽有良法无所附丽。然意立而法不密，则无以达意而文失之疏；法不浑，则又无以藏意而文失之浅。会斯意者，可与读《史记》矣！《史记》之文，一篇自有一法，或一篇兼具数法……学者不加体察，见旧人有班密不如马疏之论，喜其说之高而便于卤莽，遂群奉疏之一字以概《史记》，而法度直置之弗论。……此一大错哉！（汤谐《史记半解·杂述》）

太史公凡纪表书传世家，每作一篇，必综会其世其帝其国其人其事之始终曲折，审其孰重孰轻，炯若观火，然后即其重者以立主意，复执此以制一切详略虚实之宜。而主意之或用正揭，或用侧出，或全不见，或一见再见以至数见，亦各随机以适变。……但觉一片浑融，无复经营拟议之迹。（邱逢年《史记阐要·诸法皆归于浑融》）



司马迁叙事，全局在胸，故提挈条贯，了如指掌。

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则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河”，曰“引兵渡河，复取成皋”。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

一幅地舆图，只此禹迹所掩耳，而妙手写来，既有《项羽记》之棋布星罗，又有《货殖传》之绮回绣错，真是化工矣！太史公具有宇宙在胸，所以临文之际，并大地山河，亦供其浑洒，吾无以测其能事之所至也。（潘永季《读史记札记》）

太史公《货殖传》，将天时、地理、人事、物情，历历如指诸掌，其文章瑰玮奇变不必言……（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一三《读货殖传》）

《史记》人物合传，勾连史事，天然浑成。

《史记》者，史公文字之创局，……但以魏其、灌夫、武安三传言之，蝉联而下，断而不断，如松际欲尽不尽之云。（林纾《吴汝纶点勘史记》卷首《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

《史记》不必人人立传，《孟子传》及三驺子、《荀卿传》间及公孙龙、剧子、尸子、吁子之属，卫青、霍去病同传，窦婴、田蚡，灌夫三人为一传，其间叙事合而离，离而复合，文最奇，而始末备。（王鏊《震泽长语》卷下）

此（按：指《魏其武安侯列传》）三人合传也。虽只是使酒一案，若转捏不凑，则穿插不来，穿插不来，则章法便散缓矣，此文家第一费手事也。他只用宾客作主，窦太后、王太后，两两相照，织组成文，而中间复插入梁王、淮南王、条侯、高遂、桃侯、田胜、丞相绾、籍福、赵绾、王臧、许昌、庄青翟、韩安国、盖侯、颍阴侯、窦甫、临汝侯、程不识、汲黯、郑当时、石建许多人，提花蹙锦，灿然可观，是固史公一篇佳文字也。

…………



三人传分作三截，各为一章，犹不称好手。他却三人打成一片，水乳交融，绝无痕迹。如入田蚡，紧接魏其；先序魏其，带出灌夫，其神理可见。（吴见思《史记论文》第七册《魏其武安侯列传》）

此传虽曰《魏其武安侯列传》，实则窦田灌三人合传也。两个贵戚，一个酒徒，惹出无限风波，头绪纷繁，如何措手？……传以武安魏其为经，以灌夫为纬，以窦王两太后为眼目，以宾客为线索，以梁王、淮南王、条侯、高遂……石建许多人为点染，以鬼报为收束，分合联络，错综周密，使恩怨相结、权势相倾、杯酒相争情形，宛然在目……宜乎于古今史家中首占一席也。（李景星《史记评议》卷四《魏其武安侯列传》）

《史记》叙事，生动形象，颇富戏剧冲突。

此纪（按：指《项羽本纪》）世之喜文字者，无不读而赞之。究其所喜者，起事一段，救赵一段，鸿门一段，垓下一段，其他所知者盖仅矣。此由以粗心读古人书，正如逢场观剧，取其搬演热眼者而已。其实一部大曲，经营巧拙，非深于其事者不知也。史家原只依事实实录，非可任意措置，然至事大绪繁，得失是非之变，纷起其间，非洞观要最，扫除一切旁枝余蔓，未得恣意详写，使其人其事，始终本末，真实发露，读者惊动悲慨，千载下如昨日事也。（吴敏树《史记别钞》下卷《项羽本纪》）

彼（司马迁）之笔，纵横无尽，不论何事，靡不巧于叙述。如《项羽本纪》、《张良世家》、《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游侠列传》之豪放雄壮，不待言矣。试一观《魏其武安侯列传》，虽饮酒喧争，寻常猥琐之事，亦一经其笔，栩栩生动，宛如目睹。（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

三　《史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

司马迁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并不排斥自己对历史的理性批判和情感倾向，故于所叙之事，所记之人，很注重对事件、情节、细节作精心的筛选和安排，以突出事件和人物的本质特征，并由此透露出自己的基本态度。此外，司马迁在遵循求实原则的同时，并不排斥对某些情节、细节的虚构，而这些虚构的情节和细节对于事件和人物来说，大都具有必然性与或然性，故无损于历史的真实。史家的实录精神与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的艺术性，在《史记》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统一。



（《世家》载张良）从沧海君得力士，已怪。百二十斤椎举于旷野之外，而正中副车，虽炮架不如也。如此大索而不能得良，非自免并隐力士，此大怪事。卒归圯上老父，又极从容，如同时亲见，乃今人以为小说不足信者，即子房时时自道，容有疑之者矣。此皆不可意测，不可语解，但觉古人如在目前，亦不足辨。妙处正在“履我”，又“业”已如此（按：《留侯世家》：“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省此，顿失数倍意态。“随目之”亦不可先。盖如见其人，如闻其语。“黄石”句，“常习诵读”，写得皆不偶然。试使子房自己或后人得传，必为不能知子长之曲折具略不少省何也。（倪思、刘辰翁《班马异同》卷五）

太史公疑许由非夫子所称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饿死，为举颜子、

盗跖，反复嗟叹，卒归之各从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趣远，其文逸，意在言外，咏味无穷，然岂知其心之无怨邪？

尧让许由，盖庄周寓言，眇天下为不足道耳。太史公疑箕山上有许由冢，愚意虽无其事，尝有其人欤！（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六《史记》）

真西山云："此传姑以文取。"杨升庵曰："此言甚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与道岂二事乎？益见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补订《伯夷传》者，异哉！"又曰："朱晦翁谓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传》，满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说，'是怨'是司马子长说。翻不怨以为怨，文为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适归之无从，怨周土之薇之不可食，遂含怨饿死。（李贽《焚书》卷五）

史公传李斯，历载赵高所以愚弄二世及李斯者，多近于故事传说，故于此叙二世斋上林，居望夷宫，射行人，及自杀事，又赵高上殿，殿欲毁者三，皆如小说家言。汉代或有此传说，史公所以闻而附之《李斯传》，亦疑以传疑之意也。（郭嵩焘《史记札记》）

四　《史记》的抒情性



司马迁对现实的自觉干预和他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包括他个人身世际遇在内的人生体验，使他在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同时，常常于叙事、议论中直接或间接地移人自己的主观情感，《史记》的许多篇章，因而具有强烈的抒情性。

余读《太史公自序》，而知《史记》一书，实发愤之所为作。其传李广而缀以李蔡之得封，则悲其数奇不遇，即太史公自序也。匪惟其传伍子胥、郦生、陆贾，亦其自序，即进而屈原、贾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痛苦流涕而长太息，亦其自序也。更进而伯夷积仁洁行而饿死，进而颜子好学而早夭，皆其自序也。更推之而传乐毅、田单、廉颇、李牧，而淮阴、彭越，而季布、栾布、黥布，而樊、灌诸人，再推之而如项王之力拔山兮气盖世，乃时不利而骓不逝，与夫豫让、荆轲诸刺客之切肤齿心为知己者死，皆太史公自序也。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傀儡，诚不禁其击碎唾壶、拔剑斫地、慷慨而悲歌也。于是乎传信陵、孟尝、平原、春申四公子之好客急人之义；而于是乎传朱家、剧孟、郭解诸游侠之不爱其躯赴士之厄，与鲁仲连之排难解纷；

而于是乎传管仲之受利于鲍子，晏子之解骖以就越石父而愿为之执鞭。嗟乎！读史至《史记》，读《史记》至此，有不为之拍案叫绝、废书而三叹也哉！……（袁文典《永昌府文征》卷一二《读史记》）

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诗》可以兴。"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有所养也。《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

汉兴，陆贾作《楚汉春秋》，是非虽多本儒者，而太史职守，原出道家，其父谈亦崇尚黄老，则《史记》虽缪于儒术，固亦能远绍其旧业矣。况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此篇(《伯夷列传》)中段，既力阐伯夷之怨，末段复力言伯夷之不怨，怨与不怨，两种矛盾情绪，盘郁于胸中，所以能有如此文章。既写伯夷，亦写自照，此非有意自发牢骚。太史公之人生观本如此，情所吐露，不得不然尔。（陈柱《史记伯夷列传讲话》，《学术世界》1936年第2卷第2期）

《史记》之文字——生动而疏宕有奇气。盖迁多爱之人也，故其文热血横迸；多恨之人也，故其议论悲愤郁遏。若以儒教之家法绳之，诚不免扬雄所谓不与圣人同是非之嫌。而以历史之眼孔观之，变易编年，创为纪传，冠冕群伦，师法百代，实有如刘子元所称才学识三长，而邀郑渔仲之钦赏。即以文学之价值论之，自来文人学士，孰不仰为空前之杰作，绝后之至文者乎！（曾毅《中国文学史》《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他（按：指司马迁）的文辞，笔力劲拔。在他发痛愤的地方，文情如火如荼，悲哀之处又非常凄绝，极尽文章的能事，在《项羽本纪》与《刺客列传》里面很可以看到。而且司马迁富于感情的，发之于文辞，精采绝世，《游侠》、《货殖》二传就可以代表他的性格。……若是从历史的立场来说，情感的史笔并不就是没有弊病的，但司马迁的《史记》就没有陷入这种弊病里去。（康必诚《中国文学史大纲》《司马迁和班固》）

史迁为纪传之祖，发愤著书，辞多寄托，景、武之世，尤著微旨。彼本

自成一家言，体史而义诗，贵能言志云尔。（范文澜《文心雕龙·史传》注）

五　《史记》的文章风格和语言艺术

风格多样，是《史记》文章的一大特点。

文者气之形。太史公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游，故其文章疏荡，颇有奇气，然未尝役意学为如此之文也。气充乎其中而动乎其言也，譬颜鲁公性忠烈，故虽字画亦刚劲，类其为人，皆未可求之笔墨蹊径间也。（宋祁《余师录》卷一）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栾城集》卷二三《上枢密韩太尉书》）

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太史公作《苏秦》、《张仪》、《范睢》、《荆轲传》，分外精神，盖子长胸中有许多侠气，所谓爬着他痒处。若使之作董仲舒等传，则必不逮，以其非当行也。（楼昉《过庭录》）

太史公笔力豪放，而语激壮顿挫，如所谓"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等语，皆切近端的。赞尤奇，屈原贾谊、荆轲两赞，当为第一，读之，使人鼓舞痛快而继之以泫然泣下也。（同上）



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茅坤《茅鹿门集》卷三）

《史记》用语，精于锤炼，又似得之自然。

太史公作《张耳陈余传》："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曰：'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四句叠用四"良"字。《冯唐传》："上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两句叠用三"吾"字，而语若飞动，减一字不得。（陆游《老学庵笔记·续笔记》）

太史公论赞，不数言辄开阖顿挫，此所以为文字之祖也。至其写形属事，尤极化工。

太史公文虽变幻，却将一二字句作眼，领清题窾，客意旁入而不离其宗。《左》、《国》古质其气促，子长乃演作一二百字一句，更不可断，有以迁为史之狂，其狂不可及乎？（王治皞《史记榷参·读史总论》）

班孟坚论司马之史曰，其文直、其事核。师古注云："核，坚实也。"百果之核，无不坚实，叙事义法，"坚实"二字尽之。无虚假、无疏漏，乃得坚实。核无定形，随物为大小。试读《史》《汉》中传，长者数万言，短者数百言，有一字不坚实否？故文无论短长，总有天然结构，如铜就范，有不可增减意，是无他，文洁而事信也。（蒋彤《丹棱文钞·上黄南坡太守论志传义例书》）

史公为文，专取气势，不争琢镂，间有冗烦，益形古茂，不足病也。如"皆各"（见《五帝纪》及《大宛传》——原注，下同），"愈益"（《秦本纪》）、"尚犹"（《秦本纪》，又《货殖传》），"惟独"（《景惠间侯者年表》），"始初"、"仍有"（并《历书》）、"咸各"（《自序》）之类，皆骈累出之，似复而非复也。（李笠《史记订补·叙例》）

《史记》在征引先秦典籍时，对典奥难读的文字，均译写为当时通行的书面语。史料的可信性与语言的时代性，在《史记》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大率司马迁好异而恶与人同。观《史记》用《尚书》、《战国策》、《国语》、《世本》、《左氏传》之文，多改其正文。改"绩用"为"功用"，改"厥田"为"其田"，改"肆觐"为"遂见"，改"宵中"为"夜中"，改"咨四岳"为"嗟四岳"，改"协和"为"合和"，改"方命"为"负命"，改"九载"为"九岁"，改"格奸"为"至奸"……如此类又多。（王观国《学林》卷一）



太史公之文有数端焉，帝王纪以己释《尚书》者也，又多引图纬子家言，其文衍而虚；春秋诸世家，以己损益诸史者也，其文畅而杂；《仪》、《秦》、《鞅》、《雎》诸传，以己损益《战国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刘》、《项》、《纪》、《信》、《越》诸传，志所闻也，其文宏而壮。《河渠》、《平准》诸书，志所见也，其文核而详，婉而多讽。《刺客》、《游侠》、《货殖》诸传，发所寄也，其文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六）

司马迁袭《尚书》、《左》、《国》之文，非好同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司马迁点窜《尚书》、《左》、《国》之文，班固点窜司马迁之文，非好异也，

理势之不得不然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

《史记》述五帝三王时事，无不取信《尚书》，宜皆本于古文者也。然取迁书而读之，凡所引《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文有增损，字有通假，义有补缀，或且随笔窜易，以成己一家言……

大抵迁书以文章树奇于《左》、《国》、《楚汉春秋》诸书，翦缀而运量之，扬榷而变化之，孰为己出，孰为非己出，若淄渑混合，但见其沧涟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其于《尚书》，亦若是焉已矣。(邵保和《诂经精舍文集》卷一一)

(《史通·叙事》："故《史》、《汉之文……相去若是》驳曰：迁录《尚书》，代以训诂，以文而论，无优劣可言。知几以为浅俗，不知何意？至于战国，则本诸《国策》，其文本轶丽，非迁之露其锋也。经言出自上古，其言自尔浑略，后世媚古，则觉其妙耳。(刘咸炘《史学述林·史通驳议》)

第四节　《史记》的历史地位和文学影响

两汉时期，《史记》因其实录精神和批评精神，深为统治者忌恨，且遭到变相的禁锢。魏晋以后，始渐流传。



(东平思王)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汉书·宣元六王传》)

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班固《典引》载汉明帝语)

司马迁……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

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范)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后汉书·范升列传》)

（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汉书·杨终列传》）

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列传》引王允言）

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贾谊，词旨抑扬，悲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葛洪《西京杂记》卷四）

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裴松之《三国志》卷六注）

惟《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作者甚微。（魏征《隋书·经籍志》）

唐宋以降，《史记》的史学价值渐次受到学者的肯定。

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刘知几《史通·二体》）

《志》乙部，史录，十三类，一曰正史，七十家……始于司马迁《史记》，终于《隋书》、《志》。司马氏《史记》有裴骃、徐广、邹诞生、许子儒、刘伯庄之音解。……《史记》之学，则有王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韩琬、司马祯、刘伯庄、张守节、窦群、裴安时。……《隋志》："汉始置太史公。自是史家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汉》师法相传，并有解释。"（《玉海》卷四六《唐七十家正史》）



《史》、《汉》二书，魏晋以还纷无定说，为班左袒盖十七焉。唐自韩、柳始一颂子长。孟坚少诎。至宋郑渔仲、刘会孟又抑扬过甚，不足凭也。至明诸论隋，差得其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

自司马迁创纪传体之历史后，不仅吾国之所谓正史永奉此体为正宗，即吾国其他各种史裁如方志、传纪、史表等，亦莫不脱胎于《史记》。司马迁之得以千古不朽，诚非无因。（何炳松《中国史学演化之陈迹》，转引自卢绍稷《史学概要》《附录》）

《史记》于魏晋间，不为世所重。六朝以还，诵习稍众。……有清一代，斯学大盛：汪氏越之《读十表》、邵氏泰衢之《疑问》、钱氏大昕之《考异》、梁氏玉绳之《志疑》、王氏念孙之《杂志》、何氏焯之《读书记》、姚氏范之

《笔记》，拾遗补阙，订误考殊，洵足以津逮后学，羽翼龙门也。（周尚木《史记识误自叙》）

唐宋以来的文章，无不奉《史记》为圭臬。

凡为文须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每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黄庭坚《余师录》卷二）

唐子西云：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篇已后，便有杜子美。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四《文辨》引）

读太史传记，如与其人从游而深交之者，此等处须痛自理会，方能识得真景。……魏晋唐宋以下，独欧阳永叔得其十之一二。虽韩昌黎之雄，亦由自开门户，到叙事变化处，不能入其堂奥，唯《毛颖传》则几几耳，予于此不能无感。（茅坤《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

《史记》积健为雄，疏纵而奇，以为唐宋八大家散文之祢。《汉书》植骨以偶，密栗而整，以开魏晋六朝骈体之风。文章变化，不出二途，故曰文章大宗也。读一书抵千百书。（钱基博《古籍举要》第八十页）

司马迁的散文，乃是纯正的散文，乃是唐宋以来所奉为模范的散文。——也就是古文家所推为正统的散文。（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263页）



魏晋志人小说、唐宋传奇小说的纪传式结构和文学技巧，宋元"讲史"一类的话本，无不导源于《史记》；古代戏曲中一些优秀之作，亦往往取材于《史记》。

史迁写留侯事，颇多怪迹：仓海、黄石、赤松、四皓，后之论者，均断定都无此人，不过迁性好奇，特点缀神异，以为行文之别派。按此实为后世小说滥觞。唐人《虬髯》、《红拂》盖本此义，以为无中生有者。又程婴、杵臼存赵氏孤儿事，《史记》以前古书今有存者，皆无传焉。或意当时汉臣世家中，必有阴谋隐事，类此所记者，迁不便明言，因托晋卿以影射之，特留一重公案，动异时感弔耳。菽园按：此段更奇。果如或之意拟，千古小说祖廷，应归司马。（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

司马迁不惟影响了后来的小说，他本人就也是一个小说家；这话同样可

以说他和戏剧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剧作家，也就是他之善于写紧张的局面（如楚汉大战，荆轲刺秦王，灌夫闹酒等），以及善于写对话而可见的。（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353页）

第五节 班固与《汉书》

一 班固的家世、生平与思想

（一）家世

班固的家世，素有边疆豪强的传统。

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壹生孺，孺为任侠，州郡歌之。孺生长，官至上谷守。长生回，以茂材为长子令。回生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大司农奏课连最，入为左曹越骑校尉。成帝之初，女为婕妤，致仕就第，赀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况生三子：伯、斿、稚。……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数求使匈奴。河平中，单于来朝，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汉书·叙传》）



班固的家世，又素有正宗儒学的传统。

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召见宴昵殿，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既通大义，又讲异同于许商，迁奉车都尉。数年，金华之业绝，出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绔之间，非其好也。……斿博学有俊材，左将军（师）〔史〕丹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

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语在《东平王传》。斿亦早卒，有子曰嗣，显名当世。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方直自守。……平帝即位，太后临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风俗，采颂声，而稚无所上。……由是班氏不显莽朝，亦不罹咎。……稚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叔皮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仕不为禄，所如不合；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汉书·叙传》)

(二) 生平与思想

班固生于建武八年（32），卒于永元四年（92）。

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及窦氏宾客皆逮，（洛阳令种）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后汉书·班彪列传》)（按：据《后汉书·窦融列传》，窦宪之诛，在永元四年，班固之死于狱中，亦在是年。又由此上溯六十一岁，则班固生年，当在建武八年。）

班固幼承家教，博学好文，长而继父志，续撰《汉书》。永平年间，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四十余岁，撰成《汉书》。



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雄，时固弱冠，奏记说苍曰："……将军宜详唐、殷之举，察伊、皋之荐，令远近无偏，幽隐必达，期于总揽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宁本朝。……"苍纳之。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

之。帝乃复使终成前作著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后汉书·班彪列传》）

叔皮专心史籍，欲撰汉史。孟坚踵就其业，为人诬讼，限身狱网。仲升（按：班固弟班超，字仲升）驰阙分明，转祸为福，危哉！《汉书》之得成，更两世，关变故，如是其不易也！（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班固在明、章之世，以著作为郎，数上赋颂，实具有文学侍从之身份。

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濬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阳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

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按：《太平御览》卷五八八引作“文比金玉”）。（王充《论衡·佚文》）

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旧六为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为圣帝矣。观杜抚、班固等所上《汉颂》，颂功德符瑞，汪濊深广，滂沛无量，逾唐、虞，入皇域，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王充《论衡·宣汉》）（按：王充所云《汉颂》，不见记载，疑班固所作《东巡颂》、《南巡颂》是。）



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王充《论衡·须颂》）

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后汉书·班彪列传》）

及扬雄《剧秦》，班固《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典引》所叙，雅有懿采，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馀巧；故称“《封禅》靡而不典，《剧秦》典而不实。”岂非追观易为明，循势易为力欤！（《文心雕龙·封禅》）

建初四年，章帝诏诸儒讲论五经大义于白虎观，班固受命撰集

其事，作《白虎通德论》。

（固）后迁玄武司马（按：《后汉书》李贤注引《续汉志》："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秩比千石。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后汉书·班彪列传》）（按：白虎观讲论五经事，又见《后汉书》《儒林列传》、《贾逵列传》、《丁鸿列传》、《杨终列传》、《陈敬王羡列传》等。）

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为旷世一见之典。……《白虎通义》犹存四卷，集今学之大成。十四博士所传，赖此一书稍窥崖略。……章帝时，已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而《白虎通义》采古文说绝少，以诸儒杨终、鲁恭、李育、魏应皆今学大师也。（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四《经学极盛时代》）

汉和帝永元元年（89）秋，班固随车骑将军出击北匈奴，大破之，班固作《封燕然山铭》以颂其事。永元二年，北匈奴愿修和好，大将军窦宪遣班固等出居延塞迎之。会北匈奴为南匈奴所破，班固等至私渠海而回。永元四年，班固因窦宪事牵连下狱死。



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窦宪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及羌胡兵出塞。明年……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曰……宪乃班师而还。……北单于以汉还侍弟，复遣车谐储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见，愿请大使。宪上遣大将军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与司马梁讽迎之。会北单于为南匈奴所破，被创遁走，固至私渠海而还。……宪既负重劳，陵肆滋甚。四年……（帝）以宪在外，虑其惧祸为乱，忍而未发。会宪及邓叠班师还京师……宪等既至，帝乃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收捕叠……皆下狱诛……遣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宪及笃……皆遣就国。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诛宪，为选严能相督察之。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后汉书·窦融列传》）

固后以母丧去官。永元初，大将军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北单于闻汉军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韩邪故事，朝见天子，请大使。宪

上遣固行中郎将事，将数百骑与虏使俱出居延塞迎之。会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闻虏中乱，引还。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后汉书·班彪列传》）

观班固一生行事，实与豪强而兼儒学的家世传统颇有关系。

两汉的班氏，自始即赋有边疆豪强的传统及正宗的家学渊源。从班壹"以财雄边"，到班伯"家本北边，志节慷慨"，及其定襄太守任中收捕盗贼的"杰作"，再到班超之西域冒险与劫杀，更到作为班固系狱致死主因的"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都是七世祖传的豪强铁证。所谓"固不教学诸子"，则是旧日史家的误断。从班伯的晏昵殿儒教神父式的诵说有法，到班彪的疾恶隗嚣及《王命论》之作，再到班固白虎观集议的"实主其事"，即是正宗的家学承传；从班斿与刘向同校秘书，并"以选受诏，进读群书"，及承"赐以秘书之副"，到班彪"继采前史遗书，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及《后传略论》的对司马氏史学攻击，再到班固的"除兰台令史"，"典校秘书"，与其断代史（《汉书》……——原注）的创著，以及班昭的续成工程，则是正宗史学的家传。凡此等等，皆是两汉儒学宗教化，学校寺院化，帝王教皇化，学者神父化演进程序上的产物。理解了这些情况，然后始可以理解班固的思想。（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六章第四节《班固的庸俗思想及其人文思想》）



二 《汉书》的成书

班彪续《史记》作汉史，首创《汉书》义例。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曰："……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

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后汉书·班彪列传》）

班固承继父志，采《史记》天汉以前文字，又参酌刘向《东观汉书》等，撰成《汉书》。全书记事起于汉高祖，止于王莽末年，计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八十一万言，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按：颜师古注云："谓武帝时司马迁作《史记》"。）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汉书·叙传》）

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后汉书·班彪传》）

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文心雕龙·史传》)

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史通·采撰》)

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姑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通志总序》)

马班之史皆出自家学，《自序》皆申明之，其阐扬先美，可谓孝矣。前人乃讥固袭父书而迁推先德，非平允也。然迁书与谈本无异指，故文辞无所识别。固则承父之业而自辟门户，为断代专家之祖，不比彪之《后传》犹沿迁史绪余者也。故于世祖诸篇别出彪名以明所受，此则义例有然，其实无殊致也。盖以六家宗旨而论，彪为通史再传，固为断代之祖，不相混也 （章学诚《丙辰札记》）

《汉书》未竟而班固卒，旋由其妹班昭与马续相继续成。

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后汉书·列女传》)



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后汉书·天文志》)

班固撰《汉书》，曾受官方干预与限制，此于《汉书》的思想倾向影响极大。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臣对："此赞贾谊《过秦论》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耶？将见问意开寤耶?"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

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称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诚思毕力竭情，昊天罔极。（班固《典引序》）

司马迁……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汉书·司马迁传》）

三 《汉书》与《史记》的比较

《汉书》以史家之笔，记录西汉一代的历史，对汉代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仁人志士，均有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其中也寄寓有作者的爱憎与批判。此是《汉书》与《史记》的相似之处。但因为班固生在专制压迫、经学统治严重的时代，又因为班固家世传统的影响和他自身性格的软弱，《汉书》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又不如《史记》。



班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加强，经学统治严重，更加上汉明帝对班固修史有了直接的干预，故《汉书》对人物事件的抑扬褒贬，常有失于公正客观，而少有《史记》的批判锋芒。

（《汉书》）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史记》）三也。（《晋书·张辅传》）（按：张辅论《汉书》不如《史记》有三。）

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马总《意林》卷五引杨泉《物理论》）

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范晔《后汉书·班固列传》）

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苏洵《苏老泉先生全

集》卷九）

班固名陈胜而降为列传第一，名项籍而降为列传第二，是以成败论，而失史迁功过不相掩之笔多矣。（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九〇《师友雅言》）

（项羽）在迁，不得不纪；在固，不得不传。设使固取迁而纪，是天有二日，民有二王也。……余故曰：子长之所以纪，笔削历代之史也……孟坚之所以传，先汉一代之史也。余故曰：二体有不得不然者矣……（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五《迁固纪传不同说》）

《史记》本为历代之史，《汉书》则为一代之史，体制不同。……固所修者《汉书》，则所奉者一王之制，所编者宜有一定之程，不得任为参差。故《史记》无《惠帝纪》，而《汉书》有之；项羽、陈涉皆为列传，彼其体固宜尔也，亦何必强同哉！（浦起龙《酿蜜集》卷二《班马异同》）

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司马迁作《史记》，寄慨遥深，史识亦高；《汉书》于人于事，虽有褒贬，然少寄托，史识亦不及《史记》。

自《诗》、《书》之作皆有序，所以系事纪变，明去取也。司马迁变古法，惟序己意，既已失之，然包括上古、收拾遗散，操纵在心，犹时有高远之意，常人所不能测之者。及班固效之，而浅近重复，往往不过常人之识之所能及。至其后史官，则又甚矣。

程伊川云：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以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评《史》、《汉》者，独此语为覈。张辅以文字多寡为优劣，此何足以论班、马哉！（焦竑《焦氏笔乘》卷二）（按：张辅论《史》、《汉》"烦省不同"，见《晋书·张辅传》）



班氏父子踵《太史公》作书，以谓慎核其事，整齐其文，而其体例各有不同。《史》于"汉元年诸侯罢戏下就国"之后，历举楚之所以失天下，汉之所以得者，使后世了然见其全局。……撮项王举事失人心局势之大者，总序于汉元、二年之间，提纲絜领，较如指掌，此太史公作史之大法也。

班书以事之先后为次，首序田荣之反，次及汉定三秦遗羽书，次及九江

称疾，次及羽使布杀义帝，次及陈余立赵，年经月纬，一循史家之例，而于太史公序事之指意则失之远矣。（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三《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

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及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余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顾炎武《日知录》）

《汉书》沿袭《史记》体例而又有所改易，多用《史记》文字而又有所删省。其体例之改易，得失互见；其文字之删省，则往往失却司马迁的微旨与叙事的生动。

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斜上，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通志·总叙》）

彼班氏之表何如哉？侯表徒列子孙世数之繁，官表徒书公卿拜罢之日，是特聚诸家之谱谍耳，未闻有发明一代之意也。且《诸侯年表》曰“异姓王者”，曰“同姓王者”，迁则合而为一，正以明汉初亲疏相错之旨。固废年经国纬之制，徒以一己之见，乃以异姓同姓分而为二，则天下大势何观焉？《功臣年表》曰“高祖功臣侯者”，曰“惠景间功臣侯者”，曰“建元以来功臣侯者”，迁则拆而为三，正以明一时行封异同之意。固废国纬年经之制，徒以卷帙重大之故，乃以高惠、高后、文与景、武……折而为二，则当世得失何验焉？《建元以来王子侯者表》断自建元，盖是时始行分封之典，迁意正有在也。固则起于高祖，且谓圣祖建业以广亲亲，殊失《王子侯表》之本旨矣。《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不载九卿百司，盖汉兴将相权重之故，迁意之有寓也。固则以将相混于列职之中，且不纪大事以为主，殊失《将相名臣表》之本旨矣。（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五）



司马迁《项羽本纪》载起兵时及鸿门事，千载以下，历历如见。班固多从裁省，似少脱略矣。《高祖本纪》亦然。垓下之战，“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左”诸语，勃勃气色，而班固删之。如此类甚多，此班之不逮马者。（徐乾学《憺园文集》卷一五《班马异同辨》）

（《汉书》）其表、书之类，轻变《史记》之例，亦多可议。至若《古今人

物》一表，牵率支缀，强分九品，并阑入庄、列寓言无实之人，尤为识者所笑也。（浦起龙《酿蜜集》卷二《班马异同》）

《史记·淮阴侯传》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乎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书则《韩信传》尽删通语，而另为通作传，以此语叙入《通》传中，似乎详简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应立传之人，载其语于《淮阴传》，则淮阴之心迹见，而通之为辨士亦附见，史迁所以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兼省却无限笔墨。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立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轻，且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赵翼《陔余丛考》卷五《史记四》）

《汉书》叙一代之史，取材便利；又因东汉文风，渐趋华丽，故其文叙事详密谨严，文字整饬赡丽，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文气疏宕，富于神韵。

司马迁、班氏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列传》）

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文心雕龙·体性》）

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同上《事类》）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六家》第一）

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同上《论赞》第九）



其班氏之书，成于后汉。彪既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是兼采众贤，群理毕备，故其旨富，其词文，是以近代诸儒共同钻仰。（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

……迁辞直固事备，固文赡而事详，若用其所长，盖其所短，则升堂而入室矣。（刘肃《大唐新语·总论》）

……《史记》宏放，《汉书》详整，各有所长也。（王鏊《震泽长语》卷下）

太史公与班掾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矱胜。惟其以风神胜，故其遒逸疏宕如餐霞，如啮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

而指次心田之所不及，令人读之，解颐不已；惟其以矩获胜，故其规划布置，如绳引，如斧钊，亦往往于其复乱庞杂之间，而有以极其首尾节奏之密，令人读之，鲜不溜筋而洞髓者。……两家之文，并千古绝调也。（茅坤《茅鹿门集》卷一《刻汉书评林序》）

班孟坚书，虽无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赡，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并称《史》、《汉》，謊以为《史记》之后便有《汉书》。（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五《史一》）

按朱子曰：“《史记》疏爽，《汉书》密塞。”余亦曰《史记》变化，《汉书》整齐；《史记》宕逸，《汉书》沈厚。（邱逢年《史记阐要·班马优劣》）

班孟坚文，宗仰在董生、匡、刘诸家，虽气味已是东京，然尔雅深厚，其所长也。（《艺概·文概》）

苏子由称太史公“疏荡有奇气”，刘彦和称班孟坚“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艺概·文概》）

《汉书》从学术和文献的角度，不独在《史记》原有纪传中增加学术事迹，多载学术与经世的文章，更增设纪传，特设《艺文志》，讲论学术源流。把文化学术纳入史的视野，是《汉书》的一大贡献。

《史记·董仲舒传》不载《天人三策》，贾谊与屈原同传，不载《治安》等疏，视《汉书》略矣。盖《史记》宏放，《汉书》详整，各有所长也。（王鏊《震泽长语》卷下）



《汉书·东方朔传》不承褚先生之语而自立论；其叙董偃事，宛如画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答客难》与《非有先生论》二篇，文章亦甚奇伟，如谏罢上林苑与对武帝“朕何如主”诸语，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与《史记》角立。

太史公以贾谊与屈原同传，故但载其《吊屈原文》与《鵩赋》二篇而已，然谊所上政事书，先儒称其通达国体，以为终汉之世其言皆见施用。又其所论贮积与铸钱诸事，皆大有关于政理，是何可以不传？班固取入《汉书》，最是。（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五《史一》）

晋张辅论《史》、《汉》优劣，谓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余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余万言，以此分两人之高下。然有不可以是为定评者。盖迁喜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固则于文字

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今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书多载有用之文》)

《史记》屈贾结传，意在迁谪，故于贾谊只录吊屈、赋鹏之文，而《汉书》全录其政事一疏。谊之经术意在易风移俗以进于古者，全见于此，此班马之各成其是也。

《史记》董仲舒与申公、辕固生、伏生诸人，入《儒林传》，故只记其治《春秋》，传公羊氏学，见有功于经。而《汉书》详载其《天人三策》，及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语，见其能推明孔氏之传，此班马各成其是也。

高帝以下诸本纪，《史记》不录诏语，即间及一二语，而不录全文，《汉书》乃备载之，以志一代敦本懋实之治，此班之胜于马也。

…………

贾山《至言》与贤谊之疏、董仲舒之策，可以鼎足，又能谏文帝除铸钱之令，而《史记》不为立传，《汉书》补之，此班之胜于马也。(沈德潜《归愚文续》卷三《史汉异同得失辨》)

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载于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按：刘知几《史通·载文》以为《史》、《汉》所录诸家之赋，"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彩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只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然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文史通义·诗教下》)



班《志》(按：指《汉书·汉文志》)之优点，今按分类所关，约而书之可有下列三端：

一、类例能适应者：……盖学术之演进，常随时代而变迁，故从事分类者，须时时注意社会之新知识，补充其分类……班《志》所分，虽仅六略，而对当时之著作，大都已能包括在内。……

二、分类各从其例：……班《志》分类之优点，即在于此。故凡一书之内，今列多类，而义有异者，复用"别裁"之法以济其穷。如《六艺略礼家类》下已有《记》百三十一篇，复有《中庸说》二篇，《中庸》固裁篇别出于本类者也。……又凡一书多义，不能别裁者，则用"互著"之法，如《诸子略》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亦有《李子》、《公孙鞅》；纵横家有

《庞煖》，而兵家亦有《庞煖》，则一书两通，并举而互著者也。故班《志》分类，能将同类之书置于一处，可以辨异同，通学术，明源流，究得失。

三、子目之细密：……《汉志》每略之下，各复分类，类下之再加以分析者，则加标题于每书之上……（蒋元清《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



第五章

汉代赋体文学

第一节　赋体性质与赋称来源

赋是汉代一种新兴文体。它有如诗歌，讲求声韵的谐和与形式的整饬，又如散文，句型自由，无格律的严格限制；它既是书面的文学，又能诉诸口诵；它既宜于状物叙事，又宜于抒情说理，兼具诗歌与散文的表现功能，是两者间的综合性文体。这样的文体命名为赋，实与其上述诸性质有关。

一　赋义之一：时空铺衍



此义来源于"诗六义"之赋。赋与敷可相通假，又与铺、布、陈等字义近，都有在时空两个方面把事物加以展开的意义。赋概念之被引入文学，指不假比兴，直接表现事物时空状态的艺术手法，并进一步用来称谓以陈述性、叙述性和描绘性为主要特征的文体。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诗集传》）

天子是若，明命以赋。（《诗经·烝民》，朱熹注云："赋，布也。"）

赋纳以言，明试以功，东服以庸。（《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夏书》，杜预注云："赋纳以言，观其德也。"）（按：《尚书·舜典》云"敷奏以言"，是知赋、敷同音异调，可相通假。）

铺筵席，陈尊俎。(《礼记·乐记》)

敷筵席，陈几。(《穆天子传》)

太保率西方诸侯，入门应左……皆布乘黄朱。(《尚书·康王之诰》。孔安国《传》云："诸侯皆陈四黄马朱鬣以为庭实。")(按：布以经纬织成，铺展开来有纵横之义，故其引申义与铺、赋、敷、陈相同。)

二　赋义之二：不歌而诵

春秋列国朝聘，宾主赋诗言志，盖随时口诵，不待乐奏，赋遂指脱离音乐的一种诵读形式。战国之时，荀况赋源于民间说唱，屈原《楚辞》亦可口诵，两者铸成汉代赋体，仍保留有不歌而诵的特点，故以赋称谓之。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国语·周语》)韦昭注云："无眸子曰瞍，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班固《汉书·艺文志》)

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书·朱买臣传》)



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轶材，上乃征褒。……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汉书·王褒传》)

窃疑赋自有一种声调，细别之与歌不同，与诵亦不同，荀、屈所创之赋，系取瞍赋之声调而作，故虽杂出比兴，无害其为赋也。汉世朱买臣、九江被公能读《离骚》，盖不仅能读楚国方言，兼能明赋之声调耳。荀子有《成相篇》，俞樾说："此相字即春不相之相。《礼记·曲礼篇》：'邻有丧，舂不相'。

郑（玄）注曰：'相，谓送杵声。'盖古人于劳役之事，必为歌讴以相劝勉，盖举大木者呼邪许之比，其乐即谓之相。请成相者，请此曲也。《汉志》有《成相杂辞》，足征古有此体。"……荀卿、屈原之作赋，或亦借旧有声调别造新词以体物写情欤？（《文心雕龙·诠赋》范文澜注）

赋称的由来，一取义于诗三百"直陈其事"，重铺陈描绘的表现手法，一取义于"不歌而诵"的说唱体形式，两者概括了骚体赋、四言赋和散体赋的主要文体特征。赋在汉代逐渐由半书面、半口头文学演变为纯书面文学。

三 赋称始于战国后期

荀子《佹诗》，始称赋篇。

客又说春申君曰："……今孙子，天下贤人也。君何辞之？"……于是使人请孙子于赵。孙子为书谢……因为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杂布与锦，不知异兮。……"（《战国策·楚策四》）

此篇不载于其书。赋即《佹诗》末章。（《战国策·楚策四》鲍彪注）

荀子不还，而遗之赋，盖即此《佹诗》也。（朱熹《楚辞后语》）（按：荀子《佹诗》，《玉烛宝典》卷一二作《荆楚歌赋》）

第二节 汉初骚体赋及其流变



汉初，上层社会崇尚楚文化。这一风尚影响到文人，产生了祖述屈原楚辞的骚体赋。

在汉末抒情诗复甦以前，骚体赋几乎是文人最主要的文学抒情形式。

一 汉初骚体赋

汉初文人以骚体赋抒写贤人失志，尚葆有屈原缘情而作的传

统。贾谊、严忌、司马迁是这一时期赋家的代表。

（一）贾谊

贾谊贬官长沙，与屈原有同病之苦，作《吊屈原赋》；又无可解脱，以老庄为千古知己，作《鵩鸟赋》。两赋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汉人最早的骚体赋。

《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而抒发自己的愤懑。

>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在这以下，作者又以更加激烈的情绪，表白自己决不苟同流俗的人生态度。

> 谇曰：已矣！国其莫吾知兮，子独壹郁其谁语？凤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渊潜以自珍……

屈原、贾生，有相似的生平际遇和思想感情，《吊屈原赋》乃得楚辞的真精神。



> 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贾谊之作，屈原俦也。（挚虞《文章流别论》）
>
> 读屈、贾辞，不问而知其为志士仁人之作。太史公之合传，陶渊明之合赞，非徒以其遇也，殆以其心。
>
> 屈子之赋，贾生得其质。（刘熙载《艺概·赋概》）（按：刘熙载所云渊明合赞，见陶渊明《读史述九章·屈贾》）

但在屈原的时代，君可以择臣，臣亦可以择君。贾谊生当天下一统，不免有更为深重的感慨。

> 其曰："历九州以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人皆以原系楚宗室，义不

可去，谓谊不知原之心。然《离骚》、《远游》诸篇，原曾自述其志，谊所素闻。第以负长才而不见用，偏值天下一家之世，恨不能如原之时，列国分域，可以任其所适。此意不敢明言，聊借古人以自寄耳，非以此责原也。与东方曼倩《答客难》同义，从来未经拈破。(《古文析义》卷三)

贾谊在长沙三年，自叹年华将逝，作《鹏鸟赋》，对生死祸福，相依相存的关系，有极为深刻的思索。

万物变化兮，固亡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变化而嬗。沕穆亡间，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

贾谊幻想自己如老庄所说的真人、至人，与万物相沉浮。

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意。真人恬漠，独与道息。释智遗形，超然自丧；寥廓忽荒，与道翱翔。……

贾谊托靠庄老，勉为达人，既因势不得已，又与汉初学尚黄老很有关系。

《三山老人语录》云："性命死生之说，老庄论之备矣。自秦灭学之后，贾谊首窥其奥，为长沙傅，有鹏入舍，为赋以自广。曰……此语自汉以来，言达性命、齐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晋、宋间清谈，推本其言而已。汉兴，至文帝时，在朝儒臣，惟谊年甚少，而学甚博，非有师友渐磨之益，风俗迁染之效，而独颖然秀出，论时政则尽人事，论性命则尽天理，后世无以复加，岂非豪杰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引)(按：贾谊之言性命，正在"风俗迁染"。三山老人所云，聊备一说耳。)



《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赋七篇。《旱云赋》载在《古文苑》，其文写大暑干旱祸害民生，既谴责苍天无情，也怒斥政治无道。观其内容、体制，当为贾谊所作。

忧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劝久而败坏。何操行之不得兮，政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嗟乎！惜弃太剧，何辜于天无恩泽！

其后一段骚体，纯用四言，节奏急促，有似挞伐：

忍兮啬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与福矣！来何暴也，去何躁也！孽孽望之，其可悼也！……

世传《惜誓》，是否贾谊所作，学者未有确论。

《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誓相约，然后言乃从身以亲也。盖刺怀王有始无终也。（王逸《楚辞章句》）

《惜誓》者，汉梁太傅贾谊之所作也。……《史》、《汉》于谊传独载《吊屈原》、《鵩鸟》二赋，而无此篇，故王逸虽谓"或云谊作，而疑不能明"，独洪兴祖以为其间数语与《吊屈赋》词指略同，意为谊作亡疑者。今玩其辞，实亦瑰异奇伟，计非谊莫能及……（朱熹《楚辞集注》卷八）

严沧浪云："《楚辞》惟屈宋诸篇当读，外惟贾谊《怀长沙》……此外亦不必也。"愚按：诸篇而外，尚有贾谊《惜誓》可读，其它摹仿盗袭，无一警语。（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



贾谊长于作论，故诸赋追踪屈骚而外，不免"以文为赋"，《鵩鸟赋》尤其明显。

贾傅以文为赋，故《吊屈》、《鵩鸟》率真而少致。

贾畅达用世之才耳，所为赋自是一家。（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

（二）严忌

严忌，藩国文士。始仕吴，后游于梁。

（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景帝少弟梁孝王

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从梁孝王游。……初，胜、诡欲使王求为汉嗣……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汉书·贾邹枚路传》)

严忌本姓庄，当时尊尚，号曰夫子。史家避汉明帝讳，故遂为严耳。(《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颜师古注)

严忌好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二十四篇。今存《哀时命》，亦为贤人失志之作。

夫子名忌，与司马相如俱好辞赋。客游于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词，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王逸《楚辞章句》)

《哀时命》抒写贤人失志，大致同于屈原、贾生。但篇末一段以全身远害为旨归的游仙，乃是《离骚》所无，于汉人骚赋，却有很大影响。

……怊茫茫而无归兮，怅远望此旷野。下垂钓于谿兮，上要求于仙者。与赤松而结友兮，比王侨而为耦。使枭杨先导兮，白虎为之前后。浮云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魂眐眐以寄独兮，汩徂往而不归。处卓卓而日远兮，志浩荡而伤怀。鸾凤翔于苍云兮，故矰缴而不能加。蛟龙潜于旋渊兮，身不挂于网罗。知贪饵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宁幽隐以远祸兮，孰侵辱之可为？……(《九怀》)



(三) 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

公孙用世，同学怀妬，出相胶西，谢病自免，怨哉董生，向赋不遇，今其然耶？(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董广川《士不遇赋》云："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此即正谊明道之旨。(《艺概·赋概》)

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或作于被刑之后。其所抒怨愤，同于前

人；其所求名垂后世，则与前人立意不同。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没世无闻，古人闻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

司马子长《悲士不遇赋》云："没世不闻，古人唯耻"。此即"述往事、思来者"之情。（《艺概·赋概》）

二 骚赋变体

骚赋祖述楚辞，相沿日久，必然缺乏新意。武帝时代，赋家乃尝试有所突破。淮南小山《招隐士》在句型、用语及意境方面多有创新。

《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存《诗》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闵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沈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王逸《楚辞章句》）



此篇（《招隐士》）视汉诸作最为高古，说者以为亦托意以招屈原也。（朱熹《楚辞集注》）

（《招隐士》）音乐、局度，浏漓昂激，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词赋可比。（王夫之《楚辞通释》）

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情深，后来难并矣。惟奇倔一境，虽亦诗骚之变，而尚有可广。此淮南《招隐士》所以作与？

王无功谓薛收《白牛溪赋》"韵越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余谓赋之足当此评者盖不多有，前此其惟小山《招隐士》乎？

赋有夷、险二境。读《楚辞》《湘君》、《湘夫人》，便觉有逍遥容与之情；读《招隐士》，便觉有罔沕憭栗之意。（《艺概·赋概》）

西汉成帝时，班倢伃作《自悼赋》、《捣素赋》，情词并茂，亦为骚赋变体。倢伃，班固祖姑。

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蛾而大幸，为倢伃……倢伃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赵氏姊弟骄妒，倢伃恐久见危，求共养太后长信宫，上许焉。倢伃退处东宫，作赋自伤悼。……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园陵，薨，因葬园中。(《汉书·外戚传》)

《捣素赋》在句型上的最大特点，是取消"兮"字，换用其他虚字协调音节，抑扬声调：

燕姜含兰而未吐，赵女抽簧而绝声。改容饰而相命，卷帘霜而下庭……

又以三、四言杂揉于骚体句式，以虚字统率之，很能见出散体赋的影响。

……腾云霞之迩日，似桃李之向春。红黛相媚，绮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两靥如点，双肩如张。颓肌柔液，音性闲良。于是投香杵，扣玫砧，择鸾声，争凤音。梧因虚而调远，柱由贞而响沉……



《自悼赋》、《捣素赋》无论状物、叙事、抒情，都极富于表现力。后之学者，有疑两赋乃后世伪托者，然至今无有确证。

(《自悼赋》)归来子以为"其词甚古，而侵寻于楚人，非特妇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矣。至其情虽出于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终不过于惨伤，又其德性之美，学问之力，有过人者，则论者有不及也。(朱熹《楚辞后语》)

班姬《捣素》如"阅绞练之初成，择玄黄之自出。准华裁于昔时，疑形异于今日。"又"书既封而重题，笥已缄而更结"，皆六朝鲍谢之所自出也。昭明知选彼而遗此，未审故也。(《艺苑卮言》卷二)

疑此赋(《捣素赋》)乃徐、庾之极笔。(杨慎《丹铅总录》)(按：武帝以

来，汉赋各体均已充分成熟，两赋未必不能出于汉人之手；倢伃少有才学，工于诗赋，兼之身世如此，感喟良多，亦未尝不能为之；《自悼赋》见录于《汉书》，班固当有所据。王世贞不疑作者，态度较朱熹、杨慎为审慎。）

其它如东方朔《旱颂》、马融《围棋赋》、班固《白绮扇赋》、息夫躬《绝命词》、傅毅《舞赋》等，亦皆为骚赋变体。

三　骚赋的规范化

以贤人失志为主题的骚体赋在西汉中叶以后，内容与形式大抵走上规范化、类型化的道路。转相摹拟，是这类赋作的最大特点。

> 尝怪两汉间所作骚文，初未尝有新语，直是句句规模屈、宋，但换字不同耳。至晋、宋以后，诗人之辞，其弊亦然。若是，虽工亦何足道。盖当时祖习，共以为然，故未有讥之者耳。（《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引《石林诗话》）

自严忌《哀时命》出，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步其后尘。这类作品皆借追怀屈原，消自己胸中块垒，形成了固定的表现模式。



属于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大抵怀才不遇，穷愁悒郁，一腔哀怨：

> 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居处愁以隐约兮，志沈郁而不扬。（《哀时命》）
>
> 哀时命之不合兮，伤楚国之多忧。……恶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浊而不知。（《七谏》）
>
> 灵怀其不吾知兮，灵怀其不吾闻。……惟郁郁之忧毒兮，志坎壈而不违。（《九叹》）

他们向当道表示忠诚，陈说教训，却因小人作梗，受到猜忌：

灵皇其不寤知兮，焉陈词而效忠？俗嫉妒而蔽贤兮，孰消余之从容？（《哀时命》）

浮云陈而蔽晦兮，使日月乎无光。忠臣贞而欲谏兮，谗谀毁而在旁。（《七谏》）

念社稷之几危兮，反为雠而见怨。思国家之离沮兮，躬获愆而结难。（《九叹》）

无奈之下，他们只得企求隐逸，全身远害：

使枭杨先导兮，白虎为之前后。浮云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宁幽隐以远祸兮，孰侵辱之可为？（《哀时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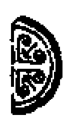
列子隐身而穷处兮，世莫可以寄托。众鸟皆有行列兮，凤独翔翔而无所薄。经浊世而不得志兮，愿侧身岩穴而自托。（《七谏》）

譬王侨之乘云兮，载赤霄而凌太清。欲与天地参寿兮，与日月而比荣。登昆仑而北首兮，悉灵圉而来谒。（《九叹》）

内容而外，汉人骚体赋的句型也日趋规范，少有变化。刘向《九叹》与班彪《冀州赋》是这类赋作的代表。

征夫劳于周行兮，处妇愤而长望。申诚信而罔违兮，情素洁于纽帛。（《九叹·离世》）

夫何事于冀州，聊托公以游居。历九土而观风，亦悲人之所虞。（《冀州赋》）



汉人骚赋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规范化，与汉代集权统治与经学桎梏的日益严重，文人丧失其政治勇气和创造精神有关。

（屈）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朱熹《楚辞集注》）

《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虽为骚体，然辞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就其中《谏》、《叹》犹或粗有可观，两王（王褒、王逸）则卑已甚矣。（朱熹《楚辞辩证》上）

第三节　赋体文学的代表——散体赋

一　散体赋的文体构成

散体赋是在汉代进入鼎盛时期，随着南北文化交汇而崛起的一种综合性文体。它熔铸先秦《诗》、《骚》、散文和民间文学形式，不拘篇制，时空容量大，句型丰富，韵散结合，富于韵律美。荀卿的《赋篇》、《成相》，屈原的楚辞体作品和宋玉的《高唐赋》、对散体赋的形成有最直接的影响。

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文体，是汉代作家在前人文学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所取得的成果。

《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丽以伤情。……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

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文心雕龙·诠赋》)



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祝尧《古赋辨体》)

(《高唐赋》)形容迫似，宛肖丹青，盖《楚辞》之变体，汉赋之权舆也。(陈第《屈宋古音义》)

长卿《子虚》诸赋，本从《高唐》，物色诸体，而辞胜之。(王世贞《艺苑卮言》)

或曰：《骚》作于屈原矣，赋何始乎？曰宋玉。(程廷祚《骚赋论》)

古者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属也；侈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章学诚《校雠通义》)

诗篇以降，有屈、宋《楚辞》，为词赋家鼻祖。……秦、汉之世，赋体渐

兴（荀子已有《蚕赋》），溯其渊源，亦为《楚辞》之派别。……盖《骚》出于《诗》，故孟坚以赋为古诗之流。然相如、子云，作赋汉廷，指陈事物，殚见洽闻，非惟风雅之遗音，抑亦史篇之变体。（刘师培《论文杂记》）

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词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同上）（按：观诸家论赋，似可注意三点。第一，其所言辞赋者，大抵偏重于散体赋。第二，古人论文，因行文所在，往往只叩其一端，不求面面俱到。故诸家论述散体赋渊源，或指古诗，或指楚辞，或指战国之文，读者可以文互见，得其全貌，而不必责其以偏概全。第三，刘勰、陈第等人十分重视荀况、宋玉在散体赋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宋玉，他在屈原楚辞体作品的基础上，融合北方文化的艺术形式，建立了独特的赋体结构，为汉代散体赋奠定了基础。故探讨散体赋的形成，不可忽视宋玉的作用。）

二 汉代主要的散体赋作家

（一）枚乘

枚乘，西汉赋家，生平见本编第三章第一节。其《七发》是散体赋的奠基之作。

关于《七发》的写作目的，历来有三种说法。

一为"戒膏粱之子"说：

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子也。（《文心雕龙·杂文》）



一为谏梁孝王忠于汉朝说：

（枚）乘事梁孝王，恐梁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文选》李善注）

一为谏止吴王濞谋反说：

《七发》之作，疑在吴濞时。扬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也。若梁孝王，岂能观涛曲江哉！（梁章钜《文选旁证》朱绶语）

《七发》作于枚乘游于诸侯之门。其时，诸侯王既嗜欲无度，又图为不轨。观《七发》内容，戒淫靡与谏谋逆的目的，实兼而有之。

"……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膬，脭醲肥厚；衣裳则杂遝曼暖，燂烁热暑。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恣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筭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虚拟人物对话，把描绘、论说的内容划分为明确的层次。这样的结构方式，始于《七发》。

《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词《七谏》之流。（《文选》李善注）

枚乘《七发》、东方朔《客难》，创体也。后人虽沿袭其体，然丰神气韵，终不能及。（贺贻孙《诗筏》）

《七发》物象纷呈，词采富丽，亦为赋体首制。

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

枚生《七发》，其（屈）原、（宋）玉之变乎？措意垂竭，忽发观潮，遂成滑稽。且辞气跌荡，怪丽不恒。子建而后，模拟牵率，往往可厌，然其法

存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屈子之缠绵，枚叔、长卿之巨丽，渊明之高逸，宇宙间赋，归趣总不外此三种。(《艺概·赋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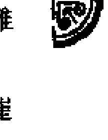
《七发》的论说方式与描绘风格，于楚辞和诸子论说之文均有借鉴，又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赋体风格。

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枚之秀韵不及宋，而雄节殆于过之。(《艺概·赋概》)

孟子问齐王之欲，历举轻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文史通义·诗教上》)(按：孟子问齐王之大欲，见《孟子·梁惠王上》)

自枚乘《七发》出，仿作者代不乏人。赋体之文，乃有"七体"。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辩》，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余家。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先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文心雕龙·杂文》)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傅玄《七谟序》)

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洪迈《容斋随笔》卷七)

《七发》气势浩汗，无堆垛之迹。拟作者《七启》、《七命》即大有径庭。(《章太炎先生国学演讲录·文学略说》)

(二) 司马相如

1. 生平

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小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为人，改名相如。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遣相如游学京师，以文辞显于世。景帝七年，以赀为郎，任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乃客游于梁，作《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依临邛令王吉，娶卓王孙女，复定居成都，卖酒市中。武帝好辞赋，召司马相如，作《上林赋》，因以为郎。曾两次奉使西南，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又作《谏猎疏》、《哀秦二世赋》。晚年任孝文园令，作《大人赋》。免官家居，作《封禅文》，郁郁而终。事见《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又有《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凡将篇》。《古文苑》所载《美人赋》，《文选》所载《长门赋》，后人以为拟作。

《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汉书·艺文志·六艺略》)



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汉书·艺文志·诗赋略》)

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矣。后之作者，实祖此意。……而《长门赋》所云"陈皇后复得幸"者，亦本无其事。俳谐之文，不当与之庄论矣。(原注：《长门赋》乃后人托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

司马长卿《长门赋》：此文乃后人所拟，非相如作。其词细丽，盖平子之流也。(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五)

2. 著作

《子虚赋》作于客游梁孝王时。相如"为天子游猎赋"，所作实可视为《子虚赋》续篇。《史记》本传以两篇合而为一，《文选》又

以《史记》所录析为两篇，皆有据焉。

《子虚》、《上林》一篇耳。下言"故空藉此三人为辞"，则亦以为一篇矣。而前文《子虚赋》乃游梁时作。及是天子，乃为天子游猎赋，疑皆相如自为赋序，设此寓言，非事实也。杨得意为狗监，及天子读赋，恨不同时，皆假设之词也。（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引吴汝纶语）

愚按《子虚》、《上林》，原是一时作。合则一，分则二。而"楚使子虚使于齐"，"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赋名之所由设也。相如使乡人奏其上篇，以求召见耳。（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按：泷川资言所云，可备一说。）

《子虚赋》始以楚使子虚盛言楚国云梦之大，物产之富，畋猎之盛，歌舞之乐，以此傲视齐国：

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姹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畋，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子虚曰："可。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畋于海滨……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仆下车对曰：'臣，楚国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泽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特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臣窃观之，齐殆不如，于是齐王无以应仆也。"



在这以下，齐国乌有先生既批评子虚侈言淫乐，显扬君恶，又大肆夸耀齐地山川方物，傲视楚国：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且齐东陼钜海，南有琅邪……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

苑囿之大。……"

相如游于梁，作《子虚赋》叙诸侯则竞夸苑囿之大，畋猎之盛，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藩国自恃势大，无视中央的现实。

明年（前153），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为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入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而府库金钱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其夏（景帝二十九年）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史记·梁孝王世家》）

及相如为武帝作《上林赋》，借亡是公之口，尊天子而抑诸侯，可见汉帝国统一大业最终取得的成果，对其创作心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而齐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猎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在这以下，作者又以更加铺排的形式、华丽的词藻，描绘天子上林苑山水林木、奇禽异兽、离宫别馆、良石美玉以及天子的校猎、游乐之事。其中既有司马相如对天子的颂扬，又有他对历史、现实的批评，更有他对自己社会理想的响往：

且夫齐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乎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宇……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

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于是……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悦。乡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人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

两汉而下，作者继起。……他如相如（姓司马）长于叙事，而或昧于情。……然《上林》……极其铺张，而终归于讽谏，而风之义未泯。……故虽词人之赋，而君子犹有取焉，以其古赋之流也。（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

《子虚赋》、《上林赋》进一步确立了散体赋的赋体结构与描绘模式，后之散体大赋，大抵踵其步武，相沿莫改。

司马长卿《子虚赋》：祝氏云：“此赋虽两篇，实则一篇。赋之问答体，其源自《卜居》、《渔父》篇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而盛。此两赋及《两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首尾是文，中间是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词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便，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性情益远，六义澌尽，体制遂失矣。”按：首尾虽以议论问答，然“车驾千乘”等句，既以赋齐王之猎；后半齐“东陼巨海”等句，即是赋齐国游猎之地，则亦未尝非赋也，后人无铺张之才，纯以议论为便，于是乖体物之本矣。（《义门读书记》卷四五）



《子虚赋》、《上林赋》好罗列名物，堆垛词藻，又多用古文奇字。其词采之赡丽，非《七发》可比。后之赋家，拟此为式，遂形成散体赋的文体风格。

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文心雕龙·诠赋》）

《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

高，所以不可及也。(《艺苑卮言》卷二)

奇字亦前人所常用，而于古体最宜，不知者诮以为怪。嗟乎！诗文固不必怪也。然班、马等赋，所以使人鬼眼溯耳者，政由时出奇字以衬复之。(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一)

相如之赋，富于想象和夸张，对后世的赋家，亦有很大的影响。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文心雕龙·夸饰》)

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此也。至模山范水，犹其末事。(《艺概·赋概》)

《哀秦二世赋》吊古以讽今，感慨颇深，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登陂陁之长坂兮，坌入曾宫之嵯峨。……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哀秦二世赋》)

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平章要切，断而能悲也。(《文心雕龙·哀吊》)(按：桓谭语当在《新论》，亡佚。又"平章"唐写本作"卒章"。)



《大人赋》目的虽在规劝武帝之好神仙方术，但因丽辞曼衍、夸饰太多，不免为讽反劝。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史记·太史公自序》)

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汉书·扬雄传》引雄语)

(三) 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93)，武帝时赋家。以好古传、受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待诏金马门，遂为常侍郎。建元三年，拜太中大

夫给事中。性好恢谐调笑，多寓讽谏，而终不得重用。事见《史记·滑稽列传》、《汉书·东方朔传》。《汉志》未著录有赋。

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按：指《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汉书·东方朔传》）（按：东方朔又有《七谏》，见刘向所辑《楚辞》，又见王逸《楚辞章句》。）

东方朔因不为世用，乃作《答客难》以舒其愤懑。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而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久之，朔上书陈农战疆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汉书·东方朔传》）

《答客难》既以诙谑语调，自嘲平生不遇，又以辛辣之笔，嘲讽当世的用人政策：

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

专制之下，文人少有轻松的幽默，却不乏冷嘲与热嘲，散体赋中，因此有了《答客难》一类的俳谐之文。

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扬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然朔名过其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



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汉书·东方朔传赞》）

自（宋玉）《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文心雕龙·杂文》）

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禅》、《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也。（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

《答客难》是散体赋中第一篇俳谐赋。自后仿作者不绝，然皆无有过之者。

东方曼倩求大官不得，始设客难；扬子云草《太玄》，乃作《解嘲》。学者争慕效力，假主客，遣抑郁者，无当玉卮，世亦颇厌观之，其体不尊，同于游戏。然二文初立，词锋竞起，以苏、张为输攻，以荀、邹为墨守，作者之心，实命奇伟。随者自贫，彼不任咎，未可薄连珠而笑士衡，鄙七体而讥枚叔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四）王褒

王褒（？—前61），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县北）人。宣帝时赋家。益州刺史王襄闻王褒有俊材，使作《中和》、《乐职》、《宣布诗》，因荐之朝廷。王褒既至，作《圣主得贤臣颂》。王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擢为谏大夫。"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神爵元年，奉命赴益州祀金马、碧鸡，道中病卒。事见《汉书·王褒传》。王褒又著有《四子讲德论》。《汉志》著录有赋十六篇。



《圣主得贤臣颂》以"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为主旨，颂而似赋。其中以工之用器、人之乘马，喻人主得臣贤与不肖的重要性，尤得体物写志之妙。

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故工人之用钝器也，劳筋苦骨，终日矻矻。及至巧冶铸干将之朴，清水淬其锋，越砥敛其锷。水断蛟龙，陆剸犀革，忽若彗氾画途。如此，则使离娄督绳，公输削墨，虽崇台五层，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驽马，亦伤吻敝策而不进于行。胸喘肤汗，人极马倦。及至驾啮膝，骖乘旦，王良执靶，韩哀附舆，纵横驰骛，忽如影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一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故服絺绤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燠；袭狐裘之暖者，不忧至寒之悽怆，何则？有其具者易其备，贤人君子亦圣王之所以易海内也。

圣主贤臣，文词采密，其推彭祖厌乔松，归之文王多士，以祝寿考，意主规讽，犹长卿之《子虚》、《上林》，游戏园囿，有戒心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汉书》所云《洞箫颂》，《文选》、《艺文类聚》作《洞箫赋》。其文以乐器材料的生长环境，各类听众的情感共鸣，表现悲剧性的音乐形象，与《七发》中同类题材的描绘模式相同。而抒情之细腻，状物之生动，词采之铺陈，句式之整饬，则又是《七发》所不可比拟的。

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文心雕龙·诠赋》）

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冷然可观。（同上《才略》）

子渊《洞箫》、季长《长笛》，才不胜学，善铺叙而少发挥。（《艺苑卮言》卷二）



王褒又有《僮约》、《责须髯奴辞》，皆为俳谐之赋。前者代僮仆立卖身契券，虽语多狎侮，但于了解汉代奴婢制度，很有认识的意义。

黄鲁直《跛奚移文》拟王子渊《僮约》，皆极文章之妙。（《容斋续笔》卷一五）

《僮约》谐放，颇近东方。（《汉魏六朝百三家题辞集》）

（五）扬雄

扬雄，西汉元、成之世赋家。生平见本编第三章第三节。

扬雄前期，颇好辞赋，尤其推崇司马相如。

扬雄……顾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

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西京杂记》卷二)

余少时见扬子云之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而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弥日瘳。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桓谭《新论》)

成帝时，扬雄拟则司马相如，作《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赋皆因事而作，旨在谏戒帝王息佚猎、绝奢侈、惜民力、崇国防，其讽劝的意义，较司马相如更进一层。

(雄)以为……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汉书·扬雄传赞》)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厓、旁皇、储胥……游观屈奇瑰玮，非木摩而不彫，墙涂而不画……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齐肃之事。赋成奏之，天子异焉。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湊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其十二月羽猎，雄从。以为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武帝广开上林……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



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人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至汉中，张罗网罝罘，捕熊罴豪猪……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罔为周阹，纵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汉书·扬雄传》)

子云属意，辞人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文心雕龙·才略》)

杂而不乱，复而不厌，其所以为屈乎？丽而不俳，放而有制，其所以为长卿乎？以整次求二子则寡矣。子云虽有剽模，尚少谿径。班、张而后，愈博愈晦愈下。(《艺苑卮言》卷二)

《河东》、《甘泉》、《长杨》、《羽猎》，四赋绝伦，自比讽谏，相如不死。(《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继东方朔《答客难》之后，扬雄又作《解嘲》，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作了更深刻的思索，发出更深沉的感慨。

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汉书·扬雄传》)

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文心雕龙·杂文》)

解，按《字书》云："解者，释也，因人有疑而解释之也。"扬雄始作《解嘲》，世遂仿之。其文以辨释疑惑、解剥纷难为主，与论、说、议、辩，盖相通焉。……雄文虽谐谑回环，见讥正士，而其词颇工，且以其为此体之祖也，故亦取焉。(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此仿佛《客难》体，而文却过之。

气苍劲，词精腴，姿态复横溢，可谓青出于蓝。(《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月峰语)



扬雄《逐贫赋》乃四言俳谐体。其文把贫穷拟人化，又设为问答之辞，已略含戏剧的因素。后世文人，多有仿作者。

韩文公《送穷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拟扬子云《逐贫赋》……皆极

文章之妙。(《容斋续笔》卷一五)

《逐贫赋》长于《解嘲》，释愁送穷，文士调脱，多原于此。(《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扬雄又依傍楚辞，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这类骚体赋标榜达则兼济，穷则独善，对屈原处世的不肯苟且，多有责难，很能见出元、成之世文人的心态。

(雄)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按：《广骚》、《畔牢愁》已佚，《反离骚》独载《汉书》本传)。

贾傅之词，于西京为最高。……若扬雄则尤刻意于楚学者，然其《反骚》，实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讥之，当矣。(朱熹《楚辞辨证》上)(按：洪氏所讥，见《楚辞辨证》上："洪氏……论扬雄作《反离骚》，言'恐重华之不纍与'而曰：'余恐重华与沈江而死，不与投阁而生也。'又释《怀沙》曰：'知死之不可让，则舍生而取义可也。所恶有甚于死者，岂复爱七尺之躯哉！'其言伟然可立懦夫之气。")



扬子云《反离骚》，盖深悼三闾之沦没，非爱原极切，不至有斯文。长沙、龙门先已并有此意。班孟坚独载此于雄传，其义可知。第子云命名太过，又莽世不能远引，故为后人所持藉。如贾生赋《吊屈原》，子云但以此命名，亦何不可。本其情出于慕悦伤痛，岂冀获岐趣者。紫阳之抨击，似亦未悉其由。

扬子云《反离骚》，似反原而实爱原，与女媭之詈同。(胡应麟《诗薮》杂篇卷一)(按：胡氏所论，异于朱熹，可备一说。)

班固以屈原为露才扬己，意本扬雄《反离骚》，所谓"知众婢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是也。然此论殊损志士之气。(《艺概·赋概》)

扬雄后期，追踪圣人，不喜辞赋。对散体赋以描绘内容淹没其讽谕主题，扬雄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扬雄以"诗人之赋"对"辞人之赋"作简单化的否定，不仅可见他对散体赋的文体特征缺

乏深刻的认识，也暴露出他的文学观念，远未能适应汉代文学出现的新情况。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以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法言·吾子》)

对扬雄后期否定辞赋的观点，后之学者从不同的立场，或肯定之，或否定之。肯定者如：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曹植《与杨德祖书》)

否定者如：

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周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俦，为皆有𠍴邪?(杨修《答临淄侯笺》)

扬子云谓"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然壮夫自有壮夫之赋，不然，则周公、尹吉甫叙事之作，亦不足称矣。杨德祖《答临淄侯笺》先得我心。(《艺概·赋概》)



(六) 班固

班固生平见本编第三章第五节。

班固兼具经学家、史学家与文学家的三重身份，其论文学，不免常常陷于自相矛盾。班固对辞赋的看法，集中在《离骚赞序》、《离骚序》、《两都赋序》、《汉志·诗赋略》与《汉书》一些赋家的传赞之中。

对屈原其人其文，班固基本持肯定的态度。

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

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离骚赞序》)

哀哉！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经曰："心之忧矣，涕既陨之。"(《汉书·冯奉世传赞》)

然而对屈原及其《离骚》，班固又有不公正的批评。

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王逸《楚辞章句序》)

以汉人诗学原则规范辞赋，使班固对司马相如等赋家的评价亦往往出现矛盾。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抒下情而

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雅》、《颂》之亚也。(《两都赋序》)

(司马相如作《上林赋》)以推天子、诸侯苑囿，其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奏之天子，天子大悦。……赞曰：司马迁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

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汉书·艺文志》)

班固《两都赋》乃为东汉建都洛阳造舆论所作。其文历数汉皇功德，专替朝廷说教，是一篇典型的“汉颂”。

(固)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指洛阳)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阳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后汉书·班彪列传》)

但其文在颂汉而外，也折以法度，讽劝奢淫逾制。

此赋盖因杜笃《论都》而作。笃谓：“存不忘亡，安不忘危，虽有仁义，犹设城池。盖以都洛，尚非永图。特以葭萌不柔，未遑论都，国家不忘西都也。”故特作后赋，折以法度。前赋兼戒后王勿效西京末造之侈，又包平子《两京》之旨也。(《义门读书记》卷四五)(按：杜笃《论都赋》引文当作“故存不忘亡，安不讳危，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客以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潜与?”)



前篇极其眩曜，主于讽刺，所谓抒下情而通讽谕也。后篇折以法度，主于揄扬，所谓宣上德而尽忠孝也。二赋犹《雅》之正变。“五诗”则兼乎《颂》体矣。(同上)

《西都》始言形胜之壮，继言建竖之胜，末言狩猎之事。《东都》一概略过，专言建武、永平之治，武功文德，继美重光，所能以法度折其眩曜也。”(《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执升语)

五诗仿《封禅文》。……《明堂》、《辟雍》、《灵台》三诗，皆兴灭继绝，润色鸿业之事。后《宝鼎》、《白雉》二诗，则皆众庶悦豫，福应尤盛事。

（《义门读书记》卷四五）

《西都赋》的体制、描绘、词采、夸饰，皆步效《子虚》、《上林》。《东都赋》则侧重颂扬圣皇，褒美制度，故语言温润典雅而少有铺陈。

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文心雕龙·诠赋》）

此赋（指《西都赋》）略分三段：首述形势田里之饶，中言宫室之胜，末言田猎之乐，皆以"眩曜"二字铺排开来。（《评注昭明文选》引何焯语）

此篇（指《东都赋》）文气谨严，不作一冗散之笔，真有冠裳佩玉，清庙明堂气象，故足折西宾而伸己论也。（同上）

《两都赋》以征实与夸张相结合的手法，描绘长安的城市布局、建筑风貌、各色人物，在赋文学史上，有开创的意义。

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西都赋》）



班固又仿《离骚》作《幽通赋》，仿《答客难》作《答宾戏》，仿《封禅文》作《典引》，亦皆赋体之文。

（彪）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赋》，以致命遂志。……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谕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汉书·叙传》）（按：所应之辞，即《答宾戏》）

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后汉书·班彪列传》）

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文心雕龙·杂文》)

《典引》所叙，雅有懿采。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馀巧。故称"《封禅》靡而不典，《剧秦》典而不实。"岂非追观易为明，循势易为力欤？(《文心雕龙·封禅》)

《两都》仿《上林》；《宾戏》拟《客难》；《典引》居《封禅》、《美新》之间，大体取象前型，制以心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七) 张衡

张衡(79—139)，东汉中后期文学家、科学家。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北)人也。世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耽好《玄经》。……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琁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阳嘉元年(132)，复造候风地动仪……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衡因上疏陈事。……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谶，兼复附以祆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后汉书·张衡列传》)

河间相张君……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与神合契。(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

张衡仿《两都赋》作《二京赋》，既颂扬两汉帝国，也针砭社会弊病。《西京赋》铺陈描绘，不出前人模式，但辞藻更见赡丽；《东京赋》更加上思贯古今，议论风生。两赋在汉人都城赋中，自有特色。



（永元中），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后汉书·张衡列传》）（《艺文类聚》卷六一引《西京赋》有序，或为后人所加。序云："昔班固睹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踰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礼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

张衡《二京》，迅拔以宏富。（《文心雕龙·诠赋》）

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同上《体性》）

《二京》之赋，覃思十年。《长杨》、《羽猎》，风犹可续。（《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孟坚《两都》，似不如张平子。平子虽有衍辞，而多佳境壮语。（《艺苑卮言》卷二）

《西京》雄丽欲掩孟坚，《东京》则气不足，举其辞不若《东都》之简当，惟末章讽戒挚切处为胜。（姚鼐《古文辞类纂》）

张衡注意到前人赋作因铺陈太过，无益于讽谏。《二京赋》虽未能出此窠臼，但于现实的揭露和批判，确有较前人为尖锐警醒者。



相如赋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隤墙填堑，乱以收罝解罘，卒无补于风规，祇以昭其愆尤。（《东京赋》）

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东京赋》）

《二京赋》描绘都市生活，其街道、市场；商人、富民、游侠、辩士；杂技、歌舞、马戏、魔术，林林总总，无不笼控笔端，此又是此前的都城赋所不及的。

临回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九剑之挥霍，若索上而相逢。……总会仙唱，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委蛇。……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

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拏攫，猨狖超而高援。……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后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西京赋》）

《二京》、《南都》（按：亦张衡所作）三赋，俱衡精思傅会之作，非历其境者，不能状其亲切；非会其神者，不能博其周至。故衡为此赋，自当在其游过三辅到过京师。（孙文青《张衡年谱》）

张衡又依《答客难》作《应间》，依《七发》作《七辩》，皆“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参看本节（一）、（三））。

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乃设客问，作《应间》以见其志云。（《后汉书·张衡列传》）（按：《后汉书》李贤注云：“间，非也。《衡集》云：‘观者观余去史官五载而复还，非进取之势也。唯衡内识利钝，操心不改。或不知我者，以为失志矣，用为间余。余应之以时有遇否，性命难求，因兹以露余诚焉，名之《应间》云。’”）

张衡《应间》，密而兼雅。……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文心雕龙·杂文》）

三　散体赋的艺术特征



（一）散体赋——描绘性文体

在先秦的诗、骚、散文之中，作为手段的文学描绘，在散体赋几乎转化为写作的目的，散体赋因此成为罕见的描绘性文体。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

西汉以降，鸿裁渐出，凡都邑、宫殿、游猎之大，草木肖翘之细，靡不敷陈博丽，牢笼漱涤，蔚乎钜观。学者生古人后，体物之作，杂然前陈，如极桂而登钟山、兰田，瑰货奇宝，焜耀于碔夫碝石间，自非具眼别裁，鲜不偶矣。（沈德潜《赋钞笺略序》）

赋乌乎统？曰：统乎志。志乌乎归？曰：归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慨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变化：天之漻漻，地之嚣嚣，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硪溪谷、风云雾霾、霆震寒暑；雨则为雪，霜则为露，生杀之代，新而嬗故；鸟兽与鱼，草木之华，虫走蛇趋；陵变谷易，震动薄蚀；人事老少，生死倾植；礼乐战斗，号令之纪；悲愁劳苦，忠臣孝子；羁士寡妇，愉佚愕骇。有动于中，久而不去，然后形而为言。于是错综其辞，回互其理，铿锵其音，以求理其志。（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

风、雅、颂者，盖未有离于性情，独赋有异。夫宛转偃隐，赋之职也。儒家之赋，意存谏戒。……乃若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或写都会、城廓、游射、郊祀之状，若相如有《子虚》，扬雄有《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奥博详实，极赋家之能事矣，其亦动人哀乐未也？其专赋一物者，若孙卿有《蚕赋》、《箴赋》、王延寿有《王孙赋》……侔色揣称，曲成形相，嫠妇孽子读之不为泣，介胄戒士咏之不为奋。当其始造，非自感则无以为也；比文成而感亦替。斯不可以一端论。（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盖诗虽兴而赋体自在也。铺陈物色，固有宜赋，不宜诗者。（刘咸炘《文学述林》）

（二）散体赋的描绘特征——图案化

散体赋之描绘物象，追求时空两个方面的完整，此与图案的构图特征，极为相似。



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司马相如《答盛览作赋书》）

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司马长卿论赋云："一经一纬"。或疑经可言一，纬不可言一。不知乃举一例百，合百为一耳。（《艺概·赋概》）

散体赋大都依时间的顺序，描绘事物运动的完整过程。如《子虚赋》描绘楚王的游猎程序：

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蛩蛩，辚距虚……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翱翔容与，览乎观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

肖之恐惧。……于是郑女曼姬，被阿锡，揄纻缟……于是乃相与獠于蕙圃，媻姗教窣。上乎金堤，掩翡翠，射鵕鸃……于是楚王乃登云阳之台，泊乎无为，澹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

散体赋又追求以全方位、多角度的描绘方式，表现事物的空间状态及空间关系。如《子虚赋》描绘云梦之山：

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崒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昆吾……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阤靡……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其西，则有涌泉清池……其中，则有神龟蛟鼍……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枏豫章……其上，则有鹓鸰孔鸾……；其下，则有白虎玄豹……

赋家在以时空编织经纬的基础上，又充分发挥想象，驱使万物，以求得物象描绘的繁富之美。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葛洪《西京杂记》卷二）

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西京杂记》）

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此也。至模山范水，犹其末事。

司马长卿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成公绥《天地赋序》云："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意与长卿宛合。

赋家之心，其小无内，其大无垠，故能随其所值，赋象班形，所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赋以象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

赋之妙用，莫过于"设"字诀，看古作家无中生有处可见。（刘熙载《艺概·赋概》）

赋家尤重知识的积累，并用以对赋的宫商经纬，作苦心的编织。



扬子云攻于赋，王君大习兵器。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谚曰："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俗之门。"（桓谭《新论》）

余少时见扬子云之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而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弥日瘳。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纳）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同上）

传曰："不歌而诵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汉书·艺文志》）

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离骚》为主，《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若扬袍、戌削、飞襳、垂髾之类，命意宏博，措辞富丽，千汇万状，出有入无，气贯一篇，意归数语，此长卿所以大过人者也。（谢榛《四溟诗话》卷二）

赋与谱录不同。谱录惟取志物，而无情可言，无采可发，则如数他家之宝，无关己事。以赋体视之，孰为亲切且尊异耶？

赋欲纵横自在，系乎知类。太史公《屈原传》曰："举类迩而见义远。"《叙传》又曰："连类以争义。"司马相如《封禅书》曰："依类托寓。"枚乘《七发》曰："杂辞连类。"皇甫士安叙《三都赋》曰："触类而长之。"

赋兼才学。才，如《汉书·艺文志》论赋曰："感物造耑，材智深美。"《北史·魏收传》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学，如扬雄谓"能读赋千首，则善为之"。



以赋视诗，较若纷至沓来，气猛势恶。故才弱者往往能为诗，不能为赋。积学以广才，可不豫乎？（《艺概·赋概》）

因为上述前提，又兼赋家追求词采之美，散体赋之描绘事物，乃挟四时、超方域、统万物、集大成、穷形尽相、辞藻赡丽，从而完成了它图案化倾向的艺术特征。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杂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文心雕龙·诠赋》）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同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东京之比目，而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不验，穷饰则饰尤未穷矣！（《文心雕龙·夸饰》）

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桔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左思《三都赋序》）

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挚虞《文章流别论》）（按：以上所引，虽大都为批评性意见，却可以见出赋的图案化倾向及艺术构思特征。）

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

戴安遂画《南都赋》，范宣叹为有益。知画中有赋，即可知赋中宜有画矣。（《艺概·赋概》）

……松友（孙梅）上溯选《骚》，下迄宋元，荟捐百家，标举一是，其言曰："用辞不如用笔，用笔不如用意。"匪第为俪体说法，凡抽思弄翰者，悉受范焉。窃尝譬诸画师界画，分刌必工；书家真楷，九宫为最。以视解衣槃礴，龙跳虎卧，难易不分，工力相亚。倘必强作轩轾，斯伪也已。（孙梅《四六丛话》秦潮跋）

（三）散体赋的类型化倾向

赋家描绘事物，往往给对象以双重的理想化，即对象的理想化和艺术表现的理想化。前者是赋家用自以为完美的类型概括他对对象的认识；后者是赋家力图给这个类型以尽可能完美的形式。散体赋描绘的类型化，由是而产生。如枚乘《七发》、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之描写音乐，皆形成一种类型：

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溯波，



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朝则鹂黄鳱鴠鸣焉；暮则羁雌迷鸟宿焉。独鹄晨号乎其上；鹍鸡哀鸣翔乎其下。于是背秋涉冬，使琴挚斫斩以为琴，野茧之丝以为弦，孤子之钩以为隐，九寡之珥以为约。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蝼蚁闻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七发》)

原乎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徒观其旁山侧兮，则岖嵚岿崎……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风萧萧而径其末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于是般匠施巧，夔妃准法……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洞箫赋》)

惟籦笼之奇生兮，于终南之阴崖。托九成之孤岑兮，临万仞之石磎……是以间介无蹊，人迹罕到。猿蜼昼吟，鼯鼠夜叫……若絙瑟促柱，号钟高调。于是放臣逐子，弃妻离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泣血泫流，交横而下……(《长笛赋》)

又如汉人宫室、都城赋之描绘建筑之高峻，亦皆形成类型：

回天门而凤举，蹑黄帝之明庭。……封峦之为东序，缘石阙之天梯……(刘歆《甘泉宫赋》)

雷郁律于岩突兮，电倏忽于墙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长途而下颠……(扬雄《甘泉赋》)



锼螭龙以造牖，采云气以为楣。神星罗于题鄂，虹霓往往而绕榱……(王褒《甘泉宫颂》)

神明郁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跻。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回带于棼楣。虽轻迅与僄狡，犹愕眙而不能阶。攀井干而未半，目眴转而意迷。舍棂槛而欲倚，若颠坠而复稽。魂怳怳以失度，巡回途而下低……(班固《西都赋》)

神明郁起特起，井干叠而百增。……上飞闼而仰眺，正睹瑶光与玉绳。将乍飞而未半，怵悼栗而怂兢。非都庐之轻趫，孰能超而究升……(张衡《西京赋》)

双重的理想化而外，散体赋的类型化，又源于赋家在题材与手法上的层层相因，递相模仿。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术也。(《文心雕龙·通变》)

古之圣贤，或相祖述，或相师友。生乎同时，则见而师之；生乎异时，则闻而师之。……班孟坚作《二京赋》拟《上林》、《子虚》；左太冲作《三都赋》拟《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辩》；枚乘作《七发》，而曹子建述《七启》……虽华藻随时，而体律相仿。(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

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二京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皆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洪迈《容斋诗话》卷二)

孟坚之《两都》，张平子之《两京》及《南都赋》，皆原本《子虚》、《上林》加以充拓，涵皇伟丽，为一代巨制。又，杜笃……有《论都赋》一首，源渊扬、马，亦见采于范史。(孙奎《春晖园赋苑卮言》)

汉赋的类型化，亦见于俳谐之赋与骚体的贤人失志之赋。足见这一文学现象的形成，与汉代经学重传统家法、汉文人因政治与思想专制而丧失其创造精神很有关系。



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容斋随笔》卷七)

自原之后，作者继起，而宋玉、贾生、相如、扬雄为之冠，然较其实，则宋、马辞有余而理不足，长于颂美而短于规过；雄乃专为偷生苟免之计，既与原异趣矣，其文又以摹拟掇拾之故，斧凿呈露，脉理断续，其视宋、马，犹不逮也。独贾太傅以卓然命世英杰之材，俯就骚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时诸人所及。(《楚辞辨证》下)

尝怪两汉间所作骚文，初未尝有新语，直是句句规模屈、宋，但换字不同耳。（叶少蕴《石林诗话》卷下）

（四）散体赋的语言风格

用字造语的怪异重沓，同偏旁字的联绵堆砌，具体名词的连续排列，乃是散体赋一望而知的语言特征。

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肬，实侈于形。二意重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肬赘也。（《文心雕龙·熔裁》）

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曹摅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讻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况乃过此，其可观乎！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文心雕龙·练字》）（按：刘勰所论，是从大量的文学实践总结出来的。而汉人的散体赋，乃是上述弊病最典型的代表。故《熔裁》、《练字》虽不专为辞赋，但辞赋的用字造语，却可以肯定是刘勰重点批评的对象之一。）

自楚辞已多用连绵字及双字，长卿赋用之尤多。至子云好奇字，人每载酒从问焉。故赋中全喜用奇字，十句而八九矣。厥后《灵光》、《江》、《海》等赋，旁搜遍索，皆以用此等字以赋体，读者苦之。（祝尧《古赋辨体》卷四）

诗赋各有体制，两汉赋多使难字，堆垛联绵，意思重叠，不害于大义也。（《四溟诗话》卷四）



汉人批评辞赋，只在赋的辞采与事义之间，前者淹没了后者。足见汉人对赋的用字造语，持肯定的态度；赋的语言风格，是符合汉人的美学趣味的。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惟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按：扬雄以"淫"、"则"析赋为二类，却承认"丽"当是共有的特征。）

广陵陈子回、颜子方，尚书郎班固、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

(《论衡·案书》)

散体赋语言风格的形成原因：

其一，汉人辞赋，祖述楚辞。但因着意模仿，不免推向极至。故其辞采之繁复，远非《楚辞》可比。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文心雕龙·辨骚》)

汉之赋颂，影写楚世……楚、汉侈而艳。(《文心雕龙·通变》)

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文心雕龙·物色》)

其二，汉赋之好用古文奇字，与汉代文字学的发展以及汉人在文字运用方面的复古心理亦很有关系。

汉代官方规定以“六体”教育学生，选拔、考课官吏，古文奇字，遂为士人所看重；汉代经学的古、今文之争，又使士人在说字解经之时，竞相标榜自己最得经文本义，这种攀附往古的作风，也加剧了文化复古的风气。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实情，雷同相从，随声是非……(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



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艺文志·六艺略》）

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艺文志·六艺略》颜师古注引）

（汉兴，以"六体"课吏），"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艺文志·六艺略》）

汉代赋家大都是文字学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扬雄作《训纂》、《方言》，班固为《苍颉训纂篇》作续篇，其余赋家，小学功底亦颇深厚。

（张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著《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又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后汉书·张衡列传》）



（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后汉书·马融传》）

（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所著诗、赋……《篆势》……凡百四篇，传于世。（《后汉书·蔡邕列传》）

洎乎贾生、枚叔，并誉汉初；相如、子云，联镳西蜀。中兴以后，文雅尤多。孟坚、季长之伦，平子、敬通之辈，综两京文赋之家，莫不洞穴经史，

钻研六书，耀采胜文，骈音丽字，故雕虫绣帨，拟经者虽致脩涂，月露风云，变本者妄执笑柄者。(《四六丛话》阮元序)

汉赋的复古倾向除了表现在古字的运用方面，还表现在忽视类概念的运用，而对具体名词的罗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如《上林赋》之言天子苑囿物产之富：

于是乎蛟龙赤螭，鰸鰽渐离。鰅鳙鰬魠，禺禺魼鳎。揵鳍掉尾……鸿鹔鹄鸨，驾鹅鸀玛。䴔䴖旋目，烦鹜庸渠，鸃鴜鸡卢，群浮乎其上。……于是乎卢桔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桃，隐乎薁棣，榙㭮荔支，罗乎后宫……

又如张衡《南都赋》：

其竹则籦、笼、篁、篾、篠、簳、箛、箠……

其三，辞赋又具有口诵的性质，因而必须以声音的美感直接契合或激发听众的感官印象和情感体验。对此，汉代赋家有较为自觉的追求。

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泽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清辞丽曲，时发乎篇，无芜音累气，固亦多矣。(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沈约《答陆厥书》)(按：沈约认为汉代赋家虽未通声律，但仍能凭借直觉，运用汉语的自然声韵，创造出赋的语言美感。观司马相如以宫商为赋家之迹，此说是。)



第四节　汉末赋的抒情化与小品化

东汉中叶以后，汉王朝急剧走向没落，以颂扬帝国富强、声威为主的散体大赋失去其存在的现实基础。这时的文人，目睹社会黑暗，传统的道德信念动摇；又因政治迫害加剧，文人的忧惧、愤懑与日俱增，抒情文学开始复甦，辞赋亦随之走上抒情化的道路。

赋家的诗人化与赋的诗化，是赋风转变的又一重要原因。汉末赋家，大多兼具诗人的身份，他们写作辞赋，不仅注意吸取与融合诗的语言艺术、诗的意境创造，而且更注重开掘和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辞赋在功能上趋向于诗歌，最终完成了向抒情化和小品化方面的转化。

汉末抒情赋的代表作家是张衡、蔡邕和赵壹等人。

一　张　衡

在和帝的时代，社会虽表面稳定，政治却每况愈下，张衡的《二京赋》，乃为汉代都城大赋的绝响。张衡作于顺帝之世的《归田赋》，则标志着辞赋抒情化和小品化时代的到来。《归田赋》师法庄老，皈依自然，兼具诗艺与诗境，在汉代辞赋发展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尘埃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鰡。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归田赋》)

《归田赋》者，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作此赋。(《文选》李善注)
衡苦于时政，故以此辞自解。(《五臣注选》吕向注)

《归田赋》之兼具诗艺、诗境，可从嵇康诗化用赋句反证之。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其二)

张衡《髑髅赋》则是一篇以寓言的形式，发挥玄言的作品。其文脱胎于《庄子·至乐》，虽为代言之作，实则包藏有作者对人生沉重的哀痛。

张平子将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倾见髑髅，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负玄霜。平子怅然而问之曰："子将并粮推命，以夭逝乎？本丧此土？流迁来乎？为是上智？为是下愚？为是女人？为是丈夫？"……答曰："吾，宋人也，姓庄名周。游心方外，不能自修。寿命终极，来此玄幽。公子何以问之？"对曰："我欲告之于五岳，祷之于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肢……"髑髅曰："公子之言殊难也。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况我已化，与道逍遥。离朱不能见，子野不能听；尧舜不能赏，桀纣不能刑……合体自然，无情无欲。澄之不清，浑之不浊。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于是言卒响绝，神光除灭……(《髑髅赋》)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因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庄子·至乐》)



二　蔡　邕

蔡邕(132—192)，汉末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少博学，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建宁三年(170)，辟司徒桥玄府，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复迁议郎。熹平六年(175)，上封事陈政要七事，遭诬陷

流放朔方。赦还，又因权贵迫害，亡命江湖十二年。中平六年(189)，董卓擅权，邕不得已为侍御史，官至左中郎将，封高阳侯。初平三年（192），董卓被诛，牵连蔡邕。邕自求黥首刖足，以余年完成《后汉记》，因司徒王允畏惧史家之笔，竟死狱中。（蔡邕事迹，见《后汉书·蔡邕列传》）

蔡邕所著诗赋甚多，然多散失。后人补辑赋十五篇，大抵为述怀、刺世、吊古、言情、咏物、俳谐之作，在汉代赋家之中，题材最为广泛。今存完整者有《述行赋》、《青衣赋》、《短人赋》和《释诲》四篇。

蔡邕《述行赋》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具体的人和事，这在以前的辞赋之中，是概不多见的。

延熹二年（159）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托所过，述而成赋。（《述行赋序》）（按：本赋《水经·济水注》引作《述征赋》。）

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入。（《述行赋》）



蔡邕，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那些“穷变巧于台榭兮……下糠秕而无粒”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鲁迅《题未定草》）

蔡邕《释诲》，体制规仿《答客难》，然其抒写怀抱，亦有新的时代特点。

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感东方《客难》及扬雄、班固、崔骃之徒，设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韪其

是而矫其非，作《释海》以戒厉云尔。(《后汉书·蔡邕列传》)

夫世臣、门子、势御之族，天隆其祜，主丰其禄。抱膺从容，爵位自从，摄须理髯，馀官委贵。其取进也，顺倾转圆，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释海》)（按：赋中所云豪族政治的特点，乃是此前所无，而汉末所有的。）

蔡邕《释海》，体奥而文炳。(《文心雕龙·杂文》)

按《字书》云："释，解也。"文既有解，又复有释，则释者，解之别名也。盖自蔡邕作《释海》，而郤正《释讥》、皇甫谧《释劝》、束皙《玄居释》，相继有作，然其旨不过递相祖述而已。(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蔡邕又有《青衣赋》、《协和婚赋》、《静情赋》(后两赋已残)，对汉人罕言的性爱，作了大胆的表露。与秦嘉《赠妇诗》、《述昏诗》相参证，可见汉末文人的心性、文学的题材，已有很大的变化。

金生沙砾，珠出蚌泥；叹兹窈窕，产于卑微。……世之鲜希，宜作夫人，为众女师。伊何尔命，在此贱微？……虽得嬿婉，舒写情怀。寒雪翩翩，充庭盈阶。兼裳累镇，展转倒颓。吻昕将曙，鸡鸣相催。饬驾趣严，将舍尔乘。矇冒矇冒，思不可排。停停沟侧，噭噭青衣。我思远逝，尔思来追。明月昭昭，当我户扉。条风狎猎，吹予床帷。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惄焉且饥。(《青衣赋》)（按：与蔡邕同时者张超，以卫道面目作《诮青衣赋》，既讥蔡邕"志卑意微"，"何德之衰"，又称"历观古今，祸福之阶，多蘖妾淫妻"，"三代之季，皆由斯起。"可参看。）



因文风转变，汉末辞赋既尚骈俪，又多用典。蔡邕的赋作，是很有代表性的。

三　赵　壹

赵壹（生卒年不详），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人。桓、灵之世名士、辞赋家。为人耿直、狂放。光和元年（178）举郡上计到京师，名动一时。后西归，公府十辟皆不就。终于家。所著赋、颂等凡十六篇。生平见《后汉书·文苑传》。

赵壹为乡党所摈，乃傍《答客难》、《解嘲》作《解摈》，其文已残。又因季世陵替，党祸四起，正直之士，动辄得咎，乃作《穷鸟赋》，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壹）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后屡抵死罪，几至死，友人得救免。壹乃贻书谢恩曰："昔原大夫赎桑下绝气，传称其仁；秦越人还虢太子结脉，世著其神。设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则结绝之气竭矣。……今所赖者……乃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使干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允所谓遭仁遇神，真所宜传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窃为《穷鸟赋》一篇。（《后汉书·文苑传》）

有一穷鸟，戢翼原野。罼网加上，机阱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幸赖大贤，我矜我怜。昔济我南，今振我西。鸟也虽顽，犹识密恩。内以书心，外用告天。……（《穷鸟赋》）

赵壹又作《刺世疾邪赋》，对历代君王以天下为私、斗争杀伐的历史，汉末豪门霸权、人妖颠倒、世风堕落的现实，皆作了无情的揭露。对汉末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亦有严重的警告。全文不事雕琢，词气峻急，其思想和艺术都已超过了以往的贤人失志之作，而更接近于"诗人的愤怒"，在整个汉赋之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文心雕龙·才略》）（按：赵壹赋的"体疏"，不同于前人赋作的"词密"，此正是汉末抒情赋的新变。）

后汉赵元叔《穷鸟赋》及《刺世疾邪赋》，读之知为抗脏之士，惟径直露骨，未能如屈、贾之味余味外文耳。（《艺概·赋概》）（按：刘氏所论，正是赵壹赋有别于贤人失志之赋的新特点）。

《刺世疾邪赋》后附秦客、鲁生五言唱和诗二首，亦为汉末文人诗佳作。

元叔散愤兰蕙，指斥囊钱。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钟嵘《诗品》卷下）

第六章

汉代诗歌

第一节　汉代乐府民歌

一　关于乐府

（一）乐府机构的设置与沿革

秦设乐府，官属少府；所制之乐，供郊庙朝会用。



少府，秦官……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乐府、若卢……（《汉书·百官公卿表》）

（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舞人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舞不失节，能以乐终也。大氐皆因秦旧事焉。（《汉书·礼乐志》）

汉初设乐府令，掌宗庙祭祀之乐。

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太乐官。……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步行之节，犹

古《采齐》、《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筦弦乱人声，欲在位者徧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作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汉书·礼乐志》)

汉武帝时，乐府造作雅乐而外，兼采各方诗乐，以观政教，娱声色。自此，乐府八方诗乐荟萃，雅乐俗乐并存。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

至成帝时……（平）当以为“汉承秦灭道之后，赖先帝圣德，博受兼听，修废官，立大学，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春秋乡射，作于学官，希阔不讲，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鎗，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亡由。是以行之百有余年，德化至今未成。……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修起旧文，放郑近雅。……”(《汉书·礼乐志》)

《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各方乐歌如下：



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
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
邯郸河间歌诗四篇。
齐郑歌诗四篇。
淮南歌诗四篇。
左冯翊秦歌诗三篇。
京兆尹秦歌诗五篇。
河东蒲反歌诗一篇。
雒阳歌诗四篇。
河南周歌诗七篇。
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
周谣歌诗七十五篇。
周歌诗二篇。

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

南郡歌诗五篇。

（按：王先谦《汉书补注》："声曲折即歌声之谱，唐曰乐句，今曰板眼。"）

（二）乐府概念的衍变

乐府由音乐机构名称，衍变为诗歌名称，始于六朝。至建安，有古题乐府；至唐，又有新题乐府。

徐陵《玉台新咏》目录：古乐府诗六首

乐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监，有游徼。……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焉。（顾炎武《日知录》）

乐府之名，起于汉、魏。自孝惠帝时，夏侯宽为乐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则采歌谣，被声乐，其来盖亦远矣。凡乐府歌辞，有因声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调歌诗，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声音，若清商、吴声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是也。有有声有辞者，若郊庙、相和、铙歌、横吹曲是也。有有辞无声者，若后人之所述作，未必尽被于金石是也。新东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曰新乐也。元微之病后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谓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近代唯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乃与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更拟古题。因刘猛、李余赋乐府诗，咸有新意，乃作《出门》等行十余篇。其中虽用古题，全无古义，则《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辞，则《田家》止述军轮，《捉捕》请先蝼蚁。如此之类，皆名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序）



（三）乐府诗的分类

汉人仅为乐府诗歌中的庙堂诗歌分类，于民间诗歌未予重视。

蔡邕论叙汉乐曰："一曰郊庙神灵，二曰天子享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曰短箫铙歌。（《宋书·乐志》）

隋王僧虔《伎录》、智匠《古今乐录》尝为乐府诗分类，今已不可得见。唐吴竞《乐府古题要解》分乐府为八类：相和歌；拂舞歌；白纻歌；铙歌；横吹曲；清商曲；杂题；琴曲。于《相和歌》等民歌的价值已有一定的认识。

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乃分乐府为八类：……以兹八类，较彼四品，其相同者，惟“铙歌”一项，其余吴氏并黜不载。又相和歌本汉乐府之精英，而汉人不自知爱惜，四品不收，自沈约录入《宋书·乐志》，始大显于世，吴氏因首列之，则知唐人之于乐府，已知趋重于文学价值方面也。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一编第三章《乐府之界说与分类》)

郑樵《通志·乐略》以古今乐府分为正声、别声、遗声，其下分属五十三小类，不独繁琐，亦有欠精当。惟郭茂倩《乐府诗集》分乐府为十二大类，较为合理。后之学者研究乐府诗歌，大都依从此种分类方法。

《乐府诗集》编集了从不尽可靠的陶唐氏之作，一直到五代，分为十二类：

一，郊庙歌辞　是祭祀用的，祀天地、太庙、明堂、藉田、社稷。

二，燕射歌辞　是宴会用的，以饮食之礼亲宗族，以宾射之礼亲故旧，以飨宴之礼亲四方宾客，是辟雍飨射所用。



三，鼓吹曲辞　是用短箫铙鼓的军乐。

四，横吹曲辞　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

五，相和歌辞　是用丝竹相和，都是汉时的街陌讴谣。

六，清商曲辞　源出于相和三调（平调、清调、瑟调），皆古调及魏曹操、曹丕、曹叡所作。

七，舞曲歌辞　分雅舞、杂舞。雅舞用于郊庙、朝飨，杂舞用于宴会。

八，琴曲歌辞　有五曲、九引、十二操。

九，杂曲歌辞　杂曲的内容，有写心志，抒情思，叙宴游，发怨愤，言征战行役，或缘于佛老，或出于夷虏。并收并载，故称杂曲。

十，近代辞曲　也是杂曲，因是隋唐的杂曲，故称近代。

十一，杂歌谣辞　是徒歌、谣、谶、谚语。

十二，新乐府辞　是唐代新歌，辞拟乐府而未配乐，或寓意古题，刺美人事，或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这十二类的分法，在当时是比较概括而不繁琐的。……是适应于乐府诗的时代变化来的。它不像郑樵的《通志·乐略》把乐府诗分为五十二类那样的繁琐。

这十二类的分法，也有可商处。如舞曲，分雅舞、杂舞，雅舞用之郊庙、朝飨，杂舞用之宴会，即已经包括在郊庙、燕射中了。再像鞞、铎、巾、拂等舞曲，都包括在清商曲内。那么舞曲就不必另立一类了。再像琴曲，本书中所收的唐尧《神人畅》、虞舜《思亲操》等都不可信。当时一部分琴曲亦属清乐，故琴曲曲调常与相和相通"（见王运熙《乐府诗论丛》第十九页——原注）。那么琴曲似可分属相和、清商等类……本书里收了合乐的和不合乐的乐府诗，不合乐的像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前者是接近民歌，后者是模拟乐府而作，把这两部分收进去是好的。但在合乐的部分收得不免稍滥，……又本集中疑有误收的诗……又它的杂歌谣辞，收录徒歌、谣谶、谚语，其中"有些是伪托的古歌，有些是和'诗'相距很远的谶辞和谚语。另一方面，有些有意思的歌谣又缺而不载。其采录标准是有问题的"。（见余冠英《乐府诗选·前言》——原注）……

本集在分类编选上虽有可商处，但还是最完备的乐府诗集，保存了极丰富的乐府诗。其中"以《相和》、《杂曲》为菁华。主要部分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同上——原注）……至于《新乐府辞》，像"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白居易所作"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以贻后世之审音者。"郭茂倩把这部分不入乐的新乐府选入本书，更能见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

由于本书的编例，把乐府古辞列在前面，文人的拟作列在后面，正好供我们研究，刚健、清新的民间文学，怎样使文人吃惊，纷纷拟作。文人又怎样把它吸收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来发展诗歌创作的。……（《乐府诗集》中华书局编辑部《出版说明》）



汉代乐府诗歌保存在《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八类之中。其中，汉代乐府民歌及汉代歌谣又主要保存在《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

之中。

1. 鼓吹曲辞

鼓吹曲，一曰短箫铙歌。刘瓛《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骚人曰'鸣篪吹竽'是也。"蔡邕《礼乐志》曰："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郑康成云："兵乐曰'恺'，献功之乐也。"（《乐府诗集》卷一六《汉铙歌》解题）

按《汉志》言汉乐有四，其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则鼓吹与铙歌，自是二乐，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盖短箫铙歌，而俱以为军乐，则似汉人已合而为一。但短箫铙歌，汉有其乐章，魏、晋以来因之，大概皆叙述颂美时主之功德；而鼓吹则魏、晋以来，以给赐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门督将皆有之，且以为葬仪。盖《铙歌》上同乎国家之雅颂，而鼓吹下侪于臣下之卤簿，非唯所用尊卑悬绝，而俱不以为军中之乐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四七《乐考》二十《鼓吹》）

至马端临《文献通考》，则更疑《鼓吹》与《铙歌》根本即为二乐……不知所谓《鼓吹》者，其在西汉盖即《短箫铙歌》，原本"合而为一"。惟至武帝时复有《横吹》之输入，而《鼓吹》本身又以当时贵族嗜好之狂热（详下），施用不一，已不尽为军乐，因而性质与内容发生分化作用，故至东汉明帝时遂分为二品，而有所谓《黄门鼓吹》。于是本为《鼓吹》之《短箫铙歌》乃反由主体变为附庸，即崔豹所云"《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耳"是也。原由合而分为二，非由二而合为一也。……



欲知《铙歌》内容之所以庞杂，当先明《铙歌》在汉时施用之情况。……《铙歌》既为一种新兴之胡曲，故汉时特见风行，凡属于人之事者，殆莫不用焉。旧云军乐，实不尽然，或从其始而言之也。……《铙歌》之施用，既如此其广泛，则其内容自难求其一致，亦正不必如求其一致也。……自今观之，则此种庞杂之现象，不独不足为汉《铙歌》病，且适为汉《铙歌》之特色焉。

是故由其所用之人而论，《铙歌》犹之《安世》、《郊祀》二歌，非贵族不得擅用。而由其文字本身言，则多近于风谣杂曲，所谓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二编第二章《汉初贵族乐府》）

2. 相和歌辞

《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合，执节者歌。本一

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刘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其后晋荀勖又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歌诗》，即沈约所谓"因丝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书·乐志》曰："《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生于《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晋书·乐志》曰："凡乐章古辞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乐府诗集》卷二六，《相和歌辞》解题)

《乐府诗集》列《相和歌辞》一类，其中"古辞"，即为汉世民间之作。所谓"相和"者，《宋书·乐志》云："……"《古今乐录》云："凡《相和》有笙、笛、节、鼓、琴、琵琶七种。"按《汉书·礼乐志》："初，高帝过沛，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此"相和"二字之始见者。志又云："武帝定郊祀礼，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又《宋书·乐志》："《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据此，则汉世祖和歌法亦有两种：一为一人独唱，即所谓"执节者歌"，一则多人合唱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二编第三章《两汉民间乐府》)

3. 杂曲歌辞

《宋书·乐志》曰："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然后被于声，于是有采诗之官。周室下衰，官失其职。汉、魏之世，歌咏杂兴，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义之余也。至其协声律，播金石，而总谓之曲。若夫均奏之高下，音节之缓急，文辞之多少，则系乎作者才思之浅深，与风俗之薄厚。当是时，如司马相如、曹植之徒，所为文章，深厚尔雅，犹有古之遗风焉。……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载，故总谓之杂曲。自秦、汉已来，数千百岁，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干戈之后，丧乱之余，亡失既多，声辞不具，故有名存义亡，不见所起，则若《伤歌行》、《生别离》、《长相思》、《枣下何纂纂》之类是也。复有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拟述，可以概见其义者。(《乐府诗集》卷六一《杂曲歌辞一》解题)



《相和歌辞》外，《杂曲》中亦有民间之作，综计约三十余篇，当为汉乐府精英，以其价值不仅在文学，且足补史传之阙文，而使吾人灼见当日社会各方之状况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二编第三章《两汉民间乐府》)

4. 杂歌谣辞

《宋书·乐志》曰："……《尔雅》曰：'徒歌谓之谣。'"《广雅》曰："声比于琴瑟曰歌。"《韩诗章句》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梁元帝《纂要》曰："齐歌曰讴，吴歌曰歈，楚歌曰艳，浮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凯歌，堂上奏乐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故歌曲有《阳陵》、《白露》、《朝日》、《鱼丽》、《白水》、《白雪》、《江南》、《阳春》、《淮南》、《驾辩》、《渌水》、《阳阿》、《采菱》、《下里巴人》，又有长歌、短歌、雅歌、缓歌、浩歌、放歌、怨歌、劳歌等行。汉世有相和歌，本出于街陌讴谣。而吴歌杂曲，始亦徒歌，复有但歌四曲，亦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郸歌》之类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类是也；有伤时而作者，微子《麦秀歌》之类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张衡《同声歌》之类是也。……历世以来，歌讴杂出，今并采录，且以谣谶系其末云。"(《乐府诗集》卷八三《杂歌谣辞》解题)(按：《乐府诗集》卷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七、八十八录《史记》、《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所载帝王、宗室、外戚、公主等歌诗及各地民谣、童谣等六十余首。)

二　乐府民歌的内容

(一) 乐府民歌的内容

古代采诗献诗，为统治者观风察俗、考核吏治、施行教化的一种重要手段。继西周采诗制度之后，汉代更成立专门的乐府机构，其采诗的目的更为自觉。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

(韩延寿)……迁淮阳太守，治甚有名，徙颍川。颍川多豪强，难治。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明，

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消除怨咎之路。(《汉书·韩延寿传》)(按：颜师古云："谣俗谓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也。")

(谷)永对曰："臣愿陛下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德，存恤孤寡，问民所劳苦。"(《汉书·谷永传》)(按：所谓"循行风俗"，即古者"听于民谣"之意。)

初，光武起于民间，颇达情伪。……广求民瘼，观讷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深刻，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列传》)

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李贤注云："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后汉书·刘陶列传》)

正因如此，两汉乐府所采之诗，多叙事而兼抒情的作品，而少有纯粹的抒情之作。

问："乐府五、七言与五、七言古何以分别？……"萧亭答："乐府之异于诗者，往往叙事。诗贵温裕纯雅，乐府贵遒深劲绝，又其不同也。……"(《师友诗传录》)

汉人歌谣之采入乐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罗敷行》之类，多言当时事。(吴乔《围炉诗话》卷一)



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国力日渐空虚。其后，边患频仍，战争不绝。繁重的兵役、徭役负担转嫁给人民，使社会生产与人民正常生活遭到极大的破坏。控诉战争罪恶、抒写行役之苦，遂成为两汉乐府的一大主题。

《东光》，因汉武有事西南夷，动众劳民，文、景之富，一朝顿匮，故托古人讽谏意而作也。诸家聚讼，迄无一是。(《雨村诗话》卷上)

凡诗有有题者，有无题者。有题是诗之正面，无题是诗之反面。如乐府《陇西行》，何篇中无陇西之意？为尊者讳也。立是名，补诗之不足也。"陇西"二字是题正面，全诗都是反射旁击。汉武有事于西南，穷兵黩武，陇西男子，无不荷戈从戎，巨室细民莫敢匿。故篇中备言妇人待客，委婉尽礼，

以见家中无男子也。言豪富者何无男子，贫穷者岂容燕息乎？大劳苦疆场，必餐风宿露，今反写欢乐，其劳苦却在言外，使后人于无字处默会也。写陇西以反衬天下，写豪富反衬贫苦，写妇人反衬男子，写闺门反衬边庭，可悟作文之法。(《雨村诗话》卷上)

《战城南》。右其词大略言“战城南，死北郭”，野死不得葬，为乌鸟所食，愿为忠臣，朝出攻战而暮不得归也。(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

《古今乐录》曰：“《紫骝马》古辞云：‘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盖从军久戍，怀归而作也。”(《乐府诗集》卷二四)

此篇（按，指《十五从军征》）在汉虽为古诗，而在晋、宋则尝播于乐府……范大士曰：“后代离乱诗，但能祖述而已，未有能过此者。”(按汉制：民年二十三为正卒，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五十六岁免兵役。核之此诗，特欺人耳。按沈约《宋书·自序》：“伏见西府士兵，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唐令狐楚《塞下曲》亦有“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之句，又知不独汉代为然也。——原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二编第三章)

《艳歌行》。右古词：“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言燕尚冬藏夏来，兄弟乃流宕在他县，主人妇为绽衣服，其夫见而疑。(《乐府古题要解》卷下)

《艳歌何尝行》(亦曰《飞鹤行》——原注)。右古词：“飞来双白鹤，乃从西北来。”言雌病，雄不能负之而去，“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虽遇新相知，终伤生别离也。(同上，卷上)



《悲歌》。朱秬堂曰：“或邦国丧乱，流寓他乡；或负罪离忧，窜身绝域，故词极悽楚，而无可怨恨，李陵似之。(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一四引)

剥削与压迫，使人民生活陷于困顿，家庭濒于崩溃，人伦之情亦颇受冲击。汉乐府诗歌不仅抒发人民的悲苦之音，对人民铤而走险的反抗，亦时有表现。

《东门行》有两篇，一为晋乐所奏，即所谓“古词”（文字颇有增改——原注），一为汉乐府原作，即所谓“本词”（“本词”之名，首见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因之——原注），此处所录，乃未经晋乐修改之“本词”。不曰携剑、带剑，而曰“拔剑”，其人其事，皆可想见。饥寒切身，举家待毙，忍无可忍，故铤而走险耳。(《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

二编第三章）

《东门行》。右古词云："出东门，不顾归。"言士有贫不安其居者，拔剑将去，妻子牵衣留之，愿共铺糜，不求富贵。（《乐府古题要解》卷上）

朱止豁曰："《孤儿行》，闵俗也。《汉志》：民自二十以上，上所长也；六十以下，上所养也。汉治诚为近古哉！'诗可以观'，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失。后代陈诗，仅献其歌颂，则疾痛之声不闻，上何由知政之得失乎？"（《汉魏乐府风笺》卷四引）

这是一篇血泪文字。它写的是一个孤儿的遭遇，也反映了当时奴婢的生活。它提出的问题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余冠英《乐府诗选》注评）

诗中（按：指《妇病行》）并无一语及后母，使人想见于言外。末句悲极愤极，与《上留田》"慷慨不可止"一意。读《饮马长城窟行》，则夫妻不相保矣；读《妇病行》，则父子不相保矣。读《上留田》、《孤儿行》，则兄弟不相保矣。"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俗吏知钱谷簿书，至于情义乖离，风俗颓坏，乃恬不知怪，可痛也夫！（《汉魏乐府风笺》卷四引朱乾《乐府正义》语）

这诗（按：指《平陵东》）写官吏贪暴。有人拿王莽时翟方进的事附合这篇诗（翟义事见《汉书·翟方进传》——原注），与诗意不合。（《乐府诗选》注评）

崔豹《古今注》："《平陵东》，汉翟义门人所作也。"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义，丞相方进之少子，字文仲，为东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汉，举兵诛之。不克，见害。门人作歌以悲之也。"（按，翟义事详《汉书·翟方进传》——原注。）前人一般都根据崔、吴的说法来解释此诗，实与诗意不合。从诗意看，本篇系控诉官吏压榨良民，竟至用"绑票"的方式，使无辜的受害者破家荡产，反映了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汉代礼教防范森严，又实行"放郑近雅"的文化政策，更兼乐府采诗，旨在观政教得失，故民间的爱情诗篇，少有入选者。但就仅存的几首情诗，亦可见人民爱情生活、婚姻生活的一斑。

《有所思》，其辞大略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若齐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刘绘"别离安可再"，但言离思而已。（《乐府古题要解》卷上）

《上邪》与《有所思》当为一篇……叙男女相谓之言。（庄述祖《汉鼓吹

铙歌曲句解》)

《上邪》。此篇与《战城南》一样的明白易晓，内容是情诗。各家尚无附会。惟庄述祖(《汉鼓吹铙歌曲句解》——原注）的话较合理，"亦指天日以自明也，此男慰女之辞。"不过也许是女慰男呢。时代无可考。（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上册）

……就文学价值而论，十八曲（按："指铙歌十八曲"）中当以言情者为最佳。今举《上邪》为例……我们读了感到诗中表情异常热烈。再举《有所思》一段为例……爱便爱到极点，恨也恨到极点，这种真率而坚决的情调是极可贵的。

《箜篌引》。一曰《公无渡河》。崔豹《古今注》曰："《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声甚悽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

这（按：指《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辞，和最长的《孔雀东南飞》同是写夫妇殉情之作。(《乐府诗选》注评)

《宋书》"大曲"有《白头吟》，作"古辞"；《乐府诗集》、《太平御览》亦然。《玉台新咏》题作《皑如山上雪》，非但不作文君，并题亦不作《白头吟》也。惟《西京杂记》有文君为《白头吟》以自绝之说，然亦不著其辞；或文君自有别篇，不得遽以此诗当之也。(冯舒《诗纪匡谬》)

(《白头吟》)盖弃友逐妇之诗，非小星逮下之刺。"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忠厚之至也。"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慷慨之思也。勿以嫉妒诬风人焉。(陈沆《诗比兴笺》)



汉代歌谣，承《离骚》之后，故多奇语。……如班婕妤《团扇》，乐府也。(冯班《钝吟杂录》)

《婕妤怨》为汉成帝班婕妤作也。婕妤，徐令彪之姑，况之女，美而能文。初为帝所宠爱，后幸赵飞燕姊娣，冠于后宫。婕妤自知恩薄，惧得罪，求供养皇太后于长信宫，因为赋及《纨扇》诗以自伤。(《乐府古题要解》)

案《文选》李善注引《歌录》曰："《怨歌行》，古辞。"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拟之。(《汉魏乐府风笺》卷五)

此诗（按：指《怨歌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本篇为古辞，班婕妤别有拟作；一种是本篇为班婕妤作，原有古辞失传。按，《汉书外戚班婕妤传》言班为赵飞燕所谮，失宠居长信宫，作赋自伤；无"并为怨诗一首"之说。且《汉书》录班赋全文，如有怨诗，亦当并载。故近人一般认为本篇是乐府古辞

而非班作。但此诗以秋扇见捐喻封建社会中受人玩弄而终遭遗弃的妇女的命运，与班婕妤的身世不无吻合之处；六朝人的看法虽近比附，亦不为无因。(《西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第533页～534页)

这（按，指《伤歌行》）是写忧人不寐，似女子诗。《文选》、《乐府诗集》、《古乐府》都以这首诗为古辞，惟《玉台新咏》作魏明帝诗。(《乐府诗选》注评)

据王僧虔《技录》，清调有六曲：一苦寒行，二豫章行，三董逃行，四相逢狭路间行，五塘上行，六秋胡行。惟豫章、董逃、相逢狭路间为古辞；至"蒲生"（按：即《塘上行》）篇并无"塘上"字，知非塘上本辞。而或以为魏武帝作者；凡魏武乐府诗诸诗皆借题寓意，于己必有所为，而"蒲生"篇则但为弃妇之词，与魏武无当也，知其非魏武作矣。惟邺都故事称甄后赐死临终诗，近之。但其词气从容，不似临终所作，今定以为甄后之诗，盖古塘上行而甄后拟之为"蒲生"也。《歌录》云："《塘上行古辞》，必别有诗，而不可得矣。"(朱乾《乐府正义》)

从"蒲生我池中"到"弃捐菅与蒯"十八句，是弃妇之辞。后六句是人乐时拼凑，和上文不相连。这诗（按：指《塘上行》）作者，众说纷纷。《文选》李善注引《歌录》云："《塘上行》，古辞，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作古辞是。(《乐府诗选》注评)

（二）《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

《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中的双璧。前者嘲笑和鞭挞上层人物的荒淫与无耻，歌颂人民维护自己爱情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凛然正气，颇有喜剧的意味；后者产生于汉末社会动荡、礼教束缚松弛的时代，表现人民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由的叛逆精神和反抗的失败，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1.《陌上桑》的本事、时代和思想内容

《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乐府诗集》卷二八引崔豹《古今注》，今本《古今注》个别字句稍有出入。)

案其歌辞，称罗敷采桑陌上，为使君所邀，罗敷盛夸其夫为侍中郎以拒之，与旧说不同。(《乐府古题要解》卷上)

朱止谿曰："《陌上桑》歌'日出东南隅'，妇人以礼自防也。汉游女人情正，但令不可求而止；《陌上桑》之情亦正，惟言罗敷自有夫而止；皆正风也。"(《汉魏乐府风笺》卷一引)

费滋衡曰："'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起句便有容华映朝日之意。罗敷对使君之语只说夫婿，而自己之不可犯，使君之冒昧，更不必言。"(《汉魏乐府风笺》卷一引)

罗敷致词，截然严正。但二语已足，此诗意可便竟。然后解又极写一段，傲使君耳。……若非此夫婿几无以谢使君者然。(《采菽堂古诗选》)

桑田里的艳事也真闹得不少哩。请看《列女传》五载着一个故事：

洁妇者，鲁秋胡子妻也。既纳之五日，去而官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傍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若曝采桑，吾行道远，愿托桑荫下餐下赍休焉。"妇人采桑不辍。秋胡子谓曰："……吾有金，聊以与夫人。"妇人曰："嘻！……(按：原作者略)吾不愿金。所愿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佚之志。收子之赍与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使人唤妇至，乃向采桑者也。秋胡子惭。妇曰："……今也乃悦路傍妇人，下子之粮与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义！"……(按：原作省略)遂去而东走，投河而死。(《鲁秋洁妇传》)

……我们鄙薄秋胡的无聊，同时更敬佩这位夫人的节烈。再看同书八又载着一个故事：

辩女者，陈国采桑之女也。晋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过陈，遇采桑之女，止而戏之，曰："汝为我歌，我将舍汝。采桑女乃为之歌曰：……大夫曰："为我歌其二。"女曰："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则有，其鸮安在？"女曰："陈，小国也，摄乎大国之间，因之以饥饿，加之以师旅，其人且亡，而况鸮乎！"大夫乃服而释之。(《陈辩女传》)



……同书六更有一个故事：

宿瘤女者，齐东郭采桑之女，闵王之后也。——项有大瘤，故号曰"宿瘤"。闵王出游，至东郭，百姓尽观，宿瘤采桑如故。闵王怪之，召问曰：……封曰："妾受父母教采桑，不受教观大王。"王曰："此奇女也！"……命后乘载之……以为后。(《齐宿瘤女传》)……以上那些故事，不必是全真，也不必是全假。《陌上桑》的故事也不妨作如是观。他不过是我国民间故事的典型——一个农业社会里的民歌题材的典型罢了。

…………

《陌上桑》最早被著录于《宋书·乐志》，称为"古辞"。"古辞"古到什么

时候呢？……考《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篇有云："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据旧说，此诗作于建安末……那时秦罗敷已经变作民间美女子的典型了。故可断定《陌上桑》一曲必已流行于建安或建安以前。……我们再考一考《玉台新咏》辛延年的《羽林郎》云……据郭茂倩说，辛延年是后汉时人，不知其何所本。但就这诗的作风上看，似乎可靠。因为他也是模仿《陌上桑》的。……他们不但辞句和结构相类似，连韵脚都差不多。所以辛延年这篇《羽林郎》的蓝本，怕十有八九就是《陌上桑》了。

又按诗中所谓"霍家奴"者，是指霍光的家奴。黄晦闻先生《汉魏乐府风笺》十四引《汉书·霍光传》云："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躏入大夫门。"又引云："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又引云："使苍头奴上谒，莫敢谴者。"是霍氏诸奴明具《汉书》。又引朱秬堂说："案后汉和帝永元之年，以窦宪为大将军。窦氏兄弟骄纵，而执金吾景尤甚。奴客缇骑，强夺货财，篡取罪人，妻略妇女……此诗疑为窦景而作，盖托往事以讽今也。"朱氏这个推测是很近乎事实的。……所谓"将军"者，表面上是说霍光，实际上是暗指窦宪。那末《羽林郎》的作者辛延年可能是后汉和帝时人，而《羽林郎》一诗可能是和帝初年——永元四年以前所作；因为窦氏兄弟是永元四年伏诛的。《羽林郎》一诗的风格与辞句既然都是仿效《陌上桑》，那么《陌上桑》的时代至晚亦当在东汉之初，可能更早到西汉。

又按诗中有"使君"一语。考"使君"的名屡见于《后汉书》：《后汉书·寇恂传》载恂谓使者曰："非敢胁使君，窃伤计之不详也。"……又《郭伋传》载建武十一年，拜伋为并州牧。"……有儿童数百，于道次迎拜。伋问：'儿曹何由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光武初年，民间已有称使者及刺史为"使君"的，则使君的称呼或不限定起于此时。所以《陌上桑》的时代，的确可以断定他至晚在东汉初，或者竟早到西汉末……



如果我们不厌再加考索一下……按《汉书·武五子传》的《昌邑哀王髆传》载：昌邑王贺有妻名罗紨……"罗紨"即"罗敷"，"敷""紨"同声字。于此我们可以想到：前汉武昭之际，已经有女子取名为"罗敷"的，必定那时候罗敷的故事在民间流行得很普遍……

于此，倘若我们愿意指定《陌上桑》这首歌曲就是武帝立乐府时所采的民歌……大概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游国恩学术论文集·论陌上桑》)

《羽林郎》和《陌上桑》的主题十分相像，都写一个女子反抗强暴，不过读《羽林郎》诗所得印象似偏于激烈，读《陌上桑》诗，又觉得它很轻描淡写，斗争不很尖锐，其实两诗所表现的女主角，态度的坚决，措词的温婉而又严正，实完全相同，不过表现的技巧不同罢了。(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

说汉乐府诗《羽林郎》)

2.《孔雀东南飞》的产生、流传与定型

《孔雀东南飞》产生于建安末，以事实为基础创作而成。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玉台新咏》卷一《无名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序)

从诗前小序知道，诗里所叙的事就是汉末的事实，这诗大约就是当时的作品。(《乐府诗选》注评)

《孔雀东南飞》产生以后，长期以弹唱形式在民间流传。

问："《焦仲卿妻》在乐府中，又与余篇不同，何也?"答曰："意者此篇如董解元《西厢》，今之数落《山坡羊》，乃一人弹唱之词，无可考矣。"(吴乔《答万季埜诗问》)

(按：本诗叙事中常有插入语，如"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生人作死别，恨恨哪可论"；"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即今之所谓"抒情性旁白"，实弹唱者与听众的交流语言。于此可见本诗的流传，依赖于讲唱形式。)



《孔雀东南飞》自产生到徐陵辑入《玉台新咏》，流传逾三百年，其间颇留下历代民间诗人加工的痕迹。

此篇(按：指《孔雀东南飞》)首载《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入《杂曲歌词》——原注)……全篇浑朴自然，犹是汉魏风骨，惟以情事既奇，篇章复巨，而又历史久远，转相传写之间，失却几分本来面目……不足为异。且如"足下蹑丝履"，张为麒《孔雀东南飞年代祛疑》，以为丝履乃六朝时物，然观曹操《内诫令》："前于江陵得杂彩丝履……"则汉末建安中已自有之，不始六朝矣。又如"进退无颜仪"，《祛疑》谓"仪"字非用古韵，仪字由歌入支，始于魏文帝。按李尤《良弓铭》："弓矢之作，爰自曩时。不争之美，亦以辨仪。"又蔡邕《济北崔君夫人诔》："世表母仪，宪殒宪师。哀哀孝子，靡所瞻依。"则仪字由歌入支不始魏文矣。又如"小子无所畏"，"下官奉使命"，说者谓"小子""下官"为六朝时通用口

语，足见此诗不作于建安。按小子一词，经传屡见。有含自谦之意者，如《尚书·汤诰》："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为尊对卑之称者，如《论语》："小子何莫学夫诗"……亦有表贬斥之义者，如《诗·板》："老夫灌灌，小子蹻蹻！"……仲卿母于盛怒之下斥其子为"小子"，夫何足异？至于"下官"二字，最早见于《汉书·贾谊传》："君主斥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为君斥臣之词。然观《后汉书·循吏·任延传》："延拜武威太守，帝（光武——原注）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此所谓上下，即指上官下官，则已为群臣相对待之词，与诗意相近。考下之为言，本为先秦两汉以来之常语，故有所谓下国、下县、下妻（见《汉书·王莽传》，即《外戚列传》所谓"小妻"——原注），自谦则或曰下走、下才、下僚、此诗叙丞对太守而自称下官，亦情理之常。又如"新妇入青庐"，说者引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遂据以断此诗为作于六朝，不作于建安。按《杂俎·贬误》篇首引《聘北道记》云："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然则所谓北朝婚礼者，本为北方婚礼，段氏窜易原文，殊属非是。故闻人倓《古诗笺》虽引段氏《杂俎》，而仍据《聘北道记》作北方，不作北朝。《世说新语·假谲篇》："魏武少时尝与袁绍为好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则是在北朝以前，北方固早有青庐之制矣。又诗有"交广市鲑珍"，说者谓分交州置广州，始于孙权黄武五年（公元二二六年），足征其非汉作。按黄武五年上距建安，不过六年，为时甚近，与《序》云"时人为诗"之言，无甚不合，盖其事发生于汉末，而诗或作于汉末稍后……此其一。考元左克明《古乐府》（《四库全书》本）"交广"作"交用"，明梅鼎祚《古乐苑》、《汉魏诗乘》及冯惟讷《古诗纪》，并注"广"一作"用"，而谢榛《四溟诗话》引此句亦正作"交用市鲑珍"，是"广"字已非定谳。且事在仓卒，以速为贵，交广去庐江重洋万里，非咄嗟可办，按之情理及上下文义，皆不当尔。疑后人习闻交州为宝产之区，故不觉由"交语速装束"、"交钱百万两走马"之文，而联想及交州之交，又因交州想及广州，因而妄改，实不足据。此其二。是故吾人即撇开此诗之风格不论，第从以上诸名物观之，亦无一能证明此诗之非汉作也。又《史记·刺客列传》："家大人召使前击筑"，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古名男子为丈夫，尊父妪为大人。'故古诗云：'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是也。"如此诗为六朝作，司马贞肯称为古诗而引以注《史记》否？是亦足为考订此诗时代之一佐证矣。（本节所论，可参阅古直先生《汉诗辩证》，王越先生《孔雀东南飞年代考》——原注）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孔雀东南飞》一诗初见于梁徐陵编选的《玉台新咏》，诗中叙述故事很详细，却缺故事发生和写作的时间、主角的名姓等等，只见于序中。……

我一向认为这序不可靠，出于后人附益。不但序文如此，连这《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题目也是后来加上的。试问，做诗有自称"古诗"的么？既曰"古诗"，即是后人口气。……庐江府这地名和诗中叙述每多矛盾，这里也不想多谈。焦仲卿和其妻刘氏，在诗里完全不见。古代作品中有些无名氏，往往被后人添人姓名，如陶潜《桃花源记》的武陵人，便在《搜神后记》上说他姓黄名道真。焦仲卿大约也是这一类罢？至于女主角的名字原见于诗中，却不曾说她姓刘，……而且说她不姓刘。"说有兰家女"是也。(后人因信序，反说"兰字或是刘字伪。"甚误。——原注) 兰芝者，姓兰名芝，非姓刘而名兰芝也。东汉时代多单名，她姓兰名芝本不足怪。……

……此外，本诗似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汉末建安到徐陵编《玉台新咏》，时代很长，为什么这么空前宏伟的名篇却不见于记载，而忽然突兀地如彗星一般出现在六朝的晚年？……近来偶读阮籍《咏怀诗》中的"昔日繁华子"一首："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下，《文选》卷二十三，注引：

建安中无名诗曰："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

仿佛如见故人，这就是"孔雀东南飞"呵。在李善本《文选》上《咏怀诗十七首》题颜延年、沈约等注，却与善注混杂……这一条……不知是颜、沈旧注，还是李善新注。但既引来注阮籍诗，作注的人自当认为在阮籍以前，所谓"建安"是也。序文所云"汉末建安中"倒还是可信的，看他称此篇为"无名诗"，是不但诗的著作者无名，并诗本身亦无名，绝不提起焦仲卿妻字样，盖别有依据，非引《玉台新咏》明矣。看其情形，在六朝初期中叶流传的只是既无序文，又无标题，那么一首没头没脑的诗。至于是否已如今本那样的长，还是经过传唱传钞，有所附盖加工，且不得而知了。(《论诗词曲杂著·略谈"孔雀东南飞"》)



宋康王舍人韩凭，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俄而凭乃自杀。……妻遂投台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首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号其木曰"相思树"。……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干宝《搜神记》卷一一)

吴黄龙(229—231)中，吴郡海盐有陆东美，妻宋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离，时人号为"比肩人"。……后妻卒，东美不食死。家人哀

之，乃合葬。未一岁，冢上生梓树，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树，每有双鸿常宿于上。孙权闻之，嗟叹，封其里曰“比肩”，墓曰“双梓”。（《太平广记》卷三九八引《述异记》）

《华山畿》者，宋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女闻，感之。……（士子）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遂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乐府诗集》卷四六引《古今乐录》）（按：以上三则故事，“韩凭夫妇”难以确知流传年代，“陆东美”、“华山畿”故事却在建安之后。《孔雀东南飞》末段“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显然受上述故事影响，其在六朝流传加工的痕迹，宛然如在。）

《孔雀东南飞》的思想意义。

此诗（按：指《孔雀东南飞》）乃言情之文，非写义夫节妇也。后人作节烈诗，辄拟其体，更益以纲常名教等语，遂恶俗不可耐。观府吏见新妇时、新妇云：“自君别我后……君还何所望！”若在他人，新妇一见府吏便作死语，不应作尔语也。……盖情到婉转缠绵，不言节义而节义见。直写节义，便伧父面目。（沈用济、费锡璜《汉诗总说》）

本篇（按：指《孔雀东南飞》）容易引起人注意的地方，第一是长，第二是技巧，第三是思想。就价值而论，正应该倒过来，思想当居首位，长短实无关宏旨。它之所以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叙事诗，在于能当反抗礼教的旗手，对着传统伦理的最中心点“孝道”给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当头一棒。我们看后来的选诗的，评诗的对这诗有些地方不太满意，甚至于很不满意，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



还有一点更值得注意的。诗虽写礼教吃人，但吃人的，不仅仅是礼教，家庭的势利，经济上的压迫，官而的强暴，又何尝都是礼教呢？若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公式，即说从一而终，正不该逼她改嫁啊。这和鲁迅的小说《祝福》写祥林嫂的命运，是很像的。女人所受的压迫实不止一种，也不从一方而来，古诗人能够见到这很重要的一点，又能“如实”、“如画”地写了出来，恕我说句套话，这实在值得我们学习的。（《论诗词曲杂著·漫谈《孔雀东南飞》古诗的技巧》）

三　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汉代乐府民歌中，如《上邪》、《有所思》、《白头吟》、《怨歌行》等，或直抒胸臆，真挚强烈；或托言比兴，含蓄委婉，皆为抒情佳构。其《妇病行》、《孤儿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诗，则于叙事之中，表达爱憎，亦通篇是情。

汉人乐府杂言有《铙歌十八曲》，中多警绝之语。但全篇多难解及迫诘屈曲者，或谓有缺文断简，或谓曲调之遗声，或谓兼正辞填调，大小混录。其意义明了，仅十二三耳。……中惟《上陵》、《君马黄》、《有所思》、《上邪》、《临高台》五篇稍可读。姑录之。如"山出黄雀亦有罗，雀以高飞奈雀何。""水深激激……驽马徘徊鸣。""汤汤回回……泣下沾水。""桂树为君船……黄金错其间。""芝为车……四海外。""美人归以南……佳人安终极。""君有他心，系不可禁。""有所思……双珠玳瑁簪。""圣人出……游九河。""山无陵……乃敢与君绝。""临高台以轩……黄鹤高飞离哉翻"等句，皆为警绝者也。(《诗源辩体》卷三)

汉人乐府杂言如《古歌》、《满歌》、《西门行》、《东门行》、《艳歌何尝行》，文从字顺，轶荡自如，最为可法。《乌生》、《王子乔》、《董逃行》、《孤儿行》、《妇病行》，语虽奇古，中有不可解，不可读者。然《满歌》而下，实为孟德、子桓杂言之祖。……《孤儿行》云："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等句，亦可为警绝者矣。(同上)



《白头吟》古辞，突然而起，突然而收，无句不奇，无调不变。(毛先舒《诗辩坻》卷一)

婕妤《纨扇》，凄怨含蓄，《绿衣》之流也。文君《白头》，悲恨讦直，其《日月》之风乎？……(同上)

《有所思》。怨而怨矣。然怒之切，正望之深。末段余情无尽。(沈德潜《古诗源》卷三)

(《孤儿行》)极琐碎，极古奥。断续无端，起落无迹，泪痕血点，结缀而成，乐府中有此一种笔墨。(沈德潜《古诗源》卷三)

此(按：指《妇病行》)刺为父者不恤无母孤儿之诗。然"不恤"意却在

病妇口中，亲交眼中显出，绝不一语正写。……妇病已久，夫不在傍，欲言必待传呼，未言先已下泪，写景凄苦。“抱时”二句，指孤儿之小者，无衣无里，应前“寒”字；“闭门”七句，指孤儿之大者，乞钱买饵，应前“饥”字。后八句叙亲交见而悲伤，与钱送归，空舍徘徊，显出其父不在。“行复尔”、“勿复道”，言母死几时，意至于此，父已不顾，我且奈何。（《汉魏乐府风笺》卷四引张荫嘉语）

汉代乐府民歌造语古朴率直、浑然天成，但于叙事状物、刻画人物，亦颇铺陈刻镂，不无藻丽。故其诗文质兼胜、情韵流荡，颇可咏叹。

汉人乐府五言与古诗，体各不同。古诗体既委婉，而语复悠圆；乐府体既轶荡，而语更真率。盖乐府多是叙事之诗，不如此不足以尽倾倒。且轶荡宜于节奏，而真率又易晓世。（《诗源辩体》卷三）

汉人乐府五言，如《相逢行》、《羽林郎》、《陌上桑》等，古色内含而华藻外见，可为绝唱。如《相逢行》云：“黄金为君门……华灯何煌煌。”“黄金络马头……罗列自成行。”《羽林郎》云：“胡姬年十五……广袖合欢襦。”“不意金吾子……金盘脍鲤鱼。”《陌上桑》云：“罗敷喜蚕桑……可直千万余”等句，皆古色内含、华藻外见者也。晋宋而下，文胜质衰，绮靡不足观矣。（同上）

汉人乐府五言《焦仲卿妻诗》，真率自然而丽藻间发，与《陌上桑》并胜，人未易晓。（同上）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侈胡姬也。“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称罗敷也。“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艳兰芝也。是三贞妇，而作者亵咏如此，不妨古雅，在今必当酷忌。……柴虎臣云：“三者虽极形容，不可谓亵，假令咏闺襜而阑人《青楼》、《子夜》诸曲，便为狎渫。”（《诗源辩体》卷三）



《孔雀东南飞》，一句兴起，余皆赋也。其古朴无文，使不用妆奁服饰等物，但直叙到底，殊非乐府本色，如云：“妾有绣腰襦……种种在其中。”又云：“鸡鸣外欲曙……精妙世无双。”又云：“交语速装束……交用市鲑珍。”此皆似不紧要，有则方见古人作手，所谓没紧要处便是紧要处。（《四溟诗话》卷一）

《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详而有体，五言之史也。而皆浑朴自然，无一

字造作，诚为古今绝唱。(《诗薮》内编卷二)

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孔雀东南飞》)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腰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古诗源》卷三)

汉乐府叙事诗剪裁情节，繁简得宜；结构情节，浑然无迹。尤其是《孔雀东南飞》叙述事件发展、人物命运，波澜迭起，扣人心弦。

《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艺苑卮言》卷二)

作诗繁简各有其宜，譬诸众星丽天，孤霞捧日，无不可观，若《孔雀东南飞》、《南山有鸟》是也。(《四溟诗话》卷一)

《铙歌》如《上之回》、《巫山高》、《战城南》三篇，皆首尾一意，文义了然，间有数字艰诘耳。《君马黄》一篇，章法尤为整比，断非讹脱也。而《有所思》一篇，题意语词，最为明了，大类乐府《东门行》等。《上邪》言情，《登高台》言景，并短篇中神品，无一字难通者。……《上陵》一篇，尤奇丽，微觉断续，后半类《郊祀歌》，前半类东京乐府，盖《羽林郎》、《陌上桑》之祖也。(《诗薮》内编卷一)

《白头吟》古辞，突然而起，突然而收，无句不奇，无调不变。(毛先舒《诗辩坻》卷一)



乐府古诗佳妙，每在转接无端，闪烁光怪，忽断忽续，不伦不次。如群峰相连，烟云断之；水势相属，缥缈间之。然使无烟云缥缈，则亦不见山连水属之妙矣。《孤儿行》从"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后，忽接"春草动，草萌芽"……语意原不相承，然通篇精神脉络，不接而接，全在此处。……通篇零零碎碎，无首无尾，断为数层，连如一绪，变化浑沦，无迹可寻，其神化所至耶！(贺贻孙《诗筏》)

"上山采蘼芜……新人不如故"。此诗将"手爪不相如"截住，分为两段咏之，见古人章法之奇。后段即前段语意，复说一遍，更觉浓至。此等手法，在文字中惟《南华》(按：指《庄子》文章)能之，他人止作一股，便觉意竭，倘效为之，则重复可厌矣。(《诗筏》)

(《孔雀东南飞》)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沓，故竟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古诗源》卷四)

(《孤儿行》)“下从地下黄泉”一句下忽起一端，另写时令，从气及草，从草及桑，从桑及瓜：几许屈曲。“春气动”三字微跟“地下黄泉”，文情甚奇。将瓜车当是实事，诗正咏之。前此行贾、行汲，乃追写耳。不然，何独于将车一小事如此细细咏叹耶？“瓜车反覆”，如见车翻瓜堕，累累满地，众共攫食，愿还我蒂，不得已之苦言。(《汉魏乐府风笺》卷四引陈胤倩语)

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否则散漫。(《孔雀东南飞》)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今赴”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痕迹，乃神化于法度者。(《汉魏乐府风笺》卷一四引陈胤倩语)

阿母云：“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则公姑之遣兰芝，征色声发，非一日矣；兰芝知其势不能挽回，始向府吏言之。诗人叙事，先后互见耳。钟敬伯乃云“新妇不合求自去”，真强作解事也。(同上)

汉乐府叙事诗于人物形貌神态，或正面着色，或侧面烘托，无不毕见。尤其善以人物语言、动态，挖掘其情感、个性，表现人物间的微妙关系。

《艳歌行》“故衣谁当补”，何处当补也。“新衣谁当绽”，何处当绽也。赖得贤主人代我为夫组纴耳。此闺阁之思，可谓贞笃。然夫婿归入门时，反隐于斜柯而眄之，盖有所猜耳。故下句复云：“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妇人必以贞信自持，然后可以要其夫。《铙歌》“拉杂摧烧，当风扬灰”，可谓极妒。而必以“鸡鸣狗吠，兄嫂知之”自明，亦此指耳。……(《诗源辩体》卷三)



“上山采蘼芜……”……“新人复何如”一问，最婉。“从阁”一去，更冷而媚，虽有妒意，然妒而不悍，妒而有情，妒又安可少哉！……“颜色虽相似，手爪不相如”，谑语也，岂有手爪可辨妍媸乎？聊以慰其问耳。“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亦谑语也，岂有缣素可别优劣乎？聊以慰其去耳。一种缱绻亲昵之意，在此二谑，不独委屈周旋，慰故人以安新人也。通篇总是一“情”字，认真不得。大率东汉敦尚气节，得气之先，莫如诗人，不独《焦仲卿妻》、《陌上桑》诸篇凛然难犯，有《汉广》、《柏舟》遗风，即如此等诗，字字温厚，尤得好色不淫之意。(贺贻孙《诗筏》)

古《艳歌行》：“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无限深情，在此一疑，后面如许温存，皆从“斜倚西北眄”出。妇人值深情男子，着假不得，认真不得，

太庄则疑疏，太谑则疑亵，故以"语卿且勿畸"微谑之。"水清石自见"一语，楚楚可怜，不费分辨，疑团自破。尤妙在"石见何累累"一转，又宕开去，而以"远行不如归"谑语结之。倘无此一谑，却又不成亲昵矣。（贺贻孙《诗筏》）

叙事长篇动人啼笑处，全在点缀生活，如一本杂剧，插科打诨，皆在净丑。《焦仲卿》篇，形容阿母之虐，阿兄之横，亲母之依违，太守之强暴，丞吏、主簿一班媒人张皇趋附，无不绝倒，所以入情。若只写府吏、兰芝两人痴态，虽刻画逼肖，决不能引人涕泗纵横至此也。……《孤儿行》写得兄嫂有权，大兄无用，南北奔走，皆奉兄嫂严令，便自传神。至"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则大兄未尝无爱弟意，然终拗大嫂不过，孤儿之命可知矣。（同上）

《庐江小吏妻诗》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口性情，真化工笔也。中别小姑一段，悲怆之中，自足温厚。唐人《弃妇篇》直用其语云："忆我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别小姑去，小姑如我长。"下节去"殷勤养公姥，好自将扶将"，而忽转二语云："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轻薄之言，了无余味，此汉、唐诗品之分。（沈德潜《说诗晬语》）

（《孔雀东南飞》）历数十许人口中语，各各有其声情，神化之笔也。（《汉魏乐府风笺》卷一四引陈胤倩语）

《庐江小吏》一首，述各人语气，有焦仲卿语，有仲卿妻语，有仲卿母语，有仲卿妻母语，有仲卿妻兄语，有县令语，有主簿语，有府君语，有作诗者自己语，沓杂淋漓，或繁或简，或因其繁而更繁之，或因其简而更简之，水复山重，曲折人妙，诗中创格也。（《昊诗集览》引靳尚藩语）



写罗敷全须写容貌，今止言服饰之盛耳，无一言及其容貌，特于看罗敷者尽情描写，诚妙。立踟蹰是人，而反言马，亦奇。（《采菽堂古诗选》）

此女（按：指《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不特性刚，亦特明智。见阿兄作此语，情知不可挽回，故更不作谢却语。至下文移榻裁衣，亦更不作不欲状。使人不疑，始得断然引决；勿令觉而防我，即难遂意。（《采菽堂古诗选》）

此时（按：指阿兄逼婚之时）兰芝竟不与兄一辩，具有深心。盖未仰头答时，其俯首沉思已久；太守上官，属吏势难与抗；阿兄戾性，大义更难与争。胸中判定一死，索性坦然顺之，不露圭角，为后得以偷出，再会府吏地也。（张玉榖《古诗赏析》）

"妾有"十四句（按：指《孔雀东南飞》"妾有绣腰襦"等十四句），缀一段琐碎丁宁，非止文章凭空设色，顿觉敷腴；盖此去原非本怀，而重还势难自主。睹物伤心，情固尔尔。"（同上）

“事事”（按：指《孔雀东南飞》“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一段），指穿衣、梳妆诸事……按，此句涵义，共有三说：一、陈祚明说：“临当欲去，极写此女华艳……如此何忍出之！‘严妆’‘严’字、‘事事四五通’句，所谓极意装束也。”张玉榖也说：“被遣归家，有何情绪；作此严妆，呈其美态……特借是再为临行固结府君之地。新妇苦衷，作者曲为写出。”……二、李因笃（按：见《汉诗音注》）说：“……自初妆以至妆成，每加一衣一饰，皆着后复脱，脱而复着，必四五更之，数数迟延，以推晷刻也。……‘着毕’则新妇去矣。”……三、余冠英（按：见《乐府诗选》注）说：“每事四五遍，或是心烦意乱，一遍两遍不能妥贴。”今按，自下文对新妇体貌之描写及“精妙世无双”等语观之，此句似当作“极意妆束”解始较连贯。但延挨时间和心烦意乱的因素也未尝没有，故一并录以备考。（《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第二节　汉代文人诗歌

一　庙堂诗歌

西汉及东汉中叶以前，文人诗歌多为帝王的政治、宗教活动而作，故义含颂美，辞惟典雅，绝少个人的抒情内容。

汉代统治者崇尚楚文化。文人为适应这一文化好尚，多以楚歌诗变体作庙堂诗歌。



……《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汉书·礼乐志》）

汉《郊祀歌》十九章，以为司马相如等作，而《青阳》、《朱明》，史题邹子乐名。按四章体气如一，皆四字为句，辞虽淳古，而意极典明，当出一人之手，是为邹作无疑。前有《帝临》一章，与四篇绝类，章法长短正同。盖五篇共序五帝，亦邹作无疑，史缺文耳。余《练时日》等篇，辞极古奥，意至幽深，错以流丽，大率祖述《九歌》，然骚语和平，而此太峻刻。（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

《练时日》，骚辞也；《维泰元》，颂体也，二篇章法绝整。《练时日》，三

言之极奇者；《维泰元》，四言之极典者。一则赡丽精工，一则淳质古雅。（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

颜、谢好蹇涩雅丽，昌黎好捃摭奇字险韵为诗，然汉《郊祀》、《铙歌》，奥衍宏博，已开其先。司马子长所谓"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经之士，不能知其词，皆会集五经家乃能讲习，读之多《尔雅》之文"是也。……《练时日》、《华熠熠》、《天门开》，多原于《楚骚》；《房中曲》多原于《雅》、《颂》。（费锡璜《汉诗总论》）

汉代文人的庙堂诗歌中，亦有摹仿《雅》、《颂》的四言作品。汉明帝时，东平王苍应诏改郊庙乐而进《武德舞歌诗》，更杂揉天人感应说以应图谶。班固《两都赋》后附《明堂》、《辟雍》、《灵台》等诗，则已俨然颂诗的翻版，索然无诗味。

《元成先生语录》曰："西汉乐章，可齐三代。旧见《汉（书）礼乐志·房中乐》十七章，观其格韵高严，规模简古，骎骎乎商、周之颂。……寻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

《安世歌》，质文古雅。（陈绎曾《诗谱》）

诗之佳，拂拂如风，洋洋如水，一往神韵，行乎其间。班固《明堂》诸篇，则质而鬼矣。鬼者，无生气之谓也。（陆时雍《诗镜总论》）

《明堂》五章，太质无文。（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

班固四言《明堂》、《辟雍》、《灵台》诸诗，非雅非颂，其体为变。（《诗源辩体》卷三）



《安世房中歌》词旨古奥，绝类周人。（乔亿《剑谿说诗》卷上）

汉《郊祀》诸乐府，以乐而象礼者也。所以典硕肃穆，视他乐府别为一格。（《艺概·诗概》）

二　楚　歌　诗

因风气使然，东汉中叶以前，作者抒情言志，多用楚歌诗。这类作品，或写帝王的四方之志、百年之思，如《大风歌》、《秋风辞》；或抒发宫廷斗争中失意者的悲愤，如赵王刘友、燕王刘旦、华容夫人、广陵王刘胥之歌（见《史记·吕后本纪》、《汉书》《武五子传》、《广川惠王越传》、《广陵厉王胥传》等）；或发泄士人失志

不遇的感慨，如东方朔《嗟伯夷》、梁鸿《适吴诗》等。它们篇制不大，而情辞俱佳。

十二年冬……上（刘邦）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史记·高祖本纪》）

上（武帝）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秋风起兮白云飞……"（《汉武故事》）（按：武帝又有《瓠子歌》、《天马歌》、《西极天马歌》、《李夫人歌》、《思奉车子侯歌》，均为楚歌诗。）

汉祖《大风歌》汪洋自恣，不必三百篇遗音，实开汉一代气象，实为汉后诗开创。若武帝《瓠子》、《秋风》、《柏梁》诸作，从湘累脱化，有辞人本色也。（任昉《文章缘起》）

武帝《秋风辞》，言固雄伟，而终有感慨之悟。故其末年，几至于变。（陈严肖《庚溪诗话》卷上）

高帝《鸿鹄歌》是"月明星稀"诸篇之祖，非《雅》、《颂》之体也。然气体横放，自不可及。（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

《大风》千秋气概之祖；《秋风》百代情致之宗，虽词语寂寥，而意象靡尽。（同上，内编卷三）

汉武故是词人，《秋风》一章，几于《九歌》矣。（《艺苑卮言》卷二）

武帝雅好《楚辞》，庄助、朱买臣俱以此得幸。《瓠子》峭刻，《秋风》骀荡，俊语俱自湘累脱出。（毛先舒《诗辩坻》卷一）

高帝《大风歌》、项籍《垓下歌》，皆乐府楚声也。《大风》词旨虽直，而气概远胜。《垓下》词旨其婉，而气稍不及，元美谓"各自描写帝王兴衰气象"是也。然二君皆非文士，而《大风》已歌于沛，疑臣下润色；《垓下》则乐府润色耳。（《诗源辩体》卷三）

昭帝《黄鹄》、《淋池》二歌，皆乐府楚声也。《黄鹄》气格苍古，声韵峻绝。《淋池》情虽荡，而气则淳。然《淋池》出于王子年《拾遗记》，真伪亦不可知。（同上）



三　文人四言诗

汉代文人四言诗以韦孟为代表，其诗或讽谏时事，或自伤贬

黜，或自责过失，皆体近《小雅》，唯情辞稍逊之。另有韦玄成《自劾诗》傅毅《迪志诗》。

韦孟（生卒年不详），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无道，孟作诗讽谏。后去位，徙家于邹，作《讽谏诗》与《在邹诗》。卒于家。

韦玄成（？一前36），字少翁，韦孟六世孙。少好学，博通经籍。以父任为郎，宣帝时曾任谏大夫。后袭父爵扶阳侯，历任河南太守、未央卫尉，迁太常。与杨恽友善，恽诛，玄成亦免官，削爵为关内侯。自伤贬黜，作《自劾诗》。元帝时，官至丞相，封侯故国，作《戒子孙诗》。建昭三年卒，谥曰共侯。事见《汉书·韦贤传》

诗人一叹三咏，感寤具存，庞言繁称，道所不贵。韦孟《讽谏》，恺直有余，深婉不足。韦玄成《自劾诗》情色未宣，末段数语，庶为可诵。（陆时雍《诗镜总论》）

徐昌穀云："韦孟辈四言，窘缚不荡……"愚按：元美谓"韦孟、玄成，雅颂之后，不失前规"……斯并得之。若韦孟、玄成之窘缚者，直是先后布置，事事不遗故耳，非受雅颂困也。（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

四言诗缔造良难；于三百篇太离不得，太肖不得。太离则失其源，太肖只袭其貌也。韦孟《讽谏》、《在邹》之作，肃肃穆穆，未离雅正。（沈德潜《诗诗晬语》）



韦孟《讽谏》诗，乃四言长篇之祖，忠鲠有余，温厚不足。太白《雪谗》诗百忧章，去韦孟远矣。（谢榛《四溟诗话》）

傅毅（？—90?），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少博学。明帝永平年间，于平陵学习章句，作《迪志诗》。章帝时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尝依《清庙》作《显宗颂》，追美明帝。后为大将军窦宪司马。早卒。事见《后汉书·文苑传》。

毅早卒，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后汉书·文苑传》）

傅毅四言《迪志诗》，二韦之后，实可继响，当作八章。(《诗源辩体》卷三)

韦(孟)、仲(长统)、班(固)、傅(毅)辈四言诗，儋缚不荡。(徐祯卿《谈艺录》)

汉末文人四言诗又有抒情自由、诗风清丽者，实已开魏晋诗先声。

天地烟煴，百卉含花。鸣鹤交颈，雎鸠相和。处子怀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实多。(张衡《思玄赋》所录歌诗。见《后汉书·张衡列传》)

《穆集》载论(按：指《绝交论》)，其略曰……又与刘伯宗绝交书及诗曰：……其诗曰："北山有鸱，不洁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揽，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趣，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盖因此而著论也。(李贤《后汉书·朱乐何刘传》注)

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又作诗二篇，以见其志。辞曰："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敖翔太清，纵意容冶。"尚书令荀彧闻统名，奇之，举为尚书郎。(《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传》)



暧暧白日，引曜西倾。啾啾鸡雀，群飞赴楹。皎皎明月，煌煌列星。严霜凄怆，飞雪覆庭。寂寂独居，寥寥空室。飘飘帷帐，荧荧华烛。尔不是居，帷帐何施?尔不是照，华烛何为?(秦嘉《赠妇诗》，见《玉台新咏》卷九)

仲长统云："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盖取无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自后窃取其意者甚多。(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

仲长统《述志诗》，允谓奇作，其曰"叛散《五经》，灭弃《风》、《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盖已开魏晋旷达之習，玄虚之风。昌黎志辟异端，而汉三贤赞，统与焉，殆未之察也。(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朱穆四言《绝交诗》，语甚庸鄙，不当以古质目之。盖汉人诗虽人止数篇，亦自有当家也。(《诗源辩体》卷三)(按：许学夷言此诗"庸鄙"，无

"古直"，"自有家当"，其说本于汉儒论诗，然由此愈可见已渐脱汉诗格调。)

四言句法高古者，已经前人采摭。自余精工奇丽，代有名篇，虽非本色，不可尽废。漫尔笔之：仲长统"乘云无辔，骋足无风。沆瀣当飡，九阳代烛。"……（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

汉明帝时，白狼王唐菆作诗三首，汉译为四言，风格非尽与雅颂相同。

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有犍为郡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白狼槃木》，夷诗也。夷语有长短，何以五言？盖益部太守代为之也。诸佛经谒，梵语也。梵语有长短，何以五言？鸠摩罗什玄奘辈增损而就汉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按：白狼王唐菆所作《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均为四言，王世贞称五言，恐系笔误。)

韦、仲、班、傅辈四言诗儋缚不荡……白狼、槃木诗三章亦佳，缘不受雅颂困耳。（徐祯卿《谈艺录》）

四 文人杂言诗



汉世文人受乐府民歌影响，亦有用杂言抒情者，从中可见由文人四言诗向五言诗演化的痕迹。

（东方）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滑稽列传》）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汉书·杨恽传》载《报孙会宗书》）

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兮多毒淫！（马援《武溪深行》，见崔豹《古今注》；又见《乐府诗集·杂曲歌辞》）

乐府有《武溪深》曲，"毒淫"二字，写尽蛮烟瘴雨之酷。即"仰视飞鸢

跕跕落水中”意，却只如是而止，更不旁及一语。觉后人《从军行》铺张扬厉，未免过情。（宋长白《柳亭诗话》）

马援乐府杂言《武溪深行》，仅二十余言，情景相融，郁纡有致，是乐府妙境。（《诗源辨体》卷三）

五　汉末文人五言诗的兴起

世传苏李赠答五言诗。钟嵘《诗品》、萧统《文选》信而不疑，颜延之、刘勰则颇有犹豫。宋代以降，论者大都以为非苏武、李陵作，此案遂有定论。

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钟嵘《诗品·序》）

……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太平御览》卷五八六引颜延之《庭诰》）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梁肖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词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而统不悟。（《东坡全集·答刘沔都曹书》）

自昔相传苏、李河梁赠别之诗，苏武四章，李陵三章，皆载《昭明文选》。然《文选》题云“苏子卿古诗四首”，不言与李陵别也。李诗则明题曰：“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而其中有“携手上河梁”之语，所以后人相传为苏、李河梁赠别之作。今即以此三诗论之，皆与苏、李当日情事不切。史载陵与武别，陵起舞作歌：“径万里兮”五句，此当日真诗也。何尝有“携手上河梁”之事？即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此谓离别之后，或尚可冀其会合耳。不思武既南归，即无再北之理。而陵云“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决无还汉之期。此则“日月”、“弦望”为虚词矣。又云“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苏、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汉初年，其相别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仅云“三载嘉会”乎？就此三首其题明为与苏武者，而语意尚不合如此，况苏四诗之全不与李相涉者乎？艺林相传苏、李河梁之别，盖因李诗有“携手河梁”之句可为言情叙别



之故实，犹之《许彦周诗话》云“‘燕燕于飞’一篇为千古送行诗之祖也”。而苏、李远在异域，尤动文人感激之怀，故魏、晋以后遂有拟作《李陵答苏武书》者，若准本传岁月证之，皆有所不合。（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二五引翁方纲语）

我是绝对不承认这几首诗为李陵、苏武作的。我所持的理由，第一，则汉武帝时决无此种诗体。……此诸诗与十九首体格略同，而谐协尤过之。如“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如“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如“骨肉缘枝叶”，如“努力崇明德”……其平仄几全拘齐、梁声病。故其时代又当在十九首之后。第二，赠答诗起于建安七子，两汉词翰，除秦嘉《赠妇》外更无第二首，然时已属汉末。至朋友相赠，则除此数章更不一见。盖古代之诗，本以自写性情，不用为应酬之具。建安时，文人盛集邺下，声气相竞，始有投报。苏、李之世，绝对的不容有此。第三，苏武于所传诸诗外别无他诗，固无从知其诗风何如，至于李陵，则《汉书·苏武传》尚载有他一首歌，其辞曰：“径万里兮度沙漠……”纯是武人质直粗笨口吻，几乎没有文学上价值。凡一个人前后作品，相差总不会太远，何况同时所作，作“径万里兮度沙漠……”的人，忽然会写出“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会写出“安知非日月，张望自有时”，我们无论如何，断不能相信。我据这三种理由，所以对东坡所提出的抗议深表赞同。……

还有应该注意的一点，《文选》所录七首之中，李陵的比苏武强多了。《文心雕龙》只言“李陵、班婕好见疑于后代”，不提苏武；《诗品》也只有李陵，并无苏武。（《诗品》叙论里头有“子建‘双凫’”一语似是指苏武之“双凫俱北飞”一首，但彼文历举曹子建至谢惠连十二家，皆以年代为次，“子卿‘双凫’”句在“阮籍《咏怀》”句之下，“叔夜‘双鸾’”句之上，则子卿宜为魏人，非汉之苏武也。窃疑魏别有一人字子卿者，今所传苏武诗六首皆其所作，自后人以诸诗全归苏武，并其人之姓名亦不传矣，此说别无他证，不敢妄主张，姑提出俟后之好古者。——原注）因此我颇疑拟李陵的几首，是早已流行。刘勰、钟嵘对他都很重视。拟苏武的那几首，或者是较晚的时代续拟，因此批评家不甚认他的价值，但最迟的也不过魏、晋间作品罢了。（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汉世谣谚，颇有五言，此对汉末文人五言诗之兴起，当有深刻影响。

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

猛而临官。(《汉书·贡禹传》引西汉俗谚)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汉书·五行志》引西汉民谣)

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汉书·酷吏列传》引西汉长安民谣)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马廖传》引长安民谣)

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后汉书·樊晔传》引凉州民谣)

文人五言诗的产生与发展。

东汉班固作《咏史》诗，单纯咏事，少有寄托，是文人五言诗的初学之作。

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诗品·序》)

孟坚才疏，而老于掌故。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同上，卷下)

班固五言《咏史》，则过于质直。(《诗源辩体》卷三。)

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的出现，表明东汉中期文人在学习乐府民歌方面，已达到相当圆熟的境地。



"昔有霍家奴"，整而条，丽而典，五言之赋也。(《诗薮》内编卷一)

《风》、《骚》既息，汉人代兴，五言为标准矣。就五言中较然两体：苏、李赠答、无名氏《十九首》，是古诗体；《庐江府小吏》、《羽林郎》、《陌上桑》之类，是乐府体。

乐府有三等：《房中》、《郊祀》，典雅宏奥，中学难窥，为最上品；《陌上桑》、《羽林郎》、《东门行》……等诗，有情有致，学者有径路可寻的是诗家正宗，才人鼻祖，为第二品；谣谚等作，词气虽古，未免俚质，为第三品。(费滋衡《汉诗总说》)

《羽林郎》、《董娇娆》、《日出东南隅行》诸诗，情词并丽，意旨殊工，皆诗家之正则，学者所当揣摩。(同上)

汉名士若王逸、孔融、高彪、赵壹辈，诗存者皆不工，而不知名若辛、宋乐府，妙绝千古，信诗有别才也。(《诗薮》外编卷一)

"日出东南隅"与"昔有霍家奴"二篇，章法颇类。前段描写罗敷、胡姬浓艳，能令好色者销魂。后段描写罗敷、胡姬义烈，能令淫人败兴。中间"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四语，皆从世俗人情，写得十分痛快。天地间一种绝妙义理，偏出自不读书人口中，可见人情至处，即礼法也。收语即申说"重前夫"、"自有夫"二意，虽"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紧严有力，"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宽愆有致，煞手不同，总就本文作总，不别起波澜也。汉乐府中有字句同而意旨与章法不同者，《鸡鸣篇》与《相逢行》是也；有字句不同而意旨与章法同者，此二篇是也。岂古作者亦有脱胎换骨之法邪？（《诗筏》）

东汉后期文人学习乐府民歌，已脱卸模拟痕迹。其于诗艺的探索与诗境的创造，以及对个人情感抒写的真实与强烈程度，标志着诗歌精神已彻底复甦。

张衡怨篇（按：指《四愁诗》），清典可味；仙诗缓歌（按：指《同声歌》），雅有新声。（《文心雕龙·明诗》）

《同声歌行》，汉张衡所作也。妇人自言幸得充闺房，愿勉供妇职，不离君子。思为莞簟，在下以蔽匡床；思为衾帱，在上以卫霜露。缱绻枕席，没齿不忘焉。盖以喻当时士君子事君之心焉。（《乐府古题要解》卷下）

高彪五言《清诫》一篇，苍莽古直，与曹孟德相类。赵壹、郦炎、孔融、秦嘉五言，俱见作用之迹，而壹、炎、融则用意尤切，盖其时已与建安时接矣。（《诗源辩体》卷二）

《饮马长城窟行》古词："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伤良人流宕不归。或云蔡邕之词。（《诗薮》内编卷二）



《饮马长城窟行》，此叹好友得志不复相顾也。观"入门各自媚"两句，可见用笔之妙。"书中竟如何"一句，令人豁然，则知不过泛语通问，夙昔苦思，付之流水矣。（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上）

秦嘉夫妇往还曲折，具载诗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非他托兴可以比肩。（《诗薮》内编卷二）（按：指秦嘉五言《赠妇诗》三首与其妻徐淑答诗一首。）

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抒情文学复苏的产物，代表了汉末文人

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一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和作者

《古诗十九首》最初载于《文选》，因其作者佚名，时代莫辨，萧统辑入《文选》，泛题为"古诗"。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

《古诗十九首》，五言。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马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文选》卷二九李善注)

《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文心雕龙·明诗》)

《古诗》，其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桔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钟嵘《诗品》上)

钟嵘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后并《去者日以疎》五首为十九首为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郁郁"、"游戏宛与洛"为咏东京；"盈盈楼上女"为犯惠帝讳。按临文不讳，如"总齐群邦"，故犯高讳无妨。宛、洛为故周都会，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两宫"、"双阙"亦似东京语。意者，中间杂有枚生或张衡、蔡邕作，未可知。(王世贞《艺苑卮言》)

问："《古诗十九首》，乃五古之原。按其音节风神，似与楚骚同时，而论者指为枚乘等拟作。枚之文甚著，其诗不多见。且秦、汉风调自殊，何所据而指为枚作耶？又'苏李河梁'，亦有《十九首》风味，岂汉人之诗，其妙皆如此耶？求明示其旨。"



阮亭（王士祯）答：《风》、《雅》后有《楚辞》，《楚辞》后有《十九首》，风云变迁，非缘人力。然其源流，则一而已矣。古诗中《迢迢牵牛星》、《庭中有奇树》、《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等五六篇，《玉台新咏》以为枚乘作；《冉冉孤生竹》一篇，《文心雕龙》以为傅毅之辞。二书出于六朝，其说必有据依，要之为西京无疑。……（郎廷槐《师友传习录》）

近代以来，学者意见虽有歧异，基本看法已渐趋统一，认为

《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它们产生于东汉顺帝至献帝之间，作者是中下层失意的知识分子。

(《古诗十九首》)皆见《文选》，不题撰人名氏，惟题"古诗"。……我以为要解决这一票诗时代，须先认一个假定，即"古诗十九首"这票东西，虽不是一个人所作，却是一个时代——先后不过数十年间所作，断不会西汉初人有几首，东汉初人有几首，东汉末人又有几首。因为这十几首诗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确是一时代诗风之表现。凡诗风之为物，未有阅数十年百年而不变者，如后此建安、黄初之与元嘉、永明，元嘉、永明之与梁、陈宫体，乃至唐代初、盛、中、晚之递嬗。宋代"西昆"、"江西"之代兴。凡此通例，不遑枚举。两汉历四百年，万不会从景、武到灵、献，诗风始终同一。"十九首"既风格首首相近，其出现时代，当然不能距离太远。读者若肯承认我这个前提，我们才可以有点边际来讨论他的出现时代了。

汉制避讳极严，犯者罪至死。惟东汉对于西汉诸帝则不讳，惠帝讳盈，而十九首中有"盈盈楼上女"、"馨香盈怀袖"等句非西汉作品甚明，此其一。"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明写洛阳之繁盛，西汉决无此景象。"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上东门为洛城门，郭北即北邙，显然东京人语，此其二。此就作品本身觅证，其应属东汉，不应属西汉，殆已灼然无疑。然东汉历祚，亦垂二百年，究竟当属何时耶？此则在作品本身上无从得证，只能以各时代别的作品旁证推论。刘彦和以"冉冉孤生竹"一首为傅毅作，依我的观察，西汉成帝时，五言已萌芽，傅毅时候，也未尝无发生十九首的可能性，但以同时班固《咏史》一篇相校，风格全别……其他亦更无相类之作。则东汉之期——明、章之间，似尚未有此体。安、顺、桓、灵以后，张衡、秦嘉、蔡邕、郦炎、赵壹、孔融各有五言作品传世，音节日趋谐畅，格律日趋严整。其时五言体制已经通行，遣诣已经纯熟，非常杰作，理合应时出现。我据此中消息以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一二〇至一七〇约五十年间，比建安、黄初略先一期，而紧相衔接，所以风格和建安体格相近，而其中一部分钟仲伟且疑为曹、王所制也。我所估定若不甚错，那么十九首一派的诗风，并非西汉初期瞥然一现中间戛然中绝，而建安体亦并非近无所承，突然产生，按诸历史进化的原则，四方八面都说得通了。……(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五言诗的起源，老实说，我是一点不知道，因为从一部分没法去知道全体。关于《十九首》的时代，虽然知道一点，可是决不多。我们很可以说在全部《十九首》里找不出一点西汉痕迹，无奈诗不必要带痕迹的，西汉

的诗也不一定要带上西汉的痕迹，如玉腕之朱痕，白脸之青记，所以我一点不知道它是西汉，或者不是。东汉呢，碰巧留下一点痕迹，地名，这是不成问题的。至于作者的传闻，如傅毅、曹植、王粲，那与西汉的枚乘，同样的靠不住，我们所知如此而已。假如不加上文学的意念以至于想象，那没除掉这一大堆东零西碎的，带消极性的杂拌，可谓毫无所得。但是反过来说呢，加上第一节中我所谓完整的观念，那么，不怕只有一个两个证据，只要他靠得住，我们却不妨大胆地把全部《十九首》以至于古诗都放在东汉，早晚自然也颇难定，但我想怕不会迟到建安的。所谓完整的观念，其根柢虽是文学的，而其用途实是文学史的。（俞平伯《〈明月皎夜光〉辨》，原载1936年7月《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三期，又见《论诗词曲杂著》）

二　《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内容

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深刻、更为直接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联系的，诸如帝王、诸侯的祭祀、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宫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死生新故、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境界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十九首》所以成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离别，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难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采菽堂古诗选》卷三）

《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是为《国风》之遗。（沈德潜《说诗晬语》）

《十九首》中，如"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飡饭"，"空床难独守"，"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忧伤以终老"，"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不知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皆透过人情物理，立言不朽，至今读之，犹有生气。每用于结句，盖全首精神专注末句。其语万古不可易，万古不可到，乃为至诗

也。（费锡璜《汉诗说》）

自汉以降，风气或殊，考调审音，均归一辙。盖其逐臣弃友、思妇劳人、托境抒情、比物连类、亲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质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叹之。无声弦指，空外余音，余讽者歌哭无端，籁由天作。《国风》、《楚骚》，此其嫡嗣乎？《古诗源》云："清和平远，不必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汉京诸诗，皆在其下，五言中方员之至也。"（王康《古诗十九首绎后序》）

汉末文人感于社会黑暗、政治腐败、仕路阻塞，又感于传统道德观念的虚伪与沦丧，愤激之下，不惜剥下昔日的伪装，对士人的从政心理作了最真诚的坦露，对上流社会的人情世态表示了强烈的失望和不满。

（《青青陵上柏》）结语乃强作旷达，正是戚戚之极者也。"极宴娱心意"句总承"洛中"六句，言当时权贵无忧国之心，一味宴乐自娱，我独何所迫而戚戚乎？正打转"斗酒娱乐"、"东马游戏"四句意。曰"斗酒"，曰"驽马"，与"冠带"、"宫阙"相反；曰"聊厚"，曰"游戏"，与"极宴"句相反。若以"极宴"句指为"斗酒"四句言，非也。（黄节旧藏《古诗赏析》眉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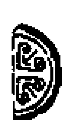
（《回车驾言迈》）"立身苦不早"，从无可奈何处泛泛说来。"人生"二句又进一层，言即能立身，身非金石，何由长寿？亦不过"奄忽随物化"已耳，直是烟消灯灭，无可收拾，乃从世情中转一语曰："求点子荣名也罢了"。（朱筠《古诗十九首》说）



这首诗（指《今日良宴会》）所咏的是听曲感心；主要的那种感，不是曲，也不是宴会。……曲辞不得而知。但是无论歌咏的是富贵人的欢悰还是穷贱人的苦绪，都能引起诗中那一番感慨。若是前者，感慨便由于相形见绌；若是后者，便由于同病相怜。话却从人生如寄开始。既然人生如寄，见绌便见绌，相怜便相怜了。……人生既是这般短促，自然该及时欢乐，才不白活一世。富贵才尽能尽情欢乐，"穷贱"只有"长苦辛"；那么，为什么"守穷贱"呢？为什么不赶快去求富贵呢？……人生既"奄忽若飙尘"，欢乐自当亟亟求之，富贵自当亟亟求之，所以用得着这样迫切的口气。富贵是并不易求的；有些人富贵，有些人贫贱，似乎是命运使然。穷贱的命不犹人，心有不甘；"何不"四语便是那怅惘不甘之情的表现。这也是诗。明代钟惺说，"欢宴未毕，忽作热中语，不平不甚。"陆时雍说，"慷慨激昂，'何不——苦辛'，

正是欲而不得。”清代张玉谷说，“感愤自嘲，不嫌过直。”都能搔着痒处。诗中人却并非孔子的信徒，没有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等信念。他们的不平不在于道而不得时，也有些别人不把他们放在眼下，很他们来往他们的——他们的来往无非趋势利、逐酒食而已。这就带些刺讥了。“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罗就是列，《魏王奏事》说，“出不由里门，而大道者，名曰第。”第只在长衢上。“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蔡质《汉宫典职》说，“南宫北宫相去七里。”双阙是每一宫门前的两座望楼。这后两项固然见得京都的伟大，可是更见得京都的贵盛。将第一项合起来看，本诗写东都的繁华，又是专从贵盛着眼。这是诗，不是赋，不能面面俱到，只能选择最显著最重要的一面下手。至于“极宴娱心意”，便是上文所谓凑热闹了。“戚戚何所迫”，《论语》：“小人长戚戚”，戚戚，常忧惧也。一般人常怀忧惧，有什么迫不得已呢？——无法为利禄只在守穷贱而不得富贵。这也不失其为真。有人说是“反辞”、“诡辞”，是“讽”是“谑”，那是蔽于儒家的成见。（朱自清《古诗歌笺释三种·古诗十九首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诗中（按：指《青青陵上柏》）写东都，专从繁华着眼。开手用了“洛中何郁郁”一句赞叹，“何郁郁”就是“多繁盛呵”！“多热闹呵”！游戏就是来看热闹的，也可以说是来凑热闹的，这是诗中主人公的趣味。以下分三项来说，冠带往来是一；衢巷纵横，第宅众多是二；宫阙壮伟是三。“冠带自相索”，冠带的人是贵人，贾逵《国语》注：“索，求也”。“自相索”是自相往来不绝的意思。“自相”是说贵人只找贵人，不把别人放在眼下……。短促的人生，不去饮酒、游戏，却为无谓的利禄自苦，未免太不值得了。这一句不单就“极宴”说，是总结全篇的。（同上）



对传统道德的信仰危机，使文人从追求外在事功，转而对个体生命价值作新的思考和追求。然而因为时代的原因，这种觉醒了的生命意识常常笼罩着悲观厌世的色彩，更促使文人的思想行为方式偏离正统的轨道。《古诗十九首》的这类诗篇，实则预示着魏晋风度的即将到来。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不得已而托之名也；“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名亦无归矣，又不得已而归之酒，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且饮一杯酒”。“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亦不得已而归之酒，曰：“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至于被服纨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怜矣。（《艺苑卮言》卷

三）

《驱车上东门》，此诗意激于内，而气奋于外，豪宕悲壮，一气喷薄而下。前八句夹叙夹议，言死者。“浩浩”以下十句，言今生人。凡四转，每转愈妙，结出归宿。……（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

《生年不满百》，万古名言，即前“驱车”篇意。而皆重在饮酒，及时行乐，是其志在旷达。汉、魏人无明儒理者，故极高志，止此而已。……（同上）

《去者日以疏》，气格与上同。此归宿在睹此当思息机，勿妄逐世味，但苦未能归耳，意更悲痛。颜子“不远复”，屈子“及行迷之未远”，庄子惜“以有涯逐无涯”，去人愈远，则不能归矣。喻意逐世者同归于一死，而不知反身求道。只此二篇，古今人不能出其意度之外矣。韩公拟之作《秋怀》。（同上）

《古诗十九首》与苏、李同一悲慨，然《古诗》兼有豪放旷达之意，与苏、李之一于委曲含蓄，有阳舒阴惨之不同。知人论世者，自能得诸言外，固不必如钟嵘《诗品》谓《古诗》“出于《国风》”，李陵“出于《楚辞》”也。（《艺概·诗概》）



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则厌世思想之浓厚——现世享乐主义之讴歌，最为其特色。三百篇中之变风变雅，虽忧生念乱之辞不少，至如《山枢》之“且为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等论调，实不多见。大抵太平之世诗思安和；丧乱之余，诗思惨厉。三百篇中代表此两种气象的作品，所在多有。然而社会更有将乱未乱之一境，表面上歌舞欢娱，骨子里已祸机四伏，全社会汲汲顾影，莫或为百年之计，而但思媮一日之安。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厌世的哲学文学便会应运而生，依前文所推论，十九首为东汉安、顺、桓、灵间作品，若所测不谬，那么，正是将乱未乱极沉闷不安的时代了。当时思想界，则西汉之平实严正的经术，已渐不足以维持社会，而佛教的人生观已乘虚而入。（原注：桓、灵间安世高、支娄迦谶二人所译出佛经已数十部。）……十九首正孕育于此等社会状况之下，故厌世的色彩极浓。“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万岁常更迭，圣贤莫能度”，“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种思想，在汉人文学中，除贾谊“鹏鸟赋”外，似未经人道，《鹏鸟赋》不过个人特别性格特别境遇所产物，十九首则全社会氛围所产物，故感人深浅不同。十九首非一人所作，其中如“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之类，一面浸染厌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学平实态度者，虽间有一二，其大部分则如《山枢》之“且以喜乐，且以永日”，以现实享乐为其结论。“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

年不满百”诸篇其最著者也。他们的人生观出发点虽在老庄哲学，其归宿点则与《列子·杨朱篇》同一论调。不独荣华富贵功业名誉无所留恋，乃至“谷神不死”，“长生久视”等观念亦破除无余。“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虽可与等期”，真算把这种颓废思想尽情揭穿。他的文辞既“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故所诠写的思想，也给后人以极大的印象，千余年来中国文学，都带悲观消极的气象，十九首的作者怕不能不负点责任哩！（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因为汉代的养士、选士制度以及汉末社会的动荡不宁，士人饱受羁旅行役之苦。兼之宦途阻塞，世情浇薄，更促使他们转而渴求以友谊、爱情、家庭的温馨慰藉其孤独屈辱的灵魂。《古诗十九首》或从思妇、或从游子著笔，极写相思怀人之苦，乃成为最富于人情魅力的篇章。在这之中，又尤以闺情题材的诗篇最为真切感人。所以如此，不独因为古代妇女因特定的处境、命运形成的无可排遣的情感最具有悲剧的色彩，也在于失意文人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中被捉弄与被遗弃的际遇，使他们有可能对处于相似地位的女性给予真正的理解和同情。



《古诗十九首》有云：“冉冉孤竹生……”言妻之于夫，犹竹根之于山阿，兔丝之于女萝也，岂容使之独处而久思乎？《诗》云：“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同此怨也。又“涉江采芙蓉……”又“庭中有奇树……”亦犹诗人“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之词，第其反义耳。前辈谓《古诗十九首》可与《三百篇》并驱者，亦此类也。（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一）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古诗》“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长相思，谓以丝缕络绵交互网之，使不断，长相思之义也。结不解，按《说文》：“结可解曰纽，结不解曰缔。”缔谓以针缕交锁连结，混合其缝，如古人结綢缪同心制，取结不解之义也。既取其义以著爱而结好，不美其名曰“相

思"，曰"不解"云。合欢被，宋赵德麟《侯鲭录》有解。会而观之，可见古人咏物托意之工矣。（杨慎《升庵诗话》卷三）

（《冉冉孤生竹》）旧注以此为新婚，非也。细玩其意，酷似《摽有梅》，当是怨迟婚之作。轩车者，逆女之车也；来迟者，以结婚之远在千里外也。"思君"云云是倒句；轩车来迟，故思君令人老耳；身固未尝老，思君致然。言君之来迟，信执高节矣；我亦何为不持高节哉？（吴淇《选诗定论》）

艳诗有述欢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废；顾皆流览而达其定情，非沉迷不反，以身为妖冶之媒也。……其述怨情者，在汉人则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

三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

汉代文学，尚未进入自觉阶段，文人无意作诗人。其于诗歌创作，大抵有感而发，不尚雕琢，《古诗十九首》因之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

《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陈绎曾《诗谱》）

思王《野田黄雀行》，坦之云："词气纵逸，渐远汉人"。昌谷亦云："锥处囊中，锋颖太露。"二君皆自卓识。然此诗实仿"翩翩堂前燕"，非《十九首》调也。第汉诗如炉冶铸成，浑融无迹，魏诗虽极步骤，不免巧匠雕镌耳。（《诗薮》内编卷一）



两汉诸诗，惟《郊庙》尚辞，乐府颇尚气，至《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辞藻骨气，略无可寻，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同上，卷二）

"东城高且长……"。"回车驾言迈……"。"文采双鸳鸯……"。"朱火然其中……"。"明月皎夜光……"。"穆穆清风至……"。"冉冉孤生竹……"。"燕赵多佳人……"等句，皆千古叙事之祖，而深情意远，隐见交错其间，且结构天然，绝无痕迹，非大冶熔铸，何能至此？（同上，卷二）

《三百篇》，非一代音也；《十九首》，非一人作也。古今专门大家，吾得三人：陈思之古，拾遗之律，翰林之绝，皆天授，非人力也。（同上，卷二）

昔人谓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窃谓二京无诗法，两汉无诗人。……自余乐府诸调、《十九》杂篇，求其姓名，可尽得乎？即李、枚数子，亦直写

襟臆而已，未尝以诗人自命也。(《诗薮》，外编卷一)

《三百篇》后，便有《十九首》。宏壮、婉细、和平、险急，各极其致，而总归之浑雅。(孙矿《文选评》)

《古诗十九首》，浑沦磅礴，纯乎元气。(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三十"十九首"条)

有谓"东风摇百草"，"秋草凄以绿"已逗六朝门径；又有尚取"古欢"、"新心"等字以为生别。不知"古诗"浑浑浩浩，纯是元气结成。若以字句求之，真是呓语。(费锡璜《汉诗总说》)

《十九首》之妙，如无缝天衣。后之作者，顾求之针缕襞绩之间，非愚则妄。(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四)

无题之诗，天籁也；有题之诗，人籁也。天籁易工，人籁难工。《三百篇》、《古诗十九首》，皆无题之作，后人取其诗中首面之一二字为题，遂独绝千古。汉、魏以下，有题方有诗，性情渐离。(袁枚《随园诗话》卷七)

用笔之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如百尺游丝宛转；如落花回风，将飞更舞，终不遽落；如庆云在霄，舒展不定。此惟《十九首》、阮公、汉、魏诸贤最妙于此。……(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

《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诗至此，始可谓其中有物也已。(刘熙载《艺概·诗概》)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被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王国维《人间词话》)



《古诗十九首》因事命意、触物起情，文人因迷醉于赋的手法而一度被忘却的比兴艺术，再度焕发异彩。故其诗情物相感，意象、意境深远。

子建《杂诗》，全法《十九首》意象，规模酷肖，而奇警绝到弗如。(《诗薮》内编卷二)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朱火然其中，青烟飏其间。从风入君怀，四坐莫不欢。""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穆穆清风至，吹我罗衣裾。青袍似春草，长条随风舒。""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

为新婚，兔丝附女萝。”“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等句，皆千古言景叙事之祖，而深情远意，隐见交错其中。且结构天然，绝无痕迹，非大冶镕铸，何能至此！（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

《诗》四始之体，惟颂专为郊庙颂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触物比类，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无定。以故，说诗者人自为见。……惟《十九首》犹存此意，使人击节咏叹，而未能尽究指归。……余谓《十九首》，五言之《诗经》也。（王世懋《艺圃撷余》）

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诗三百》几于无愧，凡以得见诗人之本意也。（张戒《岁寒堂诗话》）

凡诗深言之则浓，浅言之则淡，故浓淡别无二道。诗之妙在托，托则情性流而道不穷矣。风人善托，西汉饶得此意，故言之形神俱动，流变无方。……情动于中，郁勃莫已，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故其言直而不讦，曲而不洿也。《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陆时雍《古诗镜总论》）

“采采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即五言中，《十九首》犹有得此意者。（王夫之《姜斋诗话》）

诗有性情，兴、观、群、怨是也。诗有倚托，事父事君是也。诗有比、兴，鸟兽草木是也。言志之格律，尽于此三者矣。后人咏怀寄托，不免偏有所作。《十九首》包含万有，磕着即是。凡五伦之理，莫不毕该，却又不入理障，不落言诠，此所以独高千古也。（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总论》）



十九首第一点特色在善用比兴。比兴本为诗六义之二，三百篇所恒用，国风中尤什居七八。降及楚辞，“美人芳草”，几舍比兴无他技焉。汉人尚质，西京尤甚，其作品大率赋体多而比兴少。长篇之赋，专事铺叙无论矣，即间有诗歌，也多半是径情直遂的倾写实感。到十九首才把“国风”、《楚辞》的技术翻新来用，专务“附物切情”，胡马越鸟，陵柏涧石，江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妩媚。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纯借牛女作象征，没有一字实写自己情感，而情感已活跃句下。此种作法，和周公的《鸱鸮》一样，实文学界最高超的技术。（原注：汉初作品如高祖之《鸿鹄歌》、刘章之《耕田歌》，尚有此种境界，后来便很少了。）

论者或以含蓄蕴藉为诗之惟一作法，固属太偏，然含蓄蕴藉，最少应为诗的要素之一，此则无论何国何时代之诗家所不能否认也。十九首之价值，全在意内言外，使人心醉，其真意所在，苟非确知其“本事”，则无从索解，

但就令不解，而优饫涵讽，已移我情。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不是凭空替牛郎织女发感慨，自无待言，最少也是借来写男女恋爱。再进一步，是否专写恋爱，抑或更别有寄托而借恋爱作影子，非问作诗的人不能知道了。虽不知道，然而读起来可以养成我们温厚的情感，引发我们优美的趣味，比兴体的价值全在此。这种诗风，到十九首才大成。后来唐人名作，率皆如此，宋则盛行于词界，诗界渐少了。（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均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艺术修养，故其因情为文，虽出语平淡自然，不刻意求工求深，而意蕴自然丰厚，韵味各有特色。

读《古诗十九首》及曹子建诗，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类，诗皆思深远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学者当以此等诗常自涵养，自然下笔不同。（《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引《吕氏童蒙训》）

《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古诗》云：“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皆无愧于《国风》矣。（张戒《岁寒堂诗话》）

《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如“客从远方来，寄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也。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昂然非复在家之时。若陈思王“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声调铿锵，诵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晋诗家常话与官话相半；迨齐、梁开口俱是官话。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强，家常话自然。（谢榛《四溟诗话》卷三）



诗赋各有体制。两汉赋多使难字，堆垛联绵，意思重叠，不害于大义也。诗自苏、李、《十九首》，格古调高，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矣。（同上，卷四）

《风》、《雅》三百，《古诗十九首》，谓无句法，非也。极自有法，无阶级可寻耳。（《艺苑卮言》卷一）

“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缓”字妙极。又《古歌》云：“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岂古人亦相蹈袭耶？抑偶合耶？“以”字雅，“趋”字峭，俱大有味。（同上）

“东风摇百草”，“摇”字稍露峥嵘，便是句法为人所窥。“朱华冒绿池”，

"冒"字更捩眼耳。"青袍似青草"，复是后世巧端。(《艺苑卮言》卷一)

诗之难，其《十九首》乎？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盖千古元气，钟孕一时，而枚、张诸子，以无意发之，故能诣绝穷微，掩映千古。(《诗薮》内编卷二)

苏、李、《十九首》与乐府微异，工拙浅深之外，别有其妙。乐府能着奇想，着奥辞，而《古诗》以雍穆平远为贵。乐府之妙，在能使人惊；《古诗》之妙，在能使人思。然其性情光焰，同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灭处。(钟惺《古诗归》)

《十九首》近于赋而远于《风》，故其情可陈，而其事可举也。虚者实之，纡者直之，则感寤之意微，而陈肆之用广矣。夫微而能通，婉而可讽者，《风》之为道美也。(陆时雍《古诗镜总论》)

《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情长。(同上)

汉代歌谣，承《离骚》之后，故多奇语。魏武文体，悲凉慷慨，与诗人不同。然史志所称，自有平美者，其体亦不一。如班婕妤"团扇"，乐府也。"青青河畔草"，乐府也。《文选》注引古诗多云"枚乘乐府"，则《十九首》亦乐府也。伯敬承于鳞之后，遂谓奇诡聱牙者为乐府，平美者为诗。其评诗至云，某篇某句似乐府，乐府某篇某句似诗。谬之极矣！(冯班《钝吟杂录·古今乐府论》)

此诗(按：指《古诗十九首》)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之为尽也。尽言之则一览无余，惟含蓄不尽，故反言之，乃使人足思。盖人情本曲，思心至不能自已之处，徘徊度量，常作万万不然不想。今若决绝，一言则已矣，不必再思矣。故彼弃予矣，必曰亮不弃也；见无期矣，必曰终相见也。有此不自决绝之念，所以有思，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后人不知，但谓《十九首》以自然为贵，乃其经营惨淡，则莫能寻之矣。(《采菽堂古诗选》卷三)



理明句顺，气敛神藏，是谓平淡。如《十九首》岂非平淡乎？苟非绚烂之极，未易到此。窃见诗家误以浅近为平淡，毕世作不经意、不费力皮毅数语，便栩栩自为历陶、韦之奥，可慨也已！(黄子云《野鸿诗的》)

茗香谓孔氏之门如用诗，则汉之古歌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庑之间坐陶、杜。此说较之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可坐廊庑之间，自然胜矣，然亦未尽允也。三代以后诗或一代，或一集，无全入《三百篇》之室者，以圣贤相传"诗言志"、"思无邪"之旨，或不得之，或得之而未醇也。

然其中可择而取焉；汉之乐府古歌辞及《十九首》气体古质淡泊，皆与《三百篇》为近，则皆升堂者，不能谓《十九首》独入室也。陶之高逸、杜之沈厚，气体虽不尽与汉同，亦皆升堂者也。使陶、杜犹坐廊庑，则王、孟、韩、白等将安置乎？然汉之乐府古歌辞、《十九首》与陶、杜集，其中有精而又精者，实足以动天地而感鬼神，是又时入《三百篇》之室者也。若香高视《十九首》而卑视乐府，高视汉而卑视陶、杜，此第以气体论诗，非知诗之本教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

五言古诗或兴起，或比起，或赋起，须要寓意深远，托词温厚，反复优游，雍容不迫。或感古怀今，或怀人伤己，或潇洒闲适。写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写感慨之微意；悲欢含蓄而不伤，美刺婉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之遗意方是。观汉、魏古诗，蔼然有感动人处。如《古诗十九首》皆当熟读玩味，自见其趣。（杨载《诗法家数》“五言古诗”条）

《古诗十九首》汲取《诗三百》、汉乐府民歌的表现手法，换韵自然、章法复沓、长于叠字的运用，诗歌的言情、写景、状物，无不因此生色。

《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萧萧”两字，处处可用，然惟坟墓之间，白杨悲风，尤为至切，所以为奇。……此句用“悲”、“愁”字，乃愈见其亲切处，何可少用耶？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固不可预设法式也。（张戒《岁寒堂诗话》）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女，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皆用叠字，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古诗》之韵如《三百篇》协用者，“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是也。如洪武韵互用者，“灼灼园中柳，熠熠似苍鹰”是也。汉人用韵参差，沈约类谱，始为严整。（谢榛《四溟诗话》卷一）

诗被于乐，声之也。声微而韵悠然长逝者，声之所不得留也。一击而尽者，瓦缶也。诗之饶韵者，其钲磬乎！“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其韵古；“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其韵悠；“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其韵亮；“晨风飘岐路，零雨被秋草”，其韵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韵幽……凡情无奇而自佳，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也。（《古诗镜总论》）

诗用叠字最难。《卫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涉涉，鳣鲔发发。

蔑葭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叠字，可谓复而不厌，赜而不乱矣。《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即无人可继。……（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诗用叠字"条）

齐、梁间人喜言音调，平仄互用，不可紊乱；皆前贤未睹此理。然以沈约、谢朓诗与《十九首》并读，勿问其他，尚言音调，相去已远。盖元气全则元音足，古诗惟《十九首》音调最圆，子建、嗣宗犹近之，宋、齐则远矣。（《汉诗总说》）

诗文家不可重复说，此最为俗论。如"行行重行行"，下云"与君生别离"，又云"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又云"道路阻且长"，又云"相去日以远"，在今人必讶其重复。"昭昭素明月，光辉烛我床"，曰"昭昭"，又曰"素"，又曰"明"，又曰"光辉"。《满歌行》亦重叠言之；他诗不可枚举。汉人皆不以为病。自叠床架屋之说兴，诗文二道皆单薄寡味矣。（同上）

问："五古亦可换韵否？如可换韵，其法何如？"

历友（张笃庆）答："五古换韵，《十九首》中已有。然四句一换韵者，当以《西洲曲》为宗……

萧亭（张实君）答："《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生年不满百》皆换韵。……一韵气虽矫健，换韵意方委曲。有转句即换者，有承句方换者，水到渠成，无定法也。……"（郎廷槐《师友诗传录》）

四　《古诗十九首》的地位和影响



《古诗十九首》不仅是定型的五言诗体，也是文人诗进入成熟阶段的显著标志；它的出现，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龙·明诗》）

（古诗）其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诗品》上）

古今人诗人推及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张戒《岁寒堂诗话》）

诗体《三百篇》流为《楚辞》，为乐府，为《古诗十九首》，为苏、李五

言，为建安、黄初，此诗之祖也。《文选》刘琨、阮籍、潘、陆、左、郭、鲍、谢、诸诗、渊明全集，此诗之宗也。老杜全集，诗之大成也。（杨载《诗法家数》"总论"条）

（《古诗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遂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艺苑卮言》卷二）

《三百篇》荐郊庙，被弦歌，诗即乐府，乐府即诗，犹兵寓农，未尝二也。诗亡乐废，屈、宋代兴，《九歌》等篇以侑乐，《九章》等作以抒情，途辙渐兆。至汉《郊祀》十九首、《古诗十九首》，不相为用，诗与乐府，门类始分，然厥体未甚远也。如《青青园中葵》，曷异古风？《盈盈楼上女》，靡非乐府。（《诗薮》内编卷一）

前人谓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噫！是何言也？以汉之乐府古歌辞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庑之间坐陶、杜，庶几得之。（宋大樽《茗香诗论》）

夫古诗，难言也。《诗三百篇》中"何不日鼓瑟"、"谁谓雀无角"、"老马反为驹"之类，始为五言权舆。至苏、李、《十九首》，体制大备。（《带经堂诗话》卷一）

诗有道统，不可不究其所自。姑综其要而言：《风》、《骚》之外，于汉曰《十九首》，曰苏、李，于魏曰曹、刘，于晋曰左、阮、渊明，于宋曰鲍、谢，于齐曰玄晖，于梁曰仲言，于陈曰子坚、孝穆，于周曰子山，此数公者，虽各自为一家言，而正始之绪，截然不紊。（《野鸿诗的》）

《古诗十九首》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时。自昭明叙其次第，登之《文选》，论五言者，咸以是为圭臬，不可增减，不能移易。（钱大昕《古诗十九首说序》）

《古诗十九首》作非一人一时一地，为由《三百篇》，成五言之祖。殆起于东京，调不迫切，语意敦厚，尚有风人遗旨，为诗教一大转关，学者不可不读。盖自此五言出而《诗三百》之风不可复追矣。（刘光贲《古诗十九首注》"全诗总论"条）



自《古诗十九首》出，其题材内容与表现手法为后人所师法，几至形成模式。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

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谓之直截根源，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诗赋麤精，譬之絺绤，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识诵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诗三百，可以博其源；遗篇十九，可以约其趣；乐府雄高，可以厉其气；《离骚》深永，可以裨其思。（徐祯卿《谈艺录》）

"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即"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也；"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即"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也；"借问叹者谁，云是荡子妻"，即"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也；"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即"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也。子建诗学《十九首》，此类不一，而汉诗自然，魏诗造作，优劣俱见。（《诗薮》卷二）

《十九首》不出于一人手，作于一时，要皆臣不得于君而托意于夫妇朋友，深合风人之旨。后世作者，皆不出其范围。（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按"托意"之说，不合事实；然言后之作者"不出其范围"，庶几近之。）

（阮籍）《朝登洪坡颠》言己如鸾凤，尘世无可托足。凡此诸篇，往复一意，皆古人之雅言，而在今日则皆为陈言。《古诗十九首》中，亦多此等意旨。（《昭昧詹言》卷三）

（陶渊明）《拟古》（荣荣窗下兰），此亦仍是屈子及《十九首》、阮公等意。（同上，卷四）



《古诗十九首》不独为后人师法，亦成为后世论诗的标准之一。

近世诸公，以作诗自名者甚众。然往往持论太高，开口辄以《三百篇》、《十九首》为准，六朝而下，渐不满意，至宋人殆不齿矣。此固知本之说，然世间万变，皆与古不同，何独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三）

《十九首》后，得其调者，古今曹子建而已；《三百篇》后，得其意者，古今杜子美而已。元亮之高，太白之逸，自是词坛绝步，但入此二流不得。（《诗薮》外编卷四）

而庵曰：诗人自宋、元以来，而论诗者备矣。其去唐已远，要皆得之揣摩，无有师承，规矩放失，至于今日，颓波莫挽，有志之士，为之慨然。夫

《三百篇》、《十九首》之旨，固无有能析之者；其论唐诗，辄曰雄、曰浑、曰奇、曰奥、曰新、曰秀、曰高、曰亮，总不出乎才气、声调之间，又极论对仗、照应、重犯等，诗之道如是而已乎？议论愈繁，成就愈少，亦可以知其故矣。（徐增《而庵诗话》）

昔沈休文以子建"函京"、仲宣"灞岸"、子荆"零雨"、正长"朔风"并称。姜坞先生云："此沈所云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者也。"又云："古人尝好去取之旨，亦所未喻。"余按，仲宣"灞岸"，诚为冠古独步。"函京"篇非子建极作，而高深严重，故非凡子所及。正长"朔风"，原本《风》、《雅》，韵律似《十九首》，然无警妙。若子荆"零雨"，非所知也。（《昭昧詹言》）

姜坞先生云："士衡《拟古》，蒙所未喻。其于前人章句，想倍诵有余，何尝深妙也。往时钱受之诋李、何诸人形模汉、魏，而举陆十二首为善学古人。其徒冯班复云：'士衡学《十九首》，如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暇。'一师一弟，率皆盲语瞎赞。"愚谓钱、冯所论，诚如姚所讥。（同上）

五言古诗，厥其甚尊，《三百篇》后，此其继起，以简质浑厚为正宗。苏、李赠答、《古诗十九首》后，唯陈思诸作及阮公《咏怀》、子昂《感遇》等篇，不逾分寸。余皆或出或入，不能一致也。（施补华《岘佣说诗》）



第二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总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极混乱的时期；但在文化思想与文学艺术方面，却是中国历史上甚活跃、且富于创造精神的时期。

第一节　建安文学

一　汉末中央集权政治的崩溃

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的相替专权；党锢之祸与政治的急剧腐败；高利贷、土地兼并与农民的大量破产，削弱了中央集权统治，并导致公元184年的黄巾农民大起义。



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中平元年……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后汉书·皇甫嵩传》)

张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刘石、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不减数千。灵帝不能讨……后遂弥漫不可复

数。(《三国志·张燕传》裴注引《九州春秋》)

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割据势力渐起。中平六年（189），何进调陇西军阀董卓入京诛宦官，酿成董卓之乱，进而又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临县）人也。少好侠，常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灵帝时）迁中郎将，讨黄巾，军败抵罪。韩遂等起凉州，复为中郎将……拜前将军，封斄侯，征为并州牧。灵帝崩，少帝即位，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谋诛诸阉官，太后不从。进乃召卓使将兵诣京师……卓未至，进败。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将其众迎帝于北芒，还宫。……卓既率精兵来，适值帝室大乱，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初平元年（190）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卓至西京，为太师，号曰尚父……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百姓嗷嗷，道路以目。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卓将吕布共谋诛卓。……遂杀卓，夷三族。(《三国志·董卓传》)



初平元年春正月，关东州郡皆起兵以讨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诸将皆板授官号。(时卓挟天子，绍等罔攸禀命，故权宜板授官号——胡省三注)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冀州牧韩馥留邺，给其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俱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众各数万。(《资治通鉴》卷五九)

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定都许昌，改年号为建安（196—220），自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七年，曹操败袁绍于官渡，平定北方；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中国进入魏、吴、蜀鼎足而立的相对稳定时期，汉代政治大一统就此彻底崩溃。

建安元年……太祖将迎天子……秋七月，杨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太祖遂至洛阳，卫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九月，车驾出轘辕而东。……五月春正月……（曹操）遂东击（刘）备，破之……八月……（袁）绍复进临官渡……冬十月……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熹救合肥。权闻熹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由于汉末历年的战乱，中原一片萧条，户口十不存一，社会经济惨遭破坏。

傕等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三国志·董卓传》）

献帝即位，而董卓兴乱，大焚宫庙，劫御西迁，京师萧条，豪杰并争……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白骨盈野……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余年。及……（魏）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昔汉永和五年（140），南阳户五十余万，汝南户四十余万，方之于今，三帝鼎足，不逾二郡。加有食禄复除之民，凶年饥疾之难，见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



二　汉末文人思想观念与人生态度的转变

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异端思想崛起，文人思想获得解放。

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

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桓、灵之间，党祸两见，志士仁人，多填牢户，文人学士，亦扞文网，固已士气丧而儒风寂寥矣。……《三国志》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

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利为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学者，师商（鞅）、韩（非）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则风俗之流弊。”（《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

文人从凝固僵化的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开始以进取、务实的姿态，追求建功立业，拯济天下。在此过程中，文人又有感于社会的离乱，民生的凋敝，生命的短暂，兴衰荣辱的难以把握，诗歌抒情言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事功不朽与文章不朽同为建安文人追求的人生理想，文学乃脱出两汉经学的桎梏，进入自觉的时代。

故司空颍川荀爽言之，以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寿与不寿，不过数十岁；德义立与不立，差数千岁，岂可同日言也哉？”（徐干《中论·夭寿》）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



三　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的风格特征，被后人标举为“建安风力”、“汉魏风力”或“建安风骨”。

刘勰论“风骨”。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文心雕龙·风骨》）

刘勰所论，乃文学的美学理想，非专指建安文学。但他的“风骨”理论，本源于曹丕的“文气”说；而且“志深而笔长”，“梗慨而多气”的建安文学，也是符合他关于“风骨”的美学理想的。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子，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同上）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按：参看本节第二所引《文心雕龙·时序》）。

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以“建安风力”标举建安文学，其意亦与刘勰近似。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按：陈延杰《诗品》注：“《魏志·陈思王植传》：‘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此云平原兄弟，盖谓曹植与白马王彪焉。上云曹公父子，乃指操与丕者。陈伯弢先生说。）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



刘师培进一步把建安文学的上述特征具体概括为清峻、通脱、骋词、华靡，并结合社会与思想的变迁，分别阐述了它们的形成原因。

清峻：汉末政治、军事的割据和异端思想的崛起，扫荡了经学牵强附会、繁琐求证的作风。其时，曹操以刑名法术进取天下，于

鞍马间为文，用语简捷，词气峭厉，不容斟酌。即文人所作，无论指事写意，皆不傍经典，直达所怀。文风清峻，乃成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点。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通脱：汉末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已不复存在，文人脱卸了道德与礼教的重压，重新发现自我，往往能率心任性，表达真实情感。兼之沉浮于风云变幻，目睹人间悲剧，人们深感事功难以尽凭，命运不可逆料，转而注重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的思索。故这一时期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的乐观精神，又有产生于人生无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闷，通脱之风，由是形成。



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中国中古文学史》同上）

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骋词：汉末群雄割据，诸侯并起，战国之世，仿佛再现，为文人的实现抱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遇和选择机会。其时，文人无

论议论时事、抒写情志，都力求充分表现自我，气盛词壮，乃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又一特点。

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中国中古文学史》同上)

……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为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按：鲁迅在本文中说：“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故刘师培所言“骋词”，鲁迅侧重言其“壮大”，观两家所论，皆有“气盛词壮”之意。)

华靡：两汉文章的由质转文，已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建安时期，曹操虽质朴为文，但因文学已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其独特的个性开始受到文人自觉的重视，文学之渐趋华丽，乃成为时代的风气。

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见《杨赐》、《蔡邕》传——原注。)(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点校本误为“杨赐《蔡邕传》”。灵帝好俳辞，兴鸿都门学，事见《后汉书》杨赐、蔡邕本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中国中古文学史》同上)



由汉至魏，文章变迁，计有四端：西汉之时……若贾生作论，史迁报书，刘向、匡衡之献疏，虽记事记言，昭书简册，不欲操觚率尔，或加润饰之功，然大抵皆单行之语，不杂骈骊之词；或出语雄奇，或行文平实，咸能抑扬顿挫，以期语意之简明。东京以降，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其变迁者一也。西汉之书，言词简直，故句法贵短，或以二字成一言，而形容事物，不爽锱铢。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练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魏代之文，则合二语成一意。由简趋繁，昭然不爽。其变迁者二也。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治，致失本真。(魏、晋之文，虽多华

靡，然尚有清气。至六朝以降，则又偏重词华矣——原注）其变迁者三也。西汉文人，若扬、马之流，咸能洞明字学，故选词遣字，亦能古训是式，非浅学所能窥。东汉文人，既与儒林分列，故文词古奥，远逊西京。魏代之文，则又语意易明，无俟后儒之解释。（此由文章之中，奇字古文，用者甚少——原注。）其变迁者四也。要而论之，文虽小道，实与时代而变迁。故东京之文，殊于西京；魏代之文，复殊东汉。（刘师培《论文杂记》第九）

孝文帝曹丕……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有《典论》……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它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 s Sake）的一派。……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第二节　正始文学



一　一场亵渎名教的血腥斗争

黄初元年（220），魏文帝曹丕代汉。黄初七年，曹丕卒，魏明帝曹睿即位，改元太和。景初二年（238），曹睿病危，以司马氏权势日盛，免去司马氏亲信大将军曹宇之职，任曹爽为大将军。景初三年，曹睿死，齐王曹芳立，改元正始（240）。从正始十年至甘露五年（260）二十年间，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进行了六次政治、军事方面的较量，每次斗争，均以曹魏集团的惨败而告终。这场斗争的特点是：它主要发生在上层集团内部，但依附于各个集团的文

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介入；斗争的双方都在维护名教的名义下，行翦除异己之实，手段异常残酷，名教的虚伪性因此暴露得淋漓尽致。

(正始）十年正月，车驾朝高平陵，爽兄弟皆从。宣王部勒兵马，先据武库，遂出屯洛水浮桥。奏爽曰："……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三国志·魏书·曹爽传》)

司马宣王既诛曹爽，进（王）淩为太尉，假节钺。（王）淩、（令狐）愚密协计，谓齐王不任天位，楚王（曹）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嘉平）三年春，淩阴谋滋盛，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太傅司马宣王。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淩。……淩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宣王……宣王承诏遣主簿解缚反服……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淩至项，饮药死。宣王……乃穷治其事。彪赐死，诸相连者悉夷三族。(《三国志·魏书·王淩传》)

(夏侯）玄以爽抑绌，内不得意。中书令李丰虽宿为大将军司马景王所亲待，然私心在玄。遂结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谋欲以玄辅政。……嘉平六年二月，当拜贵人，丰等欲因御临轩，诸门有陛兵，诛大将军，以玄代之，以缉为骠骑将军。……大将军微闻其谋，请丰相见，丰不知而往，即杀之。事下有司，收玄、缉、铄、敦、贤等送廷尉。……于是丰、玄、缉、敦、贤等皆夷三族，其余亲属徙乐浪郡。(《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

初，（毌丘）俭与夏侯玄、李丰等厚善。扬州刺史、前将军文钦，曹爽之邑人也。……正元二年正月，有慧星数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俭、钦喜，以为己祥。遂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大将军统中外军讨之。……安风津都尉部民张属就射杀俭，传首京都。……（俭弟）秀、（孙）重走入吴。……俭子甸为治书侍御史，先时知俭谋将发，私出将家属逃走新安灵山上。别攻下之，夷俭三族。钦亡入吴。(《三国志·魏书·毌丘俭传》)

(诸葛）诞既与玄、飏等至亲，又王淩、毌丘俭等累见夷灭，惧不自安，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甘露）二年五月，征为司空。诞被诏书，愈恐，遂反。……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吴人大喜，遣将……率三万众，密与文钦俱来应诞。……大将军司马文王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



吴人坚守。诞不听，由是争恨。钦素与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大将军乃自临围，四面进兵……诞窘急，单乘马，将其麾下突小城门出。大将军司马胡奋部逆击，斩诞，传首，夷三族。诞麾下数百人坐不降，见斩……(《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

帝（曹髦）见权威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 自出讨之。"……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陈留王讳奂……高贵乡公卒，公卿议迎公。六月甲寅，入于洛阳，见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景元二年）十二月壬戌，天禄永终，历数在晋。诏群公卿士具仪设坛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玺绶册、禅位于晋嗣王，如汉魏故事。(《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

二 魏晋风度与正始之音

在正始时期的血腥杀戮和政治高压之下，文人朝不虑夕，动辄得咎。饮酒服药，放荡形骸，乃成为他们寄托愤懑、逃避祸端、保全性命的唯一选择，魏晋风度由是兴起。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无妄之日，神才高杰，故为世道所莫容。风邈挺特，荫映于天下；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属马氏执国，欲以智计谋皇祚，诛诅胜己，靡或有遗。玄伯、太初之徒，并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审于此时非自免之运，若登朝进仕，映迈当时，则受祸之速，过于旋踵。自非霓裳羽带，无所自全。故以饵术黄精，终于假涂托化。阮公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风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难，如为有涂。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故毁形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仲容年齿不悬，风力粗可，慕李文风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朋侣，然后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王二公，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于野泽衔杯举

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沈约《七贤论》）

由于司马氏借名教杀人，依附于曹魏集团的人士往往以自然对抗名教，从而导致玄学的兴起。又因为政治上的高压，汉末以来的清议脱离时政，演变为清谈。清谈与玄学结合，进一步推动了玄学的发展。在魏晋之际，玄学既是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又是文人保性全身的手段，更为文人纵欲任情提供了口实。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玄学的普及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它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它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的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者也。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王衍传）。是时阮籍亦素有高名，口谈浮虚，不遵礼法（裴頠传）。……其后王衍、乐广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天下言风流者，以王、乐为称首（乐广传）。后进莫不竞为浮诞，遂成风俗（王衍传）。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愍帝纪论）。其时未尝无斥其非者：如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世反谓之俗吏。裴頠又著《崇有论》以正之（裴頠传）……范宁亦谓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熊远、陈頵，各有疏论，莫不大声疾呼，欲挽回颓俗。而习俗尚已成，江河日下，卒莫能变也。今散见于各传者，裴遐善言元理，音词清畅，泠然若琴瑟，尝与郭象谈论，一座尽服……此可见当时风尚大概也。其中未尝无好学者，然所学亦止以供谈资。向秀好老庄之学，尝注解之，读者超然心悟。郭象又从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风遂盛。（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

正始时期，捲入玄学论争而又于文学有不同程度之贡献者，有“正始名士”和“竹林七贤”。

（袁）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以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仲为竹林七贤。（《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



三　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一）才性四本之争与文学

才性四本之争，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命题之一。

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南齐书·王僧虔传》）

争论的焦点在才、性的离合异同。性，指人的内在，诸如气质、性情、道德、教养等；才，指人的行为能力，也包括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魏晋思想家因其政治态度与际遇的不同，一派主张才、性统一（即合、同），即主张以外在事功，证明自己禀性的优劣，依附司马氏集团者大都持此种观点。一派主张才、性并不统一（即离、异），即认为外在事功与自己禀性的优劣并无必然联系，依附曹魏集团者大都持此种观点。

贤不肖者，人之性也。……然则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明矣。（袁准《才性论》）

（钟）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异。（《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魏略》）



（荀粲）常谓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途间，功名必胜我，但识劣耳。"嘏曰："能盛功名者，识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余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奖也。然则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识所独济也。我以能使子等为贵，然未必齐子等所为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晋阳秋》）

性至上说或才性离异说的兴起，促使两汉以来注重事功的人生价值观向着魏晋的尊重个性、重视人格完美、精神自由方面转化。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

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嵇康《养生论》)

奉法循理，不絓世网，以无罪自尊，以不任为荣。游心乎道义，偃息乎卑室。恬愉无遌，而神气条达，岂须荣华，然后乃贵哉？……不以荣华肆志，不以隐约趋俗，混乎与万物并行，不可宠辱，此真有富贵也。(嵇康《答向子期难养生论》)

魏晋之际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直接影响到人物的评议标准、文人的人生态度乃至文学艺术的美学境界。诸如神气、神情、神韵、神貌、神明、风神、风韵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个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具、遗形取神的表现方法已受到作家、艺术家们的相当重视。

如此时的人物评议，或直接描绘其内心世界：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世说新语·赏誉》)

林下诸贤，各有儁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同上)



或以其神情难摹，则托之比喻：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世说新语·赏誉》)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或评议人物，竟至遗形取神：

裴令公有儁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

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世说新语·容止》)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同上)

对艺术中心、物关系问题，嵇康虽然持心、声二元论，阮籍对借以达情的物持更为虚无的态度，但他们在心、物关系中更看重个体的体验和表达，无疑对提高古代文学艺术的美学境界和美学创造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夫喜怒哀乐，爱憎惭惧，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传情，区别有属，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为称，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而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则谓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则内外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无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也。苟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嵇康《声无哀乐论》)

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昔黄帝登仙于荆山之上，振《咸池》于南岳之岗，鬼神其幽，而夔、牙不闻其章。……是以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阮籍《清思赋》)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学意义

就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引发的一场论争，是魏晋之际政治斗争在玄学上的反映。

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长官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而所以成问题者，在当时主张自然与名教互异之士大夫中，其崇尚名教一派之首领如王祥、何曾、荀顗三大孝，即佐司马氏欺人孤儿寡妇，而致位魏末晋初之三公者也。(参《晋书》二三上王祥传、何曾传、二九荀顗传)。其眷怀魏室，不趋典午者，皆标榜老庄为学，以自然之宗。(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在玄学的范畴，正始名士一般都对名教与自然持调合的态度，即言辞激烈的嵇康，亦承认人伦秩序乃是自然秩序的反映。

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人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声无哀乐论》）

君子曰：《易》顺天地，序万物，方圆有正体，四时有常位……故立仁义以定性，取蓍龟以制情，仁义有偶而祸福分。是故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审乎人之德者不忧，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阮籍《通易论》）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因为魏晋时所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即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但在政治的范畴，正始名士愤激于司马氏的以名教杀人，更多的时候则是对名教及名教的思想基础六经持强烈的否定态度。



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族类。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嵇康《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

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各从其命，以度相守。……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形，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

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贱、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不道，不亦过乎！（阮籍《大人先生传》）

对名教与六经的批判，必然有助于正始文人努力摆脱外在事功与理性规范的束缚，而渴求皈依自然，发现自我。嵇康的“师心以遣论”，阮籍的“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正说明正始文人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自然心性的解放和创作心理的自由。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其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嵇康《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

夫称君子者，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值心而言，则言无不是；触情而行，则事无不吉。（嵇康《释私论》）

（三）“言意之辩”与文学

言意之辩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庄子以为道不可认识，更不可言传。但他同时又认为道在万物，人可以借物达道，物因此成为人与道之间的媒介。这是庄子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魏晋之际，言意关系问题随着玄学的兴起，再次引发争论。当时，欧阳建持“言尽意”论，王弼持“言不尽意”论，荀粲持“言意在象外”论。其中，尤以王弼论言、象、意的关系对文学的发展最有推动作用。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尽象，象以言著。故言者可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而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

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断见矣。（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对言意的关系问题，嵇康虽未见有直接的论述，但观《声无哀乐论》，其所云声情关系，亦即言家的言意关系；其所云声不知心，亦即言家的言不尽意。

……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假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夫会宾盈室，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而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若资不固之音，含一致之声，其所发明，各当其分，则焉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邪？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声无哀乐论》）

就实质而言，“言不尽意”与“言意在象外”实属同一范畴。正始时期言、意、象关系的建立，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在艺术的创作与审美中注意到了形象大于思维这一事实。以言绘象、以象明意，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遂使意象、意境成为魏晋之际诗歌追求的最高美学理想，中国文学的自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妙在象外。（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

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大抵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张戒《岁寒堂诗话》）

这时的文学，因外在功利与传统思想的束缚愈益松弛，作家不独能纵心适意，表现自我，文章的华丽壮大，也超过建安。

……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摛采骋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盛于竹林诸贤，溯其远源，则阮瑀、陈琳已开其始。(《中国中古文学史·魏晋文学之变迁》)

彦和以"响逸调远"评籍文，与《魏志》"才藻艳逸"说合；盖阮文之丽，丽而清者也。以"兴高采烈"评康文，亦与《魏志》"文词壮丽"说合；盖嵇文之丽，丽而壮者也。均与徒事藻采之文不同。(同上)

又因为玄学的影响，这时的论说文章，其观点的新颖和思辩的精微，亦超过以往。

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文心雕龙·论说》)

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颜氏家训·勉学》)

……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盖成于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夏侯玄、钟会之流，亦属此派；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中国中古文学史·魏晋文学之变迁》)



第三节　两晋文学

公元265年，晋武帝以晋代魏；太康年间（280—289），又进一步统一中国，西晋社会一度出现稳定繁荣的气象。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制度正式确立，中国文学逐渐向士族化阶段过渡。

一 西晋的政治制度

(一) 西晋士族制度的确立

东汉后期，诠选官吏，已重门第。三国时期，曹丕为争取士族支持，施行九品官人法，士族地位愈益巩固。

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人错杂，详核无所。延康元年（220），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通典》卷十四《选举》二）

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傥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审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诠第等级，凭之授受，谓免乖戾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贤愚。（同上《选举》二注）

魏晋之际，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在权力斗争中均拉拢士族，士族地位愈益提高。西晋建国后，为巩固政权，中正取士，于当朝显贵而外，颇依门第，士族因此具有了世袭的政治特权，士庶矛盾也因此产生并渐趋激化。



（刘）毅以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乃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帝竟不施行。（《晋书·刘毅传》）

（段）灼前后陈事，辄见省览。然身微宦孤，不见进序，乃取长假还乡

里。临去，遣息上表曰："……今大晋应期运之所授……而吴人不臣……故宜畴咨博采，广开贡士之路，荐岩穴，举贤才，征命考试，兼俊莫用。今台阁选举，途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晋书·段灼传》）

其时，占田、赐客、荫客、荫亲属制的实行，又赋予士族以经济的世袭特权。晋室对占田、荫客数量虽有限制，但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士族经济势力的膨胀。

及平吴之后……又制户调之式……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按：唐长孺《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疑"五十"当为"十五"），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晋书·食货志》）

（二）晋初分封制



晋室惩于魏氏孤立，建国之初，分封同姓王二十七人，皆授以兵权；又分封异姓士族，立国多达五百余，借以互相牵制，屏藩帝室，就此伏下分裂隐患。

武帝受禅之初，泰始元年（265），封建子弟为王二十余人，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邑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国，官于京师。……公侯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初虽有封国，而王公皆在京都。咸宁三年，诏徙诸侯王公皆归国。……其未之国，大国置守士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都侯县公亦如小国。……皆自选其文武官。（《文献通考》卷二七一《封建考》一二）

二 两晋播迁的悲剧

西晋相继灭蜀、吴之后，统一中国不过十年，即爆发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

武帝临崩，欲以汝南王亮与皇后父杨骏同辅政。骏匿其诏，矫令亮出镇许昌。惠帝既立，贾后擅权，杀杨骏。废杨太后，征亮入与卫瓘同辅政。亮与楚王玮不协。玮谄于贾后，诬亮、瓘有废立之谋。后乃使帝诏玮杀亮、瓘，又坐玮以矫杀亮、瓘之罪，即日杀玮。后益肆淫恣，废太子遹，杀杨太后。时赵王伦在京师，素谄贾后，其嬖人孙秀……又恐太子聪明，终有疑于伦，不如待后杀太子……乃使后党讽后。后果杀太子。伦遂矫诏与齐王冏率兵入宫，废后……寻害之。伦自为相国、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冏内怀不平，秀觉之，出冏镇许昌。伦僭位，以惠帝为太上皇，迁于金镛。于是冏及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共起兵讨伦。……伦寻伏诛。颖遂还邺，冏入京帝拜冏大司马，如宣、景辅魏故事。冏大权在握，沈湎酒色……有校尉李含奔于长安，诈称有诏使河间王颙讨冏，颙遂上表请废冏，以成都王辅政，并檄长沙王乂为内主。冏遣兵袭乂，乂径入宫，奉帝讨斩冏。颙本以乂弱冏强，冀乂为冏所杀，而以杀乂之罪讨之，因废帝立颖，己为宰相，可以专政。……颖亦以乂在内，己不得遥执朝权。于是颙遣将张方率兵与颖同向京师。……乂为张方所杀。颖入京……朝政悉颖主之。……安北将军王浚起兵讨颖，颖战败，仍拥帝还洛阳。……颙废颖，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东海王越自徐州起兵迎大驾……越兵入关，奉惠帝还于洛阳。颖窜于武关、新野间，有诏追捕之，为刘舆所害。颙亦单骑逃太白山……有诏征颙为司徒，颙入京，途次为南阳王模所杀。惠帝崩，怀帝即位。越出讨石勒而卒。此八王始末也。（《廿二史札记》卷八《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北方匈奴族乘势坐大。永嘉四年（310），刘曜等率军南下，破洛阳，晋怀、愍二帝相继被害。建武元年（317），元帝即位于建康，自此，东晋偏安江南达八十余年。

刘聪……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遣粲及其征东王弥、龙骧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署其卫尉呼延晏为使持节前锋大都督、前军大将

军……自宜阳入洛川，命王弥、刘曜及镇军石勒进师会之。……刘曜至，复与晏会围洛阳。时城内饥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阳门陷，弥、晏入于南宫……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曜于是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迁帝及惠帝羊后……于平阳。（《晋书·刘聪传》）

晋怀帝永嘉五年，为刘曜所掳。次年，贾疋等已奉秦王邺为皇太子，都于长安，然犹未即尊位。直至永嘉七年，怀帝崩问至，始称帝，是为愍帝。愍帝建兴四年，降于刘曜。次年，元帝称晋王于建康，亦未即尊位。又明年，愍帝崩问至，如称帝。（《廿二史札记》卷八《愍元二帝即位》）

三　晋世文人的作风与文风

两晋一百五十余年间，祸乱迭起，安宁日短。在此背景之下，享有政治与经济特权的士族，门阀的利益、世俗的享乐，自然远在王室兴衰、国家命运之上，因而不再有建安文人在社会离乱中的慷慨进取，正始文人在政治恐怖中的忧愤两集。两晋世族型的人格风貌与文学风貌由是形成。

（一）晋人之文，趋向雅化



晋文学之雅化，与帝王提倡有关。司马氏为夺取政权，曾依靠士家大族的支持；而这些士族，大都为儒学世家。此外，司马氏既以名教为武器翦除异己，又以禅让的方式窃取政权，更须兴儒学、修礼乐、存教化、明尊卑以巩固政权。故司马炎称帝以后，尝以儒学传家自诩，而羞言为将门之后；尊儒崇文，乃成为西晋立国的基本国策。

胡贵嫔，名芳，父奋。……帝尝与之摴蒱，争矢，遂伤上指。帝怒曰："此固将种也！"芳对曰："北伐公孙，西距诸葛，非将种而何？"帝甚有惭色。（《晋书·后妃传》）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制度多未能复古。历东、西京四百余年，故往往改变。魏氏承汉末大乱，旧章殄灭，命侍中王粲、尚书卫觊草创朝仪。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𫖮因魏前代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

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

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晋书·荀崧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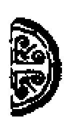
晋初太学生三千人。(《南齐书·礼志》)

两晋时期，士族居清职而显要，文化修养，已视作当然的特权。朝廷的重儒崇文，自然投合士族的口味。

……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晋书·职官志》)

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南齐书·礼志》)

在此背景下，晋世文人务为博闻多识，其于为文或清谈，亦不免炫博学识，务求典雅。



及金行纂极，文雅斯盛。张载擅铭山之美，陆机挺焚研之奇，潘、夏连辉，颉颃名辈，并采繁缛，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嘉声茂迹，陈诸别传。至于吉甫、太冲，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阐，中兴之时秀。信乃金相玉润，林荟川冲，埒美前修，垂裕来叶。(《晋书·文苑传序》)

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宋书·谢灵运传论》)

即庶族出身的文人，因风气所在，亦步其后尘，如左思之作《三都赋》。

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卫權《三都赋略解》）

晋南渡以后，玄言诗赋的畅谈理旨，虽不同于西晋文人的博奥典雅，但作者炫耀学问、追求雅化的心态，与西晋文人亦非常相似。

在晋中兴，玄风独秀，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驰骋文词，义殚乎此。（《宋书·谢灵运传论》）

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

（二）晋人之文，益尚华美

汉末以来，文章渐趋华丽；曹丕对此，更有自觉的提倡。但晋人的尚美，又有自己的特点。

在两晋祸乱迭起的时代，士族虽享有诸种特权，依然难以自保，如张华、刘逵、陆机、潘岳等，皆相继被害。因而士族在响往仕进、追逐荣名的同时，又深感世事难以逆料，仕途更多艰险。在此心态支配之下，士族乃凭借优越的条件，以玄学纵心适意为口实，尽情享受声色，而不再干犯名教。兼之中正选官，依门第而不依德行，故朝廷虽崇儒教，文人益放荡无行。



西晋之士，其以嗣宗为法者，非法其文，惟法其行。用是清谈而外，别为放达。据《世说·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谓："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据《晋书》所载，则山简、张翰、毕卓、庾敳、光逸、阮孚之流，皆属此派，即傅玄所谓"魏氏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文选·晋纪总论》注引干氏《晋纪》载玄上书——原注）。应詹所谓"以容放为夷达"（《文选·晋纪总论》注引刘谦《晋纪》所载詹表——原注）是也。（《中国中古文学史·魏晋文学之变迁》）

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为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列子·杨宋》）

（按：今存《列子》，乃晋人伪作。此言可视作晋人享乐主义宣言。）

其时侈靡豪奢，享乐淫逸之风，弥满朝野。

时帝（晋武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晋书·胡贵嫔传》）

（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刘毅等数劾奏曾侈汰无度，帝以重臣，一无所问。（《晋书·何曾传》）

（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侈相尚。恺以粭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耀目，如恺比者甚众。恺怳然自失矣……（《晋书·石崇传》）

生活既极尽侈靡，尚美必近乎病态。建安时代的阳刚之美，渐为阴柔之美所取代。魏晋之际何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世说新语·容止》注引《魏略》），又"好服妇人之服"（《晋书·五行志》），实已开士族好尚病态美的风气之先。其后晋人因袭不改，并推广为社会的普遍风气。



王濛……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邪！"居贫，帽败，自入市买之。妪悦其貌，遗以新帽，时人以为达。（《晋书·王濛传》）

（潘）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时张载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委顿而反。（《晋书·潘岳传》）

（卫）玠……风神秀异……总角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骠骑将军王济，玠之舅也，隽爽有风姿，每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

觉我形秽。"又尝语人曰："与玠同游，冏若明珠之在侧，朗然照人。"(《晋书·卫玠传》)

王丞相见卫洗马（玠），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世说新语·容止》)

（王）机兄矩……美姿容，每出游，观者盈路。(《晋书·王机传》)

其人如此，其文亦弃却建安的健美，正始的壮丽，而渐次流入绮靡。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文心雕龙·明诗》)

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文心雕龙·时序》)

到了东晋，朝廷偏安日久，文人耽于玄释，又渐得山水佳趣，心境渐趋平和，陷于网罗者亦少于西晋。这时的文人，放诞之风尽革，谈玄亦有深致。



东晋人士，承西晋清谈之绪，并精名理，善论难。……其与西晋不同者，放诞之风，至斯尽革。又西晋所云名理，不越老庄；至于东晋，则支遁、法深、道安、慧远之流，并精佛理。……大抵析理之美，超越西晋。而才藻新奇，言有深致，即孙安国所谓"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世说新语·文学》)

这时的文学，乃别有一种清丽隐秀、简淡玄远之美。

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辞联词，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词，无闻焉耳。(《宋书·谢灵运传论》)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乃成、康促龄，穆、哀短祚，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淡思浓采，时洒文囿。(《文心雕龙·时序》)

《雕龙·才略篇》曰："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

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孙盛、干宝，文胜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彩略同。袁宏发轸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孙绰规旋以矩步，故伦序而寡状；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之闲情，并解体辞赋，缥缈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彦和所举，舍庾亮、温峤兼擅事功，孙盛、干宝尤长史才外，均以文学著名。彦和所未举者，别有庾阐、曹毗、王珣、习凿齿、嵇含，亦长文学。(《中国中古文学史·魏晋文学之变迁》)

（三）晋人之文，更尚真情

自建安诸子渐藻玄思、侈陈哀乐，正始名士蔑弃礼教，哀乐由己，自我表现与自我抒情，在传统文学之中，已占一席之地。到了西晋，士族凭恃门第而不修德行，怯于祸乱而溺于哀乐，耽于玄释而又捐本舍实，礼教的束缚，愈益松弛，文人更注重个人的世俗生活与情感体验。

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止所亲。……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夫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夫亵黩而达于淫邪哉？(《抱扑子外编·刺骄》)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



因为如此，晋人爱亲人、爱朋友、爱山水、爱艺术，热烈纯情，可以为之而死，中国的文学，乃进入一个更富于情感、更敢于任情表达的时代。

建安哀词，惟伟长差善……及潘岳继作，实踵其美。观其善虑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文心雕龙·哀吊》)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复尝此否？"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世说新语·伤逝》)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情深！"（《世说新语·任诞》）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世说新语·任诞》）

（潘）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采菽堂古诗选》卷一一）

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语）！是哀乐过人，不同流俗。尤以对于朋友之爱，里面富有人格美的倾向。……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

第四节　晋宋山水田园文学

一　晋宋迭代与南方政治经济状况

（一）刘宋王朝的兴起



东晋偏安江南期间，帝室与士族，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之间矛盾迭起，不独未能有效地实行北伐，而且有王敦、苏峻、司马道子、桓玄的相继作乱。公元399年，孙恩、卢循起义爆发，桓玄趁机废晋安帝，自立为帝，国号楚。公元404年，北府军将领刘裕击败桓玄；420年，灭东晋，建立宋朝。

桓玄……大司马温之孽子也。……元兴初，元显称诏伐玄……（玄）乃留其兄伟守江陵，抗表，率众下至寻阳，移檄京邑，罪状元显。……又矫诏加己总百揆、侍中、都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显之恶，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显于市。……自祸乱屡构，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及玄之至也，黜凡佞、擢俊贤，君子

之道粗备，京师欣然。后乃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元兴二年）十二月……（玄）又矫诏使遣兼太保，领司徒，奉皇帝玺禅位于己。……于是刘裕、刘毅、何无忌等共谋复兴……（《晋书·桓玄传》）

（桓）玄篡位，以（恭）帝为石阳县公，与安帝俱居寻阳。及玄败，随至江陵。……（义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安帝崩……是日，即帝位。……（元熙）二年夏六月壬戌，刘裕至于京师。傅亮承裕密旨，讽帝禅位，草诏，请帝书之。帝欣然谓左右曰："晋氏久已失之，今复何恨！"乃书赤纸为诏。甲子，遂逊于琅琊第。……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弑帝于内房。（《晋书·恭帝纪》）

（二）刘宋的"元嘉之治"

宋文帝励精图治，二十七年间，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史称"元嘉之治"。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艰难。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职。而王略外举，未遑内务；奉师之费，日耗千金。播兹宽简，虽所未暇，而绌华屏欲，以俭抑身，左右无幸谒之私，闺房无文绮之饰，故能戎车岁驾，邦甸不扰。太祖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方，六戎薄伐，命将动师，经略司、兖，费由府实，役不及民。自此区寓晏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



与此同时，宋文帝兴学校，始设玄、儒、文、史四馆，以发展文化事业。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宋书·雷次宗传》）

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隋书·经籍志序》）

（三）刘宋王朝的衰落

由于刘宋政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士庶矛盾，加之连年北伐用兵，皇室又内乱迭起，故很快走上衰落道路。

自宋氏失御，礼教凋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沦杂，罔计厮庶……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而托姻结，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此为甚。……王、满连姻，实骇物听。……臣等请参议，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沈约《弹王源文》）

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虏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454—456），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世之盛，自此衰矣。（《宋书·良吏传序》）

大明之末（463），积旱成灾，虽弊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宋书·孔季恭等传末史臣论》）

……宋武九子、四十余孙、六七十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且无一有后于世者。当其勃焉兴也，子孙繁衍，为帝为王……及其败也，如风之卷箨，一扫而空之……（《廿二史札记》卷一一《宋之孙屠戮之惨》）



中国山水田园文学兴起于东晋、刘宋时期，其原因颇值得探讨。

二　庄园经济与山水田园文学

汉末及东晋永嘉时期，战乱频仍，城市经济遭受破坏，人口大量转入农村。世族特权的持续膨胀与无地农民对世族的依附，使世族庄园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循将士，甚得其欢心。（《晋书·郭默传》）

灵运父祖（按，祖指谢玄）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宋书·谢灵运传》)

晋元帝过江……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南齐书·州郡志上》)

封闭自足，是世族庄园经济的最大特点。

吴之晚世，尤剧之病。……秉维之佐，牧民之吏……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抱朴子》外篇《吴失篇》)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

文人生活在庄园之中，无论家居或出游，皆能尽得山水园田之美。

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而以作赋。……其辞曰：

……若夫巢穴以风露贻患，则《大壮》以栋宇祛弊；宫室以瑶旋致美，则白贲以丘园殊世。惟上托于岩壑，幸兼善而罔滞。虽非市朝而寒暑均也，虽是筑构而饰朴两逝。……自园之田，自田之湖，泛滥川上，缅邈水区。濬潭涧而窈窕，除菰洲之纡余。毖温泉于春流，驰寒波而秋徂。风生浪于兰渚，日倒景于椒涂。飞渐榭于中沚，取水月之欢娱。旦延阴而物清，夕栖芬而气敷。顾情交之永绝，觌云客之暂如。……(《山居赋》)

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宋书·谢灵运传》)

文人生活环境的转变，不独影响到他们的审美情趣，也直接影响到文学创作的题材。

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



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词，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傥值其心耳。（《山居赋序》）

三　地理因素与山水田园文学

永嘉乱中，北方士人随晋室南迁。为协调南北世族利益，北方世族多居会稽一带。

晋迁江左，中原衣冠之盛萃于越，为六州文物之薮，高人文士，云合影从。（《大清一统志·越郡志略》）

始宁（按：始宁县属会稽）沃川有佳山水，（王）弘之又依岩筑室。谢灵运，颜延之并相钦重。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晋书·王弘之传》）

江南山川风貌，迥异于北方，南下士人，耳目为之一新。

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括枫柏，擢干疏条。潭壑镜澈，清流泻注。王子美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会稽郡志》）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



王子敬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同上）

山水之美如此，文人秉笔，不免寄情。

伊昔龆龀，实爱斯文。援纸握管，会性通神。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爰暨山栖，弥历年纪。幸多暇日，自求诸己。研精静虑，贞观厥美。怀秋成章，含笑奏理。（自注：谓少好文章，及山栖以来，别缘既阑，寻虑文咏，以尽暇日之适。便可得通神会性，以永终朝。）（《山居赋》）

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宋书·谢灵运传》）

江南山水，曲折深秀，而都邑街衢，亦纡余委曲。这样的环境，亦影响到诗歌的风格。

晋室南渡，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若不可测。（《世说新语·言语》）

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亘，侧直齐平。……爰初经略，杖策孤征。入涧水涉，登岭山行。……研其浅思，罄其短规。非龟非筮，择良选奇。剪榛开迳，寻石觅岩。四山周回，双流逶迤。西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山居赋》）

四　朝隐之风与山水田园文学

晋宋王室与士族、士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使一部分士人在世俗的功利追求、个人的全身远害之间，持一种首鼠两端的态度，"朝隐"之风，由是兴起。此外，"朝隐"不独能缓冲入仕的矛盾，也能满足士人生活上溺于享乐，思想上耽于玄理的需求，因而弥散为上层社会的普遍风习。



（谢万）工言论，善属文，叙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四隐四显为《八贤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以示孙绰。绰与往反，以体公识远者则出处同归。（《晋书·谢万传》）

（孙绰）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尝鄙山涛，而谓人曰："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若以元礼门为龙津，则当点额暴鳞矣！"（《晋书·孙绰传》）

（刘惔）性简贵……尤好老庄，任自然趣。……年三十六，卒官。孙绰为之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时人以为名言。（《晋书·刘惔传》）

（邓粲）少以高洁著名，与南阳刘驎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并不应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粲嘉其好贤，乃起应召。

骥之、公尚谓之曰："卿道广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无以难之，然粲亦于此名誉减半矣。(《晋书·邓粲传》)

因为"朝隐"之风的影响，自然山水在士人的精神生活中有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许由谓尧曰："坐于华殿之上，面双阙之下，君之荣愿亦已足矣夫?"

尧曰："余坐于华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栋；余立于棂扉之内，霏焉而云生于牖。虽面双阙，无异乎崔嵬之冠蓬莱；虽背墉郭，无异乎廻峦之萦昆仑。余安知其所以荣?"(符朗《符子》)

(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常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浚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晋书·谢安传》)

晋宋以来，佛徒构筑精舍，大抵在山林之中。士人响往"朝隐"，必多接交名僧，故其足迹，亦不免徘徊于都市与山林之间。文学的题材发生变化，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自托此山二十三载，再践石门，四游南岭。东望香炉峰，北眺九江，传闻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鳞踊出。野人不能叙，直叹其奇而已矣。(释慧远《庐山记》)



(慧)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高僧传·慧远传》)

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萧统《陶渊明传》)

(渊明)居浔阳柴桑，与周续之、刘遗民并不应辟命，世号"浔阳三隐"。……常往来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以行。(慧)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莲社高贤传》)

五　玄言与山水田园文学

魏晋以来，玄学大盛，士人追求"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

（王弼《老子》第二十九章注）的人格美，故自然与人的关系更为亲近。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同上）

山水之美既与人格之美相关，因而能否领略自然之美，乃成为衡量人格境界的一项重要标准。

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世说新语·赏誉》）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同上《品藻》）

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同上《栖逸》）

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谢灵运《名山序》）

老庄以道生万物，物乃成为达道的媒介。而万物之中，唯有未受人世污染的自然山水最能体现道的内蕴与真美。故在魏晋玄风大畅的时代，士人不仅以能否体会山水之美为人、道关系的衡量标准，而且进一步把以我之自然，面对山水之自然作为人、道关系的理想境界。可见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艺术关系建立的过程中，玄学是起了催化的作用的。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阮籍《达庄论》）

公吸峻极之秀气，诞命世之深量。微言散于秋毫，玄风畅乎德音。……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孙绰《太尉庾亮碑》）

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而有趣灵。……夫圣人以

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跕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宗炳《画山水序》）

（宗炳）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徧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之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宋书·隐逸列传》）

东晋以降，士人以佛入玄，自然山水亦成为体现玄学佛理的媒介。佛学的兴盛与玄佛的合流，对山水文学的产生，也是起了催化作用的。

太虚辽廓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融而为川渎，结而为山阜。嗟台岳之所奇挺，实神明所扶持。……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睹灵验而遂徂，忽乎吾之将行。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苟台峰之可攀，亦何羡于层城。释域中之常恋，畅超然之高情。……于是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思幽岩，朗咏长川。尔乃羲和亭午，游气高褰。法鼓琅以振响，众香馥以扬烟。肆观天宗，爰集通仙。挹以玄玉之膏，嗽以华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孙绰《道贤论》）



释法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斯日也，众情奔悦，瞩览无厌。……乃其将登，则翔禽拂翮，鸣猿厉响。归云回驾，想羽人之来仪；哀声相和，若玄音之有寄。虽仿佛犹闻，而神以之畅；虽乐不期欢，而欣以永日。当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寻之，夫岩谷之间，会物无主，应不以情，而开兴引人，深致若此，岂不以虚明朗其照，闲邃笃其情焉。并三复斯谈，犹昧然未尽。俄而太阳告夕，所存已往，乃悟

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无名氏《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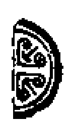
晋宋时期，因为文人的境遇与志趣的相异，自然物之进入文学创作的领域，在陶渊明为田园诗，在谢灵运为山水诗。就题材与风格而言，田园诗与山水诗虽不尽相同，但其文学与美学的意义，却是一致的。

晋宋间谢灵运等辈，纵情丘壑，动逾旬朔，人相尚以为高，乃其心则未尝无累者。惟陶靖节超然物表，遇境成趣，不必泉石是娱、烟霞是托耳。其诗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等句，皆遇境成趣，趣境两忘，岂尝有所择哉！（《诗源辩体》卷六）

游山水无本，虽模山范水，道不存焉。……康乐虽有冥会，顾身为车骑将军之孙，袭封爵，宋受禅复仕。则"倦世情之易挠"者无之……则"反无形于寂寞，长超乎尘埃"者无之，亦自贼其寿矣。渊明田园诗之佳，佳于其人有高趣也。使渊明诗山赋诗，不知又当何如？至宋之诗人，无踰康乐者，遂与陶并称，幸矣！（宋大樽《茗香诗论》）

刘勰云："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游山水诗，应以康乐为开先也。（沈德潜《说诗晬语》）

第五节 齐梁陈文学



南北朝文学，可说是士族的、宫廷的文学。但刘宋上接魏晋，下启齐梁，具有过渡期的特点。真正能代表南朝文学特征的，是齐梁陈文学。齐梁陈文学特征的形成，与文学的贵族化、宫廷化很有关系。

一 南朝君臣的精神堕落

刘宋之后，百年之间，齐梁陈隋，兴亡相替。公元479年，中

领军萧道成废宋建齐，史称南齐；502年，雍州刺史萧衍代齐建梁，史称萧梁；556年，陈霸先废梁自立，国号陈；直至589年，隋军南下灭陈，南北始复归一统。在这样一个篡乱相替的时代，南朝君主不再奢望永保社稷而唯以苟且度日为务，南朝士族更依赖于门阀特权而唯以保族全身为念。在此背景之下，无论士族与新贵，皆自取身荣而不恤国事，传统道德与国家观念愈益淡薄，建安时代文学慷慨进取的精神自此完全消歇。

史臣曰：……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南齐书·王俭传论》)

高祖（即梁武帝——引者注）在西邸，与（沈）约游旧。建康城平，引为骠骑司马，将军如故。时高祖勋烈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佗日又进曰："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万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今童儿牧竖，悉知齐祚已终，莫不云明公其人也。……"(《梁书·沈约传》)

史臣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裒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堕废，祸生邻国。……(《陈书·后主纪》)



因为如此，士族务实能力衰退，气质愈益敏感、纤弱。

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颜氏家训·涉务》)

二 南朝君臣的生活腐朽

在这样一个绝望的时代，南朝君臣从广阔的社会退缩回贵族的、宫廷的狭小圈子，放纵感官于世俗的享乐。

古来荒乱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如江左宋、齐两朝之多者。宋武以雄杰得天下，仅三年而即有义符。文帝元嘉三十年，号称治平，而末有元凶之悖逆。孝武仅八年，而有子业。明帝亦八年，而有昱。齐高，武父子仅十五年而有昭业。明帝五年而有宝卷。统计八、九十年中，童昏狂暴，接踵继出。盖劫运之中，天方长乱，创业者不永年，继体者必败德。是以一朝甫兴，不转盼而覆灭，此固气运使然也。今摘于左。……按宋、齐、陈书及《南史》所记如此，其无道最甚者，其受祸亦最烈。若仅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则虽亡国而身尚得全。又可见劫运频促中，仍有报施不爽者，可以观天道矣。(《廿二史札记》卷一一《宋齐多荒主》)。

（羊）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穷极奢靡。……初赴衡州，于两艖䑧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缋，盛设帷屏，陈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梁书·羊侃传》)

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征曰：……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狎群小，皆委之以衡轴。谋谟所及，遂无骨鲠之臣；权要所在，莫非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陈书·后主纪》)

诗文的作者是帝王，是高贵的士大夫，随着南朝政治的现实情形，这些人的脆弱和堕落的程度在一直地加剧，那个统治的圈子是一天天地缩小了。……处于同一的背景，对于由门阀出身的士大夫，比较还有一套传统的家教门风，可以缓和对刺激的要求，使它寄托在佛教玄理或诗文书籍上；数典用事和注重声律的风气，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但出身于寒微的帝王们（南朝刘萧萧陈皆寒门出身——原注）便不同了，他们的文化教养的传统少，而生活的堕落和对刺激的要求却又是同样的，或者更甚的强烈，这就产生了南朝宫闱之中的怪诞和荒淫。（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隶事·声律·宫体

——论齐梁诗》)

又由于南北对峙相对稳定，南方经济繁荣，贵族与商人互相援引，商人们把世俗享乐带入上层社会，加剧了南朝君臣的淫乐作风。

先王作乐崇德，以格神人……及周道衰微，日失其序……扰杂子女，荡悦淫志，充庭广奏，则以鱼龙靡漫为瑰玮；会同享觐，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纤罗雾縠侈其衣，疏金镂玉砥其器。在上班赐宠臣，群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斗，如恐不及，莫为禁令。伤风败俗，莫不在此。(裴子野《宋略》)

南朝君主为巩固政权，在隆推儒术、制礼作乐的同时，又纵谈玄理，尊崇佛教。

(梁武帝)洞达儒玄。……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述，开古圣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高祖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兼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梁书·武帝纪》)



梁时五经而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佛义。晋人虚伪之习，依然未改，且又甚焉。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

南朝三教并重，实则一无执着。相反地，老庄的脱略礼法，为肆心纵欲提供了口实；佛教以万恶淫为首，但一些佛徒的行为，更助长了当时上层社会的淫恶风气。

自释氏流教，其来有源……然习慧者日替其修，束诫者月繁其过，遂至糜散锦帛，侈饰车从。复假精医术，托杂卜数，延姝满室，置酒浃堂，寄夫托妻者不无，杀子乞儿者继有。而犹倚灵假像，背亲傲君，欺费疾老，震损

宫邑。……(《宋书·周朗传》)

三 南朝君臣的文化品位

对南朝士族而言，郡望家世而外，文化素养是其特有的标志。南朝君主为拉拢士族并获得士族的尊重，也必须在文化上占据一席之地。南朝君主莫不能文；宋文帝设儒、玄、文、史四馆并由此成为南朝各代的制度，皆有助于确立君主对文化的领导地位。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飚起。……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文心雕龙·时序》)

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甚。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南史·文学传序》)

中国文学，至两汉、魏、晋而大盛。然斯时文学，未尝别为一科，(故史书亦无《文苑传》——原注)故儒生学士，莫不工文。其以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刘宋始。考之史籍，则宋文帝时，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使司徒参军谢元掌之。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此均文学别于众学之征也。故《南史》各传，恒以“文史”、“文义”并词，而《文章志》诸书，亦以当时为最盛。……按：齐、梁文学之盛，虽承晋、宋之余绪，亦由在上者之提倡。据《齐书·高帝纪》谓：“帝博学善属文”，故高帝诸子，若鄱阳王锵好文章，江夏王锋能属文，并见《齐书》、《南史》，非唯豫章王嶷工表启，武陵王晔工诗已也。嗣则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衡阳王钧、随王子隆，均爱好文学，招集文士。又开国之初，王俭之伦，亦以文章提携。故宗室多才，而庶姓之中，亦文人蔚起。梁承齐绪，武帝尤崇文学。嗣则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并以文学著闻。此即《南史·梁纪》所谓“文物之盛，独美于兹”也。故武帝诸子能文者，有豫章王综、邵陵王纶、武陵王纪；其诸孙能文者，有后梁主詧、南康王会理、建安县侯义理、寻阳王大心、南郡王大连、乐良王大圜；其宗室能文者，有长沙王业、安成王秀、南平王伟、鄱阳王范、上黄侯晔，而安成、南平二王，尤好文士。任昉之流，



亦为当时文士所归。此亦梁代文学兴盛之由也。……陈代开国之初，承梁季之乱，文学渐衰。然世祖以来，渐崇文学。后主在东宫，汲引文士，如恐不及，及践帝位，尤尚文章。故后妃宗室，莫不竞为文词。又开国功臣如侯安都、孙玚、徐敬成，均结纳文士。而李爽之流，以文会友，极一时之选。故文学复昌，迄于亡国。（《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略》）

士族既以其文化的特权自傲于庶族，也自傲于出身布衣的王室，因而更倾注全部的热情，把自己的文化打磨得华丽而精致。

高祖旁求儒雅，文学之盛，焕乎俱集。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若彭城刘溉、吴兴邱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皆后来之秀也。（《梁书·文学传序》）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文心雕龙·明诗》）

至于魏晋，文风下衰；宋齐以降，盖以滋薄。然其间鼓曹、刘之气焰，耸潘、陆之风格，舒颜、谢之清丽，藹何、刘之婉雅，虽风兴或缺，而篇翰可观。（姚铉《唐文粹·自序》）

宋、齐、梁、陈文学之盛，既综述于前。试合当时各史传观之：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如《南史》称刘孝绰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又王筠与诸儿论家门文集书谓："史传所称，未有七叶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门者。"此均实录之词。惟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文思敏速，或援笔立成，或文无加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略》）



四　隶事、声律与宫体

因为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在文化上的竞争，热衷于知识的积累和炫耀，成为当时的普遍风气。分别事物，排比典故，谓之"隶事"；"隶事"的多寡，关乎知识与技能的高下。

（萧）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

辞翰，皆发教撰录"（《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

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南齐书·王俭传》）

（沈）约尝侍谯，值豫州献栗，经半寸，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梁书·沈约传》）

炫耀知识的结果，乃有类书的大量出现。

类书起于魏文帝时撰集的皇览，原来主要是为了博览检阅的方便来编纂的，但后来却成了属文时取材的宝库。魏志文帝纪云："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作皇览。"……本来邺下风流就是后来帝王和文人们企羡的对象，而皇览这书又对他们底以数典用事为工的属文努力有帮助，则类书的编纂自然也会引起他们的模仿和注意。正如四库提要类书类序言所云："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裨贩，实学颇荒。"……随着数典用事之风的流行，齐梁时编纂类书的风气也盛极一时……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云："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钞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梁书刘峻传云："安成王秀好峻学，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又南史四十九峻传言梁武帝恶刘峻："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卷七十二何思澄传云："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八年书乃成，合七百卷。"……又梁书简文帝纪所载著述中有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也都是诸儒纂集的类书。……由以上这些记载，可知齐梁时这种风气之盛了。……足见类书对于文人的主要用途，即在属文时隶事数典的方便。它是知识的仓库，可以任人随时检用，来炫耀自己的富博和才能；因为在那个生活圈子里，无论属文或日常应世，这些知识都是高贵的文人们所不可缺少的啊！（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隶事·声律·宫体》）

时尚如此，这时的文学，务以数典用事为能。

（任昉）晚节转好作诗，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之士慕之，转为穿凿。（《南史·任昉传》）



（梁）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峻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南史·刘峻传》）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钟嵘《诗品·序》）

齐、梁文翰与东晋异，即诗什亦然。自宋代颜延之以下，侈言用事，学者浸以成俗。齐、梁之际，任昉用事，尤多慕者，转为穿凿。盖南朝之诗，始则工言景物，继者唯以数典为工。（观齐、梁人所存之诗，自离合诗、回文诗、建除诗外，有四色诗、八音诗、数名诗、州郡名诗、药名诗、姓名诗、鸟兽名诗、树名诗、草名诗、宫殿名诗各体，又有大言、小言诸诗，此均惟工数典者也——原注。）考之史传，《南史》称王俭尝使宾客隶事，梁武集文士策经史事；而类书一体，亦以梁代为胜，藩王宗室，以是相高，虽为博览之资，实亦作文之助；即《诗品》所谓"文章殆同书抄"、《齐书》所谓"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也。故当时世主所崇，非惟据韵，兼重长篇，诗什既然，文章亦尔。用是篇幅益恢，偶词滋众，此必然之理也。（《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略》）

南朝君臣于书画音乐，亦大抵兼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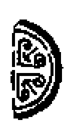
因为艺术修养的全面提高，兼之魏晋谈玄，已重"韶音令辞"（《世说新语·品藻》），佛教的讲经、唱导，更尚"协谐钟律，符靡宫商"（《高僧传》卷一三），南朝君臣无论说话和作文，都很注重辞藻的修饰和声音的华美。

（周）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汎涉百家，长于佛理。……每宾友会同，颙虚席晤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通，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卫将军王俭谓颙曰："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时何胤亦精言佛法，无妻妾。太子又问颙："卿精进何如胤？"颙曰："三涂八难，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对曰："周妻何肉。"其言辞应变，皆如此也。……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南齐书·周颙传》）

自晋代人士均擅清言，用是言语、文章虽分二途，而出口成章，悉饶词藻。晋、宋之际，宗炳之伦，承其流风，兼以施于讲学。宋则谢灵运、瞻之属，并以才辩辞义相高，王惠精言清理。（并见《宋书·王惠传》——原注）齐承宋绪，华辩益昌。《齐书》称张绪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吐纳风流，听者皆忘饥疲（《绪传》——原注）。又称周颙音辞辨丽，辞韵如流，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颙传》——原注）。又谓张融言辞辩捷，周颙务为清绮；刘绘音采不赡，丽雅有风则（《绘传》——原注。）迄于梁代，世主尤崇讲学，国学诸生，惟以辩论儒玄为务，或发题申难，往复循环，具详《南史》各传。（梁代讲论之风，被于朝野，具详戚衮、周弘正、张讥、顾越、马枢、岑之敬各传——原注。）（《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略》）

齐梁文士既有此文化偏好，乃在前代文学实践与艺术审美的基础上，发明"四声论"，并创立了时号"永明体"的新体诗。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句，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闇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宋书·谢灵运传论》）



（沈）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史·陆厥传》）

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于往时。（《南史·庾肩吾传》）

周颙好为韵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皆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封氏闻见记·声韵》）

此外，齐梁君臣把自己的生活局促于贵族的、宫廷的狭小圈子，放纵感官的享乐，沉溺于个人情感的玩味，迷醉于知识的追求

和文学形式的精雕细琢，在此背景下，便产生了号称“宫体”的轻艳诗。到了陈朝，后主的荒淫更甚于前，宫体诗的作者与读者，乃至扩大到宫闱妇女。

“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词，起源自昔。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纻词》、《白铜鞮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南史·袁廓之传》谓：“时何润亦称才子，为文惠太子作《杨叛儿歌》，辞甚侧丽。廓之谏曰：‘夫《杨叛》者，既非典雅，而声甚哀’。”亦其证。）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明远乐府，固妙绝一时，其五言诗亦多淫丽，特丽而壮，与梁代之诗稍别。《齐书·文学传论》谓：“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斯鲍照之遗烈，”其确证也。）前则惠休。（绮丽之诗，自惠休始。《南史·颜延之传》云：“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事。’”即据侧丽之诗言之。）特至于梁代，其体尤昌。《南史·简文纪》谓：“帝辞藻艳发，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南史帝纪论》：“宫体所传，且变朝野”。魏征《梁论》亦曰：“太宗神采秀发，华而不实，体穷淫靡，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徐摛传》亦谓：“属文好为新变，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始。”盖当此之时，文士所作虽多艳词，（如徐摛特有轻艳之才，新声巧变，人多讽习是。）然尤以艳丽著者，实惟摛及庾肩吾，嗣则庾信、徐陵承其遗绪，而文体特为南北所崇。（《周书·庾信传》谓：“庾肩吾、徐摛、摛子陵及信，并为梁太子抄撮学士。既有盛才，文并绮丽，世号‘徐庾体’。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此则大同以后，文体之一变也。又据《陈书》、《南史·后主纪》及《张贵妃》各传，谓帝荒酒色，奏伎作诗，以宫人有文学者为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江总传》谓其尤工五七言诗，溺于浮靡，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多为艳诗，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又《孔范传》云：“文章赡丽，尤善五言诗，与江总等并为狎客。”《刘暄传》云：“后主即位，与义阳王叔达、孙范、袁权、王瑳、陈褒、沈瓘、王仪等陪侍游宴，暄以俳优自居，文章谐谬，语言不节。”是陈季艳丽之词，尤较前代为盛，即魏征《陈论》所谓“偏尚淫丽之文”也。（《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略》）（按：文中括号内文字，皆作者自注。）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征。竞一韵之巧，争一字之奇。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

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利禄之途既开，爱尚之情弥笃。（李谔《上隋文帝书》）

第六节 北朝文学

一 十六国时期的文学状况

从八王之乱到北魏统一北方中国，近一百五十年时间内，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与部分汉族豪强的割据势力此起彼伏，互相攻伐，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割据小国，中原地区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怀帝为刘曜所围，王师累败，府帑既竭，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火烟，饥人自相啖食。愍帝西宅，馁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晋书·食货志》）

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魏书·食货志》）

自刘渊、石勒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乱，随所跨擅。□□□□长，更相侵食，彼此不恒，犬牙未足论，绣错莫能比。（《魏书·地形志》）



文人亦随典籍南下，北方文坛，几乎一片赤地，所存者，唯章奏符檄一类应用文字。

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高才有德之流，自强蓬荜；鸿生硕儒之辈，抱器晦己。（《魏书·儒林传序》）

既而中州版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其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往往而间出矣。若乃鲁徵、杜广、徐光、尹弼之俦，知名于二赵；宋该、封弈、朱彤、梁谠之属，见重于燕、秦。然迫于仓卒，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

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北史·文苑传序》)

二　北魏初期的文学状况

公元36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399年，改号称帝，世称魏道武帝。自此，北方中国稍获稳定。公元42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相继灭夏、燕、北凉诸国，完成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魏为加强对中原各民族的统治，开始任用汉官，酌用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与典章制度，并渐次发展农业文化。

(神䴥) 四年……(九月) 壬申，(魏道武帝) 诏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遂征玄等。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北史·魏本纪第二》)

太祖 (拓跋珪) 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城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岂不以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为国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务，意在兹乎？……世祖 (拓跋焘) 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显祖 (拓跋弘) 天安初，诏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魏书·儒林传序》)

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弊，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至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魏书·食货志》)

虽然如此，北魏二帝以游牧民族首领入主中原，既有睥睨被征服者的自大，又有面对先进文化而产生的自卑，因而对汉人与汉族文化，始终持有拒斥与猜忌的心理。

太祖攻中山未克，六军乏粮……（崔）逞曰：“取椹可以助粮。故飞鸮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太祖虽衔其侮慢，然兵既须食，乃听以椹当租。……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天兴初，姚兴侵司马德宗襄阳戍，戍将郗恢驰使乞师于常山王遵，遵以闻。太祖诏逞与张衮为遵书以答。初，恢与遵书云：“贤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体，敕逞、衮亦贬其主号以报之。逞、衮乃云“贵主”。太祖怒曰：“使汝贬其主以答，乃称贵主，何若贤兄也！”遂赐死。后司马德宗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皆将来奔……太祖初闻休之等降，大悦。后怪其不至，诏兖州寻访，获其从者，问故，皆曰：“国家威声远被，是以休之等咸欲归阙。及闻崔逞被杀，故奔二处。”太祖深悔之。（《魏书·崔逞传》）

神䴥二年，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崔）浩及弟览……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初，郗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按：即前所言《国书》），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魏书·崔浩传》）

泰常二年，姚泓灭，（王）慧龙归国。太宗引见与言，慧龙请效力南讨。……后拜洛城镇将，配兵三千人镇金墉。既拜十余日，太宗崩。世祖初即位，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闻慧龙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见慧龙，曰：“信王家儿也。”王氏世齇鼻，江东谓之齇王。慧龙鼻大，浩曰：“真贵种矣。”数向诸公称其美。司徒嵩闻之，不悦，言于世祖，以其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魏书·王智龙传》）



在此背景之下，北朝的文学，难以繁荣。文人所作，大抵重实用而少文采。

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袭爵白马公。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魏书·崔浩传》）

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有许谦、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北史·文苑传序》）

三　北朝文坛的复兴

北魏历文成帝、献文帝两代，汉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公元495年，魏孝文帝力排众议，迁都洛阳，命鲜卑贵族改汉姓、说汉语、服汉服，全面实行汉化政策。

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之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高祖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既至代郡，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魏书·任城王云附子澄传》)

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资治通鉴》卷一四〇《齐纪》六)

太和十有九年，六月，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高祖纪》)

太祖天兴六年，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魏书·礼志》)



对于文化事业，孝文帝不独大力提倡，亦身体力行。

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高祖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闲集词翰，莫不縻以好爵，动贻赏眷。(《魏书·儒林传序》)

(高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魏书·高祖纪》)

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迁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隋书·经籍志序》)

因为有帝王的提倡和汉化政策的鼓励，沉寂百余年的北方文坛于是复甦。

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泉涌，言多胸臆；润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眇历岁年，未闻独得。既而陈郡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畴类，稍革其风。及明皇御历，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于是，陈郡袁翻、翻弟跃、河东裴敬宪、弟庄伯……雕琢琼瑶，刻削杞梓，并为龙光，俱称鸿翼。乐安孙彦举、济阴温子升，并自孤寒，郁然特起。咸能综采繁缛，兴属清华。比于建安之徐、应、刘，元康之潘、张、左、束，各一时也。(《北史·文苑传序》)

公元534年，魏孝武帝为军阀高欢所逼，逃出洛阳，北魏乃分为东、西二魏。550年，高洋灭东魏，自立为帝，国号齐，史称北齐。北齐文学承北魏余绪，亦有可观的局面。557年，宇文氏灭西魏，建立北周。577年，周武帝灭北齐。581年，隋文帝杨坚灭北周。在此期间，北朝文学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

有齐自霸图云启，广延髦俊，开四门以纳之，举八纮以掩之，邺京之下，烟霏雾集，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范阳卢元明……并其流也。复有范阳祖鸿勋亦参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愔……并在中书，参掌纶诰。其李广、樊逊、李德林，卢询祖、卢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独擅其美。河清、天统之辰，杜台卿……亦参加诏敕。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诏旨，其关军国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讽咏。……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蘭陵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名贤烈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虽然，当时操笔之徒，搜求略尽。……论其才性，入馆诸贤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待诏文林，亦是一时盛事……(《北齐书·文苑传序》)

周氏创业，运属陵夷，纂遗文于既表，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致青紫。(《北史·文苑传序》)



四　南北文学的融合

从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到北齐建国，北方经济恢复，各民族文化开始互相融合。这时的文学，既葆有北方民族尚质朴、重实用的作风，同时也师法汉晋，兼受南朝文学的影响，从而形成有别于南朝文学的风格特征。

暨永明（南齐武帝年号）、天监（梁武帝年号）之际，太和（魏孝武帝年号）、天保（北齐文宣帝年号）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北史·文苑传序》)

惟北朝文人，舍文尚实。崔浩、高允，咸硗确（垅埆）自雄。温子昇长于碑版，叙事简直，得张、蔡之遗规。卢思道长于歌辞，发音刚劲，嗣建安之逸响。子才（邢邵）、伯起（魏收）亦工记事之文。岂非北方文体，固与南方文体不同哉？(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

自庾信、王褒入北，影响和带动了北朝作家，南北诗风开始融合。



……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是时，世宗雅词云委，滕、赵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按：《周书》以“淫放”、“轻险”论庾信文章，虽失之片面，然亦可见南朝文学对北朝文学的明显影响。）

夫南朝绮艳，或尚虚无之宗；北地根株，不祖浮靡之习。若子山，可谓穷南北之胜。(倪璠《注释庾集题辞》)

第七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成就与贡献

综观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历时虽较两汉为短，但剧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朝代更替，则非两汉可以相比。这样的现实，对形成于两汉的忠于一国一君的传统，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并由此波及与之相关的许多道德伦理观念。除此之外，影响这一时期文人与文学的其它因素，也较两汉远为复杂。诸如士族制度的确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士庶矛盾、士族与王室的矛盾；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观念、人生态度和美学趣味的变化；士族的文化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音乐、书法、绘画的发展和士族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文化重心的南移、庄园经济的兴起，江南经济的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文人生活环境、审美情趣的改变；儒学独尊地位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解放、玄学论争与儒、释、道的合流；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原文化由衰落而走向民族融合的复兴过程。凡此种种，无不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此起彼伏，远较两汉更有特色。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玄言文学、田园山水文学、永明文学、宫体文学、北朝文学，以及独立于文人文学之外的南北朝乐府民歌，它们异象纷呈，各具风姿，更非门类与风格都较为单一的两汉文学可比。除此之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成就与贡献，还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就文学的主题而言，魏晋南北朝脱出了两汉美刺教化的文学功利原则和“天人合一”的经学思想桎梏，把目光更深刻地投向广阔的现实人生和个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使人成为文学的真正主题。就题材而言，它不仅抒写忧国优民、建功立业、个人际遇，也面向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面向与人的形神息息相通的自然山水。

……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

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同上）

汉魏诗兴寄深远，渊明诗真率自然。至于山林丘壑、烟云泉石之趣，实自灵运发之，而晖殆为继响。（《诗源辩体》卷七）

就技法而言，魏晋南北朝作家确立了声律的理论规范，形成了典故的运用传统，丰富了文学的修辞技巧。

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南史·庾肩吾传》）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文心雕龙·明诗》）

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文心雕龙·丽辞》）

自宋代颜延之以下，侈言用事……盖南朝之诗，始则工言景物，继则惟以数典为工。（《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五讲《宋齐梁陈文学概略》）

就体裁而言，魏晋南北朝既是五言诗的繁荣期。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心雕龙·明诗》）



自王、扬、枚、马，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钟嵘《诗品·序》）

七言诗的产生期。

《大风》、《柏梁》，七言权舆也。自时厥后，如魏文《燕歌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鲍照《行路难》，皆称杰构。（《说诗晬语》）

七古自晋世乐府以后，成于鲍参军，盛于李、杜……（李重华《贞一斋

诗说·诗谈杂录》)

格律诗的滥觞期。

五言律体，北自梁、陈。(《诗薮》内编卷四)

杨用修取梁简文、隋王勣、温子昇、陈后主四章为《七言律祖》，而中皆杂五言，体殊不合。余遍阅六朝，得庾子山"促柱调弦"、陈子良"我家吴会"二首，虽音节未甚谐，体实七言律也。(同上，卷五)

明远五言四句，声渐入律。

明远七言四句，有《夜听妓》一篇，语皆绮艳，而声调全乖，然实七言绝之始也。

五言至梁简文而古声尽亡，然五、七言律绝之体于此而备，此古律兴衰之几也。

庾(信)七言八句有《乌夜啼》，于律渐近……

王褒五言，声尽入律……

张正见五言，声尽入律……

陈后主五言，声尽入律……

江总五言，声尽入律……(《诗原辩体》卷九、十)

骈文的成熟期。



四六之体，粗备于范晔、谢庄，成于王融、谢朓，而王、谢复渐开律体。影响所及，迄于隋唐，文则悉成四六，诗则别为近体，不可谓非声律开其先也。又四六之体既成，则属对日工，篇幅益趋恢广，此亦必然之理。(《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略》)

骈文在齐、梁之间成立了，当时好像称之为"今体"。例如梁简文帝《与湘东王论文书》曰："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到了晚唐始用"四六"之名，即李商隐名其文集曰《樊南四六甲乙集》。但是在这以前，柳宗元的《乞巧文》有"骈四俪六，锦心绣口"之语，那么彼时或者已经把这名称加于文体，也未可知。宋以来四六成了普通之名，宋代有《四六话》、《四六谈麈》等书，明人有《四六法海》之著。至隋代称为"骈体"或"骈文"，在《骈体正宗》、《骈文类苑》等书名上，多用此称。把它称为四六是因为文中多用四字句或六字句以整齐句调的原故；把它称为骈体，是因为文中多用对句以修

饰其文辞的原故；这两件事是它的特色。若寻骈体发达之迹，虽然也有人或远溯秦李斯的《谏逐客书》，汉初贾谊的《过秦论》，但是其最显著的，却是前汉宣帝时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四子讲德论》。至后汉此风渐盛，班固之《典引》，崔骃的《达旨》，蔡邕的《释诲》等文，已显示着向着六朝的骈体接近。在思想家的文章，如王充之《论衡》，王符之《潜夫论》，仲长统之《昌言》等著作中，也用着接近此体的文章。这样，及至魏、晋之顷，曹植之文，开六朝靡丽之端，陆机出此风益盛；宋颜延之、谢灵运等复承其前后；气运既熟，到齐、梁之间，遂由沈约等奠定了此体的基础。在齐武帝永明末年，沈约、谢朓、王融等把周颙之言语学的声韵说采用到文章之上，以图音调的谐和，时人称之为“永明体”，这是骈文倡道之始，陈之徐陵、庾信等后继者出，骈文越发的修饰起来，传至唐代而盛行了。骈文的特征，计有五点：（一）多用对句；（二）以四字及六字之句调为基本；（三）力图音调之谐和；（四）繁用典故；（五）文辞华美。（日·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第四章第三节·隋树森译）

又是小说的草创期。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史通·采撰》）

小说家一类……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



在魏晋南北朝，赋体文学进入了它的抒情化时期。

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宋书·谢灵运传论》）

魏、晋、宋、齐、梁、陈之士，祖述宪章，或托物以贡情，或隐忧而不去，引辞表指，触类而发，咸无悖乎六义之意。（康绍镛《七十家赋钞序》）

齐、梁多小赋，固是有病，然丽辞雅义，亦不可尽没。至于子山《哀江南赋》，则不名为赋，当视之为亡国大夫之血泪。（林纾《春觉楼论文·流别论》）

这时的辞赋，更有了俳、律二体。

祝（尧）氏曰："……建安七子，独王仲宣辞赋有古风。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此六朝之赋所以益远于古。（吴讷《文章辨体序说》）

同时，中国的理论散文，也进入更加思辨化的时期。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

自晋代人士均用清言，用是言语、文章虽分二途，而出口成章，悉饶词藻。晋、宋之际，宗炳之伦，承其流风，兼以施以讲学。……迄于梁代，世主尤崇讲学，国学诸生，惟以辩论儒玄为务，或发题中难，往复循环，具详《南史》各传。用是讲论之词，自成条贯，及笔之于书，则为讲疏、口义、笔对，大抵辨析名理，既极精微，而属词有序，质而有文，为魏、晋以来所未有。当时人士，既习其风，故析理之文，议礼之作，迄于陈季，多有可观，则亦士崇讲论之效也。（《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略》）

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夫汉代固尝有人祖尚老庄，鄙薄事功，而其所以终未舍弃天人灾异通经致用之说者，盖尚未发现此新眼光新方法而普遍用之也。（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



魏晋南北朝更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期。其具体的标志为：
文学批评蔚为风气，并产生了一大批文学选集和理论著作。

此篇（《典论·论文》）推论建安文学优劣，深切著名。文气之论，亦基于此。

…………

以上数书（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于建安诸子文学得失，足审大凡。

…………

魏代名贤，于当时文学之士，亦多品评之词。如吴质《答魏太子笺》曰："陈、徐、应、刘，才学所著，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答东阿王书》亦曰："众贤所述，亦各有志。"均即七子之文言也。又案：陈思王《王仲宣诔》曰："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王粲《阮文瑜诔》曰："简书如雨，强力敏成"。鱼豢《魏略·武诸王传论》曰："植之华采，思若有神。"亦均文章定论。自此之外，若陈思王《与吴季重书》云："后所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华，浏若清风。"殷褒《荐朱俭表》曰："飞辞抗论，骋驿奇逸。"明帝诏何桢云："扬州别驾何桢，有文章才。"亦足补史传之缺。至若吴质论元瑜、孔璋，以为不能持论；鱼豢论王、繁诸子，仅云："光泽足观"。虽为一时之言，亦千古之定说也。（《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

晋人论文之作，以陆机之赋为最先。……陆云《答兄平原书》，多论文之作，于文章得失，诠及细微；其于前哲，则伯喈、仲宣之作，多所诠评；其于时贤，则张华、成公绥、崔君苗之文，并多评骘。二陆工文，于斯可见。自是之外，其论及文体正变及各种源流者，晋人撰作，亦多可采：如傅玄《七谟序》、《连珠序》，推论二体之起源，旁及汉、魏作者之得失；皇甫谧《三都赋序》、左思《三都赋序》、卫瓘《三都赋序略解序》、刘逵《蜀都吴都赋注序》，推论赋体之起源，与汉儒"铺陈"之训，宛为符合。（又，郭象文《碑铭论》，今不传——原注）其著为一书者，则有挚虞《文章流别论》二卷，今群书所引尚十余则。于诗、赋、箴、铭、哀、词、颂、七、杂文之属，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于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评品，集古今论文之大成。又，李充《翰林论》五十四卷，今群书所引亦仅七则，大抵于各体之文，均举佳篇为式。彦和论文，多所依据，亦评论文学之专书。汇而观之，足知晋代名贤于文章各体研覈至精，固非后世所能及也。（同上）



（肖统）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梁书·肖统传》）

历览艺林，前世文士，颇矜作品，鲜事评论。及曹丕褒贬当世之人，肆为之辞，于是搦管论文，多以甄别得失为己任。在梁一代，肖子显秉其史论之识，以绳文学；刘勰更逞雕龙之辩，以评众制；庾肩吾则载书法之士，而品之有九；钟嵘亦录五言之诗家，而次之为三。衡鉴之作，于斯称最矣。（许

文雨《诗品讲疏》）

文学与学术，亦由此分途。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泛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梁元帝《金楼子·立言》）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

中国文学，至两汉、魏、晋而大盛。然斯时文学，未尝别为一科，（故史书亦无《文苑传》。——原注）故儒生学士，莫不工文。其以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刘宋始。考之史籍，则宋文帝时，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此均文学别于众学之征也。故《南史》各传，恒以“文史”、“文义”并词，而《文章志》诸书，亦以当时为最盛。更即簿录之学言之：晋荀勗因魏《中经》区书目为四部，其丁部之中，诗、赋、图赞，仍与汲冢书并列；自齐王俭撰《七志》，始立“文翰”之名；梁阮孝绪撰《七录》，易称“文集”，而“文集录”中，又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为四部，此亦文学别为一部之证也。（《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略》）

不独如此，对于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的审美，这一时期还提出了文气、风骨、意象、形神等一系列重要的范畴和概念。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典论·论文》）

夫象者，出意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文心雕龙·神思》）

……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文心雕龙·风骨》）

> 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趣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

由以上可知，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动荡与政治的混乱，对文化思想与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的竟然是相对自由的环境；魏晋南北朝文人逐渐走向意气消沉和玩物丧志，对文学的样式和技法，创造出的却是愈来愈精致的成果。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以及后代文学的持续发展，魏晋南北朝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后世文人在批评六朝文学消极因素的同时，又是不能不正视历史，正视那些宝贵的文学遗产的。



第二章

建安文学

"三曹"、"七子"和蔡琰等人，是建安文学的代表。

第一节　孔融与曹操

在建安作家之中，孔融与曹操年龄较大，是由汉而魏的过渡型人物。

一　孔　融

（一）孔融的生平



孔融，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市）人，孔子二十世孙也。……融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性好学，博涉多该览。……辟司徒杨赐府。……后辟司空掾，拜中军侯。在职三日，迁虎贲中郎将。……时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董）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在郡六年，刘备表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东，妻子为谭所虏。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复拜太中大夫。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

奏融……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魏文帝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扬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后汉书·孔融列传》)

(二) 孔融的思想性格悲剧

孔融受两汉正统思想影响，是崇儒学、讲忠孝的。

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时融年十六……因留舍之。后事泄……遂并收褒、融送狱。……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焉。融由是显名……融为北海相……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其余虽一介之善，莫不加礼焉。(《后汉书·孔融列传》)

对于董卓的擅权，孔融多有匡正之言；对于袁绍、曹操的威逼汉室，他持坚决的不合作态度。可见孔融在思想上是维护道统，政治上是忠于汉室的。



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丞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初，太傅马日磾奉使山东，及至淮南，数有意于袁术。术轻侮之……日磾深自恨，遂呕血而毙。及丧还，朝廷欲加礼，融乃独议曰："……袁术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随从，周旋数岁。……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礼。"朝廷从之。……是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融上书曰："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郊祭天地，拟仪社稷。虽昏僭恶极，罪不容诛，至于国体，宜且讳之。何者？万乘至尊，天王至尊、身为圣躬，国为神器，陛级县远，禄位限绝，犹天之不可阶，日月之不可逾也。每有一竖臣，辄云图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谓虽有重戾，必宜隐忍。……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以崇国防。"(《后汉书·孔融列传》)

但孔融又生在篡乱相替、儒学受到亵渎的时代，内心颇有失望与忧愤，故其言其行，又往往偏离正统，实开魏晋通脱的风气。

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后汉书·孔融列传》载路粹《枉状奏孔融》）（按：《三国志·袁谭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审配《献袁谭书》云：“或闻（谭）告令吏士云：‘孤虽有老母，辄使身体完具而已’。闻此言者，莫不惊愕失气，悼心挥涕……”可见时风使然，非独孔融如此。）

此州人说平原弥衡受传孔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反天道，败伦乱理……（《三国志·孔融传》注引《魏氏春秋》曹操《宣示孔融罪状令》）

操杀文举，在建安十三年。时僭形已彰，文举既不能诛之，又不敢远之，并立衰朝，戏谑笑傲，激其忌怒，无啻肉倭饿虎，此南阳管乐所深悲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易代之际，孔融所论，常迂阔而不切于事情，可见他又是一位富于理想气质，并不擅长审时度势的文人。

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后汉书·孔融列传》）

融在北海，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也，当时豪俊，皆不能及。……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至于稽古之士，谬为恭敬，礼之虽备，不与论国事。高密郑玄，称之郑公，执子孙礼。及高谈教令，盈溢官曹，辞气温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租赋少稽，一朝杀五部督邮。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黄巾将至，融大饮醇酒，躬自上马，御之涞水之上。……城溃……左右稍叛。连年倾覆，事无所济，遂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王子法、刘孔慈凶辨小才，信为腹心。左丞相、刘义逊清隽之士，备在坐席而已。……（《三国志·孔融传》注引《九州春秋》）



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于理，乃治体乖也。（《文心雕龙·诏策》）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鲁迅书信集·致陈浚》）

（三）孔融的诗文

1. 孔融的文章

孔融议论时政的文章，如《上书请准古王畿制》主张立王畿、崇帝室；《崇国防疏》反对公布刘表罪状，声称应隐其恶而待其自弊；《肉刑议》主张政简刑轻，反对以严刑挽救末世颓风，其论大抵重理想而不切于事情。

臣愚以为千里国内，可略从周官六乡六遂之文，分比北郡，皆令属司隶校尉，以正王赋，以崇帝室。（《上书请准古王畿制》，见袁宏《后汉纪》）

古者敦庞，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肉刑议》）

前以露袁术之罪，今复下刘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窥高岸，天险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诛诸侯，遏绝诏命……郜鼎在庙，章梦甚焉！桑落瓦解，其势可见。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以崇国防。（《崇国防疏》）

帝初都许，融以为宜略依旧制，定王畿，正司隶所部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书言其义。是时天下草创，曹、袁之权未分，融所建明，不识时务。（《三国志·崔琰传》注引张璠《汉纪》）



孔融的《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不事文采，却情辞婉转，颇能动人。其《荐弥衡表》虽多浮夸之词，但文采四溢，气势奔放，又体近骈文，别有一种韵律之美。

至于文举之《荐弥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

《荐弥衡表》章表多浮，此建安文敝，特其气犹壮。（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五）

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业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苏轼《东坡全集》“东坡奏议”卷一三《乐全先生文集叙》）

孔融的《圣人优劣论》称尧与孔子，并无高下之别，又说圣人不过是人中的能人，并无神秘之处，是一篇标新立异，无所顾忌的文章。他的《难曹公表制酒禁书》驳斥曹操禁酒，胆大气盛，先声夺人，则又是一篇与曹操捣乱的嘲戏之文。

马之骏者，名曰骐骥；犬之骏者，名曰韩卢。犬之有韩卢，马之有骐骥，犹人之有圣也。名号等设，骐骥与韩卢并是，宁能头尾相当，八脚如一，无有先后之觉矣？（《圣人优劣论》）

酒之为德者久矣。……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彘肩卮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主，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治者哉？（《难曹公表制酒禁书》）

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亡王为戒也。（《又难曹公表制酒禁书》）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也，扬、班俦也。（曹丕《典论·论文》）

孔融《孝廉》，但谈嘲戏……言不持正，论如其已。（《文心雕龙·论说》）（按：孔融《孝廉》已佚，然以上所引两文，亦嘲戏之属。）

子建称孔北海文章多杂以嘲戏。子美亦效俳谐体，退之亦有寄诗杂诙俳，不独文举为然。自东方生而下，祢处士、张长史、颜延年辈，往往多滑稽语。大体材力豪迈有余，而用之不尽，自然如此。（黄徹《䂬溪诗话》卷十）

七子之中，特别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为什么他的行为和议论矛盾呢？此无它，因为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 孔融的诗歌

孔融今存《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一首、《杂诗》二首、《临终诗》一首，《六言诗》三首。（冯惟纳《诗纪》汉诗卷三多《失题》一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以为《六言诗》非孔融作；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一二认为《杂诗》非孔

融作。

其六言诗之名见于本传，今所传三章多凡近，又皆盛称曹操功德，断以融之生平，可信其义不出此。即使旧本有之，亦必黄初间购求遗文，赝托融作，以颂曹操，未可定为真本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

《古诗纪》依据《文选》编苏、李诗七首于《汉诗》卷二，而以《古文苑》"李陵录别诗十首附在《汉诗》卷十。……《古文苑》之孔融《杂诗》二首，亦原属李陵。依此计之，苏、李诗今存者尚有二十一首也。然检宋颜延之《庭诰》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又此二十一首种类虽杂，然无一切合李陵身世者，说明既非李陵所自作，亦非后人所拟咏。……钦立曩写《汉诗别录》一文，曾就此组诗之题旨内容用语修辞等，证明其为后汉末年文士之作。依据《古今同姓名录》，后汉亦有李陵其人，固不止西京之少卿也。以少卿最为知名，故后人以此组诗附之耳。(《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一二注)(按：以上两说，未为确论，录以备考。)

孔融《杂诗》(岩岩钟山首)激昂慷慨，有为而发；《杂诗》(远送新行客)写丧子之悲，哀婉凄绝。

《杂诗》二首《岩岩钟山首》篇，放言豪荡，想见文举丰采。其寄志亦略可窥矣。《远送新行客》篇，至性、至悲。(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四)

《杂诗》《远送新行客》篇，此悼子之诗也。首八，叙明远出来归，即点望子，反领擒题。随借妻妾之悲，为己悲先作一引。……末二略作开势，仍复兜回，伤子自伤，无不包括，收得曲折简劲。(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六)



《杂诗》一首(岩岩钟山首)……文举志匡汉祚，不附奸雄，成则吕望，不成则为夷、齐，甘蹈庸夫之所笑，故托猛虎以咏怀。(陈沆《诗比兴笺》卷一)

《临终诗》是理想主义者在清醒后、临终前的绝唱，可见孔融对自己的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北海不长于诗，读此全篇可见。至结句"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词理宏达，气骨苍然，可想见其人，不容以瑕掩也。(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

孔融，鲁国一男子。读《临终诗》，其意气悃悃欲尽。（陆时雍《诗镜总论》）

《临终诗》文举虽严正性，而儒者阔疏，既怀忧国之诚，奈何以空言相讼。昧起句盖已悔之。结语其忠臣之心，苟复生存，此虑不释。诗至此，可谓能见志矣。（《采菽堂古诗选》卷四）

孔融又有《离合作郡姓名字诗》务为纤巧，实开后世以文字游戏为诗的风气。

孔融《离合》、鲍照《建除》、温峤《回文》、傅咸《集句》，无补于诗，而反为诗病。自兹以降，摹仿实繁。字谜、人名、鸟兽、花木，六朝才子集中不可胜数。诗道下流，学人之大戒也。（《诗薮》外编卷二）

孔融的诗文，气扬采飞，在"七子"之中，独标一格。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文心雕龙·风骨》）

当时孔文举为先达，其于文特高雄。……正平、子建直可称建安太子，其次文举，又其次为公干、仲宣。（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东汉词章拘密，独少府诗文，豪气直上，孟子所谓浩然，非邪？（《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遒文壮节，于汉季得两人焉："孔文举，臧子源是也。曹子建、陈孔璋文为建安之杰，然尚非其伦比。"

孔北海文，虽体属骈丽，然卓荦遒亮，令人想见其为人。（《艺概·文概》）



二 曹 操

（一）曹操（155—220）的生平

太祖武皇帝，沛国谯郡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太祖少机敏，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

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是岁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同时俱起兵……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之，因为谋曰……（张）邈等不能用。……（兴平）二年……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兖州牧。……建安元年……太祖将迎天子……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九月，车驾出轘辕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四年……十二月，公军官渡。……五年……冬十月……（袁）绍众大溃……十三年……十二月，孙权为（刘）备攻合肥。……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十九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二十一年……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谥曰武王。（《三国志·武帝纪》）

（二）曹操的思想特点

曹操出身于清流不齿的宦官家庭，内心深处的自卑，使他对两汉素重家世、经术的传统，持天然的反抗态度。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人明知之。（《让县自明本志令》）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脏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狷狡锋协，好乱乐祸。（陈琳《为袁绍檄豫州》）

自昔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曹操《善哉行》）

曹操又深知儒只可与守成，不可以进取，因而政教军事，颇杂刑名；取用人才，不拘资限。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举贤勿拘品行令》）

但曹操毕竟生在汉世，其所受教育与面对的舆论，使他不愿以汉相之尊，承担篡逆的罪名。

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拒王芬辞》）

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

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为制约诸侯，协调本集团内部的等级关系，曹操更无法断然否定儒的伦理纲常与道德规范。

（建安八年）秋七月，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天下。"……（建安十年）九月，令曰："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人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三国志·武帝纪》）



在进取天下的同时，曹操目睹汉室的倾颓、生民的不幸、命运的无常、人生的短暂，又不免心怀惆怅。王霸并用，思接庄玄，又构成了曹操思想矛盾的另一个方面。

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董卓歌辞》）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精列》）

（三）曹操的诗文

曹操于诗书音乐，均有所好。

上（按：指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

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曹植《武帝诔》）

汉世，安平崔瑗……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张华《博物志》）

《但歌》四曲，出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沈约《宋书·乐志》）

1. 曹操的文章

作为实践家，曹以文章经世，能超越自己的思想矛盾，而注重实用功利。这类文章，清峻通脱，不尚华采，既无两汉文章的反复说教，也无孔融文章的着意于铺排华丽，如《让县自明本志令》、《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存恤令》等。

……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



……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让县自明本志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求贤令》）

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文心雕龙·诏策》）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

丽，则未足美矣。(《文心雕龙·章表》)

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曹操又有《遗令》，其安排身后之事，不独能见出他一贯的务实作风，而且于琐细中见真情，也很能见出他对世事的留恋。

天下未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帻……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遗令》)

……惜内顾之缠绵，恨未命之微详。纡广念于履组，尘清虑于余香。结遗情之婉娈，何命促而意长。……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陆机《吊魏武帝文》)

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2. 曹操的诗歌

建安诗人以乐府古题写时事，曹操是开创者。



余谓乐府题，自建安以来，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朱乾《乐府正义》卷五)

凡后人作诗，其题有所谓"拟古"者，皆吾所不知也。拟古而自有托意，如曹氏父子用乐府题而自叙述时事，自是一体。(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

借古乐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

曹操四言诗和《短歌行》、《观沧海》等，已脱出"诗三百"束缚，开创了四言诗的新境界。

曹公《短歌行》……工堪为则矣……缘不受《雅》、《颂》困耳。（徐祯卿《谈艺录》）

作四字诗，多受束于《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吴乔《围炉夜话》卷二）

《步出东西门行》四篇（《观沧海》）浩漾动宕，涵于淡朴之中。（《冬十月》）其源出于《楚辞》，而笔矫健。（《土不同》）苍劲，自是二代以上语。（《龟虽寿》）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采菽堂古诗选》卷五）

《短歌行》全篇以比兴手法，反复申说诗人时不我待的焦虑，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立功业的决心，曲折抑扬，感人至深。

《短歌行》从来真英雄，虽极刻薄，亦定有几分吉凶与民同患意，思其与天下贤才交游，一定有一段缱绻体恤情怀。观魏武此作及后《苦寒行》，何等深，何等真！（吴淇《六朝选诗定论》）

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前四一截，以酒发端，就流光易逝，引动早当建功，为通章虚冒。"慨当"十二句，则思贤才于士类之中也。却以慷慨幽思，解忧惟酒，凭空喝人。然后"青青"四句，点清士类有贤，心欲得而沉吟不置，缴醒慷慨幽思。"呦呦"四句，则透后言诚得贤才辅治，定当如《鹿鸣》之燕乐嘉宾，方为满愿。缴醒解忧惟酒，为一截。"明明"十二句，则思贤才于故旧之中也。却借月不可掇，先作一比、拖出忧难断绝，隐逗欲得之诚。然后"越陌"四句，点清故旧有贤，虽过存而每嗟阔，缴醒难断绝。"月明"四句，则从对面即乌鹊无栖，比出贤才昧时远引，不知依我之深为可惜。以"月明星稀"领起，则又借以缴醒月不可掇也，为一截。后四，方以兼容并蓄，引周公事，醒出得贤建业本心。千里双龙，一齐结穴，奸雄叵测，活现毫端。《解题》谓"当及时行乐"，何其掉以轻心！（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一）



《观沧海》以豪壮之笔，写苍莽大海，气象宏阔，诗人的心胸气魄、悠思遐想，尽在不言之中。

《碣石篇》（《东临碣石》篇）不言所悲，而充塞八极无非愁者。（王夫之

《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古人山水之作，莫如康乐、宣城；盛唐王、孟、李、杜……诸公，搜抉灵奥，可谓至矣。然总不如曹操"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二语，此老殆不易及。（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

《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古诗源》卷五）

《龟虽寿》则以自然生命的有限，念及人生应以不懈的追求，获得社会生命的永恒。其间，已颇有哲学的意味。

（《神龟虽寿》篇），此盖孟德晚年所作。前伤大化之有尽，而后冀天年之可延也。神龟之寿，而有尽时，腾蛇能兴雾，而其没也，亦为土灰，天下安有灵长之物乎哉！惟英雄气概，老当益壮，不肯与物同尽，故以老骥伏枥之志，兴烈士暮年之心。因思壮心不已，而年华有限，然盈虚消息，虽曰天定，而善自怡养，庶可永年，则由此以建功业，而期大器晚成，幸甚矣！（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

曹操的五言诗大都有感于时事而作。由于诗人是历史漩涡中心人物，这类诗篇又大都具有"诗史"的性质。如《薤露行》、《蒿里行》写汉末一段惊心动魄的战乱历史，史家实录与诗人性情萃于一篇。

《薤露》……钟云：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蒿里行》……谭云：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七）

《薤露》此指何进召董卓事，汉末实录也。

《蒿里行》此指本初、公路辈，讨董卓而不能成功也。（沈德潜《古诗源》卷五）

魏武帝《薤露》……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此诗浩气奋迈，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恣真朴，一起雄直高大，收悲痛哀远。……收二句，妙，莽苍悲凉，气盖一世。

《蒿里行》……"铠甲"四句，极写乱伤之惨，而诗则真朴雄阔远大。（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



曹操《苦寒行》写东征高干之役，既自比周公东征，志在必胜，又极写其苦寒之状与内心的进退犹豫，并不故作豪语惊人。

凡诗人写寒，自有一应写寒事物……此诗未写风雪，先写太行之险，所谓骇不存之地，进退两难，则寒无可避，方是苦也。然于太行山上，拈出“北上”二字者，魏武欲以周公自拟，为下文东归暗伏线索耳。……此诗极写苦寒，原是收拾军士之心，却把自己平生心事写出……呜呼！当此徘徊中道，欲求一夕之栖宿而莫能，况乃如《东山》之诗云云哉？此所以喟然而悲。（吴淇《六朝选论定论》卷五）

《苦寒行》不过从军之作，而取景阔远，写景叙情，苍凉悲壮，用笔沉郁顿挫，比之《小雅》，更促数噍杀意绪，后来杜公往往学之。（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

曹操又有游仙诗如《秋胡行》、《精列》、《气出唱》，抒写自己的人生苦闷，却并不流于消极。

《精列》仙人不可得学，托之于不忧，然年暮之感，徘徊于心。……

《秋胡行》二首……疑畏之念既阻中怀，性命之理未达于究竟。游仙远想，实系思心，人生本可超然，上智定怀此愿。但沉吟不决，终恋世途，沦隐之端，多因是故。……进趣谁惠，于己何欢，再世膺图，忽焉已往。孟德非不慨然，而位居骑虎，势近粘天。入世出世，不能自割，累形歌咏，并出至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



（四）曹操的文学风格与文学史地位

因其经历地位、性格气质使然，曹操诗歌具有古直悲凉、气韵沉雄的风格特征。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冤哀存离之作，尤极于古。（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五六）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陶孙《诗评》）

魏武终身攻战，何暇学诗，而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吴乔《围炉夜话》卷二）

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刘熙载《艺概·诗概》）

曹操诗文在汉魏文学的转折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子建诗虽独步七子……然终不似孟德……苍茫浑健，自有开创气象。此非以父子观之论之也，殆实亦气候使然，具眼自得之耳。（徐世溥《榆溪诗话》）

东汉之末，曹氏父子兄弟……所为乐府，悲壮奥崛，颇得汉之遗风。（吴乔《带经堂诗话》卷一）

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沈德潜《古诗源》卷五）

第二节　曹丕与曹植

一　曹　丕

（一）曹丕（187—226）的生平

文皇帝讳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谯。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冬十月）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改延康为黄初。（黄初元年）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七年）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时年四十。（《三国志·文帝纪》）



曹丕生于乱世，长于军旅，文武兼善。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骑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际，长于戎旅之间，

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典论·自叙》)

（二）曹丕的文学见解

曹丕的《典论·论文》和《又与吴质书》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专论。

曹丕以事功与文学并重，以为两者均可获得人生的不朽，无疑提高了文学的地位。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载《与王朗书》)

曹丕注意到了作家的个性、气质与文学风格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气说"，并第一次把它用于文学批评。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可移子弟也。(《典论·论文》)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德琏常斐然有著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又与吴质书》)

曹丕不独进行文学批评的实践，而且提出了文学批评中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为己贤。(《典论·论文》)

曹丕首次对文体进行大致的分类，并提出"诗赋欲丽"的观点，显示出他对诗赋的美学特征，已有较为自觉的认识：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典论·论文》)

(三) 曹丕的诗文

曹丕善作文章与辞赋，如《典论·自叙》，述写生平，通脱而生动；《又与吴质书》叙朋友间生死离合之情，兼有随感式的文学评论，是过去的书信之文所没有的；《答繁钦书》描写美人舞乐，辞极绮丽，近于辞赋，即在曹丕的文章中，也是别具一格的。



……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芋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鄛，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典论·自叙》)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吾与足下不及见也。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

明，假日月之光。动见观瞻，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往过，何可攀援！古人思柄烛夜游，良有以也！（《又与吴质书》）

……乃令从官引内世女，须臾而至，厥状甚美，素颜玄发，皓齿丹唇。详而问之，云善歌舞。于是振袂徐进，扬蛾微眺，芳声清激，逸足横集。众倡腾游，群宾失席……（《答繁钦书》）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隽，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文心雕龙·才略》）

《典论·自序》，善述生平；《论文》一篇，直自言所得。《与王朗书》，务立不朽于著述间，不肯以七尺之一棺毕其生死。雅慕汉文，没得而谥，良云厚幸。（《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曹丕的诗，多以乐府写游子行役、思妇怨别。如四言《黎阳作》二首、杂言《陌上桑》抒写征人行军之苦：

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车，涉此艰阻。遵彼洹湄，言刈其楚。班中之路，涂潦是御。辚辚大车，载低载昂。嗷嗷仆夫，载仆载僵。蒙涂冒雨，沾衣濡裳。（《黎阳作》其二）

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披荆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路局笮。虎豹嗥动，鸡惊禽失，群鸣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盘石，树木丛生郁差错。寝蒿草，荫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伴旅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惜！（《陌上桑》）



《黎阳作》二首……（“殷殷其雷”篇）只用《毛诗》“雨雪载涂”一句，纵横成文，伤悲之心，慰劳之旨，皆寄文句之外。（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卷二）

《陌上桑》极仿孟德，荒荒苍苍，其情苦悲。“稍稍”句佳，足知从军之久。（同上）

曹丕《燕歌行》抒写思妇之情，音节和婉，修辞精美；《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虽属代言之作，但所言离别之苦，凄婉动人，可见诗人生逢乱世，对人间别情，是有切身体验的。

《燕歌行》魏文代为北征者之妇思征夫而作。妇人感时物以起兴，言霜飞木落，鸟亦知归，独我君子客游不返，令我思之肠断。又代为我君子度其客中必至之情，则必慊慊思归也，必一恋故乡也，而何为淹滞他方，使妾茕茕独守者，其归与否，谅非君所得专，是以使我忧之甚，而泪下沾衣。即欲解忧乎，乃抚琴而秋声发悲，短歌而吟声难续。又视此明月照床，清秋长夜，皆伤心之候也。……（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

《清河见挽船士与妻别作》无穷其无穷，故动人不已；有度其有度，故含怨何终。乃知杜陵《三别》，杰厓灰颓，不足问津《风》、《雅》。（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卷四）

曹丕《善哉行》、《杂诗》虽然也写游子行役，寄托的却是人生飘零、人生如寄的感慨。

《善哉行》……此文帝因征行劳苦，感物忧伤而歌以自娱也。托言上山采薇，既不足以疗饥，而徒为风霜所侵。且物之群动者尚各求其匹侣，今我何独远离所亲而劳于征役乎？于是还望故乡，则郁然垒垒者又为隔绝，使不可见，故其忧感之怀，反复兴叹而不能已焉。“汤汤川流”以下三语，亦以申岁月如驰，人生如寄之意，宜乎策马被裘以自遣释也。（刘履《选诗补注》卷二）

《杂诗》二诗以自然为宗，言外有无穷悲感。（沈德潜《古诗源》卷五）

《杂诗》二首（“漫漫秋夜长”篇）景中情长。（“西北有浮云”篇）二诗独以自然为宗。言外有无穷悲感，若不止故乡之思。寄意不言，深远独绝，诗之上格。（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

曹丕又有一类诗歌，力求探索人生意义，而终于落入悲观迷惘，如《大墙上蒿行》、《钓竿行》。

《大墙上蒿行》大墙上生蒿，荣华无久时，以比人生寿命不得长，乃反极陈为乐快意，淋漓铺叙，情极畅，词极雅。无端写剑一段，文情横姿。“驳犀”二句，生动之甚。又无端说冠一段，长短不齐，咸自谓美，本排而变，多非有余，少非不足，并擅。淋漓如此，淋漓之极，忽然为乐苦迟，使人不觉自悲。（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

《钓竿》读子桓乐府，即如引人于张乐之野，冷风善月，入世陵嚣之气，

淘汰俱尽。古人所贵于乐者，将无在此？（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曹丕的诗歌风格，虽无乃父幽燕老将式的豪壮，却能以文人深婉细腻的笔触，写出乱世中人的内心世界，因而颇得《古诗十九首》的风致。

子桓之《杂诗》二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若仲宣、公干，便觉自远。（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子桓笔姿轻俊，能转能藏，是其所优。转则变宕不恒，藏则含蕴无尽。其源出于《十九首》，淡逸处弥佳。（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

曹丕的文化教养和他的贵公子身份，不独使他的诗风不同于曹操，也较《古诗十九首》更多一份文士气。

钟（惺）云：文帝诗便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不及老瞒远矣。然其风雅蕴藉，又非六朝人主所及。（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七）

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

在诗体方面，曹丕《燕歌行》首创七言歌行体，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影响甚为深远。



建安以后，五言日盛，晋、宋、齐间，七言歌行寥寥无几，独《白纻歌》、《行路难》时见文士集中，皆短章也。梁人颇尚此体。《燕歌行》、《捣衣曲》诸作，实为初唐鼻祖。（胡应麟《诗薮》卷三）

魏文帝作《燕歌行》，以七字断句，七言歌行之滥觞也。（冯班《钝吟杂录》）

在诗韵方面，曹丕不独已认识到诗歌当有音韵之美，而且在实践中还进行了多种有益的尝试。

魏文帝"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此结句换韵之始。（范晞文

《对床夜语》卷一）

萧亭答：《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皆换韵。魏文帝《杂诗》……皆末二句换韵，不胜屈指。一韵气虽矫健，换韵意方委曲。（王士祯等《师友诗传录》）

《燕歌行》……此诗情词悱恻，为叠韵歌行之祖。（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

二 曹 植

（一）曹植（192—232）的生平

曹植，曹操第四子，少善属文，不治威仪，曹操有立为太子之意。

陈思王植子建，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临菑侯。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

《魏武故事》载令曰：“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同上注引）



曹植诗人气质太重，兼之曹丕玩弄权术，曹操立曹丕为嗣，诛杨修，植宠日弛。

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

修……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祖由是疑焉。修与贾逵、王凌……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故修遂以交构赐死。(《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注引《世语》)

曹丕即位，杀丁氏兄弟，屡改曹植封地，自此，政治迫害日益加剧。

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植与诸侯并就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四年，徙封雍丘王。(《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

曹丕死，曹叡即位，曹植一度焕发希望，上表请求自试，终不为所用，于太和六年，抑郁而死。



太和元年，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三年，徙封东阿。五年，复上疏求存问亲戚……植复上疏陈审举之义……帝辄优文答报。其年冬，诏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

(二) 曹植的文学见解

曹植论文，见于《与杨德祖书》。其于文学地位的看法，相似于曹丕。所不同者，曹丕从"文武之道，备随时而用"出发，强调文章经国治世的功用；曹植之不屑于作辞赋君子，乃偏言其志在建功立业，实则并不否定文章经国的地位。

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

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乎！（《与杨德祖书》）

至如魏文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陈思不欲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词虽冰炭，意实埙篪，读者考见深衷，推验实历可也。（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

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很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反对文人相轻，主张文人之间应有正常的批评，此与曹丕相似；但曹植同时又强调能文者方有权批评，实则把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混为一谈。

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能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云：“卿何所疑难乎！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与杨德祖书》）



（三）曹植的文学成就

1. 曹植前期诗歌

曹植前期诗歌，记时伤乱之作无多，但都真切动人。而这类诗歌，又大都兼有顾念亲朋，感慨人生短促的情感。

《赠丁仪》比也。……此诗大意与《赠徐干》篇略同。言凉气初发，庭树销落，以喻天下肇乱，渐见迫夺。至于霜依玉除，风飘飞阁，则汉室危矣。

云不归山，霖雨成川，又以比诸豪之不肯匡辅本朝，各据一方，是以兵戈日斗，流毒日深，而生民之失利，从可知焉。当是时，仪居贫贱，无能怜念之者……然我思慕延陵季子之义……况我与子亲交素厚，岂不能振拔尔乎？其言子宁尔心者，所以慰之之意深矣。（刘履《选诗补注》卷二）

《赠王粲》赋而比也。……仲宣因西京扰乱，乃之荆州依刘表……是时子建寄赠此诗，托言西游见池中有孤鸳鸯哀鸣而求侣者，我愿挚之而不可得……而思念之情切焉。（同上）

《送应氏》赋也。……既伤洛阳被焚，荆棘荒秽，则清时之难得可知。复言游子久不归，念我平生居，则嘉会之不常不可知矣。故子此叹人生之脆促，愿得常相欢洽，而今亲友远游北方，则其情念当何如哉！（同上）

曹植的《杂诗》，则抒写了他忧心时事、慷慨报国的精神。

（《飞观百余尺》篇）赋也。……此因登高望远，感而多悲。惟常以二方未克为念，愿捐躯以报国。是以目瞻西蜀，心想东吴，而此志不遂，无以舒吾愤激之怀。且如弦之急者，其发声也悲，则我之出言也，自不能不慷慨耳。（同上）

这一时期，曹植也有不少游赏、公宴、唱和之作。

《公宴》篇，此在邺宫与兄丕谯饮，武帝在，故称丕为公子。起处真是雅颂衣钵。“终宴不知疲”句，从浑璞中露出刻骨镂心处。（宝香山人《三家诗》曹集卷一）



2．曹植后期诗文

随着曹丕的立为太子和以魏代汉，对曹植的猜忌与迫害日益加剧。无可奈何的闲愁而外，更加上一份深惟恐惧，构成曹植后期诗作的基调。

壮志难酬的悲慨中，常交织有曹植对青年时代许身报国、建立功业的梦忆。

《怨歌行》赋也。……子建在雍丘时，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明帝既不报，及徙东阿，复上疏言禁锢明时，兄弟乖绝，恩纪之违，

甚于路人，愿入侍左右，承答圣问。其年冬，诏诸王朝，此诗之作，其在入朝之后，燕享之时乎？（刘履《选诗补注》卷二）

余读植诗，至瑟调《怨歌》、《赠白马》、《浮萍》等篇，暨观《求试》、《审举》等表，未尝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王士贞评点《曹子建集》卷首）

《名都篇》……子名都中，只出得一少年。子少年中，只出得两件事：一曰驰骋；一曰饮宴。却说中间一事不了又一事，一日不了又一日。只是一片牢骚抑郁，借以消遣岁月，如狮在笼中，一片雄心无有泄处，只是弄毬度日。其自效之意，可谓深切著明矣。（吴淇《六朝诗选定论》卷五）（按：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三云："《名都》者，邯郸、临淄之类也。以刺时人骑射之妙、游骋之乐，无忧国之心也。"此可备一说。）

《美女篇》贤女必得佳配，贤臣必得圣主。……余读子建《求自试表》，未尝不悲其志。其言曰："微才弗试，没世无闻，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以子建之才，而亲不见用，君臣之会，自古难之。此诗所谓"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者也。（朱乾《乐府正义》卷一二）

《白马篇》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子建《自试表》云："昔从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用兵之势，可谓神妙。而志在擒权馘亮，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篇中所云"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同上）

在政治迫害之下，曹植诗歌更多有离别之悲、忧生之嗟、悼亡之恨。



《朔风诗》（"仰彼朔风"篇）……文帝多猜忌，诸昆弟各就燕国，不得以时朝谒。黄初四年，子建始得自雍入朝，上《责躬》诗。是时待遇，礼甚傲，法甚峻。既而与白马王彪还国，欲同路款叙，不许，遂愤惋而别。此诗必还雍后作。故此章首怀魏武而兼思兄弟之国。（刘履《选诗补注》卷二）

《赠白马王彪》七章……子建在黄初四年五月入朝，与诸王俱会于洛阳，时任城威王彰暴薨。既怀友于之痛，七月即与白马王还国，而监国使者灌均等又不许同路止宿，遂愤怨赋此而别。……刘克庄曰："……诗作于诸王凛凛不自保之时，而其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同上）

《野田黄雀行》此应自比黄雀，望援于人，语悲而调爽。或亦有感于亲友之蒙难，心伤莫救。（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

《三良诗》此子建自鸣中怀，非咏三良也。……盖子建实欲建功于时，观《责躬诗》可见。今终不见用，已矣，功名不可为矣。文帝之猜嫌起于武帝之钟爱，此时相遇不堪，生不如死，慨然欲相从于地下，而杀身良难，一往不还，徘徊顾虑，是以隐忍而偷生也。子桓既以夺嫡为嫌，其待陈思诚有生人所不能忍者，故愤懑而作，追慕三良。(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

《远游篇》读曹植《五游》、《远游》篇，悲植以才高见忌，遭遇艰危。灌均之谗，仪、廙受诛，安乡之贬，幸耳。时诸侯王皆寄地空名，国有老兵百余人以为守卫，隔绝千里之外，不听朝聘，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法既峻切，过恶日闻，惴惴然朝不知夕。所谓"九州不足步，中州非吾家"，皆其忧患之词也。至云"服食享遐纪，延寿保无疆"，则其忧生之心为已蹙矣。(朱乾《乐府正义》卷一二)

曹植又有一类闺怨诗，抒写女性的相思与隐忧，其间颇寓有自己遭忌被弃的感慨。

《七哀诗》，子建云："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棲。"怨游子之未返也。(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一)

《七哀诗》比也。……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刘履《选诗补注》卷二)

《怨诗行》此闺怨诗，即谓怀君之作亦可。首六即景引情，先就愁思悲叹，设为问答，点清宕子之妻，以立篇主。调从《十九首》中"西北有高楼"篇脱来。(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



因慨叹于世情险恶，曹植乃有游仙之作。

……子建《五游》、《升天》诸作，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景纯《游仙》，体格顿衰，尚多致语，下此无论矣。(胡应麟《诗薮》卷二)

《仙人篇》超世之意弥遒，而典物凑泊，其驱役缛采，若挹河取燧，此孟德、子桓所不能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

《苦思行》子建多历忧患，苦思所以藏身之固，计欲攀云随真人而不可得，托言隐士教以忘言，盖安身之道，守默为要也。(朱乾《乐府正义》卷一四)

曹植又有《洛神赋》，作于黄初三年。或以为“感甄”之作（见尤袤《李注文选》刻本）或以为“托词宓妃，以寄文帝”（何焯《义门读书记》）。按其序云：“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赋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后说为是。

3．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

曹植兼擅各类文体、诗体，尤其长于五言。

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独陈思耳。（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

五言盛于建安，陈思王为之冠冕，潘、陆以下无能与并者。子美言“诗看子建亲”，故苏子瞻云诗至子美一变也。……今之论诗者，但当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之变，于斯尽矣。（吴乔《围炉夜话》卷一）

在诗艺、诗境方面，曹植出于《十九首》，又兼采前代诗歌之所长，俨然自成一家。

《十九首》后，得其调者，古今曹子建而已。（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

于建乐府五言《种葛》、《浮萍》二篇，或谓子汉人五言为近，非也。汉人委婉悠园，有才不露，子建二篇则才思逸，情态不穷。王敬美谓子建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是也。学者于此能别，方可与论《十九首》矣。（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



子建之诗，檃栝《风》、《骚》，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其浑雄苍老，有时或不及乃父；清莹悲凉，有时或不及乃兄。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

魏诗以陈思作主，余子辅之。五言自汉迄魏，得思王始称大成。（李重华《贞一斋诗话》）

曹植通音律，一些诗句平仄调协，音节铿锵，可见从五古到五律的音律规范痕迹。此外，曹植已不同于《十九首》诗人的无意为

诗，而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显示出他把观察事物、体验情感与选择词藻、精心修辞相结合的用心。

（曹）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翫，以为至道之宗极也。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四九）

魏文帝："西北有浮云……"又子建"转蓬离本根……"此结句换韵之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一）

子建诗多有虚字用工处，唐人诗眼本于此尔。若"朱华冒绿池"、"时雨净飞尘"、"松子久吾欺"、"列坐竟长筵"、"严霜依玉除"、"远望周千里"，其平仄妥帖，尚有古意。（谢榛《四溟诗话》卷二）

曹子建曰："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以上虽为律句，全篇高古。及灵运古律相半，至谢朓全为律矣。（谢榛《四溟诗话》卷一）

陈思王《美人篇》云："珊瑚间木难"，"求贤良独难"，此篇两用"难"字为韵。……魏、晋古意犹存，而不泥声韵。（同上）

陈思王《五游诗》云："披我丹霞衣……羡门进奇方"。此皆两句一意，然祖于古乐府，观其《陌上桑》："湘绮为下裙……锄者忘其锄"；《焦仲卿妻》："东西植松柏……叶叶相交通。"……此皆古调，自然成对。陈思通篇拟之，步骤虽似五言长律，其辞古气顺如此。（同上卷三）

汉人乐府五言，体既轶荡，而语更真率。子建《七哀》、《种葛》、《浮萍》而外，体既整秩，而语皆构结。盖汉人本叙事之诗，子建则事由创撰，故有异耳。（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



《名都》、《白马》二篇，敷陈藻彩，所谓修辞之章也。（沈德潜《古诗源》卷五）

《白马篇》……有声有势，历乱而去，而马上人身容飘忽，轻捷可知。缀词叙景，须于此等字法尽心体究，方不重滞。（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

《斗鸡篇》"挥羽"六语，生动，咏小物须如此生动始佳。（同上）

曹植之诗，又多情景语，因而气韵流注，意象相生。

读《古诗十九首》及曹子建诗，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类，

诗皆思深远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吕本中《童蒙诗训》）

《来日当大难》于景得景易，于事得景难，于情得景尤难。"游马后来，辕车解轮"，事之景也。"今日同堂，出门异乡"，情之景也。子建而长如此，即许之天才流丽可矣。（王夫之《船山古体诗评选》卷一）

《赠白马王彪》首章虚写景事，便婉转不淡。……（"踟蹰亦何留"章）此首景中有情，甚佳。凡言情至者须入景，方得动宕。若一于言情，但觉絮絮，反无味矣，景更哀凉独绝。（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

曹植诗歌，兼有豪逸悲壮、工丽深致的风格。

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钟嵘《诗品》上）

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秦观《淮海集》卷二二《韩愈论》）

……而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故不可以优劣论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王世懋《艺圃撷余》）

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

在建安时代，曹植已卓然成家；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最为巨大。



《鰕䱇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

钟（惺）云：子建柔情丽质，不减文帝；而肝肠侠骨，时有磊块处，似为过之。（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七）

汉、魏以来，二千余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王士祯《带经堂诗话》）

子建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

而穷态尽变，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固各成绝技，使后人攀仰莫及。陈思王诗如大成合乐，八音繁会，玉振金声，绎如抽丝，端如贯珠，循声赴节，既谐以和，而有理有伦，有变有转，前趋后艳，徐疾淫裔，璆然之后，犹擅余音。又如天马飞行，尔云凌山，赴汲逾阻，靡所不臻，曾无一蹶。（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

第三节　建安时期的其他作家

一　“建安七子”

（一）“七子”之称

“七子”之称，始见于曹丕《典论·论文》。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典论·论文》）



“七子”效命于邺下，于其文学创作，实有幸与不幸。

曹操罗织文人于邺下，政治的考虑大于文学。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郗俭。……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曹植《辨道论》）（按：曹操悉招方士，与罗织文人，目的一也。）

诸子在魏，犹孟子在齐，不治事而议论。魏武看诸子，俱是书生无济，然不收之，则失人望，故用之以充文学。（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

“七子”依附曹氏于乱世，虽然有了安定的创作环境，但个性

不免受到压抑，无聊的应酬之作亦相应增多。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此其所同也。（《文心雕龙·明诗》）

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并作。（挚虞《文章流别论》）

《公讌诗》，在酒肉场中，露出酸馅本色。寒士得贵游残杯冷炙，感恩至此，殊为可笑。而满篇擻数他人富贵，尤见俗态。惟曹子建自露家风，而应玚《侍建章集诗》，末语不忘儆戒，颇为得体耳。大抵建安诸子，稍有才调，全无骨力，岂文举、正平见杀后，文人垂头丧气，遂软媚取容至此。伤哉！（贺贻孙《诗筏》）

王、徐、应、刘，望路争驱，可云盛矣。然《公讌》诸篇，一望黄茅白苇，此昔人所云“萧统简辑过冗而不精，刘勰叙论阙略而未详”也。（田雯《古欢堂杂著》）

（二）“建安七子”的文学创作

“七子”除孔融外，行迹大抵相似。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劝表子琮，令归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迁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干为司空军谋祭酒，五官将文学。琳前为何进主簿。进欲诛诸宦官……欲以劫恐太后。琳谏曰……进不纳其言，竟以取祸。琳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



爱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学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移书，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门下督，瑀为仓曹掾属。玚、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玚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桢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赋数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七子"之中，陈琳（？—217）、阮瑀（？—212）长于章表书记。

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曹丕《与吴质书》）

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典论·论文》）

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邱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文心雕龙·檄移》）

阮掾为曹操遗书孙权，文词英拔，见重魏朝。……余观彼书，润泽发扬，善辨若毂。独叙赤壁之败，流汗发惭，口重语蹇，固知无情之言，即悬幡击鼓，无能助其威灵也。《文质论》雅有劲思，若得优游述作，勒成一家，亦足与伟长《中论》，翩翩上下。（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写乱世中的人间悲剧，较阮瑀《驾出北郭门行》更具艺术的感染力量。

《饮马长城窟行》此伤秦时役卒筑城，民不聊生之诗，比汉蔡中郎作为切题矣。首二，点题直起。"水寒伤骨"，就苦寒引出归思。……"寄辞"六句，以在祸难，点情所以不忍稽留之故。复借彼之生男不如生女，跌醒己之必死边城，语本汉诗，神理恰合。答辞四句，表自己之亦当从死，而彼死终不忍言，只以苦字代之，又得体。此种乐府，古色奇趣，即在汉古辞中，亦推上乘。自魏而降，尠嗣音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

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盖叙事辞缓则冗不精，"翩翩堂前燕"，叠字极促乃佳。阮瑀《驾出北郭门行》视《孤儿行》太缓弱不逮矣。（徐祯卿《谈

艺录》)

"七子"之中，王粲（177—217）文学成就最高。

（王粲）既有令德，材技广宜。强记洽闻，幽赞微言。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何道不洽，何艺不闲。（曹植《王仲宣诔》）

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龙·才略》）

王粲之诗，四、五言兼善。其南依荆州刘表时所作四言《赠蔡子笃》、五言《七哀诗》三首等诗，体兼《诗》、《骚》，颇得《十九首》韵致，是建安诗人的上乘之作。

王仲宣诗跌宕不足，而真挚有余。伤乱之情，《小雅》、《变风》之余也，与子桓兄弟，气体本殊，无缘相比。（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

《赠蔡子笃诗》情至语反质直，不务繁绘。"风流云散"八字，飘渺悲凄。（同上）

《七哀诗》（《西京乱无象》篇）乱世之苦，言之真切。"委身"字可悲，本以避乱，然此身终莫必。闻泣不能不顾，顾而终不还，情哀至此。（《荆蛮非我乡》）"山岗"数句，极写非我乡；"丝桐"二句，刻至。（《边城使心悲》）此是咏北边，序述曲尽悲苦，观此则荆楚犹为乐土也。建安诗如此，第以情至为工。（同上）

曹子建、王仲宣诗出于《骚》。（刘熙载《艺概·诗概》）



王粲依附曹操后，尝随军出征，作《从军行》五首，既写书生抱负，也抒发乱世悲慨，兼有对曹操的颂美之词。全诗气象壮阔，格调苍劲，为杜甫的前后《出塞》导乎先路。

《从军诗》五首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公西征张鲁，鲁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郑。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诗以美其事。（《从军有苦乐》篇）写掳获之多，曲意描摹。"徒行"二句，更有致，语亦苍古。"禽兽为牺"下商度出处，另是一意。（《凉风厉秋节》篇）建安二十二年，粲从曹公征吴。以下四首，盖征吴作也。立言得体，调并苍劲，古质之笔，不及汉而高子晋。汉

人笔古，然情更流丽；晋人亦苍，然视此较近。(《从军征遐路》篇)"白日"二句，景活。(《朝发邺都桥》篇)"逍遥"四句，千万全军，俨然在目。后段立言得体，不作书生语，故佳。(《悠悠涉荒路》篇)此应是还师至樵作。然以仲宣始至谯，故云然。前段景地，写得生动。(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

《从军诗》……(《悠悠涉荒路》篇)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今至于"日望无烟火，城郭生榛棘"，仁人于此尚忍言兵哉！区区一谯郡，纵黍稷盈畴，馆宅充里，何以为治？不幸而处乱世，读此篇可伤已！(朱乾《东府正义》卷六)

王仲宣《从军》五首，紧健处，杜公时效之，《出塞》诸作可见。但其铺陈处，稍嫌繁缛，乃知杜公有伤尽太冗之病，亦自古人出。(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

因地位使然，王粲后期亦有应酬之作，如《公讌》。

钟(惺)云：邺下西园，惜无蔡中郎、孔文举、祢正平其人以应之者。仲宣诸人，气骨文藻，事事不敢相敌。《公讌》诸作，尤有乞气，故一切黜之，即黜唐应制诗意也。……试与曹公父子诗共读之，分格自见，不待饶舌。(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七)

王粲《登楼赋》抒写去国怀乡、壮志未酬的心境，在建安抒情小赋中，与曹植《洛神赋》并为双美；其《为刘荆州谏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难钟荀太平论》、《安身论》等文，或指陈利害，词义恳切；或义近名法，长于辨难。



《登楼赋》者，魏侍中王粲之所作也。归来子曰："粲诗有古风。《登楼》之作，去楚辞远，又不及汉，然犹过曹植、潘岳、陆机愁咏、闲居、怀旧众作，盖魏之赋极此矣。(朱熹《楚辞后语》卷四)

王仲宣《登楼赋》出于《哀郢》。(刘熙载《艺概·赋概》)

袁显思兄弟争国，王仲宣为刘荆州移书苦谏。今读其文，非独词章纵横，其言诚仁人也。……仲宣二书，疾呼泣血，无救阋墙。袁氏将丧，顽子执兵，即苏、张复生何益哉？(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观此二文(按：指《难钟荀太平论》、《安身论》)，知粲之持论，雅似魏

晋诸贤。其他所著，别有《儒吏论》、《务本论》、《爵论》，亦见《类聚》诸书所引，均于名法之言为近。《魏志·粲传》引《典略》曰："粲才既高，辨论应机。"岂不信矣！（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魏晋文学之变迁》）

刘桢（？—217）为人，颇有气骨，文风亦然。

文帝尝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因书嘲桢曰："夫物因人为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至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桢答曰："桢闻荆山之璞……伏朽石之下，潜污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贱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饮，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

魏文学刘桢，其源出《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钟嵘诗品》）

公干诗，质直如其人，譬之乔松，挺然独立。公干不仿古人，后人亦不能仿公干。其体盖以骨胜。（吴淇《六朝选诗定论》）

刘桢亦有《公讌诗》，然并不称颂功德。《赠徐干》、《赠从弟》则颇有伤怨、愤慨之意。



《公讌诗》通章只言游从之盛、景物之美，曾无一颂德语，又贤于仲宣"克配周公"远矣。此应付诗中之有品者。（同上）

《赠徐干》武帝末年，欲易太子，故文帝子建各树党翼，而子建之党尤盛。唯伟长淡泊，公干戆直不与。然伟长以淡泊无感，公干戆直招忌，故独抱深感。然此深感，除伟长外，再无一人可告诉者。故思之不已而望，望之不已而感。……要之只是愤慨不平，无觊觎之意。若有觊觎，焉得为卓荦偏人。（同上）

《赠从弟》三首　诸子以世乱依魏，苟全性命而已，非其本志也。细玩公干《赠从弟诗》，其人似不肯仕魏者，其品行高洁，大有过人者，公干不胜致羡焉，盖亦以自伤也。首章，"蘋藻"，喻其品之洁。……次章，松柏喻其守

之正，出于性之自然，而非勉强。末章，凤凰喻其志之高。却又非沮、溺流，一味独善其身者。只是时无可出，决不苟出耳。（吴淇《六朝选诗定论》）

刘桢以气驭文，无意雕琢而得其真美。其《赠从弟》开左思《咏史》先声。

晋室左思，其源出于公干。（钟嵘《诗品》）

邺中七子，陈王最高。刘桢辞气，偏正得其中，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释皎然《诗式》）

公干气胜，仲宣情胜，皆有陈思之一体。后世诗率不越此二宗。（刘熙载《艺概·诗概》）

应玚（？—217）之诗，多流离飘泊的感慨，如《别诗》、《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简珠"，喻君子；"砂石"，喻小人。魏人《公讌》俱极平庸，后人应酬诗从此开出。篇中代雁为词，音调悲切，异于众作，存此以备一格。（沈德潜《古诗源》卷六）

《别诗》（《朝云浮四海》篇）思归不得，无甚深意。得首二，反兴有势，便觉节短韵长。（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十）



徐干质性淡泊，《室思》、《情诗》、《杂诗》等皆以情见长。

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曹丕《与吴质书》）

徐干，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

《室思》此托言闺人之词也。自处厚而望君不薄，情极深致。（沈德潜《古诗源》卷六）

《杂诗》（《浮云何洋洋》篇）此亦闺怨诗也。首四，相思难寄，却借浮云托兴，奇甚。"人离"二句，点醒相思之故。末四，只就己之相思无已收住，绝不怅望彼此何以相忘，转觉含蓄有余味。（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按：

徐干《室思诗》共六首，《广文选》以前五首作《杂诗》，后一首作《室思》。《诗纪》以前两首作《杂诗》，余皆作《室思》。）

《情思》亦复极意摹写，无一二虚语。倾吐至情，故但觉平实。（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

徐干（170—217）又有《中论》二十篇，辞义典雅，俱是汉文本色。

（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不朽矣。（曹丕《与吴质书》）

《中论》二卷，汉徐干撰。……书凡二十篇，大都阐发义理，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故前史皆列之儒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

曾子固《徐干〈中论目录〉序》谓干“能考六艺，推仲尼、孟子之旨。”余谓干之文，非但其理不驳，其气亦雍容静穆，非有养不能至也。（刘熙载《艺概·文概》）

徐干《中论》说道理俱正而实。（同上）

二　蔡　琰

（一）蔡琰（生卒年不详）的生平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194—195）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 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 “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辞曰（即五言《悲愤诗》）……。其二章曰（即骚体《悲愤诗》）……（《后汉书·列女传》）



（二）蔡琰诗作及其真伪问题

蔡琰骚体《悲愤诗》所叙情节，有与文姬生平不符处，后人多

以为伪作。其五言《悲愤诗》，苏轼《仇池笔记·拟作》以为非出自蔡琰之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以为乃蔡琰所作。以史证诗，当为蔡琰作无疑。（参看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载《论蔡琰〈悲愤诗〉》）。又传蔡琰有《胡笳十八拍》，载《乐府诗集》与朱熹《楚辞后语》，真伪至今尚无定论。（参看中华书局《胡笳十八拍讨论集》）。

苏东坡不信此诗，疑为伪造。吾以为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之所能代也。（吴闿生《古今诗范·悲愤诗》注）

东坡不信此传者，以为琰非卓众所掠，所言失实。后人又疑中幅言已陷胡一段佚去。吾谓此诗以哀痛为主，纪载固不暇求详，且其情事，亦不忍详言矣。（同上）

五言《悲愤诗》叙写诗人“流离成鄙贱”的种种痛苦，“常恐复捐废”的深切隐忧，事真情真，可看作古代社会广大妇女的一页痛史。

（《悲愤诗》）五言一章与《焦仲卿妻》相类，陈绎曾谓“真情极切，自然成文”是也。（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



《悲愤诗》叙事而兼抒情，是汉乐府叙事诗的进一步发展，对唐代杜甫的叙事诗影响甚大。

叙事长篇动人啼笑处，全在点缀生活……文姬《悲愤》篇，苦处在胡儿抱颈数语，与同时相送相慕者一番牵别，令人欲泣。（贺贻孙《诗筏》）

文姬《悲愤诗》，减去脱卸转接之痕，若断若续，不碎不乱，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蔡琰《悲愤诗》、王粲《七哀》“路逢饥妇人”一首，刘琨《答卢谌》，已开少陵宗派。盖风气之变，必先有数百年之积也。（施补华《岘佣说诗》）

第三章

正始文学

正始时期的代表作家是“竹林七贤”；七贤之中，以阮籍和嵇康的文学成就为最高。

第一节　阮籍与嵇康

一　阮籍、嵇康思想性格的异同

（一）阮籍、嵇康的生平



1. 阮籍（210—263）的生平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及文帝辅政……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会帝让九锡，公

卿劝进，使籍为其辞。……景元四年冬，卒，时年五十四。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晋书·阮籍传》）

2. 嵇康（223—262）的生平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兄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庄》、《老》。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山涛将去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曰……此书既行，知其不可羁屈也。……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缧绁，乃作《幽愤诗》……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钟会，遂并害之。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撰上古以来高士为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又作《太师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复作《声无哀乐论》，甚有条理。（《晋书·嵇康传》）



阮、嵇之传，又见《三国志·魏书》。

（二）阮籍、嵇康思想的异同

调和自然与名教，以儒家的王道融入老庄的自然天道；阮籍讲"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大人先生传》），嵇康讲"君位益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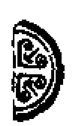
臣路生心”（《太师箴》），都对君权有所批判，是阮、嵇之所同。但嵇康以无限企慕的笔调，描绘“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的自觉的伦理境界，却是有感于世道之污浊而发的愤激之言；与之相反，阮籍所描绘的理想化的人伦秩序在本质上并未脱出汉儒窠臼，故较之嵇康，易为世教所容。

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嵇康《声无哀乐论》）

圣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虽居君位，飨万国，恬若素士接宾客也……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嵇康《答向子期难养生论》）

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朴之素；百姓熙洽，保性命之和。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阮籍《通老论》）

阮、嵇思想之异同，与二人的政治态度有关。反对司马氏的篡权，是他们的共同立场。但在态度上，阮籍较能做到敷衍世事，“应变顺和”（《大人先生传》），嵇康却往往峻切激烈，往而不返。



“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下惠，今愧孙登”（《幽愤诗》中语），盖志钟会之悔也。吾尝读《世说》，知康乃魏宗室婿，审如此，虽不忤钟会，亦安能免死邪？尝称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为可师，殊不然。籍虽不臧否人物，而作青白眼，亦何以异？籍得全于晋，直是早附司马氏，阴托其庇耳。史言：“礼法之士，疾之如仇，赖司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马氏，未必能脱也。今《文选》载蒋济《劝进表》，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为！（叶适《石林诗话》）

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何礼法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徒以钟会片言，遂不免邪？至《劝进表》之文，真情乃见。（张燧《千百年眼》）（按：政治高压之下，文人少有全者；阮籍之作《劝进表》，不得已也。叶适、

张燧以此判定阮籍依附司马氏，未免立论苛刻。但以此言阮、嵇政治态度不尽相同，却是符合事实的。）

“七贤”之义，既从《论语》“作者七人”而来，则“避世”“避地”因其初旨也。然则当时诸人名教与自然主张互异，即是自身政治立场之不同，乃实际问题，非止玄想而已，观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明其不仕当世即不与司马氏合作之宗旨，宜其为司马氏以其党于不孝之吕安，即坐以违反名教之大罪杀之也。“七贤”之中，应推嵇康为第一人，即积极反抗司马氏者。（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议之关系》）

（三）阮籍、嵇康性格与处世的异同

非毁礼法，放浪形骸，是二人之所同；阮籍含蓄而近乎圆滑，嵇康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是二人之所异。

钟会为大将军兄弟所昵，闻康名而造焉。会，名公子，以才能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会深衔之。（《世说新语·简傲》）

山巨源为吏部侍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辞之，并与山绝。岂不识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乃答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之。（《世说新语·栖逸》注引《嵇康别传》）

康尝采药，游山泽……至汲郡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晋书·嵇康传》）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饮自若。（《世说新语·简傲》）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任诞》）

（籍）宏达不羁，不拘礼俗。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得与言，昶愧叹之，自以为不能测也。口不论事，自然高迈。（同上）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谕。司空郑冲，驰遣信阮籍求文。籍当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同上·文学》）

籍……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晋书·阮籍传》）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叔夜婞直，所触即形。集中诸篇，多抒感愤。召祸之故，乃亦缘兹。夫尽言刺讥，一览易识，在平时犹不可，况猜忌如仲达父子者哉！（《采菽堂古诗选》卷八）

嵇、阮齐名，皆博学有文。然二人立身行己，有相似者，有不同者。康著《养生论》，颇言性情。及观《绝交书》，如出二人。处魏晋之际，不能晦迹韬光，而傲慢忤物，又不能危行言逊，而非薄圣人，竟致杀身，哀哉！籍放荡不检，则甚于康，不罹于祸，在《劝进》表也。（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

在非毁礼法的同时，阮、嵇骨子里仍笃行着名教，更不希望子孙步其后尘，此又是二人之所同。

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嵇康《家诫》）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任诞》）

嵇中散任诞魏朝，独《家诫》恭谨，教子以礼。（《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颜光禄集》）

二　阮籍、嵇康文学风格的异同



阮、嵇思想性格的异同，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就二人的文学风格而言，"师心遣论"、"使气命诗"是其所同，"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是其所异。

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

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同上·体性》）

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同上《才略》）

晋中散嵇康，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之高流。（钟嵘《诗品》卷中）

晋步兵阮籍，其源于《小雅》，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钟嵘《诗品》，卷中）

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遭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李善注）

"嵇志清峻，阮旨遥深"，两家诗人定论也。……凡性不近物者，勉为抑损，终与物乖。中散绝交巨源，非恶山公，于当世人事诚不耐也。……集中大文，诸论为高讽。养生而达老庄之旨，辨管蔡而知周公之心。其时役役司马门下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读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咏怀》诸篇，文隐指远，定哀之间多微辞，盖指此也。履朝右而谈方外，羁仕宦而慕真仙；大人先生一传，岂子虚、亡是公耶？（同上）

叔夜衷怀既然，文笔亦尔，径遂直陈，有言必尽，无复含吐之致。故知诗诚关乎性情；婞直之人，必不能为婉转之调审矣。（《采菽堂古诗选》卷八）

三　阮籍、嵇康之诗

阮、嵇均长于作诗。不同的是，阮籍长于五言，嵇康长于四言。

（一）阮籍五言抒情组诗《咏怀》



《咏怀》共八十二首，非作于一时一地，实为阮籍一生思想情感的总汇。

阮公虽云志在刺讥，要其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为《咏怀》耳。（吴汝纶《古诗钞》卷二）

1.《咏怀》的思想内容

《咏怀》既集阮籍平生所作，其内容的丰富，远非其他正始诗人可比。如：

其中有自明少年心性者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其十五。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同。）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其三十九）

有以史事讽谕曹魏集团荒淫失政，难免有亡国之祸者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其三十一）

有忧惧于司马氏之恐怖政治者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其三）

有追求隐逸而逃避世事者

猗欤上世士，恬淡志安贫。季叶道陵迟，驰骛纷垢尘。……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其七十四）



有抒写内心无告之焦虑痛苦者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平常改，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

有怒斥虚伪卑劣的礼法之士者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其六十七）

2.《咏怀》的艺术风格

生在易代之际，高压之下，阮籍抒其怨愤，不能不欲露故藏，欲言又止，从而形成“遥深”的艺术风格。

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文心雕龙·体性》）

阮公《咏怀》，亦自深于寄托。（《艺圃撷余》）

阮公《咏怀》，远近之间，遇境即际，兴穷即止，坐不着论宗，佳耳。（《艺苑卮言》卷三）

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而以高朗之怀，脱颖之气，取神似于离合之间，大要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而当其有所不极，则弘忍之力，内视荆、聂矣。且其托体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意固径庭，而言皆一致，信其但然而又不徒然，疑其必然而彼固不然。不但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且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

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令读者莫求归趣。此其为阮公之诗也。必求时事以实之，则凿矣。（《古诗源》卷六）



《咏怀》八十二首又大抵具备各自的个性。它们远承《风》、《雅》、《离骚》，近取乐府、《古诗十九首》，在艺术表现上兼收并蓄，寓多样于统一。

晋步兵阮籍。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钟嵘《诗品》卷上）

步兵《咏怀》……远绍《国风》，近出入于《十九首》……（《古诗评选》卷四）

阮公《咏怀》，神至之笔。观其抒写，直取自然，初非琢炼之劳，吐以匠心之感，与《十九首》若离若合，时一冥符。但错出繁称，辞多悠谬。审其大旨，始睹厥真；悲在衷心，乃成楚调。……公诗自学《离骚》，而后人以为类《十九首》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八）

正始时期，惟阮籍《咏怀》，犹有建安气骨。

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沧浪诗话·诗评》）

阮公殿魏诗之末而绰有汉音，非邺下诸子所可步趋也。……总之，步兵《咏怀》诸作，奇愁天上，埋忧地下，其胸次非复人世机轴……（《师友诗传录》）

太冲《咏怀》、景纯《游仙》，皆骨干清强，神理俊爽。其所以不及汉人者，正以太清强、太俊爽耳。若阮公《咏怀》，则浑朴之气未散也。（《岘佣说诗》）

《咏怀》首创了我国五古抒情组诗的体例。自此之后，作者代不绝人。

（陈）子昂《感遇》，尽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是杰出。盖魏晋之后，惟此尚有步兵余韵。

（二）嵇康四言抒情组诗《赠秀才入军十八首》

1.《赠秀才入军十八首》的题旨

对于诗题所云"秀才"，李善以为嵇兄喜，葛立芳以为友朋。



《文选》载嵇叔夜《赠秀才入军诗》，李善注，谓兄喜秀才入军。而张铣谓叔夜弟，不知其名。考五诗，或曰"携我好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称。善、铣所注，恐未然耳。（《韵语阳秋》卷十）

晋嵇康《赠弟秀才四言诗》云："感悟驰情，思我所钦。"则以所钦为弟。（同上）（按：葛氏所云，自相矛盾，不辩自明。此诗《文选》题作《赠秀才入军》，说明萧统所据版本，并无"兄"字。李善注谓"集云：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诗纪》亦据此言。其集宋时已不可得见。兹有可疑者三：其一、除葛氏所引数例外，诗中尚有"言念君子"，"仰顾我友"，"我友焉之"等语，似嵇康所赠，友而非兄。二、据《世说新语》，阮籍、吕安等素恶嵇喜，以其礼法之士也。观康诗有云"郢人逝矣，谁与尽言？"秀才与康形神相契，自不待言。故十八首所赠，似非嵇喜，而是友人，诗题亦应仍《文选》之旧。三、

嵇康少失父恃，得母兄鞠育，情感深笃，事见《与山巨源绝交书》。又《思亲诗》云："奄失恃兮孤茕茕，内自悼兮啼失声。思报德兮邈已绝，感鞠育兮情剥裂。嗟母兄兮永潜藏，想形容兮内摧伤。""念畴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寿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穷约兮但有悲。"是知嵇康被害之前，曾有失兄之痛。按，泰始、咸宁年间，嵇喜相继任江夏太守、徐州刺史（见《晋书·武帝纪》）；此所言"母兄"，非嵇喜明矣。是又知嵇康于嵇喜而外，另有同母兄在。故此诗即为赠兄，未必定是嵇喜。）

对于"秀才"的入司马氏军幕，嵇康视为"弃此荪芷，袭彼萧艾"，是深表遗憾和担忧的。诗人追求的人生境界，全寄托于清空高远的意象、意境。全诗主旨，似在于此。

……伊我之劳，有怀遐人。寤言永思，寔钟所亲。所亲安在，舍我远迈。弃此荪芷，袭彼萧艾。虽曰幽深，岂无颠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其五）

乘风高逝，远登灵丘。托好松乔，携手俱游。朝发太华，夕宿神州。弹琴咏诗，聊以忘忧。（其十五）

2.《赠秀才入军十八首》的艺术风格

"诗三百"后，唯曹操、嵇康和此后的陶渊明，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曹操诗以气胜，嵇康诗以意象、意境胜。

全诗有体似《诗》、《骚》之比兴、象征者：



鸳鸯于飞，肃肃其羽。朝游高原，夕宿兰渚。邕邕和鸣，顾眄俦侣。俛仰慷慨，优游容与。（其一）

鸳鸯于飞，啸侣命俦。朝游高原，夕宿中州。交颈振翼，容与清流。咀嚼兰蕙，俛仰优游。（其二）

二章往复养势，虽体似风雅，而神韵自别。（《古诗评选》卷二）

二章先叙同居之欢，下乃渐入言别，章法宛转。惟言同居极乐，乃觉离别极悲也。但两章中语无深浅，所以不及三百篇（《采菽堂古诗选》卷八）（按：全篇比兴，旨在象外。陈祚明谓"语无深浅"，是不知象征之为用；又二章四言其形，《诗》《骚》其神，即王夫之所谓"神韵自别"也。嵇康四言出于《诗》《骚》而又自成一格，于此可见。）

全诗又有直以意象、意境取胜者：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原，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谁与尽言？（其十三）

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世说新语·巧艺》）

"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妙在象外。（《古夫于亭杂录》）

高致超超，顾盼自得，竟不作三百篇语，然弥佳。（《采菽堂古诗选》卷八）

诗中又多清峻高迈之语：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风。凌厉中原，顾盼生姿。（其八）

此章突兀拔起，墨气喷薄，而当首只用一意磅礴，不作陡峭腾衰之色，神于勇矣！（《古诗评选》卷二）

清思峻骨，别开生面，刘舍人目为"清峻"，信矣。……脱去风雅陈言，自有一种生新之致。（邵长蘅《文选评》）

诗中又有一往情深语：

闲夜肃清，朗月照轩。微风动袿，组帐易褰。旨酒盈樽，莫与交欢。鸣琴在御，谁与鼓弹。仰慕同趣，其馨若兰。佳人不存，能不永叹！（其十四）

别绪缠绵，言情深至。如此结颇悠然有余致，不须下文。（《采菽堂古诗选》卷八）



丽词状物，景亦含情，也是本诗的一大特点：

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群飞。驾言出游，日夕忘归。……（其十二）

此叔夜自叙其与秀才别后之情，言见洪流尚萦带而相近，绿林且荣耀而悦人，鱼龙亦共聚而游，山鸟有群飞之乐，是以览物兴怀，思得同趣之人，相与游娱，以忘晨夕。……《魏志》称其"文辞壮丽"，观此诗，亦可见也。（刘履《选诗补注》）

叔夜送人从军至十九首，已开晋、宋四言门户。然雄辞彩语，错互其间，未令人厌。（《诗薮》内编卷一）

"鱼龙"八字，是晋人语，然颇生动。（《采菽堂古诗选》卷八）

3．四言《幽愤诗》

嵇康《幽愤诗》作于狱中，其诗自述生平，又明心志，更怨愤于凭空陷罪，实可与司马迁《报任安书》相参看。又全诗词气峻切，言必尽意，与《赠秀才入军》的风格，迥不相同。

（《幽愤诗》）通篇直直叙去，自怨自艾，若隐若晦，牵引之由、显明臧否，得祸之由也。至云"澡身沧浪，岂云能补"，悔恨之词切矣。华亭鹤唳，隐然言外。（《古诗源》卷六）

直怀叙来，喜其畅达。怨尤之辞少，而悔祸之意真。（《采菽堂古诗选》卷八）（按：全诗悔祸之词固有，愤激之词亦多，观"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等可知。沈、陈所论，失在片面。）

（三）阮籍、嵇康的游仙诗

建安诗人，首倡游仙。但因曹操诸人富于强烈的现实精神与进取精神，所作皆有慷慨悲凉之气。"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文心雕龙·明诗》）；真正把老庄哲学思想、社会理想、人格追求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借鉴庄子、屈骚中非现实性情境，创造出新型的游仙诗，实始于正始时期。阮籍游仙诗多写自己在艰难时世中对神仙境界的企羡、求索，尤其写自己求之不得的苦闷和悲哀，以及因仙境虚妄而产生的怀疑与失望，其感情复杂而浓烈。嵇康的游仙诗则冲淡、超脱，显示出诗人在大悲哀中的极度冷静。阮、嵇对东晋游仙诗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的。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咏怀》其四十一）

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凌厉五岳，忽行万亿。授我神药，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炼形易色。歌以言志，思行游八极。（嵇康《代秋胡歌诗》其六）

阮、嵇诗又有会合道家之言者，实为东晋玄言诗先导。

混元生两仪，四象运衡玑。曒日布炎精，素月垂景辉。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焉得凌霄翼，飘飖登云湄。嗟哉尼父志，何为居九夷？（《咏怀》其四十）

流俗难悟，逐物不返。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贵心肆志，纵心无悔。（《代秋胡歌诗》其十七）

四　阮籍、嵇康之文

（一）阮籍之文

阮籍、嵇康，均长于著论，但阮籍的文章，较嵇康富于文采。其散文时杂以骚赋诸体，或奇偶相生，或间用韵语，文词壮丽，结体圆熟。所为辞赋，大抵辞藻清丽，颇有寄托，亦为魏晋小赋杰构。



嗣宗论乐，史迁不如；《通易》、《达庄》，则王弼、郭象二注，皆其环内也。以此三论，垂诸艺文，六家指要，网罗精阔。曹氏父子，词坛虎步，论文有余，言理不足。嗣宗视之，犹轻尘于泰岱，岂特其人袢虱哉？大言小言，清风穆如，间览赋苑，长篇争丽，《两都》、《三京》，读未终卷，触鼻欲睡。展观阮作，则一丸消疹，胸怀荡涤，恶可谓世无萱草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阮氏之文传于今者，有《东平赋》、《首阳山赋》、《鸠赋》、《猕猴赋》、《清思赋》、《元父赋》，大抵语重意奇，颇事华采。……若《文选》所录《为郑冲劝晋王笺》、《诣蒋公奏记辞辟命》，文虽雅健，非阮氏文章之本色也。其论文传于今者，若《通老论》诸文，今均弗完，惟见《御览》诸书所引；其见于明人所刻阮集者，有《通易论》、《达庄论》、《乐论》三篇。《通易》综贯全经之义，以推论世变之由。其文体奇偶相成，间用韵语；《达庄》亦多韵

语。然词必对偶，以气骋词；《乐论》尤为繁富，辅以壮丽之词。阮氏之文，盖以此数篇为至美。(《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设为问答之辞，实为赋体之文。其文不独自明心性，发泄愤懑，亦借古讽今，直指礼教虚伪。

……或遗大人先生书曰："天下之贵，莫贵于君子。服有常设，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趍步宫商，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今先生乃被发而居巨海之中，与若君子者远，吾恐世之叹先生而非之也。……"于是，大人先生乃逌然而叹，假云霓而应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行。……且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之中乎！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寰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驰此以奏除，故循滞而不振。……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贱、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大人先生传》)

(阮赋)以天下为郛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谬悠之，则阮籍之为也。其原出于庄周，虽然，其辞也悲，其韵也迫，忧患之辞也。(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



(二) 嵇康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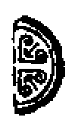
就总体而言，阮籍的文章在批判现实、介入政治斗争方面"隐而不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如嵇康的文章更切近现实。嵇康著有《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释私论》、《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声无哀乐论》等。这类文章并非只谈玄理，亦往往涉及政治。但针对性最强的，当推《太师箴》、《管蔡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

《太师箴》既是一般性的历史批判，也是声讨司马氏的檄文。

……下逮德衰，大道沈沦。智惠日用，渐私其亲。惧物乖离，攘臂立仁。名利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驰，天性丧真。季世陵替，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沈。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太师箴》)

此为司马氏言也。若讽若惜，词多纡回。(《骈体文钞》卷四李兆洛评)(按：本文虽属"师臣司训"之辞，然所言"季世"种种，大抵针对司马氏之所为。《周礼》："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晋书·宣帝纪》："及齐王即帝位，(司马懿)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军事，录尚书事。……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乃言于天子，徙帝为大司马。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如肖何故事。"司马懿既位在三公，《太师箴》自非泛泛之论。)

《管蔡论》则从历史旧案谈起：武王死，成王立，周公辅政。管、蔡怀疑周公将篡位，合同武庚叛乱。周公乃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管、蔡之为"顽恶""凶愚"，遂成历史定论。嵇康著文，为管、蔡翻案，联系到毋丘俭、诸葛诞起兵讨司马氏，兵败被诛的背景，显然是怀有深意的。



夫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是以文王列而显之，发、旦二圣举而任之，非以情亲而相私也。……功业有绩，故旷世不废，名冠当时，列为藩位。逮至武卒，嗣诵幼冲，周公践权，率朝诸侯。……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之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管、蔡虽怀抱忠诚，要为罪诛。罪诛已显，不得复理。……然论者承名信行，便以管、蔡为恶。不知管、蔡之恶，乃所以令三圣不明也。……且周公居摄，邵公不悦。推此言之，则管、蔡怀疑，未为不贤。而忠贤可不达权，三圣未为用恶，而周公不得不诛。若此，三圣所用信良，周公之诛得宜，管、蔡之心见理，尔乃大义得通，外内兼叙，无相伐负者，则时论亦得释然而大解也。(《管蔡论》)

《与山巨源绝交书》

意谓不肯仕耳，然全是愤激，并非恬淡，宜为司马昭所忌也。龙性难驯，与阮公作自别。（《文选评》引何焯语）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氏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嵇康的文章，不独思想新颖，“往往与旧说相反对”（同上），而且析理绵密，长于思辨，此亦阮籍文章所不及。

研求名理而论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矣。（李充《翰林论》）

嵇康之辨声，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文心雕龙·论说》）

以无礙辨才，发声律妙理，迴旋开合，层析不穷，如游武夷三十六峰，愈转愈妙，使人乐而忘倦。（余元熹《汉魏名文乘》）

（《养生论》）微论旨言，展析隽永，其局致尤为独操。（同上，引杨慎语）

（同上）不剿丹方气诀余沫，特以解悟为文，清通畅适。（同上，引陈明卿语）



（《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撷庄、荀之遗旨，而引契独深，亦复旷然幽滞之外。（《汉魏别解》引陆彦龙语）（按：《汉魏名文乘》作陈明卿语。）

嵇氏之文传于今者，以《琴赋》、《太师箴》为最著，别有《卜疑》（文仿《卜居》——原注）、《家诫》、《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其文体均变汉人之旧。论文自《养生论》外，有《答向子期难养生论》、《无私论》、《管蔡论》、《明胆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某氏难宅无吉凶摄生论》（本集作答张辽叔——原注），析理绵密，亦为汉人所未有。（嵇文长于辨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原注）其所注《声无哀乐论》，文词尤为繁富。（《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

嵇康文章往往以情驭文，无不尽之意，尤多性情语。故虽无阮

籍文章的清丽，但因气势所在，亦颇有壮采。

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文心雕龙·体性》)

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文心雕龙·书记》)

(《与山巨源绝交书》)此等文字，终晋之世不多见，即终古亦不多见。彼其情真语真，句句都从肺肠流出，自然高古，自然绝特，所以难及。……六朝之文，余所深服者，嵇中散《绝交》、《养生》二篇。(江进之《亘史外纪》)

(同上)"叔夜伟容色，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今此文正复似之。(《文选评》引孙矿语)

(同上)行文无所承袭，杼轴予怀，自成片段。予友畹村云："有真性情，则有真格律，遂为千古绝调。"信然！(方廷珪《文选集成》)

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饰，想于文亦尔。如《养生论》、《绝交书》，类信笔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续，然独造之语，自是奇丽超逸，览之跃然而醒。(《艺苑卮言》卷三)

第二节 "竹林七贤"的其他作家

一 "七贤"之同



在思想倾向、文化修养、人生态度等方面，"七贤"有极为相似之处。

陈留阮籍，谯郡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云："先辈初不臧贬七贤。"(同上《品藻》)

(一) 山涛 (205—283)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人。……少有器量，介然

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晋书·山涛传》）

山涛通简有德，秀、咸、戎、伶朗达有俊才。于时之谈，以阮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伦也。若如盛言，则非无臧贬，此言谬也。（《世说新语·品藻》注引《魏氏春秋》）

（二）王戎（234—305）

王戎，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戎幼而颖悟，神采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濬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赏其要会。……（王）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頠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晋书·王戎传》）

王戎简要。……《晋阳秋》曰："戎为豫州刺史，遭母忧，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棋奕，而容貌毁悴，杖而后起。（《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晋诸公赞》）

（三）阮咸（生卒年不详）



咸字仲容。……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咸与籍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锦绮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历仕散骑侍郎。山涛举咸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而居母丧，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姑当归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从去。时方有客，咸闻之，遽借客马追婢。既及，与婢累骑而还，论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晋书·阮咸传》）

（四）向秀（221？—300？）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人。清悟有远识，少为山

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又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晋书·向秀传》)

(五) 刘伶 (生卒年不详)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西北）人也。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乃引酒御肉，隗然复醉。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晋书·刘伶传》)

二　"七贤"之异

随着司马氏的政治恐怖愈益严重，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世风格逐渐有所分化。嵇康以触犯世网被杀；刘伶以无所用而得寿终；阮籍、阮咸依违于出处之间；王戎、向秀则欣然效力于司马氏；山涛则始终在"穷则独善"与"达则兼济"之间，恪尽职守与望风承旨之间，保持着相当的平衡。



(刘伶) 尝为建威参军。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竟以寿终。(《晋书·刘伶传》)

(阮咸) 虽处世不交人事……荀勖每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疾之，出补始平太守。以寿终。(《晋书·阮咸传》)

王戎每与籍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戎笑曰："卿辈意亦复易败耳!"……袭父爵，辟相国掾，历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坐遣吏修园宅，应免官，诏以赎论。迁豫州刺史，

加建威将军，受诏伐吴。……吴平，进爵安丰县侯，增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南郡太守刘肇赂戎筒中细布五十端，为司隶所纠，以知而未纳，故得不坐，然议者尤之。……戎在职虽殊无能，而庶绩修理。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杨骏执政，拜太子太傅。……戎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司隶傅咸奏戎……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寻转司徒。以王政将圮，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尝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初，孙秀为琅邪郡吏，求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焉。(《晋书·王戎传》)

康既被诛，(向)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晋书·向秀传》)

(山)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帝曰："吕望欲仕耶?"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晚与尚书和逌交，又与钟会、裴秀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势争权，涛平心处中，各得其所，而俱无恨焉。……及羊祜执政，时人欲危裴秀，涛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权臣意，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冀州俗薄，无相推毂。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涛在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涛中立于朝，晚值后党专权，不欲任杨氏，多有讽谏，帝虽悟而不能改。……涛苦表请退，诏又不许。……以太康四年薨，时年七十九。(《晋书·山涛传》)



三　向秀《思旧赋》

在司马氏为夺取权力而造成的政治高压之下，"竹林七贤"以其非圣无法的形式，表现其张扬个性的叛逆精神，从而创造出正始

文学最有光彩的部分。一当司马氏完成了权力转移的过程，“竹林七贤”便屈从于对现实政权的依附心理，复归于传统的人格形态和行为方式，正始文学因此逐渐失去了愤世疾时的内容，而流入西晋文人的徒以浮虚相标榜。向秀的《思旧赋》，是正始文学转戾期的最后一篇佳作。

对于“志远而疏”的嵇康，“心旷而放”的吕安，居然不容于当世，作者的怨愤悲凉，见于赋序：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是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但作者的“援翰写心”，并不仅在思旧与伤逝，更有易代之悲：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思旧赋》文辞简短，有未尽之意，所以如此，实与文人心怀畏惧有关。

（向子期《思旧赋》）不容太露，故为词止此。晋人文尤不易及也。（《义门读书记》卷四五）



第四章

两晋文学

第一节　太康作者

太康时期的作家，傅玄而外，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钟嵘《诗品序》）。但出身寒门的左思，在太康文人中其实是独标一格的。

一　傅玄与张华



（一）傅玄

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魏末，举为秀才，官至弘农太守、散骑常侍，封鹑觚男。入晋，进爵为子，位终司隶校尉。性峻急，不能容人之短，屡上书言事。学识渊博，精通音律。尝著《傅子》一百二十卷，原书已佚，现存辑本五卷。事见《晋书·傅玄列传》。

傅玄的文章，反对魏晋玄学空谈，崇尚经世之学。

> 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

帝初即位，广纳直言……玄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远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是以犹敢有言。"……（《晋书·傅玄列传》）

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及"，信矣！（王沈《与傅玄书》）

傅玄作诗，多摹仿汉魏乐府，其中颇有郊庙歌辞。

晋代郊祀宗庙乐歌，多推傅休奕，顾其文采，与荀、张（按：指荀勖、张华）等耳。（《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傅玄的拟乐府诗大都以女性命运为题材，内容流于伦理说教，形式典则而少有创新，反映了乐府诗歌的雅化趋向。

傅玄：思切清苦，失之太工。（陈绎曾《诗谱》）

平子《四愁》，千古绝唱，傅玄拟之，致不足言，大是笑资耳。玄又有《日出东南隅》一篇，汰去精英，窃其常语，尤有可厌者。本词："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于意已足，绰有余味。今复益以天地正位之语，正如低措大记旧文不全，时以己意续貂，罚饮墨水一斗可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乐府古诗不必轻拟。……若傅玄《艳歌行》云："一顾倾朝市，再顾国为墟。"呆拙之甚，所谓点金成铁手也。（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一）

傅玄诗中，亦有佳作。如《苦相篇·豫章行》写色衰见逐的弃妇，颇善描摹神情。《秦女休行》写烈女复仇故事，生动而有气势，唯主题流于说教。

傅玄乐府诸篇，粗率甚于韦昭，至如《惟汉行》、《秦女休行》等，语极鄙陋，较之汉人，正犹珷玞混玉耳。李于鳞《诗删》录《惟汉行》，岂以鄙陋为古朴耶。（《诗源辩体》卷五）（按：许氏所云"粗率"、"鄙陋"，正为乐府

本色。)

傅玄"庞烈妇",盖效(左延年)《女休》作者,辞义高古,足乱东、西京,乐府叙事,魏、晋仅此二篇。(《诗薮》内编卷一)

傅玄《秦女休行》,其事其奇,而写之不失分寸。夫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未有事离而情合者。(陆时雍《诗镜总论》)

(二)张华

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人。少孤贫。魏末,尝任中书郎等职。入晋,官至司空,进封壮武郡公。后因拒绝参与赵王伦、孙秀的篡权阴谋,被害。华博学而善作文章,尤好奖掖后进。有《博物志》十卷及诗文传世。事见《晋书·张华列传》。

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一面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华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晋书·张华列传》)

张华有《鹪鹩赋》一篇,本庄周之意,言位尊而险,无用安处的道理。赋作于何时,已不得考见。观张华一生行事,实不免于知易行难。



(华)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晋书·张华列传》)

(华)为太常博士,转兼中书郎,虽栖处云阁,慨然有感,作《鹪鹩赋》。(《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

壮武初未知名,作《鹪鹩赋》以寄意,感其不才善全,有庄周木、雁之思。既赋《相风》、《朽舍》,亦踌躇于在高戒险,盛衰交心。及涉台司,不详数见,中台星坼,少子韪劝其避位,犹恋勿忍决。……然死以直谏,诚重泰山,壮武岂忘牧羊时乎?名位已极,笃于守经,徒为贾氏而死,适资人口耳!(《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

张华诗不如赋。其作大抵模仿前人，如《轻薄篇》、《游侠篇》学曹植《名都篇》、《白马篇》，《杂诗》学阮籍《咏怀》，《情诗》学《十九首》，这类作品的内容虽并非全无新创，但因好排比对偶，堆砌典故，雕琢辞藻，后人评价，褒贬不一。

晋司空张华诗：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矣。（钟嵘《诗品》）

张茂先五言，得风人之致，题曰《杂诗》、《情诗》，体固应尔。或疑其调弱，非也。观其《答何劭》二作，其调自别矣。但格意终少变化，故昭明不多录耳。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也。"语虽或过，亦自有见。

茂先五言，似对非对，中亦渐入俳偶。至如"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道长苦智短，责重困才轻，"则伤于拙矣。（《诗源辩体》卷五）

壮武文章，赋最苍凉，文次之，诗又次之。大抵去汉不远，犹存张、蔡之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张华《励志诗》九首，既云"安心恬荡，栖志浮云"，又云"进德修业，辉光日新"，内心矛盾，于斯可见。后人评价，褒贬亦各置一辞。



张茂先《励志》："山不让尘，川不辞盈。……"又曰："复礼终朝，天下归仁。""进德修业，晖光日新。"《三百篇》后，能以义理形之声韵以自振者，才见此耳。晋风浮荡不检，茂先以圣贤自励，可谓独立不群矣。史称其自少修谨造次必以礼度，有由然哉？（《颐山诗话》）

张华《励志》诗曰："甘心恬淡，栖志浮云"，竟以贪位被杀。……予笔此数事，以为行不顾言之诫。（《四溟诗话》卷一）

晋以下，若茂先《励志》、广征《补亡》……尚有前代典型。（《诗薮》内编卷上）

茂先失于气馁而不健，然其雍和温雅，中规中矩，颇有儒者气象。《情诗》、《杂诗》等篇，不免康乐千篇一体之讥；余若《励志》诸什，断不可以一概掩之。（《野鸿诗的》）

（张茂先《励志诗》）汉末东北之士为学最盛。张公此诗居然有端绪可寻。

张公诗惟此一篇，余皆女郎诗也。(《义门读书记》卷四)

二 陆机与潘岳

(一) 陆机

陆机（261—303），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出身世族，祖逊、父抗均为东吴名臣。少为吴牙门将。吴亡，十年不仕。太康十年，与弟陆云入洛，颇为张华推举，名动一时。然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与陆云、潘岳等结为“文章二十四友”。历任太子洗马、著作郎、中书郎等职。后成都王颖荐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太安二年，为成都王后将军、河北大都督，讨长沙王乂，兵败，为成都王所杀，年仅四十三。事见(《晋书·陆机陆云列传》)。

吴亡，陆机作《辩亡论》；入晋，又作《五等论》。前者以人心的向背，论吴之所以兴亡，见解较为深刻。后者惩于前代分裂教训，而倡言分封之制，则不免为迂阔之论。

(机）年二十而吴灭……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辩亡论》二篇。……机又以圣王经国，义在封建，因采其远指，著《五等论》。……(《晋书·陆机陆云列传》)



陆机《辩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文心雕龙·论说》)

士衡拟《过秦》作《辩亡论》，议封建作《五等论》，二者皆论政之文，故为粗枝大叶，而非论之正体。(章炳麟《国学讲演录·文学略说》)

陆机长于抒情小赋，其中一些赋序，情理并茂，价值不在赋文之下，如《豪士赋序》之讽刺齐王司马冏的矜功自伐。《吊魏武文序》设主客问答，实为文体之赋。其文写曹操的“内顾之缠绵”，“命促而意长”，既还原了一代奸雄的人的面目，也透露出人生的几多无奈。

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让，机恶之，作《豪士赋》以刺焉。……冏不之

悟，而竟以败。(《晋书·陆机陆云列传》)

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文心雕龙·哀吊》)

(《豪士赋序》) 顿挫回薄，意内言外，不当仅赏其清新。(《骈体文钞》卷二…)

陆机以亡国之臣入洛，又才高自负，热衷功名，仕于乱朝，不免为时人所忌。故上述文章，大抵有作者的忧惧之情，难言之隐。

陆氏为吴世臣，士衡才冠当世，国亡主辱，颠沛图济，成则张子房，败则姜伯约，斯其人也。俯首入洛，竟縻晋爵，身事仇雠，而欲高语英雄，难矣。……然结冤乱朝，文悬万载，吊魏武而老奸掩袂，赋豪士而骄王丧魄。《辩亡》怀宗国之忧，《五等》陈建侯之利，北海之后，一人而已。(《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余读《陆机传》及其文章，以为皓作淫虐，自祸厥宗，虽世勋苗胄，改事新主无嫌也，犹裴回十岁，不忍死其宗室故君。既不获已而仕于晋，重遇惠帝昏乱，执不洁全，颠荡伦、颖之间，以疏逖俘余、总督六师、近监于王姻，远构于媟御，转相牵掣，虽有穰苴之略，未或不崩。谗人间之，至于陨身湛宗，三英同戮。以彼其明、而日月暗于微眚，思之未尝不愤懑也。然撮其文章行迹，犹不失为南国仁贤。(章炳麟《文录初稿·陆机赞》)

陆机诗今存百余首，大抵为模拟乐府、古诗之作，内容与形式，皆少有创新。



拟古皆逐句摹仿，则情兴窘缚，神韵未扬，故陆士衡《拟行行重行行》等，皆不得其妙，如今人摹古帖是也。(《诗源辩体》卷三)

拟古诗须仿佛古人神思所在，庶几近之。陆士衡拟古，将古人机轴语意，自起至讫，句句蹈袭，然去古人神思远矣。《拟行行重行行篇》云"揽衣有余带，循形不盈衿"，即"相去日已远，衣带日以缓"之意也。不惟语句板滞，不如古人之轻宕，且合士衡十字，总一"缓"字包括无遗，下语繁简迥异如此，便见作者身分矣。……其余全篇(按：指陆机所拟《十九首》)刻画古人，不可胜录，所谓桓温之似刘琨，其无所不似，乃其无所不恨者。夫以士衡之才，尚且如此，则拟古岂容易哉！(贺贻孙《诗筏》)

《诗》曰："蟋蟀在堂，岁聿云暮。今我不乐，日月其除。……"陆士衡

云："来日苦短，去日苦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全是诗人之体。……陆士衡"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则本《楚词》"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对床夜语》卷一）

陆士衡《拟古诗》，名重当世，余每病其呆板。（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但陆机的《门有车马客行》写吴亡之痛，《猛虎行》、《赴洛道中作》写人生之艰难，进退之犹豫，《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写故人之阻隔，心境之索寞，《君子行》写自己既热衷仕进，又惧怕政局的翻覆，都能真切地传达出他由吴入晋后的处境和心情，如《君子行》：

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近火固宜热，履冰岂恶寒。……福钟恒有兆，祸集非无端。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朗鉴岂远假，取之在倾冠。近情若自信，君子防未然。（《君子行》）

《猛虎行》，起乎反古词之意。宋人翻案实祖述于此。……

《君子行》，较之古词尤为深切。……

《门有车马客行》，悲凉古直。（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七）

陆机上述诗中，多情景相生语，显示出自曹植以来，自然景物渐入诗坛的历史趋势。如《赴洛道中作》：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几不能寐，振衣独长想。（《赴洛道中作》其二）

其《招隐诗》体貌山水，穷形尽相，末尾缀以议论，实已开谢灵运山水诗的先声。

……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哀音附灵波，颓响赴曾曲。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招隐诗》）

因时风习染，陆机作诗，好炫博知识，锻炼词藻，以至情繁而词隐。

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可复称极，不审兄由以为尔不。（陆云《与兄平原书》）

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章传》）

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文心雕龙·镕裁》）

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词隐。（同上《体性》）

士衡才思有余，但胸中书太多，所拟能痛割舍，乃佳耳。（陈绎曾《诗谱》）

陆士衡雍容华赡，词秾态远，固足动人。惜其心之意之所至，大半分向词而上去也。（历志《白华山人诗说》）

陆机诗又开六朝重俳偶的风气。中古诗歌，体气渐弱，由此而起。

陆士衡翩翩藻秀，颇见才致，无奈俳弱何。（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士衡旧推大家，然通赡自足，而绚缘无力，遂开出排偶一家。（沈德潜《说诗晬语》）

五言古诗，不废排比对偶。然如陆士衡则伤气……（施补华《岘傭说诗》）



平原五言乐府，一味排比敷衍，间多硬语；且踵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均无足观。（黄子云《野鸿诗的》）

陆机又有以赋体论文的《文赋》，对文学功能、艺术灵感，艺术构思、文质关系、文体分类、文体特征乃至具体的文学技法，均有论述，是我国第一篇系统的文学创作论。

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

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文心雕龙·总术》)(按：刘勰所云“泛论纤悉”，正是陆机论文的广泛性、系统性之所在。)

晋人论文之作，以陆机之赋为最先。观其所举文体，惟举赋、诗、碑、诔、铭、箴、颂、论、奏、说，不及传状之属，是即文、笔之分也。(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

自古惟能文之士为能论文，否则皮傅之语，必无是处。士衡《文赋》，区分十类，虽有不足，然语语确切，可作准绳。其言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十类以外，传状序记，士衡所未齿列。……士衡缘情、体物二语，实作诗造赋之要。……盖体物者，铺陈其事，不厌周详，故曰浏亮。缘情者，咏歌依违，不可直言，故曰绮靡。(章炳麟《国学讲演录·文学略说》)

《文赋》对文学本质的研究，直接影响到刘勰之作《文心雕龙》。

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

(二) 潘岳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县东)人。与其侄潘尼以文学著名，世称“两潘”。少以才颖知名，举秀才，十年不得官。出为河阳、怀令。依附权贵杨骏，骏诛，除名，岳性轻躁，趋世利，谄事贾谧，为“文章二十四友”之首。后为孙秀所诬，夷灭三族。事见《晋书·潘岳列传》。



潘岳长于哀诔。《金鹿哀辞》、《泽兰哀辞》与《马汧督诔》情文并茂，皆是传世之作。

岳……尤善为哀诔之文。(《晋书·潘岳列传》)

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文心雕龙·诔碑》)

及潘岳继作，实踵其美。观其虑善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趋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文心雕龙·哀吊》)

汧督马敦立功孤城，为州司所枉，死于图圄，岳诔之。(《文选》注引臧

荣绪《晋书》）

予读安仁《马汧督诔》，恻然思古之士，犹班孟坚之传苏子卿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潘岳又长于作赋。其《西征赋》描绘山川，咏叹史事，虽祖述汉人述征赋，但体尚骈俪，文多议论，又能见出自己的特色。

未几，（岳）选为长安令，作《西征赋》，述所经人物山水，文清旨诣……（《晋书·潘岳列传》）

潘岳《秋兴赋》、《闲居赋》，写自己厌弃官场束缚之苦，响往逍遥自得之乐。其描摹景物，述说怀抱，皆受宋玉、张衡赋的影响。与潘岳一生行事相比照，可知行不顾言，内心实有相当的矛盾冲突。

（岳）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晋书·潘岳列传》）

宋玉《九辩》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憀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送将归。"潘安仁《秋兴赋》引此语而曰："送归怀慕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难忍。"安以登山、临水、远行、送归为四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引《艺苑雌黄》）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元好问《论诗绝句》）



《闲居》一赋，板舆轻轩，浮杯高歌，天伦乐事，足起爱慕。孰知其仕宦情重，方思热客，慈母拳拳，非所念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潘岳诗大都绮密肤浅，唯《悼亡诗》三首纪念亡妻逝世周年，明净疏畅，深婉动人。后人《悼亡》之作，实由此而兴。

晋黄门侍郎潘岳诗。其源出仲宣。《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犹浅于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按：谢混，字益寿。华，张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

（钟嵘《诗品》）

安仁五言如"幽谷茂纤葛……""欻如敲石火，瞥若截道飚。"……皆俳偶雕刻者也。至如"川气冒山岭……""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等句，亦颇称工，而拙句则无矣。（《诗源辩体》卷五）

安仁体制既亡，气格亦降，察其才力，实在士衡之下。元美谓"安仁气力胜士衡，"误矣。（同上）

安仁情深而语繁冗，唯《内顾诗》"独悲"云云一首，《悼亡诗》"曜曜"云云一首，抒写新婉，余罕佳构。昔人谓之"潘江"，过矣！（《野鸿诗的》）

潘、陆诗如剪彩为花，绝少生韵。（《古诗源》卷七）

三　左　思

（一）左思生平

左思（250—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临淄县）人。父熹（《晋书·文苑传》作雍。据1931年洛阳出土的《左棻墓志》，左思父名熹，字彦雍。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学琴书，皆不成，乃勤于学。貌寝口讷，辞藻壮丽。泰始八年，妹左棻入宫拜修仪，乃移家京师，作《招隐诗》二首、《悼离妹诗》一首。官秘书郎。尝追随贾谧，为"文章二十四友"。泰始十年，左棻为贵嫔。永康元年，贾谧诛，左棻病逝，乃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齐王冏命为记室督，辞疾不就。晚年居冀州，病卒。在洛阳期间，思尝以十年心力，作《三都赋》；又感于世族专政的现实，作《咏史》八首。又有《娇女诗》、《杂诗》等传于世。事见《晋书·文苑传》、《后妃传》与《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左思别传》。



（二）《三都赋》

左思感于汉人都城赋耽于藻饰，夸诞失实，乃稽考图籍，采访人物，以十年心力，撰成《三都赋》。

（思）复欲赋三都……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

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晋书·文苑传》)

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左思《三都赋序》)

《三都赋》的结构模式虽无创新，但因作者务在征实，故于山川方物的描绘，亦有特色。如《蜀都赋》描写蜀中方物：

夫蜀都者……于前则跨蹑犍牂，枕輢交趾，经途所亘，五千余里。山阜相属，含谿怀谷……火井沈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于西则右挟岷山，涌渎发川……其封域之内，则有原隰坟衍，通望弥博……尔乃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蜀都赋》)

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怪，良可贵也。(卫权《三都赋略解序》)

《三都赋》的征实与夸张，并行不悖，可与史记相补充。但其文辞繁典富，多爱不忍，失于剪裁，依然未跳出汉大赋窠臼，以至同时之人，不得不纷然为之作注。



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至若此赋，拟议数家，傅辞会义，抑多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斯文吾有异焉，故聊以余思为其引诂…… (刘逵《注吴蜀二都赋序》)

有晋征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谧……览斯文而慷慨，为之都序。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借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卫权《三都赋略解序》)

汉末至魏，天下离析，京都大赋一度消歇。及三家归晋，天下复归一统，文人对西晋的中兴，不免有热切的期望。但晋实行分封之制，分裂危机，隐然可见，故文人对局势，又未尝不心怀隐忧。《三都赋》尊魏而抑吴、蜀，表明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仅在物象描绘。《三都赋》的主题，实有不同于汉代京都大赋的时代特征。

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魏都赋》）

曩者汉室内溃，四海圮裂，孙刘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拨乱，拥据函、夏。故作者先为吴蜀二客，盛称其本土险阻瑰琦，可以偏王，而却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丰丽，奄有诸华之意。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已著逆顺，且以为鉴戒。……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皇甫谧《三都赋序》）

东汉自光武及和帝，均都洛阳……故孟坚作《两都赋》，归美东都……平子之叙《西京》，尤侈靡无艺……孟、张二子，皆抑西而伸东，以二子均主居东者也。左思仍之，故三都之赋，力排吴、蜀，中间贯串全魏故实，语至堂皇；以魏都中原，晋武受禅即在于邺，此亦班、张二子之旨。（林纾《春觉楼论文》）

左思作《三都赋》，尝为陆机所讥；及《三都赋》成，又须名公宿儒推举，方能显称于世，此可见世族垄断文化的现实。而《三都赋》出，洛阳纸贵，又可见世族好炫博文采才学的风尚，已习染整个社会。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华）。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明之士。"思乃询求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世说新语·文学》）

司空张华见(《三都赋》) 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晋书·文苑传》）

（三）《咏史》

自班固《咏史》之后，建安诗人亦有借史咏怀者。但把历史的现象、经验与个人的现实遭遇、情感体验成功地融入诗歌，却自左思始。

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简贵。创成一体，垂式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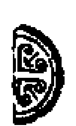
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沈德潜《古诗源》卷七）

（《咏史》）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

名为咏史，实为咏怀。（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一一）

《咏史》非作于一时。全诗或诉说胸襟抱负（其一），或批判世族霸占仕路（其二），或抒写愤激之情（其六），或宣言大释大悟（其八），不仅生动展现了左思的生活与精神历程，也深刻揭露了门阀世族制度的部分本质特征。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是涉世语；“贵者虽自贵，弃之若埃尘”，是轻世语；“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是出世语。（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左太冲若有见于孔、颜用舍行藏之意，但其壮志勃勃，急于有为，故气极似孟子。（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一一）

《咏史》无论写志向抱负、失望愤懑、高蹈遗世、安贫乐道，无不气势雄健，慷慨淋漓。诗人创造的自我形象或谋臣策士、游侠刺客、文人学者、高人隐士、失路英雄等历史人物形象，无不有睥睨四海的傲岸之气。如此作风与气概，钟嵘谓之“野”，刘熙载谓之“豪放”。

晋记室左思……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钟嵘《诗品》上）

钟嵘评左诗，谓“野于陆机……”此不知太冲者也。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辞，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古诗源》卷七）

野者，诗之美也。……若钟仲伟谓左太冲“野于陆机”，野乃不美之辞。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观《咏史》可见。（刘熙载《艺概·诗概》）

《咏史》用典引喻，神理俊爽；抒写怀抱，不假雕饰，又有淳朴浑成的风格。

（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钟嵘《诗品》上）

左太冲淳朴浑成……太冲如“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与。寥寥空宇内，所讲在玄虚。”“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等句，皆淳朴浑成者。（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五）

太冲《咏怀》（按：即《咏史》），景纯《游仙》，皆骨干清强，神理俊爽。（施补华《岘佣说诗》）

《咏史》在文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左太冲五言《咏史》，出于班孟坚、王仲宣，而气力胜之。（《诗源辨体》卷五）



《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诗薮》外编卷二）

太冲《咏史》……后惟明远、太白能之。（《古诗源》卷七）

太冲祖述汉魏，而修词造句，全不沿袭一句。落落写来，自成大家……（黄子云《野鸿诗的》）

《咏史》的浑成、豪壮，又是独立于当时的士族文化氛围之外的。

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唯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

（严羽《沧浪诗话》）

陆士衡、潘安仁、张景阳五言，其体渐入俳偶，而陆、潘语并入雕刻，景阳亦间有之。左太冲虽略见俳偶，却有浑成之气。刘勰谓四子"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则似无分别。（《诗源辨体》卷五）

在六朝而无六朝习气者，左太冲、陶彭泽也。（张蔚然《西园诗麈习气》）

壮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轻轩；二陆、潘、张；亦称鲁、卫。左太冲拔出于众流之中，胸次高旷，而笔力足以达之，自应掩诸家。（沈德潜《说诗晬语》）

太康诗，二陆才不胜情，二潘才情俱减，情深而才大者，左太冲一人而已。（成书倬云《多岁堂古诗存》卷四）

左思《招隐诗》虽源自淮南小山《招隐士》，但始于招隐，归于偕隐，却是这类作品的创调。

淮南小山作《招隐》，极道山中穷苦之状，以风切遁世之士，使无遐心，其旨深矣。其后左太冲、陆士衡相继有作，虽极精丽，顾乃自为隐遁之辞，遂与本题不合。（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一九引《朱文公文集》卷九语）

《乐府录》云：《招隐》，本淮南小山之作也。……后人因小山词更为五言，若左思"杖策招隐士"最为首出。（何汶《竹庄诗话》卷三）

《招隐》中的写景语，实已开晋宋山水诗门户，如：

……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招隐》）

太冲以气胜者也，"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至矣。而"岂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其韵故足赏也。（《诗薮》外编卷二）



第二节　南渡诸家

一　刘　琨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黎昌（今河北无极县东北）人。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文咏为当时所许。早年奢豪放荡，好老庄之学，为“文章二十四友”。历任尚书左丞、司徒左长史等职。八王乱起，中原板荡，与祖逖尝中夜闻鸡起舞，以豪杰相推许。光熙元年（306），因奉迎惠帝还洛阳有功，封广武侯。永嘉六年（307），任并州刺史，招抚流亡，抗击刘渊，兵败，父母被害。愍帝时任大将军，都督并、冀、幽三州军事，进位司空，与幽州刺史、鲜卑贵族段匹磾喢血盟誓，共击石勒。元帝初，迁侍中、太尉。后为段氏所疑，缢杀于狱中。事见《晋书·刘琨列传》。

刘琨身当离乱，慨然有天下之志，其议论时局，多有书表传世。如《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与丞相书》，痛陈沿途所见惨状，历数北上抗敌的艰危，不仅写得悲伤慷慨，而且指造时事，不尚骈俪，很不同于晋世文风。



越石兄弟……诗赋岂尽无传，顾乃奔走离乱，仅存书表。想其当日执槊倚盾，笔不得止，劲气直辞，迴薄霄汉。推此志也，屈平沅湘，荆卿易水，其同声邪？晋元渡江，无心北伐，越石再三上表，辞虽劝进，义切复雠，读者苟有胸腹，能无慷慨？……夫汉贼不灭，诸葛出师；二圣未还，武穆鞠旅，二臣忠贞，表悬天壤，上下其间，中有越石。（《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刘琨为段氏所拘，作《答卢谌书》。其文不独能坦诚地剖析自己，是一篇忏悔录式的文字，而且文中又说“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这在两晋士族崇尚浮虚、逃避

社会责任的风习中，的确是出类拔萃的。

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雕残。……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答卢谌书》)

刘琨传诗不多，四言《答卢湛诗》抒写家国之恨，五言《扶风歌》、《重赠卢湛》写志士的艰危处境，英雄的末路悲哀，慷慨苍凉，皆有为而发者。

(刘琨)《答卢中郎》五言，磊块一时，涕泪千古。……

实境诗于实境读之，哀乐便自百倍。……余每览刘司空"岂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未尝不掩卷酸鼻也？呜呼！越石已矣，千载而下，犹有生气。彼石勒、段磾，今竟何在？(《艺苑卮言》卷三)

四言诗缔造良难……刘琨《答卢湛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荡，准之变雅，似离而合。(《说诗晬语》)

孔北海《杂诗》"吕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刘越石《重赠卢湛诗》："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又称"小白相射钩"。于汉于晋，兴复之志同也。北海言"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越石言："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其欲及时之志亦同也。……

刘越石诗，定乱扶衰之志……第以"清刚"、"俊上"目之，殆犹未觇厥蕴。(《艺概·诗概》)



因时代与处境使然，刘琨的诗歌不独有建安风骨，更别有一种悲凉之气。

(晋太尉刘琨诗)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钟嵘《诗品》)

曹刘虎啸坐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元好问《论诗绝句》)

刘越石五言，篇什不多。其《赠卢湛》及《扶风歌》，语甚浑朴，气颇遒迈。(《诗源辩体》卷五)

刘太尉诗有孟德之气，子建之骨，特密处不似魏人耳。(毛先舒《诗辩

坻》卷二）

刘公干、左太冲诗壮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惟刘越石乎？（《艺概·诗概》）

（《重赠卢谌》）慷慨悲凉，故是幽、并本色。（《义门读书记》卷四六）

二、郭　璞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好经术，洞悉五行、天文、卜筮之术，辞赋号为“中兴之冠”。南渡后历任殷祐、王导幕参军。作《南郊赋》为元帝所赏，擢为著作郎，又升尚书郎。后任王敦记室参军，因借卜筮谏阻王敦谋反，被杀。王敦乱平，追赠弘农太守。平生著述甚丰。事见《晋书·郭璞列传》。

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所作诗赋诔颂亦数万言。（《晋书·郭璞列传》）

郭璞早期颇有辞赋，其中以《江赋》、《客傲》为最著名。《江赋》写景壮丽，设想新奇，唯好用古字奇典。《客傲》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牢骚语中，颇杂玄言。



璞著《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璞既好卜筮，缙绅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晋书·郭璞列传》）

景纯绮巧，缛理有余。（《文心雕龙·诠赋》）

《灵光》峭劲，为力颇殚；《景福》条畅，承胜徽缓；下及元虚之赋海，景纯之赋江，或以浑沦胜，或以征实胜，要皆不易之才，非等斤斤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中，极雕镂组织之工也。（林纾《春觉楼论文》）

郭璞南渡后深感世路坎壈，祸福难测，又目睹晋室豪族争权夺利，不思北伐，乃作《游仙》以明志。《游仙》的形式，虽源自汉

乐府，但其忧心时事的精神与隐而不显的风格，却源自《离骚》与《咏怀》。

郭景纯五言《游仙诗》，出于汉人《仙人骑白鹿》、《邪经过空庐》、《今日乐上乐》及子建“远游临四海”、“九州不足步”、“仙人揽六箸”等篇。(《诗源辩体》卷五)

景纯《游仙》，殆《杂诗》、《咏怀》之流，类多讽刺时事。钟记室讥少列仙之趣，王弇州亦云“奕奕佳丽，第少玄旨”，真门外语耳！(无名氏《静居绪言》)

游仙诗本之《离骚》，盖灵均处秽乱之朝，蹈危疑之际，聊为乌有之词以寄兴焉耳。建安以下，竞相祖述；景纯、太白，亦恣意描摹。(《野鸿诗的》)

《游仙》意象鲜明，造语奇丽；名为游仙，实为咏怀，在东晋诗坛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文心雕龙·明诗》)

景纯艳逸，足冠中兴。(《文心雕龙·才略》)

(晋弘农太守郭璞诗)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但《游仙》之作，辞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钟嵘《诗品》)



(郭璞)构思险怪而造语精圆，三谢皆出于此。杜、李精奇处皆取此。本出自淮南小山。(《诗谱》)

渡江以还，作者无几，非惟戎马为阻，当由清谈间之耳。景纯《游仙》，晔晔佳丽，第少玄旨。(《艺苑卮言》卷三)

东晋一朝无诗，以老庄汩之也。越石、景纯，西晋之后劲耳。(陈仅《竹林问答》)

太冲《咏怀》、景纯《游仙》，皆骨干清强，神理俊爽。(施补华《岘佣说诗》)

自《游仙》出，后之诗人取其谈玄而遗其取象；东晋诗坛之玄风大盛，可视作对《游仙》的消极发展。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

郭景纯《游仙诗》，与颜延年《五君咏》同一命意，皆愤激之词耳。……江文通拟景纯诗，专以游仙为题；昭明又厕景纯诗于何敬宗《游仙诗》后，标为游仙一门，均非悬解。至曹唐铺陈诡诞，大小《游仙》等作，累幅不休，痴人前政不得说梦。偶一览之，辄笑不能仰也。（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郭璞又有《幽思篇》，今存“林无静树，川无停流”二句，颇得玄对山水，澄怀观道的理趣，实已预示晋宋山水田园诗歌的即将兴起。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幽思篇》），阮孚云：“萧瑟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世说新语·文学》）

三　玄言诗人

东晋偏安日久，文人意气，更加消沉。其时，魏晋清谈之风，不仅相沿不改，又兼受佛理的影响，更朝着“精名理、善论难”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之下，产生了“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的玄言诗赋。孙绰、许询、袁宏、庾阐，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



（一）孙绰

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北）人。孙楚之孙。少好隐居，游放山水。博学善文，名冠江表。始任著作佐郎，历任太学博士、永嘉太守，官至廷尉卿。事见《晋书·孙绰传》。

孙绰以玄入诗，最为典型；兹举二例，以见东晋玄言诗大概。

大朴无象，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测深钩缅。谁谓道辽，得之无远。（《赠温峤诗》其一）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答许询诗》其一）

孙绰诗中，亦偶有佳句：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疏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市远朝。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秋日诗》）

又传孙绰有《情人碧玉歌》二首。东晋诗人开始学习、模仿南朝民歌，此是一例。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

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郎抱。（《情人碧玉歌》）（按：《玉台新咏》以此为孙绰作，《乐府诗集》以此为宋汝南王作。）

孙绰有《天台山赋》，其文虽多言玄理，然写景生动，声韵铿锵，甚为当时所重。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世说新语·文学》）



（二）许询

许询（生卒年不详），字玄度，高阳北新城（今河北徐水县西南）人。曾为道士，隐居永兴。与孙绰友善。早卒。事见《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续晋阳秋》及《晋书·王羲之传》。

许询玄言诗颇为时人称许，今仅有《竹扇诗》及《农里》等残诗传世。

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世说新语·文学》）

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同上，注引《续晋阳秋》）

玄言诗的产生，显示了玄学通过文人的思想行为影响文学，进而直接向文学渗透，从而取代了文学的一些基本特质。其实以玄学入诗，本来就是意落言筌，有悖于玄学对物道关系、言意关系的根本认识。所以，玄言诗既是对建安以来文学自觉的反动，也是对老庄与玄学本质的反动。因为如此，六朝的文艺批评家对玄言诗有十分中肯的批评。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钟嵘《诗品·序》）



第五章

晋宋山水田园文学

在晋宋时代，标志着文学完成了题材与风格转变的，是田园诗人陶渊明和山水诗人谢灵运。晋宋时期的著名诗人还有颜延之和鲍照，他们与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其中，能继承建安诗歌传统，发扬“左思风力”者，唯鲍照一人。

第一节　田园诗人陶渊明

一　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其曾祖陶侃以军功官至大司马，但因出身寒门，一生为士族不齿，尝被讥为“小人”。

陶侃，字士行……侃早孤贫，为县吏。……伏波将军孙秀……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侃州里也……侃诣之，晫……与同乘见中书郎顾荣，荣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共载？”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史臣曰：……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拔萃陬落之间，比肩髦儁之列……（《晋书·陶侃传》）

渊明祖父、父亲虽作过太守一类官职，但到了渊明的时代，家

境早已破败。

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宋书·隐逸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五柳先生传》)

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自祭文》)

因为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渊明少年时代既游好六经，有大济苍生的宏愿，又厌恶世俗，热爱自然。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八)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五)

(先生)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



因迫于生计，渊明二十九岁始入仕，作过州祭酒、参军一类小官。后因仕途坎坷，又不耐烦屈心抑志，周旋官场，更愤慨于南北士族的兼并无餍，王恭、司马道子、桓温、刘裕等人的篡乱相替，毅然辞去在任仅八十余日的彭泽县令，回柴桑归隐。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义熙末，征著作郎，不就。……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

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宋书·隐逸传》)(按：《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引思悦语云："思悦考渊明之诗有以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中有《乙巳岁为建威参军使节都经前溪作》，此年秋乃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即解印绶，赋《归去来兮辞》。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萧德施《渊明传》曰：'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于渊明出处，得其实矣。宁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以自取异哉？矧诗中又无标晋年号者，其所题甲子，盖偶记一时之事耳。后人类而次之，亦非渊明之意也。"渊明隐而不仕，原因不仅在晋宋易代；其诗有题甲子而不署年号者，亦与晋宋易代无关。思悦之说，可作参考。)

渊明自归居田园，二十二年间，虽生活窘困，但以耕读自娱，诗酒为伴，未再入仕。卒年六十三岁。

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之至，亦无迕也。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弥日不得。弘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惠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世号"靖节先生"。(萧统《陶渊明传》)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

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病患以来，渐就衰损。旧亲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与子俨等疏》）

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空，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

陶渊明的生平材料，见《宋书·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颜延之《陶征士诔》、萧统《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疏》、《自祭文》等。

二　陶渊明的田园诗

观陶渊明的诗文与行迹。他的由仕而隐不独绝无半点虚假，而且对自己的认识转变过程，有十分真诚的坦露。



（《归去来兮辞》）通篇以“觉今是而昨非”为主，“田园”二字，作两大柱。首二句唤起一篇之势，最有力。一行作吏，田园便芜，固是实赋，然亦有朝廷不治之意，此《归去来》之缘起也。然昨非只有“心为形役”一句，而通篇俱说今是。是非既辨，便当勇退，不须徘徊惆怅，此《归去来》之根本也。“既以”至“昨非”六句，皆就心头说，谓动念归去来之一刻，有不善未始不知；以下云云，去之甚速，盖知之未始复为也。……（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一一）

（《归园田居》）从出世后归田，与烟霞泉石人不同。譬如潜渊脱纲，无二鱼也，其游泳闲促，自露惊喜。元亮以居官为樊笼，不知八十余日作何等烦恼，无论三十年间矣。（蒋薰《陶渊明诗集》评语，卷二）

高尚之士，强入尘网，得复遂初，心乐难比拟。靖节八十日彭泽，想同羁鸟池鱼也。（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二）

“返自然”三字，道尽归田之乐，可知尘网牵率，事事俱违本性矣。（查初白著、张载华辑《初白庵诗评》卷上）

（《饮酒》其三）此言大道久丧，情欲日滋，当世之人，不肯适性保真，而徒恋惜世荣，殊不知一生之内，倏如电之过目，今乃舒缓怠惰，不自速悟，持此以往，欲何所成而垂名乎？盖不特以之讽人，亦以自警焉尔。（刘履《选诗补注》卷五）

（其十六）观后篇，意多所耻，终归田里。公年近四十而去官也，故云“向不惑”、“遂无成”。（蒋熏《陶渊明诗集》评语，卷三）

陶渊明归隐之后，亲事耕作，不独体察了劳动的艰辛，而且还获得了不计收获的快乐，这在士大夫“耻涉务农”（《颜氏家训·勉学》）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归园田居》其三）谭元春曰：高堂深居人动欲拟陶，陶此境此语，非老于田亩不知。（《古诗归》卷九）

前言桑麻，此言种豆，皆田园中实事，亦有次第。（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古人处畎亩之中，躬耕乐道，非若后世徒为丰积者比。靖节自辛丑岁七月于镇军幕赴假还后，日以耕稼自乐。及赋此诗，乃以“怀古”名题，意有在矣。其言圣人“忧道不忧贫”，而我瞻望远不易及者，盖犹有饥馁之累，不免务为农作，而转欲忘其长勤也。然既能忘其勤劳，且耕且种，即事欢欣如此，其于忧贫也复何有哉！（刘履《选诗补注》卷五）

……古来唯孔、颜安贫乐道，不屑耕稼，然而邈不可追，则不如实践陇亩之能保其真矣。篇中隐寓四古人，各相反照，悠然意远，不唯章法低昂起伏，并可知古人铸题之妙。（吴瞻泰《陶诗汇注》卷三）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衣食从有道说起，普为观获占地步，会心不远，无一非道也。（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

不以躬耕为耻，自不以仕进为荣矣！（张潮等《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三）

此获稻后赋岁功既成之可乐也，总重在当力田意。（张荫嘉《古诗赏析》卷一三）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钟伯敬曰：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也。



（《古诗归》卷九）

及时力田，田畯事游，襟期开朗，作诗自然高洁。（《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三）

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又写他几乎以平等的地位与农民亲切交流，这又是徒然以归耕标榜清高的士人所不曾有过的。

（《归园田居》其二）此篇言野外事简人静，绝无尘虑，唯与邻曲往来，共谈桑麻之长而已。（《选诗补注》卷五）

（《移居》其二）前首文心，此为农务，邻居中文质兼尽。曰“相呼”，又曰“各归”，各归之后，再说“相思”、“言笑”，言笑则与农务不尽相涉矣。又再结以“衣食”、“力耕”，见非荒嬉之谈也。“须纪”字、“不欺”字，仍是农务中扬推古今文心。（《陶诗析义》卷二）

……上章移居卜邻，得友论文；下章饮酒务农，不虚佳日。人苟乐此无厌，则狎邪之友何由而至，非僻之心无自而入。（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二）

（《杂诗》其一）“比邻”与“兄弟”相应。失常，则兄弟非亲；得欢，则比邻宜聚。（《陶诗析义》卷四）

因为有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的转变，陶渊明之描写田园生活、自然景物，便有了如下特点：

其一，诗人笔下的田园景物，无不与诗人自己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归园田居》）园田诸首，最有次第。其一为初回，地几亩，屋几间，树几株，花几种，远村近烟何色，鸡鸣狗吠何处，琐屑详数，语俗而意愈雅。恰见去忙就闲，一一欣快；极平常之景，各生趣味。次言乡里来往，“相见无杂言”，一切出仕应俗之苦套，不复入耳目矣。三言苗稀草盛，道狭露多，田园亦自有田园之苦况。而愿既无违，衣不足惜，自解自叹，与受俗苦、宦苦，宁受此苦。秤停轻重，较量有致。四言携子姪同采薪，慨然于邻里存没之感。五言独策复还，荆薪代烛，田园中真景实事，令人萧然悠然。前三首以入俗之苦，形归居之乐，此从田园外回头也；后二首以邻里之死，形独游之欢，此从田园中再加鞭也。（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

其二，诗中的田园景物，即是诗人寄托情怀的载体。

（《归园田居》其一）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田园。而后人田园之句，虽极其工巧，终莫能及。（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和郭主簿》其一）此陶公自述其素位之乐，真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者，岂矫情哉！公《与子俨等疏》云：“少学琴书，偶爱闲静。”“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此诗起数语意同。（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其二）（“露凝无游氛”四句）游氛少则半空无所障蔽，天加一倍矣，山亦加一倍矣。“高”字“耸”字承顶秋意，最为逗观。（“芬菊开林耀”句）秋来物瘁，气渐闭塞，林光黯矣；惟此孤芳，足以开景色，而生全林之光辉。（“衔觞念幽人”二句）尔，指松菊。千载之内，幽人不可见，但与此霜杰永诀耳！语傲而惨。（“检素不获展”二句）“简素”，自简平素也。曰“不获展”，又无由诀矣。“竟”字更惨。（《陶诗析义》卷二）

（《己酉岁九月九日》）此诗亦赋而兴也。以草木凋落，蝉去雁来，引起人生皆有没意，似说得甚可悲。（《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饮酒》其八）此借孤松为己写照也。前六句皆咏孤松，偏以连林陪写独树，加倍衬出，近挂又复远望，与松亲爱之甚，无复有尘事羁绊，此生亦不嫌孤矣。（吴瞻泰《陶诗汇注》卷三）



其三，又是诗人澄怀观道的媒介。

（《己酉岁九月九日》）王棠曰：“‘往燕无遗影’，妙在‘遗’字。‘哀蝉无留响’，妙在‘留’字，皆静察物理之言。”（《陶诗汇注》卷三引）

此诗纯是静字意境。而程子诗有句云：“春深昼永帘垂地，庭院无风花自飞”……亦非静者不能见得静中境界。然此犹皆空摹静字意境，乃是既静之后，自然流露出来。究不若靖节之静察物理，似尤为靠实也。（钟秀《陶靖节纪事诗品》卷二“宁静”）

（《饮酒》其五）通章意在“心远”二字，真意在此，忘言亦在此。从古高人只是心无凝滞，空洞无涯，故所见高远，非一切名象之可障隔，又岂俗物之可妄干。有时而当静境，静也，即动境亦静。境有异而心无异者，远故

也。心不滞物，在人境不厌其寂，逢车马不觉其喧。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王士祯《古学千金谱》）

其四，然而人不能完全否定昨日之我，也不能彻底无视身外的世界。少年时的济世心肠，田园外的离乱凋敝，常令陶渊明平和的心境掀起波澜。诗人归隐后的咏史、咏怀诗不独包藏着炽然的爱与恨，即一些田园诗，冲淡平和之中，亦往往能显示诗人内心的另一个侧面。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甫《遣兴五首》）

吾少时读《醉乡记》，私怪隐居者无所累于世，而犹有是言，岂诚旨于味邪？及读阮籍、陶渊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韩愈《送王秀才序》）

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陶澍《靖节先生集》引黄庭坚《跋渊明卷》）

世人论渊明，皆以其专事肥豚，初无康济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尝求其集，若云："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又有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其自乐田亩，乃卷怀不得已耳。士之出处，未易为世俗言也。（黄彻《䂬溪诗话》卷七）



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

晋人多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任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有物我同得语，倘幸列孔门，何必不在季次、原宪下。（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

……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

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更加抑扬，更离真实。……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其五，因为如此，诗、酒、田园在陶渊明的生活中融为一体。酒不独可以忘忧避祸，亦可使人遗落世事，返回真朴，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饮酒咏酒，乃成为陶诗的一大内容。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萧统《陶渊明集序》）

（《饮酒》）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真意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

陶渊明《止酒》诗，盖不得已而欲止于酒。“止”，犹“绵蛮黄鸟，止于丘隅”之止，非禁止之止也。居止城邑，坐止高荫，步止荜门，味止园葵，欢止稚子，皆止其所止也。而平生乃不能止于酒焉。暮止，则寝不安；晨止，则起不能，日日欲止之，则营卫不理，是岂涵世全身之道哉！今觉止酒为善，虽止扶桑涘可也。又何独止扶桑涘哉？虽千万祀亦可也。（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二）



《饮酒》诗，昌黎谓其有托而逃，盖靖节退归之后，世变日甚，故得酒必尽醉。其卒章曰：“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观此二语，则以醉而逃世网，洵可知也。（康发祥《伯山诗话》卷一《话古》）

（《饮酒》其七）此章乃说到饮酒。……酒可忘忧，泛此而遗世情可也，乃并遗世情而远之。太上忘情，情亦不设，一觞独进，杯尽而壶自倾，因物付物，不假造作。因思人生所遇，不过喧寂二境：万象不闻，喧中寂也；归林鸟鸣，寂中喧也。我从此啸歌寄傲东轩之下，娱德于喧寂之间，聊得此生已矣。彼役役于物者，皆失此生者耳。不欲酒得乎？（《古学千金谱》）

（《饮酒》）第二十首“羲皇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四句，乃渊明饮酒之旨。“真”对“伪”，“淳”对“漓”言也，言饮酒欲反真还淳也，故曰“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又曰“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又曰“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皆托饮酒以反真还淳，忘怀名利，

以了死生。(方宗诚《陶诗真诠》)

三　平淡而醇美的诗歌艺术风格

平淡之中有醇美，是陶诗最重要的艺术风格特征。

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苏轼《与苏辙书》)

人之为诗，要有野意。盖诗非文不腴，非质不枯，能始腴而终枯，无中边之殊，意味自长。风人以来得野意者，惟渊明耳。(陈知柔《休斋诗话》)

皇甫湜曰："陶诗切于事情，但不文尔。"湜非知渊明者。渊明最有性情，使加藻饰，无异鲍、谢，何以发真趣于偶尔，寄至味于淡然？陈后山亦有是评，盖本于湜。(《四溟诗话》卷四)

……拟陶彭泽诗，只是田家景色，无此老隐沦风趣，其似近而实远。

庾肩吾、张正见，其诗觉声色臭味俱备。诗之佳者，在声色臭味之俱备，庾、张是也；诗之妙者，在声色臭味之俱无，陶渊明是也。(《诗镜总论》)

陶诗的这一风格，源于诗人的秉性贵真，出语自然。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引苏轼语)



晋人作达，未必能达。靖节悲欢忧喜出于自然，所以为达。……观其《咏贫士》、《责子》与其他所作，当忧则忧，当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遇而皆适，未尝有择于其间，所谓超世遗物者。(《诗源辩体》卷六)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元好问《论诗绝句》)

……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文句，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

又源于诗人心地纯静，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了景与意会，物我合一的境界。

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景与意会，故可喜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引苏轼语)

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之情也。(《艺概·诗概》)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耳。(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

渊明诗中，更蕴含有深邃质朴的哲理。

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渊明避俗未闻道，此是东坡居士云。身似枯株心似水，此非闻道谁更闻？(邓广铭辑《辛稼轩诗文钞存》)

东坡尝拈出渊明谈理之诗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予谓渊明不止于知道，而其妙语亦不止是。如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如云："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拘形迹。"如云："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如云："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如云："及时当勉厉，岁月不待人。"如云："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分阴，念此使人惧。"观此数诗，则渊明盖真有得于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都穆《南濠诗话》)

晋人贵玄虚、尚黄老，故其言皆放诞无实。陶靖节见趣虽亦老子，而其诗无玄虚放诞之语。中如"纵浪大化中……""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涂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等句，皆达人超世、见理安分之言，非玄虚放诞者比也。(《诗源辩体》卷六)

渊明用语，质直中有工致，平淡中有奇奥，因而声韵浑成，气格兼胜，这也是陶诗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

或问："以《兰亭》诸诗较靖节，靖节自是当家，然靖节未可谓无意为



诗。"曰：渡江后以清谈胜，而诗实非所长，故《兰亭》诸篇仅尔。若靖节，则所好实在诗文，而其意但欲写胸中之妙耳，不欲效颜、谢刻意求工也。故谓靖节造语极工，琢之使无痕耳既非；谓靖节全无意为诗，亦非也。

靖节诗不为冗语，惟意尽便了……

靖节诗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写己怀，不事雕琢，故其语圆而气足，有一等见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彻，故其语简而意尽。……

靖节诗有三种：……如"行行循归路"、"自古叹行役"……等篇，则声韵浑成，气格兼胜，实与子美无异矣。(《诗源辩体》卷六)

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析之以炼字炼章，字字奇奥，分合隐现，险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

四　陶渊明的其他诗文

陶渊明归居田园之后，又有《拟古》九首、《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等组诗。这些作品，皆有为而作，与田园诗的内容和风格，很不相同。

靖节《拟古》九首，略借引喻，而实写己怀，绝无摹仿之迹，非其识见超越，才力有余，不克至此。……

先儒谓靖节退归后所作，多悼国伤时托讽之语，然不欲显斥，故以拟古等目名其题云。愚按：此论靖节甚当……且如士衡诸公拟古，皆各有所拟；靖节拟古，何尝有所拟哉？(《诗源辩体》卷六)



《拟古》九首，大抵遭逢易代，感世事之多变，叹交情之不终，抚时度势，实所难言，追借伤今，惟发诸慨……(温汝能《陶诗汇评》卷四)

(《杂诗》)十二首中愁叹万端。第八首专叹贫困，余则慨叹老大，屡复不休，悲愤等于《楚辞》，用复之法亦同之。……肠太热，意太壮，故入仕多恨。使从少之时，专意颐养，不问世事，脏腑之间，别是一副心理，又何处可着许多忧愁哉？极愁之后，结以不复言愁，而愁乃愈深。(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

《杂诗》诸篇，亦《拟古》余绪。味其声调，稍近张孟阳兄弟一流。(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一四)

陶靖节之《读山海经》，犹屈子之赋《远游》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悲痛之深，可为流涕。(王应麟《困学纪

闻》卷一八翁元圻案语)

《读山海经》诗，前七章为一类，后五章为一类。正以定哀微词，庄辛隐语，故托颂纂于前端，寄坎壈于末什。《拟古》九首，例亦同斯；寓义灼然，宁徒数典？(陈沆《诗比兴笺》卷二)

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是一篇集中体现其人生理想、社会理想的作品。关于该诗的取材与主题，众说纷纭。或有以为写实地实事者：

盖古桃源实在武陵境内；今则别自名县矣。然八景亦惟仙景者著称于世，是固所谓桃源，乃晋渔者逢避秦时人处也。其事陶靖节记甚悉。(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四十《送刘武陵诗引》)

或有以为写神仙之事者：

陶渊明所记桃花源，今武陵桃花观即是其处。余……数以问湖、湘间人，颇能言其胜事，云：自晋、宋来，由此上升者六人。山十里间无杂禽，惟二鸟往来观中，未尝有增损。鸟新旧更易不可知，耆老相传，自晋迄今如此。……渊明言刘子骥闻之，欲往不果。刘子骥见《晋书·隐逸传》，即刘驎之，子骥其字也。(郑景望《蒙斋笔谈》)

晋宋乱世，人有避地深山者。有此存在，又采以传说，此或《桃花源诗并记》之题材来源。



(江州)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

蛮民归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所在多深险，居武陵者有雄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谓之五谿蛮。而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宋书·夷蛮传》)

关于该诗的主题，或以为愤宋之作：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

境，不复出焉。……按《宋书》本传云："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故五臣注《文选》用其语，又继之云："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此说虽经前辈所诋，然予窃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洪迈《容斋三笔》卷十）

或以为其中亦寄寓有作者的人生理想：

时按：《桃花源记》一篇，诸家之解，或以神仙说，或以寓意说，或以实事实处说，未见一定也。考六朝时，士君子颇有喜异闻之风，桃花源亦是当时喧传之异闻，而陶公聆此，乃为记录之，取其合自家隐逸之理想，故谓为寓意亦可；注者以为托避秦以叙避宋之意，是也；谓为事实亦可，盖桃源地志所载，而刘子骥亦有其人，吴大澂著《游桃源洞记》，王先谦寻作其书后，详征诸史传，若有所得。苟以神仙说之，误甚。（郑文焯批、日本桥川时雄校补《陶集批录》）

或以为寄寓社会理想之作：

（《桃花源诗》）设想甚奇，直于污浊世界中另辟一天地，使人神游于黄农之代。公盖厌尘网而慕淳风，故尝自命为无怀、葛天之民，而此记即其寄托之意。如必求其人与地之所在而实之，则凿矣。（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五）



桃源之事，古来说者不一。……余窃谓靖节先生不应凿空妄语，意诗中所谓高寻吾契者，亦自谓羲皇上人同其寄托耳。矧男女耕作，秋熟春蚕，依然寻常日用之事，岂与游仙轻举者同日而道哉！（王文治《快雨堂题跋》卷六《自书桃源记》）

陶渊明今存赋三篇：《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虽属汉人旧题，但其立意，未人前人窠臼。

董广川《士不遇赋》云："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此即正谊明道之旨。司马子长《悲士不遇赋》云："没世无闻，古人唯耻。"此即述往事、思来者之情。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云："宁固穷以济意，不委

曲而累己。”此即屡空晏如之意。可见古人言必由志也。(《艺概·赋概》)

《归去来兮辞》则是诗人一篇辞仕归隐的宣言书：

(《归去来兮辞》)通篇以“觉今是而昨非”为主，“田园”二字，作两大柱。首二句唤起一篇之势，最有力。一行作吏，田园便芜，固是实赋，然亦有朝廷不治之意，此《归去来》之缘起也。然昨非只有“心为形役”一句，而通篇俱说今是。是非既辨，便当勇退，不须徘徊惆怅，此《归去来》之根本也。(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一一)

欧阳公曰：“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一篇而已。”余谓陶公胸怀淡远，妙处尚在语言文字之外。《归去来辞》直是曾点沂水春风一段注脚，即谓超越秦、汉，上接《风》、《骚》可也。(黄本骥《痴学》卷五)

因诗人意在真隐，故《归去来兮辞》出语真率，非一般贤人失志之赋可比。

李格非曰：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

《归去来辞》本自一篇自然真率文字，后人模拟已自不宜，况可次其韵乎？(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四)



《归去来兮辞》虽托于楚调，但因诗人胸次高旷，更绝无一般贤人失志之赋的反复申说，哀怨悱恻。

朱文公曰：“《归去》一篇，其词义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实用赋义，而中亦兼比。”此千古之确论矣。(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

(《归去来兮辞》)风格亦本楚骚，但《骚》侈此约，《骚》华此实。其妙处乃在无一语非真境，而语却无一字不琢炼，总之成一种冲泊趣味。虽不是文章当行，要可称逸品。(孙月峰评、闵齐华注《文选》卷一三)

《闲情赋》的题旨，众说不一。或以为比附君臣之事：

其赋中"愿在衣而为领"十段，正脱胎《同声歌》中"莞蕈衾帱"等语意，而吴竞《乐府题解》所谓"喻当时七君子事君之心"是也。《诗》曰："云谁之思，西方美人。"朱子谓"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离骚》"怨美人之迟暮"，亦以美人目其君也。此赋正用此体。(《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五)

按《闲情赋》序，其题旨当与张、蔡等赋同，皆言男女情事，而卒归于自我约束。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陶渊明《闲情赋》序)

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渊明作《闲情赋》，盖尤物能移人，情荡则难反，故防闲之。(俞文豹《吹剑四录》、张宗祥《吹剑录全编》第一百零七页)

赋情始楚宋玉、汉司马相如，而平子、伯喈继之为《定》、《静》之辞。而魏则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玚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晋张华作《永怀赋》，此靖节所谓"奕世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者也。(何孟春《陶靖节集》卷五)

五 陶渊明的地位和影响



晋宋诗风，渐趋浮靡；陶诗价值，未为时人所重。故《文心雕龙》不论陶诗，唯钟嵘以"隐逸诗人之宗"视之，论诗则列为中品。

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丽，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钟嵘《诗品》)

钟嵘品陶，徒曰隐逸之宗；以隐逸蔽陶，陶又不得见也。析之以忧时念乱，思扶晋室，思抗晋禅，经济热肠，语藏本末，涌若海立，屹若剑飞，斯陶之心胆出矣。(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

陶渊明超然尘外，独辟一家，盖非六朝之人，故诗亦非六朝之诗。(江盈

科《雪涛诗评》）

陶诗浑然之古，在六朝中自为格。（乔亿《剑谿说诗》卷上）

萧统对陶诗评价颇高，为之编集、作序、作传。但其《文选》仅选诗八首，文一篇，数量皆在颜、谢之下。

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校，粗为区目。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乎？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旁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肖统《陶渊明集序》）

唐代，陶诗的价值为人发现，自此以后，地位乃渐次上升。

靖节诗真率自然，倾倒所有，晋宋以还，初不知尚；虽靖节亦不过写其所欲言，亦非有意胜人耳。至唐王摩诘、元次山、韦应物、柳子厚、白乐天、宋苏子瞻诸公，并宗尚之，后人始多得其旨趣矣。（《诗源辩体》卷六）

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说诗晬语》）

古来称诗圣者，唯陶、杜二公而已。……余以为靖节如老子，少陵如孔子。（黄子云《野鸿诗的》）



第二节　山水诗人谢灵运

一　谢灵运的生平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世居会

稽（今浙江绍兴市）。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东晋末，先后任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抚军将军刘毅记室参军、卫军从事中郎。刘裕以宋代晋，降爵为县侯，任散骑常侍。少帝时，卷入上层斗争，出为永嘉太守。文帝时，征为秘书监，使整理秘阁图书，并撰《晋书》，未成。因不受重用，常称疾不朝。元嘉五年，免官还乡，乃纵游山水，又强索公湖，以广田宅。后为官吏弹劾，被迫"兴兵叛逸"，流放广州。元嘉十年，被杀，年四十九。事见《宋书·谢灵运传》。

二　谢灵运山水诗的思想特点

谢氏为东晋功臣，改朝换代后，为刘宋王朝所压抑。谢灵运热心功名而不得逞其志，又痛感士族利益受到伤害，更畏惧上层权力斗争的冷酷无情，因而徘徊于朝廷和山林之间，其所作的山水诗，自有一番不同于陶诗的情愫。

高祖受命，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灵运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游，徧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称疾去职。……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名动京师。作《山居赋》并自注，以言其事曰："……谢子卧疾山顶，览古人遗书，与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为轻；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质文咸其常。……判身名之有辨，权荣素其无留。孰如牵犬之路既寡，听鹤之途何由哉！……"太祖登祚，诛徐羡之等，征为秘书监，再召不起。上使光禄大夫范泰与灵运书敦奖之，乃出就职。……灵运诗书皆独绝……文帝称为"二宝"。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乃上表

陈疾，上赐假东归。将行，上书劝伐河北。……灵运以疾东归，而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复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重，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徐知是灵运乃安。……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太守孟）顗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岯崲湖为田，顗又固执。灵运……与顗遂构仇隙。因灵运横恣，百姓惊扰，乃表其异志……灵运驰出京都，诣阙上表……太祖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加秩中二千石。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廷尉奏灵运率部众反叛，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乃诏曰："……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宋书·谢灵运传》）

吾闻达士道，穷通顺冥数。通乃朝廷来，穷即江湖去。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皆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物，亦欲抒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谕。因知康乐作，不独在章句。（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七《读谢灵运诗》）

谢灵运在永嘉、临川，作山水诗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浮躁不羁，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践祚，灵运已播扇异同，非毁执政矣。及文帝召为秘书监，自以名辈应参时政，而王昙首、王华等名位逾之，意既不平，多称疾不朝，则无君之心已见于此时矣。后以游放无度，为有司所纠，朝廷遣使收之，而灵运有"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之咏，竟不免东市之戮。（《韵语阳秋》卷八）



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何知下伍徒步，乃作天子，客儿比肩等夷，低头执版，形迹外就，中情实乖。文帝继绪，轻戮大臣，与谢侯无夙昔之知，绸缪之托，重以孟顗肩谤，彭城坠渊，寻山陟岭，伐木开径，尽录罪状。……盖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倔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予所惜者，涕泣非徐广，隐遁非陶潜，而徘徊去就，自残形骸，孙登所谓抱叹于嵇生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三　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风格

因为谢氏家族的文化传统，又因为谢灵运个人的文化素养、思想心境以及他优游山水的物质条件和鉴赏山水的士族品位，谢灵运的山水诗与陶渊明的田园诗，有迥不相同的艺术风格。

谢灵运山水诗的最大特点，是善于经营画境。所以如此，是因为谢灵运的领略山水，不是陶渊明式的静观，而是移步换景式的游赏。静观须心境纯静，方能物我亲切交流，落笔成诗，便出意境。游赏则寻幽揽胜，山水异态，纷至沓来，耳目为声色所感，摛藻绘象，乃成画境。

汉魏诗兴奇深远，渊明诗真率自然。至于山林丘壑、烟云泉石之趣，实自灵运发之，而玄晖殆为继响。灵运如“水宿淹晨暮”等句，于烟云泉石，描写殆尽。黄勉之谓“如川月岭云，玩之有余，即之不得。”冯元成谓“语不能述，画不能图”是也。（《诗源辩体》卷七）

谢康乐之诗，虽是涉于对偶，然而森蔚璀玮，繁密错褥，一句一字，极其深思，昔人谓无一篇不佳。今观其《入彭蠡》、《华山冈》、《七里濑》、《始宁墅》、《富春渚》诸诗，模写行役江山，历历如画，信一代之伟作也。（《颐山诗话》）



康乐情深于山水，故山游之作弥佳，他或不逮。抑亦登览所及，吞纳众奇，故诗愈工乎？龙门足迹遍天下，乃能作《史记》；于瞻海外之文益奇。善游者以游为学可也。（《采菽堂古诗选》卷一七）

因为登山临水，视野开阔；又因为景有远近，色有浓淡，诗人依其感官印象纳入画面，其山水林木，乃粗具透视关系，诗歌的画境，因而获得一种疏宕清丽之美。此与汉赋对山川方物的全景式描绘相比，无疑是一次质的飞跃。

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

拂衣遵沙垣，缓步入蓬屋。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过白岸亭》）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汉魏之诗，如画家之落墨于太虚中，初见形象。一幅绢素，度其长短、阔狭，先定规模，而远近浓淡，层次脱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诗，始知烘染设色，微分浓淡，而远近层次，尚在形似意想间，犹未显然分明也。盛唐之诗，浓淡远近层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备。(叶燮《原诗》外篇下)

谢灵运又通玄、禅二理，其山水诗往往情、景、理兼长。

谢诗有极易入目者而引之益无尽，有极不易寻取者而径遂正自显然。顾非其人，弗与察尔。言情则于往来动止、缥缈有无之中，得灵蚃而执之有象；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落笔之先，匠意之始，有不可知者存焉，岂徒"兴会标举"如沈约之所云者哉！(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

康乐于汉魏外，别开蹊径，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洵堪睥睨一世。(《野鸿诗的》)

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艺概·诗概》)

然而与陶渊明相比，谢灵运距澄怀观道尚有一定距离。兼之受东晋玄言诗的影响，其借山水化其郁结，不免哲理游离于景物之外，形成叙事——写景——说理的模式。



晋宋间谢灵运辈，纵情丘壑，动逾旬朔，人相以为尚，乃其心则未尝无累者。唯陶靖节超然物表，遇境成趣，不必泉石是娱，烟霞是托耳。其诗……皆遇境成趣，趣境两忘，岂尝有所择哉！(《诗源辩体》卷六)

谢灵运一意回旋往复，以尽思理，吟之使人卞躁之意消。(王夫之《姜斋诗话》)

谢灵运摹景状物，炼句用字，较陶渊明有更为刻意的追求，故其诗又有精工密丽、深涩厚重的特点。

(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

繁芜为累。（钟嵘《诗品》）

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沧浪诗话》）

弃淳白之用，而竞丹雘之奇；离质木之音，而任宫商之巧，岂非世运相乘，古始易解，即谢客有不得而自主者耶！（焦竑《题谢康乐集》）

太康五言，再流而为元嘉。然太康体虽渐入俳偶，语虽渐入雕刻，其古体犹有存者。至谢灵运诸公，则风气益漓，其习尽移，故其体尽俳偶，语尽雕刻，而古体遂亡矣。……刘勰云："宋初文咏，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造新，此近世之所竞"是也。《南史》载："灵运车服鲜丽，衣物多改旧形制，世共宗之。"其畔古趋变类如此。（《诗源辨体》卷七）（按：许氏引刘勰语，"宋初文咏"后脱"体有因革"句；"造新"当作"追新"。）

因为如此，谢诗往往有佳句而少佳篇。

"池塘生春草"，虽属佳韵，然亦因梦得传。"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语饶霁色，稍以椎炼得之。"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不琢而工。"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不淘而净。"杪秋寻远山，山远行不近"，不脩而妩。"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不绘而工。此皆有神行乎其间矣。

谢康乐诗，佳处有字句可见，不免硁硁以出之，所以古道渐亡。（陆时雍《诗镜总论》）



五言自士衡至灵运，体尽俳偶，语尽雕刻，不能尽举。然士衡语虽雕刻，而佳句尚少，至灵运始多佳句矣。灵运如"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秋岸澄夕阴，火旻团朝露。""远岩映兰薄，白月丽江皋。"等句，皆佳句也。然语虽秀美，而未尽镕液。至如"水宿淹晨暮，阴霞屡兴没。""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池塘生春草，园林变候禽。""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等句，始为镕液矣。即鲍明远所谓"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王元美谓"琢磨之极，妙亦自然"者也。（《诗源辨体》卷七）

"池塘生春草"，单拈此句，亦何淡妙之有！此句之根在四句之前："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乃其根也。"褰开暂窥临"下，历言所见之景，至于

池塘草生，则卧痾前所未见者，其时节流换可知矣。此等处皆浅浅易晓，然其妙在章而不在句，不识读诗者何以必就句中求之也。（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引黄陶菴语）

四　谢灵运的地位与贡献

因有胸襟志趣、生活环境的相异，陶、谢诗乃有田园与山水、意境与画境的不同。但在把自然景物纳入审美视野与文学创作方面，两人的贡献却是一致的。

有灵运然后有山水，山水之蕴不穷，灵运之诗弥旨。山水之奇，不能自发，而灵运发之。仆尝一游吴、越之山水矣，每当即景延览之际，忆“昏旦变气候……游子淡忘归”之诗，击杖而歌，低回无已。及其风泉奔会，林籁相发，与夫岚霭烟霏，举目无状，乃知“异音同至听”，“空翠难强名”诸语之妙有化工。故谓山水之奇蕴，无时不肖，而游非其人，不知也。（无名氏《静居绪言》）

刘勰云：“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游山水诗，应以康乐为开先也。（《说诗晬语》）

谢诗匠心独运，别开境界，在古代山水诗中，为一大宗派。

前人评康乐诗，谓：“东海扬帆，风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约匠心独造，少规往则，钩深极微，而渐近自然，流览闲适中，时时浃洽理趣。（《说诗晬语》）

老庄告退，山水方滋。康乐善游，精于独造，其写山水诸作，千秋绝调。归愚谓谢公能于山水闲适之中，时时浃洽理趣，故诗品高不可攀。又谓永嘉山水奇丽，康乐诗境肖之；西蜀山川雄险，工部诗境肖之；永、柳山川幽峭，柳州文笔诗境肖之。略一转移，失却山川真面。所以山水诗，以大谢、老杜为宗，参以柳州，可尽其变矣。此论虽正，是知其当然，而未悉其所以然之妙也。……相山水雄险，则诗亦出以雄险；山水奇丽，则诗亦还以奇丽；山水幽峭，则诗亦与为幽峭；山水清远，则诗肖其清远，凡诗家莫不能之，犹是外面功夫，非内心也。即于写山水中，由景生情立意，以求造语合符理境，又由情起一波澜，以求语有风趣，亦非难事。……夫文贵有内心，诗家亦然，

而山水诗尤要。盖有内心，则不惟写山水之形胜，并传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其山情水意，天所以结构之理，与山水所得于天，以独成其奇胜者，则绝无相同重复之处。历一山水，见一山水之妙……游者领悟当前，会心不远……是游山水之情，与心所得于山水者，又各不同矣。作山水诗者，以所心得，与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证，而潜会默悟，凝神于无朕之宇，研虑于非想之天，以心体天地之心，以变穷造化之变……必使山情水性，因绘声绘色而曲得其真，务期天巧地灵，借人工人籁而毕传其妙，则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并与天地之性情、精神相通相合矣。……造诣至此，是为人与天合，技也进于道矣，此之谓诗有内心也。康乐、工部二公之后，《广陵散》绝已久，柳州望门而未深入，不足嗣音。归愚翁所论，祗能模范山水，未能作为表章，以附山水知己也。（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

谢灵运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刻画山水艺术形象，亦为后世诗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富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钟嵘《诗品》）

谢灵运以险为主，以自然为工，李、杜取深处，多取此。（陈绎曾《诗谱》）



灵运以丽情密藻，发其胸中奇秀，有骨、有韵、有色，时有字句滞累，即从彼法中带来。（《古诗归》卷一一钟惺语）

凡丽密诗，薄不得，浊不得。康乐气清而厚，所以能丽能密。（同上）

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康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鐻乎？（《诗镜总论》）

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陶诗胜人在不排；谢诗胜人正在排。（《说诗晬语》）

第三节　颜延之与鲍照

一　颜延之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少孤贫，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世。晋时为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入宋为太子舍人。少帝即位，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汨潭，作《祭屈原文》。文帝时为中书侍郎，转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因触犯权臣刘湛，出为永嘉太守，愤而作《五君咏》以寄意。刘湛诛，入朝任侍中、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孝武即位，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谥曰宪子。延之性褊激，嗜酒；居身清约，不营财利；肆意直言，不畏权贵，故不能取容于当世。与陶渊明友好，尝作《陶征士诔》；诗与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事见《宋书·颜延之传》。

颜延年饮酒袒歌，自云“狂不可及”。……玩世如阮籍，善对如乐广……江左辞采，颜谢齐名。延年文莫长于《庭诰》，诗莫长于《五君》……三十不昏，以文出仕，历四主，陪两王，浮沉上下，老不改性。诋尚之为“朽木”，斥慧琳为“刑余”（引者按：以上两事见《宋书》本传）……远吊屈大夫，近友陶征士，其风流固可想见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颜延之今存诗二十九首，未见有山水诗，却多应诏之作。其诗辞采繁密，好用典故，即抒情诗亦不免艰涩深晦，体尽俳偶。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钟嵘《诗品·序》)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

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钟嵘《诗品》卷中）

延之创撰严整，而斧凿时露，其才大不胜学，岂惟惠休之评，视灵运殆更霄壤。如《应诏曲水讌》，而起语云："道隐未形，治彰既乱。……惟王创物，永锡洪算。"与题有毫发干涉耶？至于《东宫释奠》之篇起句："国师尚位，家崇儒门"，老生板对，唐律赋之不若矣。（《艺苑卮言》卷三）

颜延年诗，体尽俳偶，语尽雕刻。然他篇尚觉明爽，惟四言如《应诏讌曲水》、《皇太子释奠》、《宋郊祀歌》，五言如《应诏观北湖田收》、《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拜陵庙》诸作，艰涩深晦，殆不可读。其意欲法《雅》、《颂》，实则《雅》、《颂》之厉耳。……岂当时以艰涩深晦者为铺锦镂金耶？然延年较灵运，其妙合自然者虽不可得，而拙处亦少，观其集当知之。（《诗源辩体》卷七）

五言古诗，不废排比对偶。然如陆士衡则伤气，如颜延之则窒机，盖整密中不可无疏宕也。（《岘佣说诗》）

颜延之《五君咏》伤贬黜，寄怨愤，自有清拔之气。

延年《五君》忽自秀于它作，如"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以比己之肮脏也；"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以解己之任诞也；"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以感己之濡滞也。语意既隽永，亦易吟讽。"明月照积雪"，是佳境，非佳语；"池塘生春草"，是佳语，非佳境。此语不必过求，亦不必深赏。



延年诗长于廊庙之体，然如《五君咏》，抑何善言林下风也。所蕴之富，亦可见矣。（《艺概·诗概》）

延之奉使北上，作《北使洛》，写中原残破，较有特色。
其《秋胡行》以细腻之笔，写游子思妇之苦，亦属上乘。

沈约《宋书》云："延年至洛阳道中，作诗一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竹庄诗话》）

……嗟余怨行役，三陟穷晨暮。严驾越风寒，解鞍犯霜露。原隰多悲凉，回飙卷高树。离兽起荒蹊，惊鸟纵横去。悲哉游宦子，劳此山川路。……

(《秋胡行》)

二 鲍 照

(一) 鲍照生平

鲍照(414? —466),字明远,东海(今江苏涟水县北)人。出身寒微,少有才名,一生备受压抑。曾为国侍郎。孝武帝时,出任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后又出为秣陵令,转永嘉令。临海王刘子顼守荆州,任为前军参军,故世称鲍参军。泰始元年,晋安王反,临海王起兵响应。翌年兵败,鲍照死于乱军。事见《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南史·宋临川烈武王道规传》。

(二) 鲍照诗作

南朝时期,能继承建安诗歌传统,发扬"左思风力"者,惟鲍照一人。组诗《拟行路难》十八首、《拟古》八首是其代表之作,皆非作于一时。

其中有抒发少年壮志者:

十五讽《诗》、《书》,篇翰靡不通。弱冠参多士,飞步游秦宫。侧睹君子论,预见古人风。两说穷舌端,五车摧笔锋。羞当白璧贶,耻受聊城功。晚节从世务,乘障远和戎。解佩袭犀渠,卷袠奉卢弓。始愿力不及,安知今所终!(《拟古》其二)

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拟古》其三)



有控诉门阀士族之摧残压抑人才者: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拟行路难》其四)